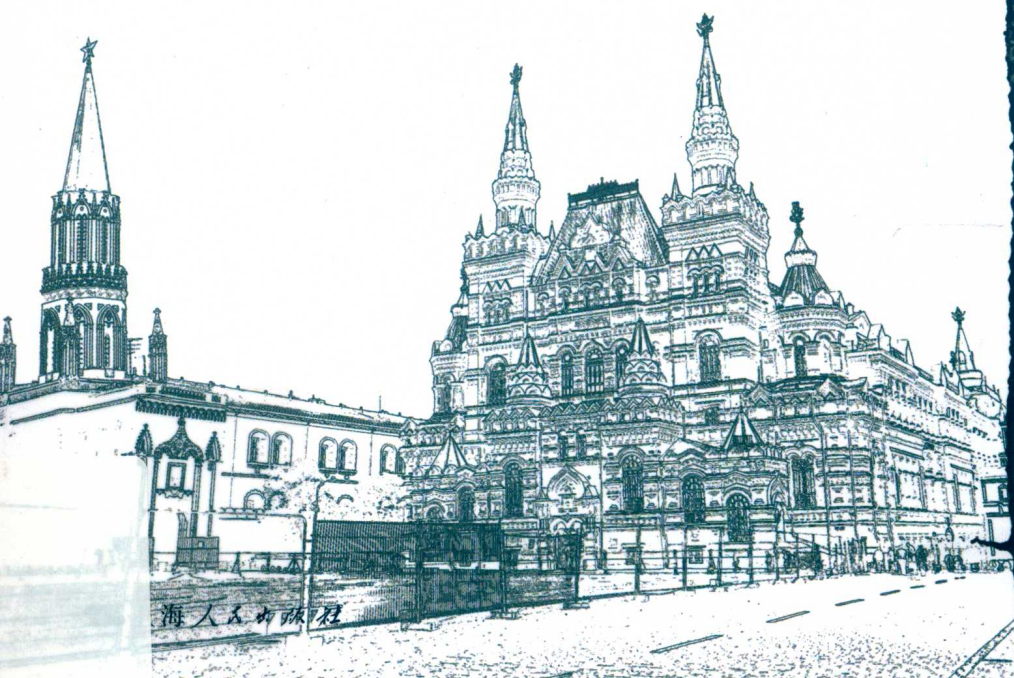


郑异凡◎著

大转变





苏联春秋 大转变

郑异凡◎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春秋.大转变/郑异凡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ISBN 978-7-208-15167-3

I. ①苏… II. ①郑… III. ①苏联-历史 IV. ①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9085 号

序 言

1929年底，斯大林踌躇满志地写下《大转变的一年》。

对斯大林来说，1929年确实是大转变的一年！经过多年的争斗，斯大林打败了他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29年斯大林又击败了最后一个反对派——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现在他可以宣布取得完胜了。

十月革命初期斯大林还是个知名度不高的人物，排在他前面的不仅有列宁，还有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人有才能，有实力，领兵打仗，鼓动演说，文字写作能力，都在斯大林之上。群众大会上被高呼万岁的有列宁、托洛茨基，有时还有季诺维也夫，但从来没有斯大林。列宁逝世后短短的五年时间内，斯大林能够打败这些强人，确实是一个奇迹。试问，斯大林的诀窍何在？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其他武器。斯大林

领会其中奥妙，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两个著名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这就是斯大林取胜之秘笈。革命初期，那些领导人都不屑于或者瞧不起默默无闻的组织工作，只有斯大林毫无怨言地在组织人事领域埋头苦干，斯大林能够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这三个重要职务并不是偶然的，这样一来斯大林就抓住了共产党内部最核心的权力——组织人事权，把干部的选拔、任免、升降、调动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形成一股坚不可摧的力量。经过斯大林的操作，那些在革命中处于二流三流的人物如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被提拔上来，取代列宁的近卫军。“干部决定一切”，诚然！“技术决定一切”，搞党内斗争是要有技术、有手腕的。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拉一派打一派，各个击破，斯大林先是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打头号政敌托洛茨基，然后拉布哈林、李可夫来打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打倒此三人后，斯大林的羽翼已经丰满，拉出自己的队伍打倒最后对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中止了新经济政策，这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转变，可以说是决定苏联今后命运的大转变！斯大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宣布，新经济政策已经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了，我们要让它“见鬼去”。稍后他对自己的“见鬼去”的说法作了解释：“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就凭这几句话，斯大林打发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见鬼去了”！^①此前联共（布）中央并没有讨论过这一重大问题，更没有作出中止新经济政策的决定。强行中止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就堵死了利用市场机制，甚至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可能性，重新回到被废弃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上去，斯大林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恶性发展。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一个标志就是改变农业的方针，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列宁在最后的文章中曾经提出通过流通领域的合作社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这种合作社是农民能够接受的，农民在其中仍然是独立的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土地和农具牲口。1928年发生所谓粮食收购危机，这本来是市场机制运用不当造成

^①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163页。

的,通过调节价格和政策,应当是可以解决的,但是不喜欢小生产者农民的斯大林决定实行农业集体化,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在这过程中说是剥夺“富农”,实际上是剥夺全体农民,使他们成为没有土地、没有农具、没有耕畜的集体农庄庄员,而集体农庄的任务则是保证国家能够方便地取得所需的粮食供工业化之用,农民实质上成为替国家耕种的“国家农奴”。集体化是一场大灾难,是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其直接后果是1932—1933年的大饥荒,其长远后果是苏联农业从此一蹶不振,农业产量直到50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苏联把一个沙俄时期的粮食出口国变成了一个粮食进口国!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开始了对国内各阶层、各级干部的清洗。从1928年开始,国内陆续举行各种审判案,如沙赫特案、孟什维克案、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案、莫斯科的三次公审案、秘密举行的军事阴谋案,打击的矛头从工程技术人员、原反对党派,到党内现存的和已经投降认错的反对派人员,还有毫无过错的军事领导人。大规模的清洗造成告密成风,人人自危,集中营人满为患。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卫国战争初期苏军缺乏能征善战的将领,几天之内一败千里,失去西部大片国土和工业国防设施,这就是军队大规模清洗造成的直接恶果!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进攻,点名批判一批专家学者,紧接着1930年,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接见党支部成员时发表讲话,要求批判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直到布哈林、德波林等大批名家,掀起一个大批判高潮。此后从30年代一直到50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各种批判连绵不断,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到自然科学,无一幸免,斯大林祭起的不仅是批判的武器,更有武器的批判,不少学者专家死于监狱和集中营,结果伪科学盛行(例如李森科的学说),真知灼见遭压制。一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20世纪的共产主义“圣经”。

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获得了对苏联的绝对统治权,从今而后再没有力量能够制约他了,再也没有公开反对他的声音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有权监督党中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附属于中央的一个监督各级组织执行中央决定的机构。

“大转变”,准确点说应是“大变局”,一部苏联兴亡史的转折点就是1929年的“大变局”。

斯大林的胜利意味着其对手的失败,并且败在斯大林手下的那些人都逃不过

最后被肉体消灭的命运。不过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在谈到斯大林的“大转变”的时候，也不能忘记那些失败者，例如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毫无疑问是英雄，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后的岁月，他始终是坚持反对斯大林种种做法的坚定不移的斗士，尤其是他在最后一次流亡期间所写的著作，是今天总结苏联解体、苏共丧权教训所不可忽视的资料，在某些问题上他是有先见之明的。斯大林的另一个重量级对手是布哈林。布哈林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他对新经济政策的阐述和发挥是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的一笔重要遗产。这是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奋斗一生的人物，甚至在监狱里他也没有放弃理想的追求，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争分夺秒为后人写作了三部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自传体小说《时代》，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中说：“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历史上许多蒙受不白之冤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历史法庭上。著名历史学家罗易·梅德韦杰夫把他论述斯大林主义的专著取名为《让历史来审判》，也是寄希望于历史法庭。

历史法庭在不断地做出判决！

郑异凡

2016年4月于北京蓬莱公寓

目录 | Contents

- 1 / 序言
- 1 / 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 10 / 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制度
- 20 / 斯大林伪造“政治局”
- 25 / 以列宁的名义突击招兵买马
- 34 / 列宁和斯大林主义问题
- 81 / 苏共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两条不同路径
- 90 / 监督与反监督
- 102 / 列宁斯大林的工资是多少？
- 111 / 发财还是贫穷，这是个问题
- 118 / 苏联的土地政策及其农民问题
- 122 / 斯大林模式的来龙去脉
- 126 / 斯大林的“三条鲸鱼”捡不得
- 129 / 性格与政治

——读姜长斌和左凤荣著《读懂斯大林》

- 140 / 苏联的“告密文化”
- 146 / “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光盘
- 150 / 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所作的修改
- 155 /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诞生记
- 165 / 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
- 176 / 斯大林的最后时日
——斯大林医生的最新回忆
- 179 / 木犁与原子武器,何人所言?
- 183 / “澄清”还是“搅混”
——有关斯大林的几个历史事实
- 196 / 斯大林“热”及其误读
- 199 / 一本谬误百出的“奇书”
——《大元帅斯大林》略谈
- 202 / 托洛茨基、斯大林及其他
——有关苏联史的几条知识
- 207 / 托洛茨基生平思想略论
- 242 / 托洛茨基和文化
- 250 / 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 257 / 托洛茨基著作在中国

- 267 / 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
——读《炼狱》
- 272 / 在监狱里著书立说
- 280 / 纪德的悲哀
——再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
- 285 / 《驯服的艺术》中文版前言
- 292 / 布哈林及其著作变色记

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斯大林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其对苏联历史演变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关于斯大林怎样走上权力的巅峰却鲜为人知。

无可替代的斯维尔德洛夫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国务活动上，无法分身处理党务。好在有斯维尔德洛夫挑起了这副担子，担任了中央书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有过人的记忆力和惊人的组织能力，党和政府的各种组织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季诺维也夫在谈到斯维尔德洛夫时说：“有时觉得，正如二月革命胜利后弗·伊(列宁)带着整个革命的现成政治图纸回到俄国一样，斯维尔德洛夫也是带着有现成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安排计划的整个党的工作的现成的组织图纸从遥远的流放地回来的。”

托洛茨基说：“当时所有的机关团体在草创时期都向他(斯维尔德洛夫)要人，而这种首次分配党的干部的工作需要这个人有非常灵活机智的头脑才行，不能依靠机关、记录和档案，因为这一切都还非常不充分……解决这类问题要求有特殊的心理直觉……‘去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着办！’——在很多场合伊里奇都在电话中这样建议。解决首要的实际问题的办法之一，按照不成文法，都是同斯维尔德洛夫商量着办。”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去世。这时候，在他领导下已建立了四个民族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50个省委，350个县委，1 139个乡委。1917年全国只有577

个支部,到1919年初已经有8000个左右。

在俄共八大上本来准备由斯维尔德洛夫作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的,但因他病逝,只好由列宁来做。列宁在大会上说:“我甚至不能讲出他要讲的百分之一,因为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只好完全信赖并有充分理由信赖常常一个人就能作出决定的斯维尔德洛夫同志。”

斯维尔德洛夫的突然去世确实是俄共无可挽回的损失。列宁说,他“一个人就完全领导了要一批人才能领导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些最大的工作部门”,“在解决许多重大的实际组织问题时,只要他说一句话,不必召开任何会议,问题就得到了明确的彻底的解决”。“像这样一个有非凡的组织才能的人,我们是永远找不到人代替他的。”“现在要担负起他一个人在组织方面,在挑选和按专长任用人才方面所做的工作,只有把整批整批的人派到斯维尔德洛夫同志过去一个人所管的各个重要部门中去,而且要踏着他的足迹前进,才能勉强完成他一个人所做的工作。”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俄共决定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个人的才能上,下决心建立一套组织系统,凭借组织机构进行组织工作。俄共八大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三个机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前两个机构是新设的,书记处是在原有基础上改组的。

俄共中央机关和书记处情况

先说一下“书记”的来源。书记一词的俄文是 Секретарь,按字典的解释是:(1)处理机关团体或个人业务信函、公文的人员,也就是通常说的秘书;(2)会议的记录员、书记员,也就是文书;(3)选举出来的组织领导人(通常是政党),即现在党的书记。前两释义是此词的本义,第三种释义是后来发展演变的结果。

俄共当年设书记一职的本意是强调这不是官职,仅仅是从事文案工作、处理来往公文和信函的秘书工作。不过发展到后来,书记作为秘书、文书之类的称呼同大权在握的官方身份有点不相称,于是 Секретарь 一词的概念就一分为二:在中文里,一个是专管办文、处理日常事务的,仍称“秘书”;一个是掌握权力的政党长官,称“书记”。俄文用的还是同一个词,所以在翻译时需要加以辨别。

从苏共书记职能的演变也可以看出词义的上述变化。

书记处设立得较早,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8月6(19)日设立了书记处。当天的会议记录写道:

“工作的组织部分由书记处负责,应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书记处的成员为:捷尔任斯基、越飞、斯维尔德洛夫、穆拉诺夫和斯塔索娃。”

按照《苏共中央通报》的说法,那时书记处不是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集体组织,而是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小组,中央委员们通过书记处同地方党组织保持联系。书记处组织党的情报信息系统,调节党员干部的分配,从事中央委员会的通信联络工作,统计和监督党的资金,执行其他组织职能。实际上俄共八大之前从事书记工作的只有两人,即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塔索娃。

1919年1月16日首次设立组织局,成员为弗拉基米尔斯基、克列斯廷斯基和斯维尔德洛夫。

1919年3月,俄共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其他中央委员可以参加政治局的会议,有发言权。政治局就紧急问题作出决定,每两周向中央例行全会报告工作。组织局也由5名委员组成。每一位组织局委员主管相应的一个部的工作。组织局每周召开会议应不少于三次。组织局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书记处由1名责任书记和5名技术书记(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组成,斯塔索娃任责任书记。书记处下设立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按规定,每月至少要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此决定写入1919年12月召开的俄共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

俄共八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是加米涅夫、克列斯廷斯基、列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候补委员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里宁。组织局委员是:别洛博罗多夫、克列斯廷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和斯塔索娃。书记处由斯塔索娃担任责任书记。

1920年4月5日,俄共九大后的中央全会选举克列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为中央书记,他们同时也是组织局委员。此3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支持托洛茨基、布哈林的主张,俄共十大后失去了书记和组织局委员的职务。接替他们担任书记处书记的是米海伊洛夫、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1921年正式确定:“书记处的决定,如组织局委员中无人表示反对,则可视为组织局的决

定。”这就明显扩大了书记处的权限。

随着书记处权力的扩大,其编制也不断扩大。斯维尔德洛夫任书记时只有15名助手和30名工作人员。到1919年12月,书记处人员扩大到80名,三个月后为120名,1920年3月增加到602名。从1919年3月起,中央书记处开始组建下属部门,首先成立总务部。1919年6月在总务部的基础上成立财务部和事务管理部,还成立了信息部、登记分配部、组织指导部、检察侦查部、学校教育部、妇女工作部、出版部等。

政治局和组织局成立后就开始取代中央全会。1919年4月到11月,按规定应召开16次中央全会,实际上仅召开了6次。政治局单独开了29次会,还同组织局一起召开了19次联席会议,组织局单独召开了110次会议。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可以作为参照的是,当时的《真理报》只有“责任编辑”,没有总编辑的说法。领导该报的布哈林的职务是“责任编辑”。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斯大林当选总书记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也不出色,甚至可以说很差。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一封信中说,斯大林“在三年半来实际上从未担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也没有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这是事实”。1923年初,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批评长期由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写道:“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在成立苏联的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但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和否定。

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要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

由加米涅夫主持。列宁在填表时，在党内职务一栏填的是“中央委员”。

斯大林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

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写信（抄送列宁），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察院。他提出工农检察院需要1000到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但老实说，我不了解组织局这次‘调配’工作的规模。”

斯大林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至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到意识形态部门了。

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之后表现急躁，1921年夏天又有许多党内问题待处理，例如“清党”。为了加强“薄弱环节”，俄共领导层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的一名委员去帮助主管的“青年专家”，这个人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到任后很快就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

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做准备了。在托夫斯图哈就任新职的同时，纳扎列疆也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在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他有力支持。最后，还在1921年，在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下制定了一批党内规范性文件，其大多数涉及登记分配工作。在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这些文件没有修改，而是立即“检查执行情况”。

到1922年3月已经非常清楚，莫洛托夫退居书记处的第二位，排到斯大林之后。莫洛托夫在俄共十一大上自我批评说：“列宁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挑选党内的负责力量的工作现在当然进行得还很差，如果说得更厉害一点——很糟糕。”

俄共十一大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向代表们建议的方案是27人，选举

时可以涂去选票中不合适的候选人,写上要选的人名。这种选票自然是有导向性的。结果,方案中的27人均获得多数票,当选中央委员。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票),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票),第5位的是捷尔任斯基(473票),拉狄克和托姆斯基得472票,李可夫得470票,拉柯夫斯基得468票,斯大林得463票,位列第10位。

俄共十一大选举中最奇特的是,在发给代表的中央委员选票上,在斯大林名字后面的括号内写着“总书记”字样,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名字后面标明“书记”。这就是说,在制作选票的时候已经内定这三人未来的职务,而代表在投票的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把总书记的大权交给了斯大林。所以,4月中央全会实际上只是通过了一个事先已经决定了的决定而已。不过关于这一切大会速记记录上没有任何说明,仅直接公布当选名单。

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斯大林时期一些著作都特别强调,是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例如经斯大林本人亲自修订的《斯大林传略》写道:“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最优秀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对此一说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1929年)中认为:“斯大林正是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推荐,违背列宁的意愿而被任命为总书记的。”托洛茨基还说,谁也没有赋予这次选举以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是个技术性的职务,不具有政治性质。”

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建议在我们党设立总书记这一职位的,尤其是,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的。大家知道的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是列·加米涅夫主持的(在全会开幕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见证说,就是他建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书记的。”

总之,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提议”的说法。

在代表大会之前,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大会做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自1922年4月1日起任总书记。

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据记载,1922年3月6日,列宁去莫斯科省特洛伊茨科耶—雷科沃村附近的科尔津基诺休假,3月25日才返回莫斯

科。所以，列宁没有参加 25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这就是说，列宁没有参加决定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位的中央全会。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 1922 年中央 4 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当时，列宁虽然对斯大林非常了解，但对此建议没有表示异议。”巴让诺夫的说法解决了托洛茨基与梅德韦杰夫两人之间说法的矛盾。由此看来，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共同主意，这也可以解释不久之后，在列宁于 1922 年 5 月第一次中风之后，为什么他们三人能够迅速结成控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选票上标明“总书记”和“书记”的字样，是明显违背程序的做法。代表大会只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应该由大会后的中央全会选举。这种违规做法显然是为斯大林造势的措施。这种做法招致检票委员会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甚至要求将这些选票作废。

由于有人对这种做法有意见，4 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加米涅夫作了解释。他说：“在选举期间，他在大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曾经声明过，在某些选票上注明了担任书记的人选，此事不应限制中央全会的选举自由，这只不过是一些代表表达的愿望。”然而俄共十一大速记记录中未见加米涅夫的这一声明。中央全会只好把此解释记录备案。这种解释相当牵强，某些代表个人的愿望怎么可以写在选票上呢？这种愿望首先当然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

代表大会也没有讨论和决定设置总书记一职，最终确定设置这一职务的是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全会记录写道：“确定设总书记和两名书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在俄共十一大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领导人身兼数职曾提出意见，他问道：“我们举斯大林同志为例，他是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两个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能够设想吗？一个人能够负责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除此以外还要担负政治局和组织局以及中央几十个各种各样委员会的工作？”

列宁在会上为斯大林身兼数职辩解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察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

从列宁的辩解看,似乎还要斯大林继续兼职下去,看不出另有安排。因为如果那时已打算让他担任总书记的专职,并打算解除他的人民委员职务,那就用不着为斯大林的兼职辩解,说无人可代替之类的话了。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俄共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大厨只会做辣菜”。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她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所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塔·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列宁起草的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中写道:“责成斯大林同志立即给自己物色几名副手和助手,使他解脱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除原则性的领导外)。”

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把“总书记”的职务当作一回事,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务。

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1922年8月,俄共第十二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设立由委员5人至7人组成的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设立由中央委员3人组成的书记处(这3个中央委员经常在书记处工作)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的工作。”这时候虽然已经有“总书记”的设置,但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这一职务。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没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制度”,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使斯大林拥有了“无限权力”。斯大林的“无限权力”加上他的行为粗暴,使列宁非常担心他能不能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害怕由此引发党的分裂,为此,他在“遗嘱”中明确建议撤销斯大林的这一职务,由另一个人来担任。但是,这时候列宁重病在身,力不从心,已经撼动不了斯大林的总书记位置,遏制不了斯大林的上升劲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利用总书记的无限权力,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逐步打倒自己的所有反对派,独揽党政大权。

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制度

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国内有学者多次著文认为问题之一是苏共实行“指定接班人制度”。

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持。看一下苏共历次权力更迭的具体历史,就可以发现在苏共的历史上并不存在“指定接班人”的制度。

列宁没有指定任何接班人

十月革命后列宁是理所当然的党内领袖,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到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开始设想理想的领导班子的组合:不同年龄段的组合。实际上当时的领导班子相当符合列宁的设想,包括有各个年龄段的干部,是一个理想的梯形结构。

1921年底1922年初,列宁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此后不得不经常休养。到1922年底由于两次中风,已不能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感觉到接班问题,但是并没有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有一种说法,1922年俄共十一大后中央全会上“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暗示是列宁指定斯大林担任他的接班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其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不是列宁提议的,现在看到的各种资料证实,此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在私下商妥,由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提议的。当然,与会的列宁并没有反对。

其二,“总书记”的职务在当时并非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此前书记处设有“责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的工作,现在把“责任书记”改成“总书记”,其职责并

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书记处的头,负责书记处的领导工作。犹如《真理报》的主编最初叫“责任编辑”,后来叫“总编辑”一样,基本任务并没有变。总书记及其书记处只负责日常的党务工作。

第三,总书记选出半年后,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另任他人担任。

列宁在考虑其继任者的时候,并没有把眼睛盯在一个人身上。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列出6名领导人,对他们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没有明确表示谁最合适。这6人分为三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列宁谈了他们每一个人的优缺点。在这6人中列宁认为最能干的是托洛茨基,最有理论修养的是布哈林,拥有权力最大的是斯大林。然而,他们又都有自己的缺点、短处。列宁没有表示属意某一个人。他把这些看法告诉代表大会,显然是要代表大会集体作出选择。然而在列宁生前这封信没有能够送达代表大会,列宁去世后在俄共十三大上,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宣读并认真讨论列宁的信,而是在各个代表团分别口头传达,代表只匆匆听了一遍,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就草草了之。对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又不让讨论,是很难领会其要义的。

列宁卧病和去世后,一段时间党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十二大由谁做政治报告一开始就成为问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斯大林推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推举斯大林,结果由季诺维也夫出来做中央政治报告,斯大林作组织工作报告。不过,从来没有人认为做中央政治报告的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接班人。

简而言之,列宁卧病期间和逝世之后实际掌权的是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因反托洛茨基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斯大林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不是列宁给的,而是他在20年代纵横捭阖,不断地拉一派打一派的结果。他首先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打击托洛茨基,然后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最后集中精力打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样到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赢得党内和国内的绝对统治地位。

长期以来斯大林以列宁的接班人自居,但是这并不是列宁指定的结果。

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问题

从1929年独揽大权算起,斯大林单独执政了二十四年。在这期间斯大林考虑过接班人问题没有呢?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就谈论过接班人问题。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大谈接班人问题。

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他认为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①

然而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发挥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②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的回忆录中也说,1922年列宁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40来岁的人。我们应当培养接班人,培养30来岁和20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③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② Фотиева. Из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М., 1967. С.285—286.

③ 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1922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政治遗嘱”)中对6名中央委员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年龄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年列宁本人52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同年,生于1879年^①,都是43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1883年,为39岁;最年轻的两人,布哈林生于1888年,34岁,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32岁。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年龄梯队,完全符合列宁同玛丽亚谈话的设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这6人,显然不存在老化问题。斯大林这时候大谈“老化”无非想借此把自己人拉进最高领导班子里来。

不过这时候说的接班人问题还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问题。

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60多岁,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病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

据现在所知,他正式提出过两个人选——来自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辛斯基。这两个人在卫国战争中,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列宁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列宁格勒的全部防务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负责。斯大林曾经给他写信说: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焦躁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下……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战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时曾经大发感慨,宣称:“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问题。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②

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1950),1937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期间是波罗的海舰队、北方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联共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干部管理部部长。

^① 有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是这样,除列宁外斯大林就是当时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了。

^② A.阿法纳西耶夫:《“列宁格勒案件”真相》,见《克里姆林官秘闻》,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尼·阿·沃兹涅辛斯基(1903—1950), 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5—1937 年任列宁格勒市计委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1937—1949 年先后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主席, 与此同时, 1939—1946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1949 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对这两个出身列宁格勒的干部, 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 1949—1950 年制造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 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人杀了。从此以后, 斯大林再也不谈什么接班人问题, 而是一心要除去身边让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战友, 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米高扬, 等等。

有一个说法, 认为斯大林指定苏斯洛夫为接班人, 说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要让一个人接班, 是不能暗中进行的, 必须授以权力, 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 争取公众的认同。这是起码的做法。很难设想, 连政治局委员还都不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接班人”会被各界所接受。

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认为: 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 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 30 多人的主席团中, “没有一个人能说, 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①。那时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这是一个临时的“三驾马车”。即使这三个人也没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 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中地位岌岌可危。

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 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 决定马林科夫任总理, 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 由贝利亚领导, 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恢复外交部长职务。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 10 人, 其排名次序为: 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岗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 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就是说, 我们没有看到足以证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实。退一步说, 即使马林科夫是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 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所取代, 这种“指定”(如果有的话) 实际上是无效的。

^① 罗·和若·梅德韦杰夫:《赫鲁晓夫执政年代》,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第 10、12 页。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和政府领袖的最后敲定是通过党内斗争,通过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来解决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关键的位置是党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第一把手,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行使权力的最高身份是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斯大林为方便发号施令,往往越过党而直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这是党政合一国家的一种简便的统治形式,但斯大林的权力首先来自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党,所以他能够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可以撤销他的这个职务,由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就暴露了马林科夫的一个严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本来名列第五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蹿升为党的第一把手。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结果,而是党内各派力量斗争的结果,这包括除去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削权,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等等。

赫鲁晓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这是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他的这项措施触犯了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赫鲁晓夫终于被党内政变所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结果,这是无需论证的,甚至政变集团推举勃列日涅夫当头的时候,他还万分不情愿。

安德罗波夫接班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他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限制干部任期的制度,许多高级干部一直连任下去而不挪窝。勃列日涅夫本人后期长期患病,实际上已经无力视事,他本人也曾有退意。1979年4月勃列日涅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他非常累了,打算退休。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友好地表示反对,并保证要为总书记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能够继续富有成果地为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工作”。亲信们坚持由他主政,硬要这个病人支撑着出头露面,因

为这个病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不倒,党内争权的斗争就可以被压住,大家都团结在总书记周围。并且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忘记斯大林的花招——斯大林多次宣布辞去全部党政职务,然后看看谁敢表示赞同。谁能保证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不是玩同样的花招呢?没有人敢冒险!

勃列日涅夫确实也考虑过后继者的问题。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回忆录中说,1976年勃列日涅夫非常看好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格里戈里·罗曼诺夫,认为此人是整个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干部,如果他再多学一点,完全可以坐上总书记的交椅。但此后有传言说,他为女儿结婚动用了收藏在埃尔米塔施博物馆的沙皇家庭餐具,而其客人偏偏又打碎了其中一件。这样罗曼诺夫的官运就结束了。1980年5月,勃列日涅夫赏识的已经有经验的党的机关工作者契尔年科。

乌克兰共产党首脑谢尔比茨基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一,有一次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的成绩,引得勃列日涅夫大为高兴,于是指着自己的圈椅说:“沃洛佳,我走了以后你就来坐这个位置。”^①这个说法得到主管党的干部的伊万·卡皮托诺夫的证实。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曾同他谈过话,谈话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座椅说:看到这张座椅了吗?过几个月谢尔比茨基将坐在上面。所有的干部问题都要据此安排。

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大有人在。苏斯洛夫去世后,葛罗米柯就想接替苏斯洛夫登上第二把手的宝座,一旦成功,接班就有望了。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都认为应当由安德罗波夫来担任第二把手。

安德罗波夫也为此苦心经营多年。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上台后,需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时任中央国际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是最早表示效忠的人员之一,所以他在1967年获得重要任命,当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安利用这个位置逐步扩展自己的权力,据说曾多次策划针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

第一次是在7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从国防部吸收了一批著名的将领和元帅,让他们去总书记那里,逼他辞职,但保留其中央委员的身份。这次阴谋遭到失败,因为找不到让勃列日涅夫辞职的有说服力的借口。

另一次是热列勃奇科夫把安德罗波夫给的一份西方大众媒体关于苏联凄惨的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

真实情况以及苏联领导老化的材料交给勃列日涅夫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斯洛夫看后大为震惊,打算立即辞职。不过勃列日涅夫相当镇静,只是大为光火,大骂了一通,最后说:我还能活过你们所有的人。苏斯洛夫这才平静下来,说这些材料是“卑鄙的挑拨”。有这两次遭遇,安德罗波夫明白了,总书记不死,他是无望的。

当时,契尔年科同安德罗波夫竞争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中央全会决定安德罗波夫担任第二把手之后,契尔年科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不撒手,直到有一天安德罗波夫搞了一场“内部政变”,径直坐到会议主席位置上才算扭转了这个不正常局面。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在“小圈子”内碰了头,决定让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会议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然后由中央全会正式表决通过。

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生前担任了中央书记,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总书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最后还是幕后的“小圈子”拍板决定安德罗波夫的命运。这是一种暗箱操作,一千多万苏共党员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即使中央委员也是没有发言权的,摆在政治局委员面前的是一个不容异议的现成方案,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举手同意而已。这从一年后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接班人的最后敲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元老选择了又一个病夫契尔年科

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

安德罗波夫虽然能干,并且想有所作为,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惜他上台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天不假以时日,执政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生前是属意戈尔巴乔夫接替他的。1983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安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契尔年科的报告不满意,休息后直接让戈尔巴乔夫主持全会。据说,安德罗波夫曾准备另一个在1983年底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说:

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①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这段话在分发给会议参加者的文件中不见了。但不管怎么说,出现这样的插曲,不会事出无因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有几个人有可能接班: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认为75岁的乌斯季诺夫最为合适。而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则属意戈尔巴乔夫。然而总书记刚刚逝世,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内碰头商量。这是没有记录的会商,商量的情况如何,外人不得而知,连当时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不过碰头后,耳背的吉洪诺夫在走廊上大嗓门的话却让许多人听到了: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契尔年科)嘛,正好合适。

接着的选举就是例行公事了。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立即抢先提议选举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事情就这么草草决定了。接替安德罗波夫管理这个大党大国的,又是一个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的病夫!

总书记的葬礼完毕后,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看望安德罗波夫德的夫人,后者高声哭诉说:

为什么要选举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安德罗波夫)希望的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啊。^①

由此可见,前任总书记并没有,而且也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即使他有自己属意的人。这一次又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圈子”的暗箱操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各种权利、权力平衡的结果是抬出一个注定一年后要归西的领袖来。

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契尔年科以新的身份讲话,正式接任了第一把手的职务。但到年底,已经彻底失去工作能力。但是并没有作出正式决定由谁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都是临到要开会了,通知说总书记不能来了,由戈尔巴乔夫代为主持会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

戈尔巴乔夫出山是“众望所归”

契尔年科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直接担任治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丧委员会主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任总书记。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惯例,由治丧委员会主席担任未来的总书记。但是戈尔巴乔夫要求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决定问题,实际上他需要赢得多数的支持,这样他才有可能大展宏图。尽管还有人觊觎总书记的职位,但是接连死去三位总书记的可悲现实,使得高层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得到一致的支持。葛罗米柯率先提议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表示同意。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受政治局的委托提议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这个建议得到全会的表决通过。十来年的老人病夫治国,三年死去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出现一个普遍的声音:“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领导人,54岁的戈尔巴乔夫应运出山。

戈尔巴乔夫本人评论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权力更迭的正常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权力金字塔的顶峰。^①

从上述历史不难看出,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其接班人选不是也不可能由上一任领袖指定,而是在其身后或者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胜出者为王,或者由少数元老通过暗箱操作来选定新主。无论是哪种方式,广大党员群众是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的!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

^①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2页。

斯大林伪造“政治局”

一个谎言

一个弥天大谎忽悠了历史学界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这就是十月革命前,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成立所谓政治局的说法。

1917年10月10日在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就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判的那个苏汉诺夫)家中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与会的有12人——中央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柯伦泰、乌里茨基、洛莫夫、索柯里尼柯夫。会上讨论了列宁关于当前局势的报告。列宁的主张获得了多数的支持。只有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两人投票反对举行武装起义。据说,就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

1924年在同托洛茨基就十月革命问题展开争论的时候,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中写道:在10月10日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选出了名为政治局的领导起义的政治总部,其成员如下:列宁、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①

斯大林还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反对起义的立场辩护说:“这些同志还是站在布尔什维主义共同基础上的老布尔什维克。”^②

另一当事人季诺维也夫在《布尔什维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一文中写道:“从不久前所找到的会议记录里可以知道,被选入政治局的7个成员是:列宁、季诺维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2—28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83页。

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①

从以上两人的文章可以看到，第一，10月10日的中央会议上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政治局”。第二，政治局成员包括反对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三，这一“事实”的依据是“不久前所找到的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的官方文本是怎么写的呢？

1958年出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中记载：

捷尔任斯基同志建议为对近期进行政治领导成立由中央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经过交换意见建议被接受。政治局由7人组成(编辑部+两人+布勃诺夫)。[在书记记录的原件第3页上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建议……(编辑部+两人+布勃诺夫)——写在纸的背面并涂去。]

然后提出成立中央政治局问题。决定成立由7人组成的局：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洛夫。^②

历史学家都据此认为，在1917年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了政治上领导武装起义的7人“政治局”。2007年出版的《斯大林百科全书》还认为政治局最早成立于1917年10月10日。^③

托洛茨基也被忽悠

托洛茨基是会议的参加者，照理他对事情的真实情况是清楚的。不过也许因为当时的头绪太多，对一些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也许他没有可能进入档案库查看原始档案记录，一向严密的托洛茨基竟然也相信斯大林的说法，他在《十月革命史》中就此写道：

在10日的会议上，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选出由7人组成的政治局：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勃诺夫。然而，这个新的机构是完全没有生命力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仍然躲藏着；季诺

① 《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136页。

② Протоколы ЦК РСДРП(б). Август 1917-февраль 1918. М., 1959. С.86.

③ И.В.Сталин.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Алгоритм. 2007. С.330.

维也夫这时候继续进行反对起义的斗争,如同加米涅夫一样,十月选出的政治局从来没有开过会,很快就把它给忘记了,如同其他特别是在事变的旋涡中建立起来的组织一样。^①

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的揭露

1993年12月24日在列宁故居哥尔克举办文献展“转折中的俄国:1917—1924年”。俄国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为展览提供了一百多件展品。

1994年2月8日《独立报》发表H.B.穆希茨的文章《在十月革命中谁不走运》,同时刊载了展出的1917年10月10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的证词的照片。

从照片可以看到,在中央决议打字文本的下面有细小的笔迹所写的附注:

为政治上领导起义成立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组成的政治局。

在此附注下面又加了一个手写的注,说上述文字“由于疏忽在文本中遗漏了”。

10年后,1934年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就此写了一个证词:

原件上手写的附注是斯大林同志亲手所写,但不是写于1917年,而是1924年,在同托洛茨基进行书面争论时,在准备出版《走向十月的道路》文集时所写的——我碰巧是此事的目击者。托夫斯图哈1934年3月10日。^②

据查,1958年莫斯科出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中“第25号记录”(即10月10日会议记录)有一个编者的说明,其中写道:

会议记录附有以下文件:(1)打字机打印的中央委员会决议,上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此决议同时也写入会议记录文本。^③

斯大林添加的字样就写在此打字机打印的决议的下面。

托夫斯图哈的证词证明,这个所谓政治局不是在1917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建立的,而是1924年由斯大林“建立”的。

此事的背景是:1924年托洛茨基为他的文集《1917年》撰写了一篇题为《十月

① Л.Троцкий.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Ч.2. Изд. Гранит. Берлин. 1933. С.171.

② Н.Мушиц. Кому не повезло 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8 фев. 1994.

③ Протоколы ЦК РСДРП(б). Август 1917-февраль 1918. М., 1959. С.83.

的教训》的序言。序言揭露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的错误，同时也批评了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持下的《真理报》在战争和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上的右的立场，等等。这指名道姓的批评，立即引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猛烈反击。在苏联的报刊上展开了一场所谓“书面争论”。正是在这时候，斯大林偷偷地在1917年10月10日的中央会议记录下面添加了几行字，事后“成立”了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并把反对起义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入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作为对他们反托洛茨基斗争的犒赏。

托夫斯图哈提到的《走向十月的道路》一书是斯大林的一本文集，收入写于1917年的文章。1924年12月斯大林为此书写了序言。此前，1924年11月19日斯大林在《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的报告中已经提到10月10日选出“政治局”。由此可以推断，斯大林作伪的时间是在1924年11月19日以前不久。

据说，这个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根据捷尔任斯基的建议选出来的。然而有人查过，保存在俄国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的捷尔任斯基的大量档案中没有任何提及这一重要片段的東西。

托夫斯图哈何许人也？

И.П.托夫斯图哈(1889—1935)，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在赤卫队总部工作，然后是斯大林领导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和部务委员。从这时起一直是斯大林的秘书和重要的办事人员。1921年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托夫斯图哈也随同调入中央机关。1924—1926年任联共中央列宁研究所所长助理。1926—1930年再次进入总书记机关工作，是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为斯大林的各种讲话准备材料，是《格拉纳特百科全书》中《斯大林传》的作者，这篇传记于1927年单独发行了5万册。曾参加《列宁全集》第一版的编辑出版工作。1931年起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副所长。1934年起任中央候补委员。死后骨灰存放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上。

1934年托夫斯图哈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病入膏肓的他也许想给后世留下真实的历史，所以写下以上证词，揭露了一个弥天大谎。

一个不合逻辑的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对“政治局”这样一个重要的组织，斯大林时期的一些官方史书

却避而不提。经斯大林本人修改审定的两本书：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1947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都对10月10日成立“政治局”一事不置一词。这显然是因为斯大林有点心虚，因此避而不谈。尤其是不久之后，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即已转入了反斯大林阵营，斯大林已经没有必要用伪造的组织去抬举这两个“叛徒”。不仅如此，到30年代，斯大林干脆把他们给枪毙了。

实际上，斯大林的伪造一开始就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试想，两个坚决反对武装起义的人物，不仅在10月10日的会议上反对，在10月16日的会议上还继续反对，并且向全党发出反对起义的《论时局》的信，最后加米涅夫又在《新生活报》上发表反对起义的声明，因而被列宁斥为“工贼”，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政治上领导起义”呢？把这样的人纳入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岂非儿戏？早在1917年9月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一文中就一再声明，要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在“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中包含反对起义的人，这是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态度吗？斯大林在伪造“政治局”的“创举”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

除了误信存在这样一个政治局外，托洛茨基对政治局没有任何活动的说法是正确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组织，在历史上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

确定无误的事实是，俄共正式成立政治局是1919年3月25日，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后召开的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

以列宁的名义突击招兵买马

领袖们的“地盘”

十月革命后一些领袖都有自己的“地盘”或“根据地”。

托洛茨基一直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又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是属于他的地盘，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得到红军的广泛支持，也因为如此，斯大林一直惦记着要削去他的兵权。

党内另一个巨头是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同时长期担任彼得格勒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彼得格勒（后来的列宁格勒）是他的根据地，1925年他领导的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就是以列宁格勒为基地的，正是因为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他得以在俄共十四大上做反对斯大林的副政治报告。

第三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他是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他又兼任莫斯科党政第一把手的职务，莫斯科是他的“地盘”。

这样，在当时的党政军首脑中，上述三人除了全国性全党性的职位，都还有一块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

斯大林的情况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后，他在政府中担任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工农检察院），相对来说，都算不上重要部门。他在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搞得不好，受到列宁的批评，说“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的更糟的机关了”^①。然而在党内他担任中央政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从1922年4月起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中央同时身兼三职，这是无人能比的。不过，他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要想有可靠的据点，尚待营造。

斯大林扩大“领地”

斯大林还在担任总书记之前，就注意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关键位置上去。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

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抄送列宁）写信，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察院。他提出工农检察院需要1000—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①

他插手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领导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2小时处理这一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意识形态部门了。

俄共十大后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此人坐得住，能埋头干活，被列宁称为“石头屁股”，但缺乏创新能力，控制不了全局。斯大林作为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被派去加强书记处的工作，他迅速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充当自己的下手。

斯大林的亲信托夫斯图哈1921年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在托夫斯图哈就任的同时，斯大林的另一些亲信如纳扎列疆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这些人是总书记的得力干将。

1922年3—4月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会后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通过违背程序的做法当选书记处总书记。说“违背程序”是因为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选票上在斯大林的名字后面标有“总书记”的字样，从而把选举中央委员同时变成“选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1卷，第500页。

举”总书记!

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1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80年代后期起被叫作“在册权贵”,这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具体化,他们在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斯大林所能控制的只是党的机关和干部,却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知名度并不高,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可言。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组织工作,较少出头露面。除列宁外,党内外知名度最高者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在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的得票数总是落在他们之后。例如就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票),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第5位的是捷尔任斯基(473),拉狄克和托姆斯基得472票,李可夫得470票,拉柯夫斯基得468。斯大林得463票,处第10位。

被歪曲的列宁的建议

为扩大自己的队伍,斯大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并且特别强调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他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增加的应当是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和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①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2页。

列宁还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写道：“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 75—100 名(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①

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些信是严格保密的,也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看。但是斯大林通过非法途径看到了信的内容。他接过列宁的建议,1923 年 4 月在列宁缺席的俄共十二大上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他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

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 27 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 10 人到 15 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很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

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

“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 40 人的建议,那就是极严重的错误了。”^②

斯大林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是不提列宁的方案和思路。增加人数,这是他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取来的,但是他的方案与列宁的思路根本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主张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委员,而斯大林建议从地方干部中选拔,而这正是列宁要避开的。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7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177—178 页。

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人中,斯大林^①和托洛茨基年龄最大,生于1879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而布哈林生于1888年,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他们的年龄在32—43岁之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组合。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列宁讲了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②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斯大林“老化”之说完全是个借口。

斯大林说,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论他们的动机,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此前,斯大林建议二月中央全会靠吸收地方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看出了斯大林的动机不纯,是企图用地方上的自己人来扩大中央,所以他和李可夫投票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托洛茨基提出反建议,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委员会,作为指令机关。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看到这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局大权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建议遭到否决,而斯大林的建议获得通过。

结果,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40人,选出候补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50人,候补委员10人。

16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2人接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0名来自省或中央工作人员,都是斯大林提拔的。17名候补委员中,3人接近季诺维也夫,2人为中央工作人员,其余12人都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③

^① 另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1878年。如果此说属实,斯大林就是除列宁外这个班子里年龄最大的了。

^② *Фотиева Из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М., 1967. С.285—286.*

^③ 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上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页。

中央监委从 5 人扩大为 50 人,加 10 名候补委员,大致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相同。

托洛茨基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来到大会致敬的代表团最后都高呼“万岁”:通常都喊“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除列宁外,喊托洛茨基万岁共 12 次,喊季诺维也夫 6 次,喊加米涅夫 3 次,而喊斯大林的仅 1 次!就代表大会鼓掌的次数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由此可见斯大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这种状况是斯大林所不甘心的。

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

1923 年底“新方针”的争论中,在首都莫斯科,托洛茨基有广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在这些地方,争论经常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方取胜。这不是托洛茨基刻意争取的。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在争论中多数支持托洛茨基。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只有斯大林是悬空的。

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举办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一语是中文意译。俄文为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 призыв 是征收的意思,征兵用的就是 призыв 这个词。所以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 一词直译是“列宁的征召”,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完全是按照搞运动的大哄大喻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生产队(突击队)、整车间甚至整工厂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 25 万党员。

到 1924 年 5 月底,俄共原有党员 472 000 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 25 万,一下子变成 72 万左右,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宝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作“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宝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

教”了。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指出，“本应把列宁看作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作宗教领袖看待”。^①

据斯大林在俄共十三大上的组织报告，党员成分如下(不包括“列宁的征召”的党员)：

1905 年以前入党的 0.6%

1905—1916 年入党的 2%

1917 年入党的 9%

1918 年, 15.7%

1920 年, 30.4%

1921 年, 10.1%

1922 年, 3.2%

1923 年, 2.3%^②

合计: 73.3%。还有 26.7%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没有交代。

1924 年 5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和征收党员的做法。斯大林当时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 征收党员运动巩固了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不仅和它所有弱点, 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③

斯大林作出结论说: “所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是正确的。经验证明, 扩大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好处, 坚持缩小中央委员会‘原则’的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的道路上。”^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 “大会指出了列宁的征召的巨大意义, 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在列宁的征召中入党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⑤

“巨大意义”是对斯大林而言的, 至于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 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 年 4—5 月, 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赵弘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448 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 第 179 页。

③ 《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1 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 6 卷, 第 193 页。

⑤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298 页。

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在列宁的征召中入党的同志们。约·斯大林。”

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护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是后来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的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说：“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①

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工人的成分发生了大变化。工厂的工人是增加了，但大多数是由来自农村的农民补充的，他们在工厂的工龄很短，完全够不上列宁所说的工人的标准。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困难年月逃到农村另谋生路而现在返城的工人。这一部分工人，也很难说是坚定的无产者。把这些人征收入党只会涣散党的队伍。

40万党员列宁还嫌多，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新党员！这些党员构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接受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

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②

“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这样评论“列宁的征召”运动：

党的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7—18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3页。

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①

通过斯大林的苦心经营,到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为自己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用斯大林本人的话说,就是“宝剑骑士团”,下面是以列宁名义征收的党员,上面是一批在列宁时代的处于二三流地位,被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如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等。这些人在1929年斯大林五十大寿的时候纷纷亮相,在《真理报》上撰文,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同时大肆伪造历史。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就是一篇严重歪曲国内战争历史,竭力吹捧斯大林的典型。下面是一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队伍:在同反对派斗争中,只要反对派一上台讲话,台下就有人起哄、跺脚、吹口哨。举行对“破坏分子”、“外国间谍”、反对派分子等等的审判时,场外就有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要求严惩以至枪毙这些“人民公敌”。这些人也是斯大林派到农村去征粮、搞强制集体化的骨干力量,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群众基础。

有了自己的骨干队伍和群众,斯大林剩下的工作就是在30年代一步步地消灭列宁的老近卫军,消灭人们对这些开国功臣的记忆,消灭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

《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9期

^①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6—387页。

列宁和斯大林主义问题

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问题。斯大林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产生既有俄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也有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某些理论和政策为其准备好的现成的因素。有些因素是布尔什维克党固有的,可以直接接受过来,并进一步予以发挥,如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有些因素在列宁时期仅仅是开端,到了斯大林手中被“发扬光大”,变得规模化、系统化,如集中营制度;有一些列宁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因不合斯大林的心意而被拒绝和抛弃了,如新经济政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有的已经被列宁和实践所否定,却又被斯大林恢复了,如军事共产主义;有的则是斯大林的发明创造,如“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列宁的遗产中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适合俄国国情的,有违背规律的,同所有历史遗产一样,对这些遗产也应当是批判性的继承。列宁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此路不通,就另寻他途。他的策略是灵活的,需要妥协让步的时候,就妥协让步,以缓和矛盾,消解冲突,维护苏维埃政权。斯大林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他从不放弃暴力镇压的手段,他用恐怖来维持统治。

本文不准备全面分析列宁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只就其中某些问题展开论述。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认错”

俄国革命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其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俄国是否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革命过程中,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地遇到这个问题。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同列

宁的争论就涉及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论点：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①

十月革命的一个致命问题是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物质前提。

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对的少数，最多 300 万人。二月革命取得胜利，但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土地问题，立宪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民主化的问题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1917 年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曾发生一场有重要意义的争论，这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它关系到以后苏联的命运。

1927 年列宁乘“铅封列车”回国后，立即宣布俄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应当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他回国后喊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以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为理由反对列宁的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并就此同列宁展开论战。普列汉诺夫援引马恩论述指出：

远非在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例如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历史性灾难莫过于在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②

列宁当时没有能够就理论挑战作出应有的应对，实际上是高挂免战牌。但是他不能不承认普列汉诺夫说的真理。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在一个括弧里写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③话虽如此，但在有可能通过起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列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3 页。

② 《普列汉诺夫文选》下册，虚容译，三联书店 1964 年版，第 418—420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3 卷，第 266 页。

首先考虑的不是这条真理,而是权力,是夺取政权,他要用起义创造出社会主义来!这是列宁作为政治家同作为理论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列宁的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论据就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中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那就可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中写道:“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①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作为社会革命,远远不是取得政权就能够解决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俄国还有大量的民主革命任务有待完成,如土地问题、召开立宪会议问题。列宁的这一说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俄国二月革命后匆忙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列宁提出的另一个辩护论据是,俄国一旦开始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会跟着爆发革命,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会来支援俄国,拯救俄国。这是从布尔什维克到托洛茨基的一贯主张。然而,历史发展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设想,欧洲并没有跟着俄国发生革命,虽然十月革命后苏俄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向西欧特别是德国输出革命,但都无功而返,到20年代初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世界革命遥遥无期,苏俄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支援。这时候,列宁又把希望转向东方。但东方革命也迟迟不来,中国大革命曾经给苏联人以很大的鼓舞,但是这场革命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下,很快就败下阵来,也没有能够给予苏联以支持。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是理论家同政治家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要求的是理论的一贯性和严整性,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防止革命的变味。而列宁这时候作为政治家眼睛盯着的是机遇给予的取得政权的机会,已经顾不上理论的严整性,他需要的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不可多得良机夺取政权,理论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先把政权抢到手再说。虽然仓促,对下一步怎样走缺乏科学的规划,但政权是第一位的,拿到政权再说。他到1923年初还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第137页。

引拿破仑的话说：“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①这是列宁终身信奉的座右铭！一般说来，政治家往往是实用主义者，怎么做能达到目的就怎么做。例如列宁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国有化，认为国有化优于私有化、市有化和社会化。但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临到武装起义前夕，放弃了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借取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苏维埃政权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

到底怎样搞社会主义，列宁起初只想到两点：一是巴黎公社的措施，二是大战期间各国的战时措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就出现了“军事共产主义”。立宪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上就写上的，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一直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然而一旦政权到手，看到自己未能在立宪会议上占多数，立宪会议不能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就悍然予以驱散。这种理论家同政治家的对峙，十多年后我们又在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对峙中看到，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是拙劣的模仿。理论家照例是斗不过政治家的，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布哈林，失败是必然的。不过政治家可以取胜于一时，看似击败了理论家，理论家的理论却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验证、证实。74年后苏联的解体说明普列汉诺夫当年所坚持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是有应验的一天的。

斯大林没有参加这场争论，他缺乏理论功底去同普列汉诺夫争论。不过他在此前写的文章却是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一致的，不幸的是后来又被斯大林本人否定了。

1946年在《斯大林全集》出版的时候，斯大林特地写了《著者第一卷序言》，声明编入第一卷的著作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中“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被斯大林认为陈旧的论点有二：一是土地纲领问题，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斯大林是这么说的：

“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2页。

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指出,这个论点“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是大家公认的”。^①

这个被斯大林否定的论点最早见于他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1907),此文表述得更为清楚: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②

如果说,这里讲的只是革命发生的条件,那么接下去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③

斯大林怎么修正自己的这个观点的呢? 1946年在为《斯大林全集》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然而欧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列宁所发现的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一切都表明:这个论点已不适合新的发展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发展的最高点、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资本主义阵线却薄弱得能被无产阶级冲破的个别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④

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夺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确实说明,由于各种因素的凑合,不一定非得等到无产阶级占国内人口的多数时才能举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斯大林在否定这一论点的同时也抛弃了社会主义需要“足够发达的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即生产力论。他执政以后的实践基本着眼点是改变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关系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84—285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08、312页。

④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10页。

的改变去“建成”社会主义。

这样,我们在“不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到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可惜的是这个论点后来被斯大林抛弃了。

列宁与斯大林不同,根据几年的执政教训,深切感觉到生产力欠缺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抛弃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论点,而是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来弥补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前提之不足,如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还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列宁就提出要搞“经济方面的政治”。1923年初,列宁更是明确提出: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①

他提出要搞“经济方面的政治”,着手制定全国电气化计划,提出搞“文化主义”,都是认识到社会主义需要物质前提。

列宁没有忘记1917年普列汉诺夫以及孟什维克对他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批评。5年的历史说明了在俄国搞社会主义确实是困难的,他同意布哈林所说的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要进行建设则是困难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共执政5年,其中头3年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搞了一个“军事共产主义”,闹得全国农民起来造反。“军事共产主义”实验失败后,列宁开始重新审视俄国的现实。19世纪末,列宁写作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竭力论证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需要写作专著去论证,这本身就说明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人们还不容易察觉。做这番论证的目的是要证明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因而也就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然而,就总体而言,那时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某些发展,但还是个半农奴制的国家,是落后的农民国家,正因为如此,连沙皇体制内的人也在设法继续清除农奴制残余,因而有斯托雷平的改革。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7页。

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十月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并被叫做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实践中到处遇到俄国经济不发达这个无法逾越的问题。1919年3月,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了俄国的落后性:“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①这句话标志着列宁对俄国的国情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强调:“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②在推行新经济政策中,列宁公开号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③

承认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实际上就是承认俄国缺乏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这个问题苦恼着列宁。1922年到1923年初,列宁回过来阅读抨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领袖的著作,特别是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

经过5年的实践,问题又回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问题上来了。列宁认真思考了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第二国际考茨基等当年的批评,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是“无可争辩的论点”,承认了他们说的社会主义需要经济前提是“真理”。面对这些批评,列宁找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回应,这就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他写道: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④

从世界历史长河来看,这个方案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发展确实不是严格按照某种顺序进行的,其中会有偏离甚至背离,但总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可以偏离,可以改变发展的顺序,不过对社会主义来说有一条是必须始终坚守的,这就是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15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7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19—22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2页。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坚定不移、千方百计地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所以列宁在最后时日提出搞“文化主义”,把工作重心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

这就是说,你可以暂时改变社会发展的顺序,但是你不能长期缺乏必要的物质前提条件,必须把创造这个物质条件放在首位,补上这一课,否则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然而,斯大林完全没有领会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否定了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的扛鼎之作《论列宁主义基础》根本不提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提新经济政策。《论列宁主义基础》共9章,分别是:1.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2.方法。3.理论。4.无产阶级专政。5.农民问题。6.民族问题。7.战略和策略。8.党。9.工作作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经济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最后一章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这里虽然提到了新经济政策,还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①这里斯大林强调的还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新经济政策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即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斯大林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斯大林笔下的列宁主义不包含经济建设的内容,这就一笔勾销了十月革命后5年的历史,特别是1921年以后的历史。

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这种“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并且认为: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52页。

的目的。^①

斯大林总想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走捷径，抄小路。对斯大林来说，改变生产关系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手段就可以达到。1929年底开始的全盘集体化就是斯大林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小生产，消灭“富农”，消灭农民的运动。

他用行政手段取缔了私商，通过扫地出门、流放、枪毙消灭了“富农”，把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这样国内不仅没有了剥削阶级，也没有了“时时刻刻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农民，于是斯大林就可以在两年大饥荒后人们刚有饭吃的时候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它前有大规模饥荒，后有大规模镇压，绝对不是马克思预期的那种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社会主义，纯属乌托邦！

1988年邓小平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劝说他们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说：

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是可以参考的，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②

这是从世界各国包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结论。不是社会主义不好，不是说某个国家无权搞社会主义，而是说搞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条件，脱离本国的条件，不顾本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无视国内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硬要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与其搞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如暂时不搞。邓小平的这一结论，可以说也对当年普列汉诺夫同列宁争论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6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

到底怎样搞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十月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列宁没有一个完整的纲领，也不可能有完整的纲领，他是“先投入战斗”再说。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可以从他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文中看到，那完全是传统的观点，也就是后来被当作托洛茨基主义批判的观点。此前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一直谈论和宣传的是民主革命，是民主革命的策略、目标、敌我友关系。甚至到1917年初，列宁还认为自己有生之年不会见到社会主义。然而回国后却立即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从认为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号召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仅仅隔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俄国人搞社会主义是匆匆上马的，而不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怎么办？1917年列宁一方面鼓吹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加紧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革命和国家的论述。1916年上半年布哈林写了长文《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16年底列宁曾经指责布哈林此文中“炸毁”国家的提法是无政府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对恩格斯的有关国家的论述，至少是“炸毁”国家的论述，还不太熟悉。在布哈林的启发下（或者说挑战下）列宁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来恶补，写出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应该说通过对马克思恩斯论述的研究，他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马恩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他注意到巴黎公社短短72天的经验，如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器，取消议会制，公社兼管行政和立法，廉价政府，官员领取工人的平均工资，实行选举制、罢免制，消灭寄生物——国家，等等，但他印象最深的，因而反复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方面是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措施学习，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措施加上社会主义外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为了军事的需要，纷纷在国内实行统制经济，把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控制在国家手中。这些措施被某些社会主义者称作“军事社会主义”或“军事共产主义”。列宁在1917年的著作中反复引用这些战时措施，认为这是能够克服危机的方法，《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文章列举了“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立刻把银行、保险事业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粮食垄断”，实施“面包配给证”，“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等，认为这是革命政府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

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①

把以上所述与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措施如粮食征收制等等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内战时期所实施的各项措施并无新意,只是给照搬来的沙俄、临时政府实施过的政策披上“共产主义”的外衣而已。

“军事共产主义”并非列宁的发明。1870年巴枯宁、涅恰也夫办的《“人民裁判”协会会刊》发表题为《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其中就提到,在未来社会中一切都是公共财产,每个人都必须加入某个劳动组合,否则就无权进入公共食堂、公共寝室之类的公共设施,“谁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加入组合,谁就没有生存权”。由各组合推选出的成员组成办事处,主持组合之间的交换,管理一切公共设施并领导一切公共事务。“把社会存在的一切手段都集中到我们的委员会手中,并且宣布人人都必须从事体力劳动”。“那时,尽可能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消费更少的东西就将成为每一个人的意愿”,等等。马克思在评论这种“未来社会制度”时写道:

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

马克思称这个计划为“荒唐的实际组织计划”。^②

马克思这里所批判的就是那种由各种组织从劳动组合到办事处以至“我们的委员会”把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生产、消费、教育等等统统管得死死的那种社会制度。

原布尔什维克派主要领导人的亚·波格丹诺夫在十月革命前后曾警告过列宁不要搞“军事共产主义”。波格丹诺夫把军事共产主义同战争,同“军营的逻辑”联系起来考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工厂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3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469—471页。

企业都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

波格丹诺夫对这一个进程及时地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早在1917年6月,他在《国家—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十月革命之初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①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从生产单位取得的产品,相当平均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生产。这种“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扩大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战争造成国民经济的破坏,在经济持续衰落的情况下不调节生产就无法控制销售和消费,这样国家就必须对生产的方向和生产的规模进行控制,对物资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力的分配实施监督,实行强制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使企业失去独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推行劳动义务制,把军事组织原则推行到社会的劳动阶级。

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横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改造是从消费领域开始的,通过销售领域过渡到生产领域。这种程序同正常程序截然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分配和消费形式的变化是由生产的发展决定的。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复员的开始,消费共产主义本应缩减——把

^① “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波格丹诺夫著《社会主义问题》中的一节。而“社会主义问题”是1918年出版的书中的一章。此书的第一册后来收入亚·波格丹诺夫和伊·斯捷潘诺夫著《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卷。

军事公社减少到一般规模,取消给予士兵家庭的公费配给。然而,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①

波格丹诺夫认为,文化水平很低的士兵很容易追随共产主义口号,因为军队本来就是个大消费公社。这个联盟打垮并推翻了不够“文明”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这个资产阶级缺乏组织训练,不能也不愿做需要做的事情,如制止战争,调整生产和分配,给农民以土地。由于统治阶级不能克服其私有者的本能,所以下层劳动者就会联合成共产主义同盟,推翻他们,夺取政权,以便组织共产主义。在俄国,这个共产主义联盟最初是工兵联盟。布尔什维克党依靠这种联盟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就俄国而言,俄国革命是在非常特殊的各种条件的配合下诞生的。俄国革命不能自生自长,其整个进程和过程都完全取决于世界局势。

后来,士兵脱掉了军装,现出了农民的本色。联盟继续斗争,进行国内战争。追随他们的还有下层和最下层的劳动知识分子。联盟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因此它也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态。然而,“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不可能是从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转变的过渡阶段。最后联盟转入新经济政策。^②

波格丹诺夫所预言的过程大体上是符合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实践的。

十月革命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先并没有预设的方案。国内战争中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大量措施都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沙皇俄国和临时政府实行过的战时措施,如粮食征收制、粮食垄断、粮食专政、征粮队、凭证供应(配给制)等,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就变成了“军事共产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国家把生产和分配(消费)集中到自己手中,实施的手段是军事命令,是强制,是暴力。军事共产主义一方面是战争迫使采取的政策措施,而从指导思想上说,更多的是在一个落后国家采取的穷过渡的政策,企图通过由国家统一掌握生产和分配的办法立即实现共产主义。

① 见亚·波格丹诺夫:《社会主义问题》,莫斯科1990年版,第335—344页。

②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4. №9.

十月革命前列宁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说了许多取得政权后应当效法的措施,但是在巴黎公社的众多原则、措施中,布尔什维克坚持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其他措施没有一条能够得到落实,如选举制、罢免制、官员的工人平均工资等都是如此。十月革命前列宁提出过四大口号:自由、和平、面包、土地。夺权后立即抛弃了“自由”的口号,实施书报检查制度、驱散立宪会议;苏维埃政权也没能给予面包,实行的是难以果腹的粮食定量配给制。

军事共产主义,简言之,就是企图通过军事强制手段,由国家统一掌握生产和消费,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后来也被列宁本人所否定。1921年春在农民起义、水兵暴动的压力下,列宁抛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在这样做的时候,首先需要清算军事共产主义,列宁对头三年的做法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1921年4月21日,在《论粮食税》中列宁首次把以前实行的以粮食征收制为核心的政策叫作“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当时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这种做法保证了军队和城市的需要,所以应当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①。但是,列宁随即警告说,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行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须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②

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反思,列宁开始检查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1921年10月14日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承认: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08—20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209页。

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①

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说:

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②

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③

列宁说,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的各种声明可以发现,

“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我确信当时我们真的有过这样的设想”^④。“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⑤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7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1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82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0页。

⑤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21页。

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①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

“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市场关系是一定种类生产即商品生产的另一面，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②

列宁对自己的政策反复作如此深刻的反省，这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哪一位领导人从思想根源上如此检讨自己政策的错误。很可惜的是，当时多数高层领导人并没有同列宁一起对过去的做法进行反思，他们对军事共产主义恋恋不舍，而对“恢复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持有抵触情绪。这是 20 年代党内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真正的新经济政策派是少数，如布哈林、克拉辛、李可夫、托姆斯基等。

斯大林在击败各种反对派掌权之后，从 1929 年起，又把整个国家纳入军事共产主义的轨道。表现在：

1. 消灭私商，重新把生产和消费控制在国家手中，由于是短缺经济，商品和食品严重匮乏，不得不恢复定量供应，凭本供应的配给制。

2. 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剥夺富农的做法，消灭“富农”阶级。所不同的是，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富农，苏联已经不存在旧的富农阶级，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要消灭的实际上是在新经济政策下通过劳动和经营富裕起来的富裕农民。那时口口声声消灭富农阶级，但对什么是富农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消灭富农的口号随意性很强，不仅打击到富裕农民，而且也打击了中农，甚至部分贫农。

3. 消灭个体农民。斯大林始终认为农民属小资产阶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子。他抛弃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实施自己的集体化方针，用暴力把农民赶入集体农庄。其结果就是消灭了整个农民阶级，把农民变成集体农庄庄员。农民们失去独

^①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2 卷，第 221 页。

^② 《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92 页。

立的生产者地位,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大牲口,是名副其实的农村“无产者”。他们在集体农庄里为国家干活,为国家提供粮食,许多庄员往往只能靠宅旁园地即自留地养活全家。

4. 实行高度集中的军事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由国家控制全部工业、农业和商业。

军事共产主义是布尔什维克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段大弯路,它被列宁否定了,抛弃了,但不久又被斯大林捡起来,斯大林模式基本上就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军营共产主义”。在斯大林的著作中看不到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反思和检讨,虽然他本人经历过军事共产主义,对这种统治方式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反而非常欣赏那时的军事命令制,那时所实施的暴力镇压。

农民——妥协让步还是剥夺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农民是没落的阶级,没有前途的阶级,最终要加入无产者队伍的阶级,因此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农民不在联合之内。列宁继承这一观点。如季诺维也夫所坦诚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城市的党”,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在城市,做工人的工作,而很少从事农民运动。长期以来列宁制定的土地问题纲领立足点是土地国有化。这是不受农民欢迎的纲领,所以在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急急忙忙借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土地法令是照抄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方案的。社会革命党人指责布尔什维克“抄袭”,列宁则回答说,抄袭就抄袭,反正符合农民的要求就行。土地社会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使用,这是农民多年的梦想。但是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农民得到了土地,但是他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却不能归自己支配,几乎都被苏维埃政权拿光了。苏维埃政权还在农村组织公有化程度极高的公社,搞平均主义。后来列宁承认,公社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组织集体农业不是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这个观念是布尔什维克党长期解不开的结。早在1905年列宁在《两个策略》中写道: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

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①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谈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意志统一”,是可笑的。^②到1922年还认定最后的斗争是同小生产者的农民的斗争。

军事共产主义下对农民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俄共八大提出“中立中农”的口号,这就意味着,此前执行的是孤立和打击中农的政策。在农村执行的是打击一大片的政策,粮食征收制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住苏维埃政权的制度,它拿走农民的所有粮食,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因而引发广大农民的反抗,到内战后期,农民暴动遍及全国。那时布尔什维克党把农民暴动叫作“盗匪”活动,但这并没有能够改变事情的本质。由农民暴动最后发展到兵变,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直接危及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列宁承认,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因而不得不痛下决心,取消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从而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但仍认为最后的斗争是同农民这个小生产者的斗争。虽然做了让步,但是并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好办法,合作社还是被看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是被他们掌握的组织。直到1923年初,列宁在病中重新读了一些有关农业和土地问题的著作之后,经过新的思考,最后肯定了做买卖的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肯定它是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有效机构,认定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到这时候列宁才彻底改变对农民的看法,真正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盟友。

新经济政策消除了农民暴动遍布全国的局面。1922年列宁写道:“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③

1922年列宁在私下谈话中指出:不能同农民为敌,对付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工商报》副主编瓦连廷诺夫曾记述了列宁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的“临别赠言”: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606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592—59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80页。

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①

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②

出逃的斯大林秘书(也是政治局秘书)波·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列宁的秘书格利亚谢尔和福季耶娃关于列宁最后思考的一段话:

当然,我们是遭到了挫败。我们本来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直就像童话一样,随便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党不至于丧失灵魂、信心和斗志,我们必须向全党提出,作为某种暂时退却的做法,要重新采取交换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们世代所形成的生活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尝试以暴力把居民赶进新的制度,但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个全俄绞肉机中我们是否能够保住政权。^③

不能对农民施加暴力,不能对农民发号施令,这是列宁总结沙皇政权、临时政府和初期苏维埃政权的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曾因农民暴动指责临时政府,他

① Н. Волежинов (Вольский). 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кризис парти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Ленина. Stanford, California. 1971. с.186.

② 尼古拉耶夫斯基谈布哈林。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布哈林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8页。

③ 见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洪刚译,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119页。

也亲历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暴动,这使他深深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妥善予以解决。可以说,在列宁执政的5年里着重处理的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在列宁的理论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斯大林否定农民问题在列宁学说中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曾经给列宁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指责这个定义“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①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论断。列宁思想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着眼于解决俄国的问题,其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首先是农民国家有借鉴意义。关注俄国的落后性,关注俄国的特殊情况恰恰是列宁后期思想的特点,正如马克思的思想适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欧洲一样。

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关于农民的上述说法,仍然坚持把小生产者的农民看作资本主义的根源,仗着手中的政权,对农民横施暴力。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农村出现一批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他们凭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成为农村的富裕农民。这些人成为斯大林的眼中钉,他把他富裕农民叫作“富农”,批判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在农村中不断剥夺“富农”,瓜分他们的土地,分他们的浮财。这种做法引起广大农民的不安,他们不敢扩大生产,不敢改善农艺。等斯大林掌握了全权之后,立即开展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把大批富裕农民当作富农扫地出门,流放边远地区,甚至肉体消灭。斯大林亲口对丘吉尔说,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他把一千万富农埋入地下。集体化不仅消灭了“富农”,实际上消灭了整个农民阶级,苏联没有了个体农民。正因为如此,几十年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时候,即使解散了集体农庄,那些庄员也不知道如何独立耕作,他们不像中国的农民,一旦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土地承包制,拿起一把锄头就可以独立耕作。

列宁最后建议的组织农民的形式是做买卖的合作社,即消费合作社。在此之前,列宁否定了公社和集体农庄这类公有化程度高的组织。20年代初就说过,公

^①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396页。

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搞集体化不是当务之急。斯大林以集体农庄偷换列宁的合作社,说都是同一种类型的农业组织。实际上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有加入和退出的自由,在合作社里农民是独立的生产者,是生产和销售的利益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而集体农庄是生产组织,农民是被强制加入的,他们已经失去独立生产者的身份,他们的农具、禽畜统统成为农庄的财产,农民实际上成为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他们在农庄里首先是为国家生产,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首先是满足国家的需要,庄员的生活大多依靠一小块宅旁园地(自留地)。集体农庄只不过是保证国家征收所需农产品的连环保组织,即使在荒年,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上缴的粮食一颗也不能少。农庄庄员没有身份证,不能自由流动,无权进入城市。农民在集体农庄中的地位相当于沙俄时代的国家农奴。对农民的镇压是相当残酷的。1932年制定了所谓“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及加强公有制”的法令,俗称“麦穗法”。

斯大林用集体化取代列宁的合作化。全盘集体化遭到广大农民的反抗,农民骚动蜂起,被集体化的农民则大量屠杀家禽家畜,造成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无奈之下,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文章《胜利冲昏头脑》来安抚农民,但文章的写法大有讲究:(1)全盘集体化不是失败,而是胜利(胜利冲昏头脑);(2)把责任推给下面,中央政策是对的,只是基层干部执行得不好。斯大林不得不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一时多达一半的农民退出了集体农庄。然而过不了多久,斯大林又恢复了强制集体化,逼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

1928年托姆斯基在七月中央全会上举了三次同农民关系的危机的情况,第一次是内战末期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叛乱,第二次是1923年因“剪刀差”引发的销售危机,第三次就是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前两次危机都通过对农民的让步,改变或调整政策得到妥善的解决,所以这第三次危机也应当用对农民的让步来求得解决。^①托姆斯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些危机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和政府,是他们的政策措施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当局作出让步,调整政策以平息民怨民愤,这叫作解铃尚需系铃人!

斯大林批判托姆斯基的对农民让步的主张,把托姆斯基的要求归结为“不断让

^① 见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步的理论”，声称“这样的理论只能使整个事业毁灭。这是绝望的理论”^①。斯大林的做法是向农民节节进攻，退一步进两步，变本加厉。全盘集体化的直接后果是1932、1933年长达两年的全国性饥荒，饿死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这边大量的饿殍，那边粮食的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加。斯大林的工业化，主要是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是靠剥夺农民取得的，他的重工业化是建立在农民的白骨之上的！

集体农庄是一个缺乏效益的农业组织，它只能保证国家粮食征购的需要。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同生产者脱离，产品同生产者脱离，农庄庄员缺乏独立性，这种组织不能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向集体农庄索取大量的粮食，而集体农庄的一切活动纳入国家计划，集体农庄本身没有生产的自主性，一切按上头派下的计划行事，所以集体农庄也缺乏生产的积极性。结果就是集体农庄存在了20多年，到50年代初其生产的粮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沙俄曾是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却成了粮食的进口国。这种状态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被扭转，当今的俄国又恢复为粮食输出国了！

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归结起来就是：剥夺农民！他做到了，但是苏联的农业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解决。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从“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到个人独裁

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必须开展阶级斗争，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在俄国是绝对的少数，1913年产业工人只有350万^②。1917年全部注册工业的工人人数为259.64万，到1920年减少了一半，只有122.28万。^③1917年农村人口为13390万。

按照列宁的公式，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道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时候革命是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也将是多数人的政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85页。

②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7页。

③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1卷，第455页。

权。社会主义革命则不同,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村的贫农和雇农(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革命,其人数在全国是少数,革命胜利后这少数人要进行统治和管理,就不得不实行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200万左右的人对1亿多人的专政。这是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正是在革命和内战的高潮中,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定义。1918年10至11月列宁同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过一场争论,针对考茨基说的“就本义来讲,这个词(指无产阶级专政——引注)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列宁直接承认:“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他接着引申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①这是国内战争正酣,新生政权生死存亡未卜之时,此时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和维持”政权。这时候,资产阶级法律已经被推倒,而无产阶级法律尚未确立和完善,所以要强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这“任何法律”指的就是资产阶级法律。列宁曾经非常生动地描绘那时的实践:早上我们占领银行,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决议,宣布银行为国有财产。^②按照资产阶级法律,神圣的银行是不能随便占领的,而无产阶级去占领银行的时候,银行国有化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只能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这是一种在夺取政权和国内战争中的权宜之计,是非常手段,而不是一种常规。

1924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却继续沿用当年列宁的说法,他写道: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③

这时候苏联已经进入和平的建设时期,苏联已经通过第二个宪法,各种具体的法律也在不断制定和实施,在这样的时候不加修正地引用列宁在革命和战争期间所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显然是非常不恰当的,它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法无天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30年代苏联举行了三次公审,1937年,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就声称:“应当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中会有这样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94—595页。

② 见《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412页。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19页。

一种时期,这样一种时刻,这时法律变得过时而必须把它们扔到一边去。”他讲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要在积极参与的大审判中把法律“扔到一边去”,置那些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被告于死地!他在三次公审中发表的公诉词尽管漏洞百出,但仍然能够把那些被告送上断头台!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本身是不可能具体实施专政的,他需要凭借政党和政权的力量来实现专政。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变成由共产党代行专政,而共产党本身也难以实施专政,只能由少数甚至依赖领袖来实施专政。列宁把阶级专政同党专政和个人专政看作一回事,认为不应当提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之类的问题,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他写道: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可以说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①

1919年7月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宣布: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②

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他解释说:“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正如列宁本人所说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③。不过由领袖集团主持政党毕竟同领袖专政是两回事,历史证明,在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领袖专政同阶级专政混为一谈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含有阶级专政演变成个人独裁的危险。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0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第125—126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151页。

俄共十二大决议明确承认“党专政”，决议写道：“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证。”中文版在此加了一个注说：“决议中出现‘党的专政’这个不正确的提法，是由于疏忽。（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24页和第8卷，第32—59页。）”^①

1924年6月，斯大林在县委书记训练班上作关于俄共十三大的总结，这时候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所以在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了他们，其中就涉及“党专政”问题。斯大林宣称党的十二大决议中说“党专政”是由于“疏忽”，“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用党的专政来顶替阶级专政是十分荒谬的”。^②

俄国十二大《关于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是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总结报告作出的。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所做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肯定“党专政”，他说：

我们有同志说：“党专政——这样做，但不要这样说。”为什么不呢？这种羞于说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羞于说出存在并且不能藏起来的东西？工人阶级专政以其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为前提，即以其优秀部分的专政，其政党的专政为前提。这一点应当有权勇敢地说出来并予以捍卫，尤其是在现在，现在非党工人对此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不允许做任何修正的缘故。^③

针对斯大林的指责，季诺维也夫毫不示弱，1924年底他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讲授《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时，对此进行了反驳：

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是不可能的；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至少胜利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党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函数。……如果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过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那么他恰恰是忘记了列宁主义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列宁关于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51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4—225页。

③ Двенадца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осква-Кремль. Бюллетень. №1.1923. С.29.

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①

接着他引证了列宁一系列有关“一党专政”的论述,充分证明列宁是主张“一党专政”的。

我们这里重提这场争论,是要确定一个事实,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始终是主张“一党专政”或“党专政”的,他们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

关于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一个说法:党是专政的工具。他说:“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②这种说法实质上同“党专政”并无多大差别。共产党的任务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争得和保持专政,而领导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在斯大林笔下不见了。请注意,斯大林说此话时已是1924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由斯大林出来反对“党专政”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其实那时候斯大林是以反对“党专政”为名整季诺维也夫,以证明季诺维也夫“不关心理论问题”,要打倒这位长期同列宁合作共事的理论家!后来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其源头就在“党专政”这里,他的个人独裁就是从阶级专政到一党专政,再到领袖专政,最后变成个人专政,个人独裁的。这是一条清楚的演变路线图。

自然,列宁时期还没有出现个人独裁的现象,那时党内还存在民主,列宁独裁不了。例如,1918年列宁主张立即同德国媾和,结束战争,但是受到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顽强反对,这时候列宁完全没有力量以独裁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争取和说服对手,设法形成自己的多数。列宁在1922年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对斯大林等人的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都不是他一人说了就算的,他还得争取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的支持。而斯大林就不一样了。到20年代末他取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后经常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决定许多重大措施,例如在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中采取“非常措施”,宣布“消灭富农阶级”,在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等,都是他先发布命令或指示,然后由中央委员会事后开会予以追认的。几次“先斩后奏”并且得到追认之后,斯大林就把这种做法常规化,发展到30年代,连“后

^①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郑异凡、郑桥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88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67页。

奏”也不需要了，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就是党的决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他的个人独裁！

由领袖专政代替党专政和阶级专政，原因首先是俄国落后、民主制不发达这一先天性缺陷。十月革命后，列宁本人对党员成分就提出过怀疑，说：

“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我想，谁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查一下统计材料就能证实这一情况。”他说得很清楚：“同样毫无疑问，我们党要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醒、投入独立的阶级政治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望。”^①

由此可以看出：1.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成分是靠不住的，它不能决定政策的无产阶级性质。2.多数党员的政治水平和一般水平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领导。3.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能取决于人数极少的党的领导人。这样，俄国当时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只能靠这个少数领袖来实施。

列宁所说的“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到底是那些人呢？

如果以政治局委员作为标志，那就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等人。

俄军事专家沃尔科戈诺夫略为扩大这个领袖集团，他说：“可以相当准确地说，由列宁的战友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在革命后的初期包括下列同志：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伏龙芝。可能还要算上莫洛托夫、皮达可夫、彼得罗夫斯基、托姆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②

这“为数不多的党员”，只有斯维尔德洛夫、列宁、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古比雪夫、彼得罗夫斯基、莫洛托夫等人是病逝的，其余的都被斯大林戴上“人民敌人”、“外国间谍、代理人”之类的帽子，先后被杀害（少数是自杀）。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8—19页。

②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1卷，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如果斯大林给这些人戴的帽子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列宁所说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望”,就全都落空了。列宁时期实施的所有政策就都应该被看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策了!

所以说,这种仅靠少数领袖来保持党的政策以至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状态,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状态:如果这人数极少的领袖并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如果他们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并不能体现无产阶级性质,如果他们执行的专政并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是个人的极权独裁,那么以无产阶级名义实施的一切就都变质了。斯大林在30年代的所作所为,从强制集体化,到大规模镇压,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成分或性质呢?

从“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到“阶级斗争尖锐化”

在夺得政权并镇压了反革命的反抗之后,无产阶级政权就应当转向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这也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结论。由于实行粮食征收制,广大农民手执武器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遍布全国的农民战争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给新政权造成了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时候,列宁得出结论,需要国内和平与和谐,对农民需要作出让步,国家应当从暴风骤雨的革命转变为平和的改良,实现国内和平。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

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后开始,列宁把目光放在转向争取国内和平和谐,主张采用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到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上去。

1921年8月5日,列宁在给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肯定了“国内和平”的口号:“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可笑的。”^①俄文 мир“和平”也有“和谐”的意思,国内和平也就是国内和谐。

1921年11月,列宁在《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提出与建设国内和谐相应的方法:“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而改良行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84页。

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①。这种行动方式是同国内和谐的目标相适应的。

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在谈到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时指出:

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国家的产生和消亡有清晰的阐述。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产品的结果。阶级将由于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消亡。这是阶级消亡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越往前发展,阶级斗争就越缓和,以致最后消失,或者“熄灭”。阶级和国家是要逐渐消亡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消灭阶级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创造消除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产品的现象的根本条件。从肉体上消灭某一阶级的人员是达不到消灭阶级的目的的。

斯大林提出了另一种说法: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报告中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并首次提出他独创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尖锐化。^②

这种说法首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所谓成就越大云云,并不符合事实,这是为自己的失败做的辩解。第三,斯大林提出尖锐化的理论是为了人为煽动阶级斗争,消灭他所认为的“阶级敌人”,排除和消灭异己。

苏联在某一时期确实存在阶级斗争激化的现象,不过这并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由于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相反地,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问题、失误和错误,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是斯大林的领导出现严重错误所致。斯大林的说法是掩盖自己决策和政策错误的一种烟幕弹,让人误以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确实是由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4、24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于成绩大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抗使然。

1928年初,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农民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宁可把粮食作为饲料喂养牲口,然后出售畜产品以换取较高的收益。这样1928年初苏维埃政权就遇到粮食收购困难,有1.28亿普特的粮食收购不上来。解决收购困难的根本办法本应是调整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价,鼓励农民种植谷物,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图。然而斯大林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有粮不售的农民,为此动用《刑法》第105条和第107条来对付农民。

第107条写道:“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剥夺自由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剥夺自由。”^①

这一条是明显针对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的,而农民藏而不售的是自己生产的粮食,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不能与投机倒把混为一谈。何况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已经反对使用“投机倒把”的提法。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在初期即1928年上半年是有效的,完成了收购任务,但是以后就不灵了。错误的政策和非常措施引发农民的反抗,农村形势紧张。

正是在这时候,斯大林首次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称:

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尖锐化。^②

推出这个理论首先是为斯大林坚持的“非常措施”辩护的,而往后到了30年代就成为国内大规模镇压的“理论”根据。不是偶然的,在大清洗的高潮,1937年,斯大林对这一“规律”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我们的进展越大,胜利越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越加凶恶,他们越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越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越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③

这是充满血腥的“规律”,千百万无辜的人被淹没在这条“规律”的血泊之中!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5期,第19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9—150页。

③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29页。

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刚刚提出“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①。在击败了布哈林等所谓右倾集团之后,1929年12月初斯大林立即宣布农业发展发生了根本转变:从细小的落后的个体经济进到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进到集体农庄。到月底,斯大林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开始“全盘集体化”和实施“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了。斯大林在这里运用了暴力手段,一个是用暴力消灭“富农”,把富农扫地出门,直接处死或流放到边远地区。另一个是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拒绝加入者遭到各种迫害,甚至被当作富农处理。正是通过这种强迫手段,在苏联农村掀起了所谓“全盘集体化”。

“非常措施”和全盘集体化引发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本来在新经济政策下20年代初的农民暴动已经平息下去,现在又开始活跃起来。由于档案材料的封锁,过去我们只知道农民的消极反抗,他们杀猪宰羊,甚至宰掉大牲口,给畜牧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大量农民逃离农村,1931年就有400多万人逃进城市。现在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我们看到农民不仅消极反抗,而且积极采取行动,以暴力对抗的大量事实,农村出现暴动、武装起义以及众多的群体事件。

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下简称格伯乌)报告,1928年1月至1929年12月,即实施“非常措施”期间,农村发生了13000起暴乱,参加的农民达244000人。开展全盘集体化之后,1930年全年有约250万农民参加了13712起起义、暴动和抗议事件。最不安定的地区是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据格伯乌统计,有20200人被处死。令人震惊的是还发生多起妇女暴动。1930年5月18—19日,阿尔泰边区爆发“婆娘暴动”,约300名妇女包围了村苏维埃,抗议流放“富农”。她们声称:“我们不会把富农交给你们的!”,要不然把我们也一起流放好了。她们殴打了几名村苏维埃人员。格伯乌人员赶到后有14人被捕并被判刑。这300名妇女显然不会都是富农的亲属!在暴动中,农民打出的口号是“打倒无产阶级专政!打倒共产党人!”“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贸易自由!”,有的地方起义农民赶走苏维埃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开仓分粮。有的史书称国家处于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2页。

“内战边缘”，有的干脆称“第二次国内战争”。

当局不仅动用格伯乌的部队，而且动用国防军来镇压农民的反抗，这些暴乱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但显然震惊了联共领导和斯大林本人。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胜利冲昏头脑》，3月15日联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进行纠偏。然而斯大林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基层组织和干部，并且声称出现种种错误是“胜利”冲昏了头脑。这哪里是什么“胜利”！这是农民的反抗迫使斯大林和联共不得不后退，不得不纠偏。结果农民纷纷退出集体农庄，集体化的农户由58%降至21%，也就是说，一大半农户退出了集体农庄。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集体化不得人心！不过斯大林不会放弃集体化这一既定方针的，风头一过，接着搞强制集体化，到1931年7月1日集体化的农户比例又达到58%。

全盘集体化造成严重后果。据统计，在1930—1933年的“第二次国内战争”中人口损失为930万，除去为逃避集体化从哈萨克斯坦逃亡到中国的20万牧民，人口损失为910万。^①

斯大林实行的全盘集体化并非胜利，而是失败。首先，它遭到广大农民的反对。其次，它是对农村生产力的一场大破坏。第三，集体化并没有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苏联的农业生产直到50年代初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此后的几十年里，苏联竟成了粮食进口国，而当年的沙俄曾是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斯大林把农民的反抗说成是阶级敌人对胜利成就的反抗，对农民大动干戈。同时推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在全国实施大规模镇压。此理论实践的结果是消灭了列宁的近卫军，不仅排除而且消灭一切异己。

由此可见，如果说苏联出现过阶级斗争尖锐化，那么这不是由于“胜利”、“成就”造成的，而是错误的政策措施引发的。阶级斗争只会随着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而逐步缓和以至熄灭。如其不然，如果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永远不会到来！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一个伪命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集中营始建于列宁时期，但把集中营制度系统化、规模化，则是斯大林时期。

^①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1894—1939. Под ред. А.Б.Зубова. АСТ. Москва. С.901.

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利用劳改犯的劳动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莫斯科的地铁、白河运河等主要都是用无偿的劳改犯的劳动修建的,在这里大量的高级知识分子被当作粗工使用。略好一点是把一些技术专家关在监狱工厂里为社会主义服务,如著名的监狱飞机设计所。

斯大林制造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是为在党内国内的“大清洗”“大镇压”提供理论依据的。斯大林领导的大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这个案件把矛头对准工程技术人员,把由于设备老化失修、组织混乱造成的矿难事件说成是投靠外国资本家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蓄意破坏。法国作家纪德《从苏联归来》一书中收有法国全国矿工联合会副书记克列伯·列格的一封信,列格当了30多年的矿工,他说:“从技术观点看,所有人都认为:以积聚瓦斯的方法使矿井常处于爆炸状态,是不可能的事。”^①然而,沙赫特案的被告就是因这样一些荒唐的罪名而被判刑,被枪毙的。

此后各种案件绵绵不断,1930年有“劳动农民党”案,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等经济学家受审,被判刑。接着又炮制了“工业党”案件,1931年制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把在国家计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中的负责工作人员罗织在内。1933年4月制造了对暗害分子的公审,被告中甚至有英国工程师。斯大林炮制这些案件的目的是把建设中的失误错误的责任推到这些“敌人”身上,规避自己应负的责任。

党内公开的反对派已经不存在,但是对斯大林的政策不满,想把他拉下马的人还是有的。1930年11月揭露了瑟尔佐夫—罗明纳兹—沙茨金“阴谋”。他们没有过分的要求,只是要求集体化和工业化采用较为理性、较为人道的方法。就为这个他们被开除出党,罗明纳兹自杀,另两人死在集中营。接着党内流传“柳亭纲领”,柳亭领导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盟,要求降低计划任务,农业集体化中坚持自愿原则,恢复党内民主,要求解除斯大林的职务,因为他把党看作是自己的“世袭领地”。斯大林要求枪毙柳亭及其同伙,但遭到高层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古比雪夫的反,他们认为,不能因观点问题枪毙中央的著名工作者。柳亭起初被判10年徒刑(后来还是被枪毙了),其29名战友刑期略短。1933年1月破获了A.П.斯

^① 纪德:《从苏联归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米尔诺夫集团,该集团由老布尔什维克组成,并在工人中间从事地下活动。他们要求根本改变集体化和工业化,工会独立,对格伯乌实施监督,并议论排除斯大林。又是基洛夫等三人阻止了斯大林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最令斯大林震惊的是1934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要求基洛夫出任党的总书记,但被基洛夫拒绝了。不过到无记名投票时,1218票中还是有292票是斯大林的反对票!这显然成了此后几年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起因。

这一切说明所谓阶级敌人反抗是斯大林捏造的,但党内确实存在反对斯大林,反对斯大林个人极权的个人和集团。这使斯大林存在危机感,他需要除掉公开和暗中反对他或者潜在反对他的人和集团,消除后患。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首脑基洛夫遇刺身亡。基洛夫暗杀案至今扑朔迷离。不过以此为借口,斯大林开始了“基洛夫清洗”,在“清洗”中联共350万党员中有110万被清除出党。联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镇压。不仅如此,参加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代表遭逮捕镇压。因此这次代表大会被叫做“被枪毙者的代表大会”!这是对292张反对斯大林的选票的报复!

此后几年苏联进行了针对列宁战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三大案件的公审,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秘密审判,大镇压进入了高潮期。

当国内阶级斗争说不通的时候,斯大林就把问题归结为外国派遣的间谍特务。

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苏维埃知识分子三个集团。则也就意味着,不再存在阶级了,再讲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说不过去了,于是开始从国外寻找阶级敌人的线索。1937年斯大林在一个报告中说:

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①

现存的档案资料证明,审判闹剧的编剧和导演就是斯大林本人。他指示格伯乌,他想从被告那里听到什么样的供词,要他们制造出敌人的形象:“我们为什么生

^①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129页。

活得不好？是因为暗害者搞坏了一切！”以后许多“犯人”就被贴上“间谍”、“外国侦探机关的特务”、“破坏者”的标签。发明了这种说法，斯大林就可以放手去镇压自己的原先对手如布哈林等了。1938年3月，莫斯科举行了“托派与右派联盟案”的审判，枪毙了原共产国际领导人、《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原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原俄共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等等。至此斯大林的所有宿敌都被消灭殆尽，还有一些曾经与他有不同意见，或者可能潜在的反对者，也被清除得差不多了，斯大林的天下似乎太平了。不过这都是暂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陷入紧张不安的状态，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洗镇压。不过这时候已经不再动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了，为了镇压异己，斯大林总是能够找到或者发明新的借口，新的帽子，如反对“世界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综上所述，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成就越大阶级敌人的反抗就越激烈，是编造的谎言。如果苏联社会曾经有过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话，那不是由于成绩大，而是出现严重失误，引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然，是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这些都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而是社会正常的现象，解决的办法不应当是对正当不满的群众和党员进行镇压，而是改正错误，纠正错误。不称职的领袖是可以也应当更换的。

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圣剑骑士团”

集中制的争论

列宁的建党思想中有两点非常突出：一个是党员必须参加一个党组织，这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一个原则区别，由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另一点是，坚持集中制。列宁的这一主张1904年曾遭到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的批评。

1904年普列汉诺夫在一篇名为《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的文章中同主张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争论。普列汉诺夫写道：有文章说，“委员会也好，单个人也好，都可以有非常广泛的全权，不过这应当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相反地，如果觉得需要和有益，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解散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它可以剥夺这一位或者那一位党员的权利。否则就不能成功地组织无产阶级的斗争。”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些代表的话表现了其组织观点的实质，并且不仅仅是他们个人

的,“几乎全体‘多数派’成员都会赞同他们的观点,而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表示相信,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它应当拥有‘遣散’人的无限权力。”

普列汉诺夫针对以上说法写道:

我们党的少数派拒绝承认的正是这种权力。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要求是否站得住脚?我们现在就会看到。

设想一下,如果中央委员会拥有我们大家都承认的目前还有争议的“遣散”权。那就会出现下列情况:由于代表大会临近,中央委员会到处“遣散”所有对它不满的分子,到处穿插自己的亲信,而在所有委员会中充斥这些亲信以后,就能不费力气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这个由中央委员会的亲信们所组成的代表大会就会异口同声地向中央委员会高呼“乌拉!”赞成他的所有成功的或不成功的行动,并为它的所有计划和倡议鼓掌。那时我们党内确实不会有多数和少数,因为那时我们正在实现波斯王国的理想。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①

普列汉诺夫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变质,变成由一帮亲信组成的机构,成为少数人操纵的工具。

卢森堡也针对集中制写道:

“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她认为,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是把工人运动降低为“委员会”执行工具的官僚集中制。然而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②

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全党,更确切些说,是由

^① Г.В.Плен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XIII. Под ред. Д. Рязанова. Ленинград. Москва. Госиздат. 1926. С.91.

^②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3—504页。

整个运动制定的,那么党的各级组织显然就需要有行动自由,以便单独促使充分利用当时的形势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斗争和发挥革命的首创精神。^①

为回答对集中制的批评,列宁在集中制前面加了“民主的”一个定语,成为“民主的集中制”,以区别于“官僚的集中制”。不过,民主的集中制也好,官僚的集中制也好,首先都是“集中制”,其落脚点仍然是“集中制”。列宁领导下的党,始终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加上“民主的”一语并没有改变集中制的本质。这种高度集中的党对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是有用的。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仅有几万人(4月代表会议称代表全国8万党员),而社会革命党有百万人,孟什维克党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布尔什维克党。但是正是这个仅有几万人的党最后夺得了政权,接着又在国内战争中赢得了胜利。这说明起义、打仗等,需要高度集中的党来领导。不过,事物都应当有一个限度,在国内战争期间,这种集中制被推到极端,变成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制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结合起来,就逐渐向斯大林的极权政治过渡。

党内民主与派别

党内争论以至斗争本来是正常现象,因为对完成一项任务,达到一个目标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这些异见可以通过争论达成一致。列宁时期有过多次数争论,甚至激烈争论,但是争论过后大家仍然是同志,仍然可以在同一个党内和衷共济。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列宁曾处于少数,但他仍然有发言权,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当他的主张得到多数拥护,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从多数变成了少数,布哈林等人并没有受到打击压制,布哈林继续当他的《真理报》主编(只有一小段时间由于布哈林自己的要求暂时辞去主编的职务,很快就复职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这样分歧的处理,完全是对事不对人,说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了良好的处理党内分歧的传统,争论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人整死。列宁时期党内曾经存在各种派别,有敢于直接同列宁争论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有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军事反对派”,有要求党内民主的“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等等。列宁自己有时也参加党内的某一派。例如在工会问题争论的时候,列宁加入了“十人纲领派”。有不同意见,就会

^① 《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

有争论,那时党内争论被看作一种正常的现象,党的代表大会开得生动活泼,议论纷纷,即使列宁的提案也会有反对、修正的意见。《真理报》出“争论专页”,刊载党内对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一个重要论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定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地,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这就是说,党内实行已久的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应当根据任务的变动实行相应的党内制度,决议提出的新制度就是“工人民主制”,它废除“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上到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在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上,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必须使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党的委员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等等^①。可惜的是俄共十大还同时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其第7条规定,中央委员从事派别活动的可以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出党。列宁在会上坦率地承认,“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列宁反复说明,“这是一种极端措施,我希望我们不去用它”^②。大会决定,这一条不予公布,也就是说打算备而不用。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叫派别,什么叫派别活动,实践证明,这是很难作出科学界定的。党内出现不同意见是常有的事,如果两个人对某一问题持同样的看法而与多数人发生分歧,这两人又联合提出自己的看法,此两人就会被看作是搞派别活动而受到惩处。这种情况在苏共党内曾多次出现。其次,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时起,派别活动就连绵不断,最大的两派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57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97页。

克,在这两派内部又存在不同的小派别。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派成为独立的政党,但它并没有能够消灭内部的派别存在。在缔结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出现了坚决反对缔结和约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并且一度成为党内多数。在工会问题争论时党内派别多达10个,列宁自己也参加“十人纲领派”。其中“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在十大之后继续存在。

1922年,列宁不同意十月中央全会作出的放松外贸垄断的决定,暗中同托洛茨基以及非中央委员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联系,设法推翻中央全会的决定。对这种做法列宁本人也感到“尴尬”,他在写给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短信中承认:

由于病情恶化,我不得不放弃出席全会。我完全意识到,在同你们的关系上我是多么尴尬,甚至比尴尬还要糟糕,但我反正无法做得像样一点。^①

列宁之所以感到“尴尬”,是因为联合非中央委员去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去推翻中央的决定。但是为了事业的利益也只能这么做!

大致也是这个时候,列宁在同托洛茨基谈话时,表示愿意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的“联盟”。一个政治家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同一部分同志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联盟,是完全正常的事。在历史上,列宁就曾同孟什维克领袖普列汉诺夫结成过“护党联盟”!

1923年秋俄共党内开展了关于“新方针”的争论,这实际上是一场争取党内民主的争论,也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就民主问题展开的党内争论。斯大林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反对派,迫不及待地擅自公布了俄共十大“关于党的统一”决议中的第7条。

1924年1月17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做“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在会上宣读了这第7条,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当把这项条文放到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中去,并把它公布。”^②不公开“第7条”是俄共第十次代表大

^① The trotsky papers, 1917—1922. Hague · Paris, 1971. p.774.《列宁全集补遗》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页。《补遗》中的译文为:“我很清楚,这样对待你们我感到不安,甚至是很不安,可是我连作稍微像样一点的发言都办不到。”此译文不确切,俄文 не ловко 的基本意思是“困窘,尴尬,不恰当行为”。列宁的意思是同非中央委员商量如何推翻中央全会的决定,从组织程序上说是尴尬、不恰当的行为。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3页。

会决定的,党的代表会议无权推翻代表大会的决议,斯大林未经党代表大会的批准公开这第7条显然是不合法的。

俄共十大的这项决议后来被斯大林当作压制党内不同意见、镇压党内反对派的“尚方宝剑”,他以此条为依据不断开除作为反对派成员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到20年代末都被斯大林开除光了。到30年代,这些人更被当作外国派遣的间谍、特务而被枪毙,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也难以幸免,被斯大林的特工追杀身亡。只有托姆斯基自杀身亡而免于公审的羞辱。

党内不容异己,党外就更加不能容忍其他政党,哪怕是同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十月武装起义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实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俄国内还存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虽然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见不同,但它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并没有改变,在十月革命前它们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20年代初,曾经考虑过让这些政党合法化,但最后还是决定消灭它们。为此在1922年举行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这场审判是违背布尔什维克政权1919年所做的对他们实施大赦的诺言的。通过这场审判以及其他镇压措施,布尔什维克党消灭了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初除布尔什维克党外确实存在其他政党的话,那么到30年代初,频频出现的所谓“农业党”、“工业党”、“孟什维克党”等则均纯属虚构。斯大林借自己制造的假想敌来消灭任何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不同意见,推卸自己在工作中的种种错误。当然在30年代也确实存在反对他的势力,例如以柳亭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派。这是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政策、高压手段的反抗。斯大林则借此机会扩大打击自己的政敌,把大量与之无关的人员罗织进去。结果在苏联就形成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局面。

共产党是“圣剑骑士团”

共产党历来把自己看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怎样看待共产党?他提出一个独创的说法:共产党是“圣剑骑士团”,党的领导人是“领导术士”。

1921年斯大林在《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中写道:

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①

这是斯大林的一大发明。

在中世纪天主教有自己的骑士团，骑士团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有严格的等级，大体上分三级：团首（магистр），骑士长（командор），骑士（рыцарь），受教皇册封。通常集体住在寺庙，是教皇和封建主推行其政策如攻城略地，杀戮异教徒，清除异端的有力工具。历史上有一个叫作“条顿骑士团”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曾使俄罗斯公国深受其害。但历史上是否有过“圣剑骑士团”（орден мечносцев）无从查考，可能是斯大林参照宗教组织“骑士团”杜撰的。就实质而言，这种“骑士团”在现代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在法西斯德国就有起“圣剑骑士团”作用的“冲锋队”和盖世太保。斯大林手下的格伯乌、内务部及其内卫部队，也是此类“圣剑骑士团”。不过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等同为圣剑骑士团，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中世纪的宗教组织，这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一大发明！不过，话又说回来，斯大林的说法虽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却完全符合苏联共产党以后的发展实际，这个党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逐步演变成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变成信奉宗教教条、等级森严、排斥异己、代表少数贵族特权阶层利益（“在册权贵”）的“骑士团”！

1923年4月斯大林在俄共十二大上做中央组织报告，谈到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时说：

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②

很难理解，一个领导人会由于熟练领导政治和经济工作而会成为什么“领导术

①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57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士”！这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说法！

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圣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作“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圣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教”了。

开保存共产党领袖遗体之先河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的某些做法都是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列宁的遗体作防腐处理，放进水晶棺，安放在专门的陵墓之中，供世人顶礼膜拜。这是仿照东正教保存“圣人”遗骸的做法。还在列宁逝世之前，斯大林和加里宁等已经筹划保存列宁遗体了，列宁去世后，正是他们不顾其他领导人布哈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以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强烈反对，保存列宁遗体，在红场上修筑陵墓。

在追悼列宁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发表誓言，后来被叫作“伟大的宣誓”，苏联有一部电影就叫作“伟大的宣誓”。在这篇誓言里，关键词“遗嘱”斯大林没有采用通常的法律用语“завещание”，而是使用东正教的宗教语言“заповедь”，这个词的本义是宗教的“戒条”、“圣训”^①。斯大林使用这样的用语，一则是斯大林本人习惯于这种东正教的语言，其次还因为列宁并没有在“永别时嘱咐”过斯大林所举的6条“遗嘱”。这些“圣训”，是斯大林本人创作出来的，其中有的斯大林遵循了，有的则抛弃了。例如“保护我们党的统一”，斯大林率先分裂了党，并且把列宁的亲密战友斩尽杀绝。“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斯大林遵循了，不过他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他个人的专政和独裁，变成了对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专政！“竭力巩固工农联盟”，斯大林把农民作为剥夺的对象，通过全盘集体化直接消灭了农民阶级。“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这一点斯大林做到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并吞了波罗的海三国，给苏联增加了三个加盟共和国，还通过侵占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土地，大大扩大了苏联的领土。“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斯大林没有做到，他在共产国际里瞎指挥，导致一系列革命的失败，1943年又亲手解散了共产国际！可见，“戒条”也好，“圣训”也好，对斯大林来说仅仅是一种表态的需要，哗众取宠的需要，实际上都是可以置诸脑后的。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6页。

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发动了以纪念列宁为名的征收党员运动,招兵买马,扩大力量。

1923年底“新方针”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有广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军队和青年学生中,在这些地方,争论经常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方取得多数。这不是托洛茨基刻意争取的结果。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在争论中多数支持托洛茨基。“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首脑,同时也是彼得格勒的首脑,加米涅夫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也是莫斯科的首脑,他们在地方上都有自己的支持者。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斯大林是悬空的。

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举办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一语是中文意译,俄文为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 призыв 是征召的意思,征兵用的就是 призыв 这个词。所以 Ленинский призыв 一词的直译是“列宁的征召”,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是按照搞运动的大哄大喻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生产队(突击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的人员统统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 25 万党员。

到 1924 年 5 月底,俄共原有党员 472 000 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 25 万,一下子增至 72 多万人,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1924 年 5 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征收党员的做法。斯大林当时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征收党员运动巩固了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不仅和它所有弱点,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

^① 《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1 页。

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①

“巨大意义”是对斯大林而言的,至于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年4—5月,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约·斯大林。”

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解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将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又是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说:“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②

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工人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工厂的工人倒是增加了,但大多数是由来自农村的农民补充的,他们在工厂的工龄很短,完全够不上列宁所说的工人的标准。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困难年月逃到农村另谋生路而现在返城的工人。这一部分工人,也很难说是坚定的无产者。把这些人征收入党只会涣散党的队伍。

40万党员列宁已嫌多了,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新党员!这些党员构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接受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1924年最高领导集团92%的人是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到1939年,94%的中央委员(1924年的)被清洗出统治集团,代之以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入党的人。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9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17—18页。

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①

“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托洛茨基这样评论以列宁名义征收党员的运动:

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②

职务名册的制定与“在册权贵”的诞生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重申巴黎公社“廉价政府”的原则,官员拿工人的平均工资。十月革命后由于建设和战争的需要,开始给专家以高薪,这是一种收买、赎买。列宁承认这是违反巴黎公社原则的。

1922年斯大林当上俄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他同时还是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成员,这就把党的组织和人事大权抓到了自己手里。他手下的卡冈诺维奇开始制定中央控制的职务清单,确定中央各单位设多少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选由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任命或批准,这就是苏联延续几十年的“官员等级名册制”,由此获得职位的官员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高薪特权阶层,在苏联后期,这些官员被叫作“在册权贵”。通过这一制度全国高级干部的任免就掌控在总书记手里了。

为了拉拢党员和干部,斯大林提高党员待遇,把赎买党外专家的做法延伸到对党内干部的收买,在国内培养出一个“在册权贵”群体。斯大林时期开始给高级干部发红包,提供别墅、高级休养所、出国旅行等福利。30年代,斯大林给自己定了全国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3页。

^②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6—387页。

最高月工资 1 万卢布,以后的最高领导不敢拿 1 万,就拿 8 000 卢布(赫鲁晓夫等)。这时外国留学生一个月的助学金是 500 卢布,清洁工的月工资为 200 卢布左右。

在列宁时期,党内并没有设立最高职位,列宁本人在党内只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在政府中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党内和政府内的领袖地位是由他的威望造成的。那时候总书记并非党内最高职位,只是处理日常党务的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那些技术性的日常事务甚至是其他党内领袖所不屑于介入的,但斯大林很清楚组织的力量,他利用这个职位拉党结派,并最终夺取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列宁患病期间,斯大林打听到列宁不久于人世,就开始拉党结派,打击自己的对手。他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行使党政最高权力,在此基础上又结成“七人小组”,顶替政治局,把托洛茨基排除在决策层之外。后来在“三驾马车”和“七人小组”内又设法排挤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逼得加米涅夫在党的十四大上大呼“斯大林不是能够团结全党的人物”,反对“制造领袖”。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不仅击败对手,还要失败者不断公开悔过,跪地求饶,然后予以肉体消灭。

1923 年秋开始党内“新方针”的争论,接着又就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一文展开历史问题的争论,结果是给托洛茨基扣上“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罪名,撤销其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1925 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织“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对农村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结果是斯大林改组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组织,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列宁格勒的领导职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加米涅夫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解除其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务。1926 年至 1927 年,他们两人同托洛茨基结盟,组成“托季联盟”,继续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结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1928 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边远的阿拉木图,1929 年初被驱逐出境。1928 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对农村实施“非常措施”、阶级斗争尖锐化、共产国际政策、工业化速度等问题同斯大林发生激烈争论,在这中间布哈林等人提出辞职,斯大林不准他们辞职,但是几个月之后,却解除了布哈林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解除托姆斯基的政治局委员和全苏工会中央

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李可夫的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20年代同斯大林的争论中败北者最后都以被解除职务结束!这样,通过解除职务,斯大林一个一个地清除掉(也就是普列汉诺夫当年所说的“遣散”)自己的对手,最终形成他个人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在20年代斯大林还不敢做得太明显,驱逐托洛茨基算是对待政敌的最后措施了。到了30年代,斯大林羽翼丰满了,他清楚记得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寻找机会和借口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他以基洛夫遇刺身亡为契机,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送上断头台,以后又把布哈林、李可夫枪毙了。

斯大林施展的是拉一派打一派的权术,先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等打击托洛茨基。然后拉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打击季诺维也、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结成的“托季联盟”。最后孤立并打倒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派”,终于大权独揽。

非常了解斯大林的托洛茨基这样总结斯大林的斗争方法:

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做法,那就是:在进行反驳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辩论,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能的话,在肉体上消灭他。^①

在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使用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战术,其终极目标并非对手的投降,而是斩尽杀绝,他使用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这种做法倒是与中世纪的圣剑骑士团一脉相承的。

戴隆斌主编:《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518页。

苏共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两条不同路径

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此目标而建党。不过在共同目标下,对达到目标的方法、道路以至执政期间的具体政策,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出现分歧。对出现的分歧如何正确处理,以消除分歧、达成一致,在苏共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做法和方针。大体说来,在列宁时期是出现分歧,展开争论,达成一致,继续和衷共济地工作;在斯大林时期,是出现分歧,展开争论,上纲上线,捣乱起哄,撤职降级,公开悔过,流放,驱逐出境,关进监狱,枪毙处决。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一个是为消除分歧而展开争论,一个是利用分歧搞权力斗争,打击异端,消除政敌,建立独裁。

本文不用“党内斗争”的说法,“党内斗争”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惯用的语言,它把一部党史写成连绵不断的“党内斗争”的历史,把任何与领导不同的观点、言论的出现都叫作“党内斗争”的表现,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场合只不过是某项政策、某种提法和做法的不同意见而已,提者未必要掀起一场斗争,而不同意见经过讨论是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所以本文更愿意使用“意见分歧”与“党内争论”的说法。

党内有派别和分歧,列宁的办法是说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之时起就不断出现各种派别,这些派别都是在某些问题上有共同看法和主张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最早有“经济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叫“信条”,接着出现党内最大的两派——布尔什维克派(多数派)和孟什维克派(少数派),两派共存于一党达十四年之久(1903—1917),这期间分分合

合,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方把另一方开除的情事,最后也不是以开除结束,而是以布尔什维克派单独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来完成党的最终分裂的。这以后孟什维克继续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看起来倒是他们继承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统地位。不仅如此,在很长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内部都还存在小的派别,例如布尔什维克派内有“前进派”、“召回派”,孟什维克派内有“取消派”、“护党派”、“国际主义派”等,此外还有游离于两大派之间的派别,如“区联派”。到1917年为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可以说是各种派别并存于一党之内的一个共同体。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党内还有派没有?派别继续存在,意见分歧和党内争论继续存在。列宁时期就有两次大的争论:一次是围绕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展开的,另一次是围绕工会问题展开的。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总共执政八个月,它未尝不想同德国缔结和约,退出战争,它坚持的是签订公正平等的和约,但当时德军在战场上正取得上风,自然不可能同临时政府缔结这样的和约,况且当时临时政府执政不久,有大量的事务等待处理,所以并没有能够满足人民和军队退出战争、实现和平的愿望。布尔什维克当然有理由指责临时政府迟迟不解决战争问题。不过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后争取和平的斗争也并不容易,为解决战争问题,也几乎花了半年时间。之所以拖这么长的时间,一则敌强我弱,德国根本不想同苏俄签订什么平等公正的和约,其二,国内阻力非常大,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布尔什维克党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反对签订这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和约。可以说,当年临时政府如果愿意签订这种丧权辱国的和约,退出战争并非不可能,布尔什维克也肯定会指责临时政府是卖国政府。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和的列宁处于少数,他的媾和主张无法在党内通过。托洛茨基在和谈中持“不战不和”的立场。现在都指责托洛茨基的策略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严重损失。但是人们不知道,“不战不和”策略并非托洛茨基的发明,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策略,托洛茨基率团去布列斯特和谈时,两人曾约定尽量拖延谈判,不战不和,等待德国爆发革命,只是后来德国军队发动进攻,初建的红军抵挡不住,列宁才转变策略,要求立即签订和约。而托洛茨基继续寄希望于德国革命,他认为不能不战而降,指望用苏维埃政权的战败激起德国无产阶级起来推翻德国的统治者。最后托洛茨基派以弃权的方式使列宁

的和平主张赢得多数。那时候,坚决反对签订对德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主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用革命战争点燃西方的革命烈火,为此即使牺牲苏维埃政权也在所不惜。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上,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与列宁的分歧在于对德国等西方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的估计上,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没有本质区别。在处理这样一个革命后遇到的大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有人说,瞧,列宁多宽宏大量,没有用开除“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办法来解决分歧。实际上,那时列宁在中央委员会里处于少数,谁开除谁呀?解决分歧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说服,揭示当时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真实危险,用别无出路来说服反对者。

第二次大争论是1920年底至1921年初的工会问题争论。工会问题争论把党的高层全都卷进去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主张,使党的高层出现十来个派别,如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缓冲派、十人纲领派等等,甚至列宁也加入了“十人纲领派”。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争论,党内争论得热火朝天,但是有一个当时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却没有人提及,这就是广大农民暴动反对粮食征收制,反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时布尔什维克领导仅仅把这个遍及全国各省的农民起义看作“盗匪”作乱,单纯派军队去镇压此起彼伏的暴动,而没有从根本上去满足农民的要求,彻底消除农民的不满。这从俄共十大仅仅用半天的时间讨论废除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政策也可以看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列宁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严厉批评,并且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过,批评归批评,最后对这场争论的直接当事人托洛茨基并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托洛茨基、布哈林照样当他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托洛茨基继续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布哈林继续担任《真理报》的主编。争论各方十大后和衷共济地继续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努力。俄共十大只是通过一个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而对其中最严厉的第七条,即可以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直至开除出党,列宁作了若干保留,公开说明,“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因此大会决定该决议的第七条不予公布,希望这一条备而不

用,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列宁还强调指出:要把“必要的策略上的一致和统一同必要的辩论自由结合起来”,“不要放弃学术探讨”。^①

“三驾马车”与“尚方宝剑”

可惜的是,列宁逝世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第七条,把它作为镇压异己的“尚方宝剑”。不过,用不了多少时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尝到了这方宝剑的厉害,这是后话。

列宁卧病期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悄悄组成的“三驾马车”掌握了党政大权,它没有得到正式授权,但由于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被默认了——季诺维也夫是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加米涅夫是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斯大林是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均由季诺维也夫做政治总结报告。不过此三人并非铁板一块,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之间也在为第一把手的地位而争斗,那时斯大林的位置在三驾马车中处于末位,对这个位置他是不甘心的。

1923年秋冬党内围绕“新方针”展开一场新的争论。“三驾马车”并不打算就党内民主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和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发扬党内民主,而是致力于把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打成派别集团。起初有46名党内资深领导人员联名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对党的方针和国内经济状况提出不同的看法,托洛茨基并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而是单独给中央写信,谈自己对反对官僚主义、党内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三驾马车”却千方百计把所谓46人政纲同托洛茨基绑在一起,称之为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实际上那时候还谈不上什么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派的形成还要晚一些。倒是“三驾马车”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自己的派别组织以控制局面。有1923年12月6日季诺维也夫写的便条为证:

他们完全按照派别的做法行事。如果我们不立即成立自己的高度团结的派别,那么一切就完了。

我建议首先要得出这个结论。我提议明天(星期日)专门就这个问题召开一次会议,可以在郊区斯大林的住处,或者在我这里。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94—95页。

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

季诺维也夫 1923年12月8日

便条上有如下批语：“同意。斯大林”，“很好。同意。米·托姆斯基”，“阿·李可夫”，“只是不要早于晚上7点钟。列·加[米涅夫]”，“同意。可我更愿意‘观景’。阿·伊·李可夫”。^①

人家是“按照派别的做法行事”，而“三驾马车”则是干脆直接组织自己的“派别”。谁搞派别活动？无需多说。

1923年到1924年，“三驾马车”主政下有两场争论，一场就是刚才提到的“新方针”的争论。另一场是关于《十月的教训》的争论。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间的错误，这自然引起“三驾马车”的反击。不过，反击的方法不是去辨明1917年间的是非，而是给托洛茨基戴上一顶“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是致命的一招，托洛茨基头上从此就带上摘不下来的这顶帽子。接着就是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季诺维也夫甚至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这是十月革命后首次用撤职给争论做总结的做法。这时斯大林还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极端措施，反对“割除”政策。

“三驾马车”击败了托洛茨基之后，内部的分歧表面化，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新的派别，被叫做“新反对派”。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排除斯大林。加米涅夫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挑战斯大林，说斯大林不是一个能够团结全党的人物。“新反对派”的大本营在列宁格勒，代表大会还没有结束，斯大林就派人去列宁格勒“清理”队伍了。接着就是采取措施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解除加米涅夫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职务也被解除。“新反对派”攻击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而斯大林出来为布哈林辩护，认为这不过是布哈林脱口而出的一时失言而已。不过，三年后斯大林就以更猛烈的炮火攻击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斯大林的做法逼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跑去同托洛茨基结盟共同反对斯大林，是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斯大林联合布哈林击败了“托季联盟”，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12. С.168.

涅夫先后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对托洛茨基则不仅开除出党,还把他流放到那时还是不毛之地的阿拉木图,最后于1929年初把他驱逐出国,托洛茨基从此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次国外流亡。托洛茨基是幸运的,那时还没有因意见分歧处死反对派领袖的先例,所以给托洛茨基的最高刑罚只是流放和驱逐出境,他在国外还能再活十多年。

在反对托洛茨基派中,布哈林作为理论家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托洛茨基派的失败,布哈林的声望也上升到顶点,这对斯大林的权威是严重的挑战,成了斯大林最后的强大的竞争对手。收拾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之后,斯大林开始同自己的盟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算账了。1928年布哈林同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分歧的主要点是赞成还是反对对农民采取暴力措施,实行“非常措施”。斯大林在获得多数之前,对全党隐瞒出现的分歧,口口声声宣布中央始终团结一致,当他争取到多数之后,就毫不留情地开展反“右倾”运动。最后的结局与托派一样,撤销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职务,撤销李可夫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撤销托姆斯基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他们都先后被开除出政治局。在争论过程中,布哈林等人曾多次提出辞职,认为在斯大林所设定的条件下(派“政治委员”到他们主管的单位进行监督),他们无法工作,不能承担所负的责任,但是不允许他们辞职。最后当斯大林完全掌控了局面之后,就把他们开除了。

不准辞职,只能开除!这是斯大林的方针。在列宁时期,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初期,某些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在同中央的政策发生冲突,而自己的主张得不到中央的支持时,往往采取辞职的做法,这种辞职有的是表示不能为中央的政策承担责任,有的是表示抗议。如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表示不能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承担责任,不能代表中央的政策。布哈林辞去《真理报》主编的职务,表示不同意签订和约。那时的人并不留恋官职,去留完全以自己形势、政策的判断为标准,用辞职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主张是常见的现象。

枪毙取代争论

在争论中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

在20年代初列宁时期,党内是可以就重大问题提出异议和展开正常争论的。

1921年初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堪称党内民主的典范,它不是听一个报告,代表们表态赞成拥护完事,代表们在会上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同列宁争论。不用看会议记录,光看看列宁回答各种问题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相当活跃:代表们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建议,有些是列宁所不同意的,对此列宁一一做了回答,阐述自己的看法。大会作出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但是并不禁止有不同意见,不禁止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传统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存在。传统不会马上消失,列宁去世后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还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新反对派”可以按照党章的规定针对政治报告做自己的“副报告”,阐述自己的政纲,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指名批评斯大林。但到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情况就完全变了,反对派成员参加了会议,但每逢他们发言,下面就是一片鼓噪声,嘘声、跺脚、吹口哨,甚至拿手头的东西砸人,限制和强制打断发言,其情景犹如当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西方某些国家的议会那样。到了30年代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就剩下一个声音,与会代表只能给斯大林鼓掌欢呼,高喊万岁了。但由于选举时代表们没有把票全部投给斯大林,据说基洛夫获得票数比斯大林多了近300票,会后有一半以上的代表被逮捕处决。斯大林消灭了党内分歧,消灭了党内争论,全党实现了“坚如磐石的团结”。

对于失败者斯大林要使之身败名裂,这就不仅仅是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降级使用,而且要求对方公开承认错误,表示悔过。在俄国历史上这叫做“公民死刑”。这种做法在列宁时代是从未有过的。克鲁普斯卡娅坚决反对党内争论中要求“悔过”的做法,认为要求反对派无条件放弃自己的观点是“心理上行不通的”,只会造成原反对派与党的核心之间关系不必要的紧张。^①根据当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共产党需要保障少数的权利,因为多数有时并不一定正确,真理反而掌握在少数手中。克鲁普斯卡娅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为例,那时孟什维克在大会上占多数,通过的是孟什维克的决议,但是这并不表示孟什维克是正确的。

1929年4月中央全会上布哈林等人遭到失败,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不

^①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承认错误。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不同，布哈林并没有组织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组织纪律的派别集团，他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只不过有共同观点而已。对此斯大林的做法是一口咬定他们组成了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反党集团，这样就可以动用党纪处分，同时把党内分歧扩大到社会上去，展开大规模的批判右倾和布李右倾反党集团的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强大压力下，11月25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终于被迫发表声明，承认错误：

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在这一争论中党及其中央是正确的。我们在人所共知的一些文件中所表述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承认自己的这些错误，我们从自己这一方面将竭尽全力和全党一起同偏离党的总路线的一切倾向，首先是右倾和调和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以克服任何困难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全胜利和早日胜利。

这还不是他们的最终结局。最终结局是在30年代的三次所谓公开审判，曾经与斯大林发生过分歧并争论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都被先后处死。

党内存在不同意见，发生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条条大道通罗马，达到某一目标本来就有多种道路，多种方案，何者为佳，可以通过协商、争论、比较、共同探讨进行最优选择，意见分歧并不一定要通过党内斗争来解决。苏联共产党把党内斗争的作用夸大了，形成一种通过党内斗争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一部苏共党史被写成党内斗争的历史，其始作俑者则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逻辑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苏共的历史证明这种团结一致是高压下达到的。由于只允许一个声音，错误的决策得不到纠正。尽管集体农庄并没有能够解决国家的粮食问题，尽管大清洗搞得人人自危，但是没有人敢出来说声不字，一错到底。苏联的粮食到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大清洗”不仅消灭了列宁近卫军，而且消灭了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大清洗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人民，致使民众与党离心离德。所谓“坚如磐石的团结”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只要看看斯大林弥留期间那些领导人采取的“不作为”做法，不难看出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斯大林在长时间里是孤家寡人，是孤独的独裁者。1991年底苏共总部被查封，总部工作人员撤出办公

大楼时,只有围观的人群,没有声援的群众。这是相当可悲的场景!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副主席的反思

2001年9月6日中央编译局学术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伊凡·伊凡诺维奇·梅尔尼科夫。我请他谈谈苏共失败的原因,他回答说:

最有害的因素是党垄断一切。首先是对政治的垄断,国内看不到其他的观点,对不同的观点一味压制,不允许讨论。我是数学家,也能感觉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更严重了。其次是对经济的垄断,任何创新都被扼杀,像俄国这样的大国不能仅仅靠中央来管理。我个人认为,如果从一开始能给公司企业更多的自由,使具有市场的性质,这不会有什么坏处。第三,对真理的垄断。我们的电视、报纸很多,但只有一个观点,报纸上只有第三、四版略有不同,这很不正常。一些人提出问题和建议不是反对党,而是帮助党完善,有助于对道路方案的探寻。

一针见血!

《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

监督与反监督

列宁的国家设想

十月革命前,列宁设想的国家是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其特点是各级官员选举产生,接受选民的监督,可以随时罢免,官员的工资不超过熟练工人平均工资,全民武装(以民兵取代常备军)。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大体上就是这样的国家。这里说的专政主要不是暴力,而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民主管理模式。

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很快全国进入内战,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巴黎公社式的国家连影子也没有。全国实行“战斗命令制”,官员任命制,由于全国经济遭到破坏,官员与工人的工资都处于低水平的粗糙的平均主义状态,有时甚至连工资也说不上,只能分到一份不足以果腹的口粮。但是由于需要专家,开始对专家实行高薪,打破了巴黎公社规定的薪金标准,以后又把这种高薪用于各级官员。巴黎公社的经验只剩下列宁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镇压一项。代表无产阶级实施专政的是共产党,代表共产党实施专政的则是人数不多的几个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包括无产者、农民等都没有管理国家的可能。在整个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盛行的是强迫命令,是军事行政措施。官僚主义应运而生,国内出现各种官僚。国内战争结束之时,列宁把官僚主义列为三大敌人之一。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号称“议行合一”,即行政与立法合一,但“议行合一”的结果是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都可以立法,法出多门引起混乱,不久即被实践所否定,还是实行苏维埃司立法,人民委员会司行政,议行分立。后人只是依据列宁的说法,不顾苏俄的实践,继续肯定所谓“议行合一”的说法。不过苏维埃政权的根本问题是党政合一,以党代政。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内战末期,农民反对粮

食征收制和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把全部过错都加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身上，他们不反苏维埃，而反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不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20年代初，列宁觉察到其中的弊病，提出党政分开，但说说而已，未见成效。如果说，在列宁时代人民委员会还能够独立作出决定，那时是因为人民委员会是列宁主持的缘故，而到斯大林掌权之后（1929年以后）由李可夫和莫洛托夫先后任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已经没有独立决定权。掌权的是政治局，而政治局里最后决定权属于总书记。

列宁时代，政治局人数很少，正式委员5人，候补委员3人（1922年正式委员增加为7人），按字母顺序排位，没有头，即没有以谁为首的问题。政治局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列宁缺席，则由加米涅夫主持，是主持政治局会议，没有设政治局主席的职位。1922年政治局委员的具体职务：列宁——人民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缺席时主持政治局会议；托洛茨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斯大林——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李可夫——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列宁逝世后继任主席；托姆斯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候补委员：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后来是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第一把手）；加里宁——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终身），莫洛托夫——俄共书记处书记。

除政治局，还设有组织局，主管组织人事工作。1922年书记处新设了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担任。这是书记处的总书记，是书记处的头，而不是全党的头。不过，这样一来，斯大林就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个职务于一身，用列宁的话说，拥有无限权力。政治问题可以立即转化为组织问题，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尤其到了30年代。政治局是核心政府，人数不多，但管整个苏联，还管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要不要对政治局实施监督

政府的各种问题都事先由政治局讨论作出决定，后来几乎事无巨细都需要政治局来决定。1922年从国外运来一船罐头食品，由于政治局没有作出决定，就一直留在船上，而莫斯科食品短缺，急需这批罐头。这是典型的苏维埃官僚主义，列

宁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不过,这不是某个官僚的个人问题,而是机制问题。我在20年代末的一份档案中看到,某位医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提交政治局讨论批准。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政治局专门讨论供应妇女需要的连裤袜问题。这个政治局不是政府是什么?

有权就有可能被滥用,为对政权机关、经济机构实施监督,十月革命后曾陆续成立监察机构,先是成立全俄工人监察委员会,1918年1月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监察委员会,1918年7月改组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19年3月改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也叫工农检察院),由斯大林领导。由于工农检察院威望一直不高,根据列宁的建议,1923年起工农检察院同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合成一个统一的党政监察机构,由中央监察委员会领导。

监察机构起初的任务相当于现在的审计机关,主要实施财务检查,后来的任务包括对各级政府机构的办公制度实施监督,改善国家的行政机构,反对官僚主义,等等。不过斯大林领导下的工农检察院工作做得不能令人满意,列宁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比工农检察院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

列宁关心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察监督,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他更关心的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政治局的监督。当时经常出现党员犯罪被从轻发落的事,列宁不得不对此提出批评,可见党员的特权在那时候就存在了。

1920年,党的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1921年该委员会分为两部分,一个为中央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党的财务,另一个为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纪律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当时规定中央监委委员不能兼任政治局委员,以保证监委的独立性。1920—1923年间中央监委没有设主席职务,由工农监察人民委员斯大林主管,1923年起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央监委主席,任期为2—3年。

1927年党的十五大选出约120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人数太多了,不便于活动,就新建了一个主席团。那时频频召开该主席团与政治局的联席会议,在反对布哈林、李可夫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治局不仅是党的,也是国家的最高领导机构,但政治局建立以来没有提出和解决对政治局自身的监督问题,政治局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是不受任何监督的。这就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承认,官僚主义不仅国家机关中

存在,而且党的机关中也存在,尤其是看到从国内战争时期开始的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不和有造成党的分裂的危险,因此病榻中的列宁口授了好几篇文章,谈论怎样改善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问题。鉴于工农检察院“毫无威望可言”(列宁:“让我们直说吧,工农检查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办得更糟糕的机关了……”^①),列宁想以党的机关的威望来提升工农检察院的作用,所以建议把它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院,合署办公。同时,压缩工农检察院的人数,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扩大,用“掺沙子”的办法改善这个机关——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委。列宁希望用改组的中央监委来加强对党的各级组织,包括对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不过列宁的眼光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更想到对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局的监督问题,提出有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委委员出席政治局,实施对政治局的监督。在给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写道:“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形成为一个严格集中的和威信很高的集体,但是这个集体的工作条件还和他的威信不相称”,列宁接着说,他提出的改革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这就是让一定人数的中央监委出席政治局会议,以提出质询、检查文件:

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②

列宁建议的思路是:政治局需要监督,由和中央委员会并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派人出席政治局会议,检查政治局的文件,提出各种质询,等等。为此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有工人农民出身而又未沾染官僚习气的委员,以此改善中央监委的工作。他们的监督工作,应当是铁面无私的,不受领导人的威望的影响,尤其是不能受总书记的影响干扰——虽然那时的总书记并非党内第一把手,但掌握的权力太大,列宁认为有必要在信中特别指出。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8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列宁建议找人取代斯大林

列宁特别提醒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问题。还在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矛盾冲突就始终不断。托洛茨基反对游击作风，主张使用旧俄的军事专家，建立一支正规军队，而斯大林支持伏罗希洛夫等人为核心的军事反对派，反对使用军事专家，坚持游击作风。斯大林多次违抗军令，不听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自行其是。他们的冲突在内战结束后仍在继续。

1922年列宁病重不断休假，斯大林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抗列宁，如主张放松外贸垄断、主张用“自治化的方案”组建苏维埃联盟国家，坚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打压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辱骂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而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列宁保持一致，支持列宁的主张。

这样列宁不得不对中央这两个领导人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估：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在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①

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补充，认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开，换一个人接替，同斯大林相比这个人只要“较为耐心、较为谦恭（也译作‘忠顺’）、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就行。

我们由此看到：第一，列宁看到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矛盾冲突的危险，警告全党要注意防止因两人的关系造成党的分裂。第二，托洛茨基同列宁保持高度的一致，在民族问题、外贸垄断问题、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上病中的列宁都要借助托洛茨基的支持。第三，鉴于斯大林拥有无限大权，而又性格粗暴，担心他不能谨慎地使用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9页。

手上的权力,建议设法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就是说,列宁用排除斯大林的办法来防止党的分裂。关于领导人的性格问题,列宁特别强调,这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①

给代表大会的信要求加强党的稳定性,“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

历史证明,列宁的警告是正确的,20年代联共党内出现的最大分裂正是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分裂。

斯大林见招拆招

列宁在口授他的“政治遗嘱”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1923年3月口授最后三封短信后即一病不起,半身瘫痪,失语,再也不能介入党政大事了。斯大林从1922年起,即非常关心列宁的健康状态,第一次中风之后,斯大林就此病询问医生,索取有关医学图书查阅,还两次专门去哥尔克观察列宁病情。斯大林得出结论,列宁的病是无法治愈的,第一次中风之后接着还会发作,列宁“完蛋了”。列宁知道后曾愤慨地说:“我还没有死,而他们,以斯大林为首的,已经把我埋葬了。”但是,这时候列宁已经大权旁落,无能为力了。一些领导人表面上对列宁恭恭敬敬,把他神化,抬上天,实际上已经开始各行其是。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写成后即按照列宁的指示送往《真理报》发表。报纸主编布哈林不敢发表,斯大林支持他,借口是必须拿到政治局讨论。克鲁普斯卡娅于是求助于托洛茨基,要求他促使文章尽快发表。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召开的政治局和组织局联席会议上多数与会者不仅反对列宁提出的改革建议,而且反对发表文章。由于列宁坚持要看到刊载文章的报纸,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甚至建议单印一份刊有此文的《真理报》应付。

由于列宁的坚持,此文终于在1923年1月2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但是做了手脚。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页。

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于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对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①。《真理报》在发表时删去了文中提到总书记的字样。^②此后《列宁全集》俄文第一、二、三、四版均按《真理报》的文本刊载,直到第五版才恢复原样!

由于文章严厉批评了当时的国家机关,点了总书记,特别是谈到工农分裂问题,1923年1月27日政治局委员们特意给各级党的组织发送了一封秘密通告信:

不言而喻,列宁同志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并且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没有把政治局和组织局会议的记录发给他。然而医生认为,鉴于他无法忍受完全不从事脑力劳动,允许他做写日记之类的事,他可以把自己对各种问题的想法写下来,部分日记根据列宁同志本人的指示在报刊上发表。写作《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的外部条件已经表明,此文中的建议并不是由于中央内部的某种纠纷引起的,而是列宁同志关于党在未来的历史时代中还会遇到的困难的一般设想。^③

除当时在彼得格勒的季诺维也夫以外,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上面签署。发出时还附有斯大林的信,强调严格保密。这封通告信把列宁关于分裂危险的警告化为乌有了!

列宁提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特别强调增补进来的委员应是来自基层的没有沾染官僚主义习气的工人和农民,以增加中央的稳定性和改善“糟透了”的机关”。斯大林看到了列宁的这个建议,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以个人的名义提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人数,趁机把自己的人塞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俄共十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正式委员40人,候补委员17人。据党史学家阿夫托尔汉诺夫分析,新增中央委员中有10人、候补委员中有12人是斯大林直接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干部,另有两人是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增的17名候补委员中有12人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另有3人是支持季诺维也夫的。中央监委从5人扩大到50名正式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其情况与中央委员会大体类似。^④列宁要增加的是直接来自工农的委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② 《真理报》1923年1月25日。

③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11. с.180.

④ 见《苏共野史》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0—591页。

员,而斯大林改为来自地方的各级官员,列宁的建议就变成了斯大林招兵买马扩充队伍的措施了,结果斯大林在这两个党的机构中开始拥有自己的多数,他所拥有的“无限权力”更加扩大了,足以对抗任何反对意见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在同反对派斗争中斯大林频频召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以自己的多数压打反对者。列宁是希望通过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来增加中央的稳定,维护党的团结,加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斯大林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列宁的初衷。

“三驾马车”隐瞒、曲解列宁“遗嘱”

写有列宁各项建议的所谓遗嘱,即给代表大会的信,是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十二大,他的信也没有能够在大会宣读,尽管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早已看到或者知道列宁的信,但一直严格保密,直到列宁逝世之后,才在党的十三大以特别的方式传达。

1924年5月召开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大会出现一个令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三驾马车”非常不安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处理“列宁遗嘱”,即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2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的“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这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为列宁的信中点出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武装起义问题上的错误,指出斯大林的严重缺点,要求把他调离总书记职位。列宁曾经嘱咐,口授的信件必须严格保密。但是1922年12月23日的信,秘书福季耶娃违反规定当天就交给斯大林了。对24日信的补充,至少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许还有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也看到了。^①斯大林曾故作姿态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但作为总书记,他不可能不知道。^②

1924年5月18日,代表大会开幕前5天,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给代表大会的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4. с.199.另见郑异凡:《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3—416页;尤·阿·布拉诺夫:《被篡改的列宁遗嘱》,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1页,作者认为,托洛茨基在1922年底没有看到列宁口授的信件。

^②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4. с.203. 1923年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的信中提到“伊里奇的话千真万确”。斯大林显然获悉了信的内容,于8月7日给季诺维也夫回信说:“何必引用一封我并不知道的伊里奇谈书记的信呢?”(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第313、324页)。可见斯大林知道“伊里奇的话”的内容。

信等 1922 年 12 月 23 日至 1923 年 1 月 23 日所口授的 13 个文件正式移交给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克鲁普斯卡娅写明,列宁坚决要求在他死后送达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实际上在 1923 年 5 月底或 6 月初列宁的文件已经陆续送到政治局,而列宁逝世后立即成立了列宁文件接受委员会,不言而喻,其首要任务就是接受这批关系最高领导人命运的文件。^①所以克鲁普斯卡娅的移交仅仅是一种例行公事而已。5 月 21 日,大会开幕前一天,在中央全会上宣读了列宁的信。斯大林的秘书巴扎诺夫参加了全会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宣读遗嘱的情况。

宣读完毕,季诺维也夫接着讲话说:

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伊里奇的遗嘱,伊里奇的每一句话对我们都是法律……但有一点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伊里奇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亲眼证实最近几个月我们的共同工作,跟我一样,你们可以满意地看到,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我说的是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分裂的危险。^②

季诺维也夫,接着加米涅夫提议继续选举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加米涅夫说,政治局考虑到列宁的意愿,提出把列宁的这一文件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传达的建议,不过政治局建议不要在全体大会上传达,而只在各代表团分别宣读。加米涅夫补充说:

政治局建议在讨论列宁的信件时应以能够把斯大林留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为出发点,因为他已经承认列宁所指出的缺点,并且答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③

全会通过举手表决,多数人同意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会上除托洛茨基外,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反对向大会宣读“遗嘱”。全会最后通过如下决定: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受委员会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④

① 详见郑异凡:《列宁遗嘱考》,载《不惑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89—412 页。

② 见波·巴让诺夫:《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8 页。

③ 阿·伊·米高扬:《列宁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载陈启能主编:《苏联大清洗内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60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558 页。

根据这项决定和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决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宣读时禁止做记录,不进行讨论,在全体会议上不得引用遗嘱。宣读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加以说明,说从列宁写这份文件起,党内状况有了重大变化,现在的主要危险已不是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忠顺,而是托洛茨基及其党徒的活动,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只会有利于他们。他们要代表们相信,斯大林接受了列宁对他的缺点的批评,斯大林也立即作出保证。

对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本来应当仔细阅读、深刻思考、交换意见的,然而仅仅是用耳朵听一遍,还不许议论,这样对列宁的思想是很难有深刻的把握的。“遗嘱”没有能够中止或缓和党内斗争。

在决定总书记职务问题时采取了违规的程序。先由大会各代表团作出赞同保留斯大林职务的决定,然后中央全会“形成”这一实际上已经通过的决定。由于这种做法,斯大林似乎是直接从党的代表大会获得担任总书记的授权的,他在以后不止一次地提到这一点。因此大会不是限制,而是加强了斯大林的权力。

代表大会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选出的中央书记除斯大林外,还有莫洛托夫(第四次当选),安德烈耶夫、卡冈诺维奇、捷连斯基(均为第一次)。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有: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候补委员有:捷尔任斯基、加里宁、莫洛托夫、鲁祖塔克、索科里尼柯夫和伏龙芝。

“三驾马车”在这次大会上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消除列宁“遗嘱”对他们的冲击上,限制列宁最后思想和主张的扩散,全力保住斯大林的总书记位置,这样就把列宁在信中提出的一系列其他建议,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建议,推到次要地位,甚至没有在十三大及以后的党的论坛上讨论。而广大普通党员除小道消息外,根本就不知道有列宁“遗嘱”一事。

列宁的建议并非组织决定,党的组织和个人自然有权拥护和反对。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列宁确实有先见之明,他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建议是正确的。

偷梁换柱,斯大林的致命缺点成了优点

在俄共十三大开幕的前一天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宣读了列宁遗嘱,之后斯大林在会上假惺惺地提出辞呈:“好吧,我确实粗暴……伊里奇建议你们找一个比我有礼貌的人。好吧,试试找吧。”

1927年10月21至23日召开联共中央联席全会,反对派再次提出公布“遗嘱”和执行列宁关于撤销斯大林职务的建议问题,斯大林被迫在全会上宣读“遗嘱”文本。

斯大林在会上作了题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发言,在“几个小问题”一节中声称谁也没有隐瞒列宁的遗嘱,斯大林把列宁批评他“粗暴”的缺点变成“优点”:“一点不错。是的,同志们,我对待那些粗暴而阴险地破坏并分裂党的人是粗暴的。这一点,我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掩饰过。”“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最后斯大林提到他多次辞职的请求以及请求被拒绝的经过,说:“我有什么办法呢?从岗位上溜掉吗?这不合我的性格,我从来没有从任何岗位上溜掉过,也没有权利溜掉,因为这样做就是逃兵行为。我这个人,以前已经说过,是不由自主的人,只要党责令我,我必定服从。”^①

斯大林这是在偷梁换柱,列宁批评的明明是对自己的同志粗暴,而不是对什么分裂分子的粗暴,正因为如此,列宁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为在人际关系中,有人性格粗暴是难免的,但是作为总书记,粗暴就会表现在组织手段、行政措施、暴力手段上,其危害无穷。所以列宁接着建议,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换个人取代之,这个人只要有一点胜过斯大林即可,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为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里明白无误地说的都是同志关系上的问题。

在中央和中央监委中形成自己的多数之后,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频频召开中央委员会与中央监委的联席会议,以自己的多数打压人数较少的反对派,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1928年,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是否使“非常措施”常态化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起初,两人在党内的支持率相当,斯大林不占优势,所以争论一直严格限制在党的高层进行,并且严格保密,上头争得热火朝天,下面一无所知,直到斯大林的支持者占多数之后,就开始利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公开批判布哈林集团,并最后解除布哈林等人的职务。中央监委主席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49—153页。

团是联共十五大后设立的,斯大林的人马占多数,政治局和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就成为打压布哈林集团的重要手段。

召开的联席全会不是为了发扬党内民主,而是为了打压反对派,所以斯大林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在30年代就很少召开这种联席全会了。不过中央监察委员会还继续存在,名义上它仍然有监督各级组织的职能。

列宁的监督思想全面落空了

为彻底摆脱监督,1934年在联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撤销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设置,改为在中央委员会下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由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兼任,取消其监督检查任务,而把其任务局限于检查执行党的决定的情况。从此以后政治局、总书记就不再受任何独立机构的监督了。

党需要监督,中央委员会需要监督,中央政治局需要监督,拥有无限权力的党的总书记更需要监督,列宁提出监督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列宁指望把监督限制在党内范围,即让境内的一个机构去监督另一个机构,这还不是现代民主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国家内部分权的监督,广大人民群众无权也无法参与这种监督。斯大林所采取的反制措施证明,这种党内监督是可以破解的,使之变质,为我所用。其次,列宁生前最后时日提出的各项建议仅仅是设想。由于重病,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虽然那时口头上已经把列宁奉为神,领导人口口声声声称列宁的话就是指示,就是命令,实际上自行其是。所以列宁的建议并没有能够形成制度,由于没有形成制度,没有约束力,掌权的领导人仍然能够逃避监督,甚至废除监督。这是历史的悲剧。列宁党内监督思想的落空,说明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建立国家的监督制度,吸引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监督,使执政党不仅受到党内的监督,而且受到党外即全国民众的严格监督。

列宁斯大林的工资是多少？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多次谈到巴黎公社原则，主张革命一旦胜利，立即实施这些原则，其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通过这一措施，建设“廉价政府”，使纳税人的钱不被用去供养大批于国于民都一无用处的官僚。

征收累进所得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张实行累进所得税，他在一个报告中说：“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唯一正确的税收是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他主张“一切收入和工资，毫无例外都应当征收所得税”。^①

列宁申报收入

列宁本人当然也不例外。1919年9月13日，列宁收到莫斯科第一所得税稽征所发来的1918年个人收入报表。

列宁对此认真对待，当即给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去信，请他找人抄录他的1918年薪金和稿费的明细账目，并请有关人员签名作证，此外还请他计算出房租。与此同时，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请求办公厅主任代查她的收入情况。

收到邦契-布鲁耶维奇提交的资料后，9月20日，列宁亲自为申报表写了说明。说明不长，现摘录如下：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29页。

我 1918 年的收入包括以下两项：

(第 4 项)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

由于薪金的数额在一年中有变化,所以我委托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将我 1918 年领取薪金的明细账目摘抄一份,现随此件附上。

(第 5 项)稿费:我定期从负责党的出版社工作和与作者结算工作的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处领取数量不等的稿费。随此件附上有相关人员签名的、根据 1918 年稿费领取总额凭证出具的证明。

对第 4 项的补充。实物收入是,年初在斯莫尔尼宫(彼得格勒)内得到一套住宅,后来,从政府迁到莫斯科时起,在克里姆林宫(莫斯科)内得到一套住房,内有 4 个房间,1 个厨房和 1 个保姆间(家庭人口——3 口人,加上一个保姆)。这套住房按当地价格值多少钱我不清楚。^①

列宁向邦契-布鲁耶维奇了解薪金和稿费数额,是为了缴纳 1918 年的所得税。从他本人写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列宁申报了三个项目:薪金、稿费和住房。具体数字为:

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薪金:9 683 卢布 33 戈比。

稿费:15 000 卢布。

住房:1 套共 4 间,加 1 间厨房和 1 间保姆间。

报表中所列的其他收入,包括货币资金、不动产、商务活动和手工劳动的收入、来自各种定期收益权的收入,列宁均填“无”。

这就是列宁在 1918 年全年的收入情况。这些收入是什么概念呢?

1917 年 12 月 1 日人民委员会曾作出规定,人民委员(相当于政府部长)每月最高薪金为 500 卢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个子女加 100 卢布,对高级职员征收特别税,削减一切过高的薪金及退休费。^②1918 年 1 月 2 日,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布关于薪金的决定,“确认人民委员会成员月薪为 500 卢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标准,至于付给专家更高的报酬不在此限”,同时要求财政人民委员部提出报告,说明是否已采取坚决措施征收所得税和杜绝逃避缴纳所得税的现象^③。不过,在是否

^① 中央编译局编印:《马恩列斯研究》2003 年第 4 期,第 5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101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33 卷,第 223 页。

给予专家以高薪问题上,1918年春在党的领导层有过一场争论,那时,为了吸引专家参加苏维埃国家的建设,决定给予专家月薪2000—4000卢布。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说:“有些人收入4000卢布,应当把他们拉到墙角下枪毙。”列宁反驳说:“这是不对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而我们这里能够领取4000卢布的人并不多。”不过列宁承认,这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公职人员应当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20卢布左右。

列宁的年工资9683.33卢布,月平均工资为807卢布,为专家的工资4000卢布的五分之一。807卢布的月工资是一个平均数,当时国库的收入是靠印钞机日夜加印纸卢布解决的,因此卢布不断贬值,年初的500卢布,购买力同年底的是大不一样的。1918年列宁的月薪金超出500卢布,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顺便说一下,苏联时期有过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1922—1924年,实行切尔夫文卢布,第二次是1947年,第三次是1961年(10卢布旧币等于1卢布新币)。由于通货膨胀和币制改革,所以不同时期的工资的绝对数字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同时期或同年的最高工资与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的比较。

列宁的稿费收入比工资高,1918年收入为15000卢布。这完全是他劳动应得的报酬。列宁的所有著作都是他本人亲手所写,而不是由秘书代笔,或者某写作班子创作的。在列宁的60卷著作中,没有发现他人代笔的文字。

关于住房,当时有一个规定,人民委员家庭成员的住房每人不得超过一间^①。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有一套房子,共4间,三人共住: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克鲁普斯卡娅,第三人是谁不清楚,可能是列宁的妹妹,后来与列宁同住的是他的两个兄弟。当时还不兴给领导人配备别墅,列宁因病需要休养的时候,住到莫斯科郊外哥尔克一个旧庄园。列宁病逝的时候,布哈林恰巧因感冒也住在那里,他是在现场给列宁送终的唯一领导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哥尔克当时并不是列宁专用的别墅。不像后来,领导人的别墅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在南方避暑胜地。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有去南方休养过,虽然医生一再建议他到气候宜人的南方去疗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01页。

可以说,列宁执政期间,在分配上大体上是坚持了巴黎公社的原则的,在党内并没有实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第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明确对定:“党员负责工作人员(即党员领导干部——引注)没有权利领取个人特殊薪金、奖金以及额外的报酬”,“必须规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消除‘专家’、负责工作人员同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生活条件、工资数额方面,等等)”。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违反民主的,它会瓦解党和降低党员的威信。^①

领导干部的高薪制

变化发生在1922年4月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这一年8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改善党员干部的物质状况,通过专门决定。“党的指挥人员”起初确定为15235人,包括中央和区域机构、省党委和省团委干部、县委(或区委)和县团委、乡支部和大企业支部书记,他们领取不同级别的工资,享受住房、医疗以及子女教育的保障。这些措施由中央委员会实施。领取最高等级工资的有俄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各部部长、中央区域局委员、区域委员会和省委员会书记。此外还允许给某些人特别提高工资。

此前,1922年7月,中央组织局通过“关于改善党的积极工作人员的生活”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最低级党的工作人员——企业和村支部书记的月工资为300卢布,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委员和省委书记为430卢布。在苏维埃和经济机关工作的领导人员的工资大体相当。同时规定,有3名家庭成员的党的工作人员工资提高50%,有兼职工作的加50%的工资。高工资的扣税完全是象征性的,从645卢布起征。由此可见,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的工资应是430卢布。但他还有兼职,是民族人民委员,应当再加50%。而1922年夏,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为10卢布。^②

对领导人来说,工资和收入不是一个概念,除工资外,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还获取党提供的粮食配给、无偿的住房、医疗服务,有时还有专门的交通工具。例如,苏维埃中央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在1922年夏每月获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

^① 见《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43页。

^② 《俄共中央通报》1922年第8期,第11—12页。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3. с.68。

4.8 公斤大米,等等。省一级的干部定额略少一些:4.6 公斤肉或鱼、1 公斤油脂、400 克糖、162 支香烟、3 盒火柴,等等。这对一个刚刚走出饥荒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量。

供领导干部休养之用的休养所网扩大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经济部主任亚·杰·梅捷列夫在 1924 年的工作报告中统计,为维持供领导干部休息之用的郊外房产,一共花了 6 万卢布。他在报告中写道:“我觉得在我们这种贫穷状态下,在农民难以缴纳粮食税(这是我们的预算收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无可逃避的职责是思考一下,如何减少这些开支……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①

还要补充一点,最高领导干部每年还可以到国外休养度假(一至三个月)。这种国外疗养,经常带着家庭成员和治病医生,均由国库开支。根据 1922 年 5 月 5 日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支付 100 金卢布作为去休息或治病的路费,100 金卢布作为第一个月在疗养院的开支,还有 100 金卢布作为“安顿和零花钱”,以后每月支付 100 金卢布。金卢布是沙皇时期的卢布,每卢布含纯金 7.774 235 克,不受苏维埃纸币贬值的影响,1 金卢布大体相当于 1922—1924 年币制改革后的 1 切尔文卢布。

1923 年下半年,中央组织局开始编制高级职务名册,一共制定了三个“职务名册”,规定这些职务的任免权归中央组织局及其分配登记部,这样就把当时叫做“负责工作人员”的高级干部概念明确化了——这就是登记在册的那批领导干部,其人数起初大体在 10 000 名左右。1922 年 4 月至 1923 年 4 月为 10 351 人,1923 年 4 月至 1924 年 5 月为 6 088 人,1924 年 5 月至 1925 年 12 月为 12 227 人。苏联末期开始流行的“在册权贵”(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词指的就是登记在“职务名册”上的领导干部,这些人不仅拥有相应的权力,而且还享有明文规定或没有规定的各种特权,例如在莫斯科就有相当著名的特供商店,里面各种优质的国产和进口商品应有尽有,且价格低廉,这是专门为他们服务的。

1932 年,斯大林废除了党员干部工资最高限额的规定,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级干部的实际工资。高工资和特权实际上是一种收买。有一个文件说,斯大林经常

^① ЦГАОП, ф.1235, оп.133, д.11, л.28, 30. 转引自 Павлова, И.В. 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3. с.69.

给省委书记发去大致如下内容的条子：“卡巴科夫，恳请在代表大会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会忘记你的。”

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伊甸园

2003年1月俄《总结》周刊发表文章《从工资到工资》，介绍了苏联不同时期领导人的工资情况，据这份资料，斯大林的月工资如下：

1921年到1935年为225卢布。1935年500卢布。1936年翻一番，1200卢布，是当时工人平均工资的5倍。卫国战争末期为2000卢布。1947年底，大概由于政治局委员等高干家属的吃穿不再由政府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资加到10000卢布，其他领导人的工资则为8000卢布。当时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80卢布，最低工资为220卢布。文中1921—1935年的数字可能是经过换算的，应是币制改革后的切尔文卢布，所以同上文1922年规定的430卢布对不上。

斯大林时期还有一个发“红包”制度。由于公开提高工资不太方便，于是采取另一种途径，每月发给高级干部一个专门的“红包”，内放工资外的“奖金”，是按照级别和“贡献”发放的，通常为月工资的1—2倍。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鲁晓夫取消。

对斯大林来说，从30年代初开始工资多少对他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他本人连同家属的一切开销均由政府包干，他本人再也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他的女儿斯维特拉娜回忆说，1947年货币改革后，政治局委员亲属的吃穿不再由国家开支，斯大林开始给她钱，但他并不知道新币值多少，或者物价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的旧价值，那时候给100卢布已经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当他递给女儿2000或3000卢布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笔钱能用多久，还以为给的钱值100万呢。他让他的工资袋在书桌上堆得高高的，都没有打开过。他从来不花钱——没处花，没有需要购买的东西，他所需要的一切全由政府开销，包括他的吃穿、别墅和服务人员，等等。克格勃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管这件事，设有专门的会计室。斯大林的工资都到哪里去了，他本人并不知道。^①对斯大林来说，早已生活在

^① 斯维特拉娜·阿里卢耶娃：《致友人的20封信》，见外文出版社研究室编印：《国外作品选译》第3期，第183页。

“共产主义社会”了！

和斯大林一样生活在“共产主义”的还有苏联的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其职位最高时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他同丘耶夫谈话时说，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领多少工资，“不知道，我从不关心这个问题。几乎没有限制，按需要领。够用，仅此而已。就是这个限度。”“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以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倡议，采用了红包制。用这种封口的信封给领导人们送钱，很多的钱。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斯大林得多少，谁都说不清。他有几所别墅……怎么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仅在莫斯科郊区就有4座专用别墅！”

直到被逐出“共产主义伊甸园”之后，莫洛托夫才关心起养老金，知道他起先每月养老金是120卢布，1967年提到250卢布，后来又增加到300卢布。这时他的别墅已经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给领导写信要求别墅，结果把位于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长会议的别墅给了莫洛托夫。别墅里的餐具打碎后，只要出示碎片，就可以免费换新的。每年可以在疗养院休养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卢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食堂吃午饭和晚饭。塔尼娅（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周去一趟，领回干的食物，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当然领的食物实际上大大超过60卢布，至少超过1倍。保姆塔尼娅由国家付工资。^①

赫鲁晓夫执政后曾经想改变一下这种不得人心的状态。他废除了斯大林的“红包制”，降低工资，他本人的月工资从任中央书记时起至下台一直是800卢布（币制改革前为8000卢布），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收入。后来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也坚持800卢布的月工资，但他从写作三本书《小地》、《垦荒地》和《复兴》获得巨额稿费和列宁奖金，据统计，他执政十八年共获得50万卢布的收入，这相当于一个乡村教师500年的工资！

自赫鲁晓夫之后，第一书记或总书记的工资一直保持800卢布的水平。1990年确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工资为2000卢布，为普通劳动者工资的5—20倍。

^①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613—615页。

工资外的物质特权

工资的数额是明的,关键是还有许多隐性的收入,或者说“灰色收入”,这就是作为领导人所享受各种物质特权,这些物质特权使某些领导人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利钦在自传中相当详细地谈了领导人所享受的各种特殊服务和优待,如专门的别墅、专门的医院、专门的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那赛似“皇宫盛宴”的特制佳肴,还有舒适的交通工具。职位的阶梯越高,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克格勃的第九局负责供应这一切。叶利钦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配有三个厨师、三个服务员、一个清洁女工,还有一个花匠。你如要去电影、剧院、博物馆,去任何社交场所,都要先派一个班的军警到那里检查一遍,然后封锁起来,你才能在这些地方露面。不过别墅里就有电影院,有放映员给放专场电影。医疗设施是最现代化的,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影院有各种精美的设施。莫斯科设有为高干服务的特供商店,购买“克里姆林宫贡品”,只需花它的一半价钱,送到这里来的都是精选的商品。全莫斯科享受各种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上面有好几个医生签名。休假时可以挑选南方任何一个地方,那里有专门的别墅,过了假期,这些别墅就闲着不用了。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4或图-134出行的,乘机时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①

每一个高级领导人都有一座甚至几座别墅,有的在莫斯科周围,有的远在南方海滨。斯大林在莫斯科和南方有好几处别墅,有的是他指示修建的,有的是手下主动为他修建的。戈尔巴乔夫调到莫斯科之后,先临时被安置在哥尔克10号别墅,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别墅也换了。他自己说,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要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的别墅豪华阔绰。^②

所有这些特权享受都没有计入领导人的工资,他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一个戈比。这是开支都来自国库。

① 见《叶利钦自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151页。

②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倡议国家官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他想实现巴黎公社的“廉价政府”的理想,他本人身体力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也曾经为此努力过,可惜在他去世后社会主义政府逐渐演变成了“高价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则终于荡然无存!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22日

发财还是贫穷,这是个问题

1925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五个年头,俄国共产党(布)内就发财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

起因是新经济政策虽然实行了五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阻力仍然很大,特别是在农村,有不少政策规定如禁止雇工和出租土地,严重束缚了农民的手脚,广大农民对剥夺富农的做法也心有余悸。农民们都害怕发家致富,怕扩大再生产,有先进的农业机器不敢使用,有钱不敢盖铁皮房子,等等。这种情况严重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说明新经济政策还没有进入农村。布哈林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分害怕雇佣劳动,害怕积累,害怕资本主义农民阶级,等等,这会使我们在农村采取不正确的经济战略。我们过分热衷于得罪富裕农民。但因此中农害怕改善自己的经济,害怕受到严厉的行政压制;而贫农则埋怨我们,说我们妨碍他们到富裕农民那里干活,等等。”

为把新经济政策推广到农村,1925年俄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农村的雇工和土地租佃合法化,以鼓励农民放手发展生产。

但是农民怕冒富,怕当“富农”的心理是不会一下子消除的,因此布哈林在一次报告中直截了当地向农民发出“发财吧”的号召。他说:

“总之,应当对全体农民说,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现在我们应当采取的政策,是要能在我国消除贫穷的政策。”^①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8页。

经过军事共产主义,经过多年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之后,这样提问题,要求消除贫穷,增加积累,甚至高呼“发财吧”的口号,在许多正统人士看来,显然是离经叛道。果然,党内出现了群起而攻之的局面,甚至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写了文章,要予以驳斥。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首先发难,对布哈林大肆攻击,认为这个口号“实际上是号召富裕农民和富农”发财,是要发展资本主义。那时候,斯大林还需要布哈林这位“党的最大理论家”,出于结盟的需要,不得不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出来保护布哈林,甚至声明不会把“布哈林的血”给他们的。斯大林虽然暂时保了布哈林,但他把社会主义积累同个人积累对立了起来,对这一个口号不表赞同,认为“不是我们的口号”,是错误的,虽然是“甚至是不值得注意的”错误。不过斯大林对其他人可就不客气了。当时《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斯捷茨基的一篇文章,“力图用婉转而隐约的形式为‘发财吧’的口号作辩护”,结果斯大林主持的中央组织局撤销了该报主笔的职务。这实际上也是给布哈林的一个警告。

在两派的夹攻下,布哈林不得不三次声明收回这一口号,说发财吧的口号“无疑是对完全正确的论点即党应该采取提高农村福利的方针对错误的表达方法”。^①

农民要不要发财,能不能发财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说,当时党内对立的两派——新反对派和斯大林派都反对农民发财。

这就出现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要让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特别是流通领域的合作社,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去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不让发财,禁止发家致富,甚至把那些肯干活,会经营,因而变得富裕的农民当作“富农”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有生产的积极性呢?广大农民只好等着挨饿受穷了。那些在新经济政策下努力耕作,善于经营,利用政策给予的优惠和可能来发展生产的农民,那些城里赚了钱的商贩,即所谓的“耐普曼”,虽然对当时的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仍然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1928年8月11日,有一个乌克兰农民就中农地位给《农民报》写了一封信,对这种现象表示了严重的不满。他认为,这种政策鼓励了懒汉,其结果就是让无产者躺在那里,什么也不干,等着享用别人的劳动。他说,他们什么也不干,可生活得比我们并不差,而且还不交税。他举了一个例子:1921年他们的农村曾经进行一次

^①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7页。

财产的重新分配。按照牲畜和农具多少把人分成三类，贫农得三份，中农得一份半，富农只得到半份，大小牲畜这样分，其他农具和粮食也这样分。但这样做的结果农村贫富差别并没有消除：那些分得三份财产的贫农，一年之后还是贫农，虽然他们当时分得近 20 头牛和 20 张犁，但一年后已所剩无几，有人只剩下一头牛了。而富农在三年之后又要重新划分，原来怎么分，现在还怎么分。中农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不剥削别人的劳动，因为他们日夜工作，所以中农原先是中农，现在还是中农。写信人说，农民中间流行这样一种做法，就是少种一点，这样就可以不交税，可以进入 35% 的免税贫农的圈里。按照统计数字，播种面积好像是扩大了，可是粮食却不够。原因不难找到。过去这里一个中农要种 10 或 12 俄亩的土地，登记的是 6 或 7 俄亩，现在实行刑法 107 条^①的规定，把有粮不卖当作投机倒把处理，于是他们登记的播种面积就更少了，还不到一犁沟。那时的税收对贫农是有优惠的，贫农耕作 3 俄亩或 4 俄亩土地，每亩课税 5 卢布。这位农民说，给我们哪怕是 5 亩、10 亩或者 50 亩，我们可以每亩交 10 卢布的税，只要给我们自由和机器，我们中农就会充分供给你们粮食，而且不需要使用别人的劳动。只是当我们取得成绩时，不要给我们扣上富农的帽子。那时你们的粮食就会多得没处放。写信人说，我是个乡巴佬，很少见过世面，我觉得，政权在竭力使所有的人都变成无产者和贫农，可是那时国家靠什么来生存呢？

另一个贫农在 1928 年 1 月 27 日给《农民报》写信说，农民非常愿意帮助苏维埃政权，准备全力帮助国家，但是当局不让他们发展，不让他们得到解放，不给农民所需要的木材，对农民的粮食规定固定的价格，可是农民买东西却不按固定的价格。农民买一双靴子需要付出 15 个卢布，也就是要卖掉 70 公斤粮食，当局不让农民去挣钱，不让他们发展农业，不给他们自由，农民没有自由。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把他当作富农，剥夺他的选举权，这就是说政权希望所有的人都过穷日子，不，这算什么自由？需要帮助，需要给农民自由，让他们发展，让他们发家致富，因为农民在养活整个俄国，整个俄国都靠农民来供养，怎么能不给农民自由呢？不过对我们刚刚说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国家需要粮食，去哪儿拿？向农民要，向农民要税，向农民要粮，而农民除了种田得到的收入以外没

^① 俄罗斯联邦刑法关于投机倒把罪的第 107 条。

有别的收入。

请注意一下写这两封信的背景。这正是苏联国内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的时候，国家缺乏粮食，粮食收购不上来，为此党内出现严重分歧。在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斯大林不是去提倡农民发展生产，用政策去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把农村变成富裕的农村，变成粮仓，而是认为收购危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富农有粮不卖，囤积居奇，企图以此扼杀城市和工业，于是大抓“阶级斗争”，采取“非常措施”，对广大农民施加暴力。结果把大批从家中搜出粮食的农民打成“富农”，接着又采取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置千百万农民于死地。

如果说这些农民反映的情况也许只是个别情况，那么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萨夫钦科给斯大林的信所反映的情况无疑是具有普遍性的。1927年5月10日他给斯大林写信汇报农村的情况。信中写道：

我们的同志轻率地搬弄书本，大吹大擂，常常在农民中急于搞什么合作化、集体化、共产化、机械化、工业化、电气化、拖拉机械化，还有其他什么“化”和“富农化”，而农民则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在想，当明天你就要成为富农时，干嘛还要这些“化”呢？

有一位农学家在比斯克区显然工作得不错，于是有人就指责他的高产工作制造了一批批“富农”村。一个人不好好当家，不好好干活，不善于干活，因而收入也少，这样他就是贫农。然而如果你干得好，干得巧，不误农时，收成很好，收入很多，不但不会得到表扬，反而会成为富农、危害社会分子，于是剥夺他的选举权，剥夺他表现开拓精神的权利。如果出了什么事，就都说是富农搞得阴谋诡计，是富农暗中破坏。这是既简单而又容易的回答，比对错误负责和为错误辩解容易多了。

萨夫钦科接着写道：

我们的农村党员同志大多数变成了冷漠的，官气十足的（如果不说得更严重的话）农村官僚，他们不寻求解决农村失业问题的办法，不寻求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的办法，不寻求提高农村福利的办法，不去巩固国民经济的基地，巩固工业的基础，而是到处寻找富农，有些地方几乎把所有殷实的农民都当成了富农，认为富农是对共产主义构成威胁的人。这些人把农村的贫穷和愚昧无知看作共产主义：有党票的官员为自己小小的职位而担忧，他们一个赛

一个地竞相努力寻找更多的富农,因为常常按照找到富农的数目来评价他们的工作。

这里所反映的,实际上就是当时新经济政策所遇到的矛盾。一方面国家需要发展经济,需要发展农村经济,用更多的粮食和原料供应城市和工业,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时时担心农村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富农,出现新的资产阶级。在这两难选择中,当局选择了抓阶级斗争,甚至人为地制造“富农”,这样就可以把一切困难和过错统统推到“富农”的身上。实际上,十月革命以后,经过国内战争时期剥夺富农的运动,苏联已经不存在沙俄时期那样的富农了,后来在农村出现的富裕农民,大多是善于经营、用自己的劳动致富的农民。苏联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从整体上说仍然是贫穷落后的农村,不少地区无马的农民占40%以上,中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半贫困者。达到富裕水平的农民还在少数。布哈林在同斯大林争论的时候就明确指出,这些贫困的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离富农还很远。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在20年代苏联对富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标准。当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曾经批评过乱划富农的现象,说被当作富农特征有:“生产值钱的农作物,拥有大量的幼林,有新住宅,制作并向本村人出售收音机,拥有良种牲畜,土地经营得法,从前使用过雇工,自己拥有农具,不是今年,也不是去年,而是曾经一度做过生意,等等。”有的地区规定有2—3头奶牛或2头役畜者为富农,甚至连经常或临时出租住房者也算作富农。在许多场合被列入“富农”的是从事集约化生产、采用先进技术、种植高产作物、把农业劳动同辅助性手工业结合起来的农民。^①1929年5月,在消灭富农的前夕,人民委员会曾规定过富农的特征,其中包括拥有磨坊、油坊、碾米厂、梳羊毛机、弹毛机、烘干房或其他有机械动力的企业。等等。^②而这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小小的乡镇企业主。把这些人当作“富农”打击甚至消灭,那么谁还会去努力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呢?只好大家都去争当既享受优惠而又安全的“贫农”了!

富裕农民缺乏安全感并不是一个心理问题。实际上,当时每当遇到什么困难,都用抓阶级斗争的办法去解决,而富裕农民总是首当其冲。1928年初苏联出现粮

① 李可夫:《1928年中央11月全会总结》,《李可夫文选》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5页。

② 见B.П.丹尼洛夫编:《文件作证》莫斯科1989年版,第221—222页。

食收购困难,于是斯大林就对农民实施“非常措施”,动用刑法第107条——禁止粮食买卖,挨家挨户搜查,凡查出家有粮食而不卖给国家者即按照囤积粮食、投机倒把处理,他们就成为“富农”。从1929年底起又进一步宣布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实行农村的全盘集体化。那些在新经济政策下勤劳致富的农民一个个被当作富农予以消灭——他们被没收住宅、土地、粮食、家具,扫地出门,流放到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边远贫瘠地区。斯大林亲自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在全盘集体化过程中有几千万“富农”被消灭(按俄文本,为一千万)。^①实际上,如果说得再彻底一些,斯大林消灭的不仅仅是所谓“富农”,而且是全体农民阶级,使全体农民每一个人都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没有自己的牲口。

这种做法造成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这就是广大农民(甚至不仅仅是农民)不敢富,大家以穷为荣,安于贫穷,干部则以穷人为依靠。这种状况迫使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1934年)不得不提出批评,说有一些“左派”糊涂虫把穷人理想化了,他们以为在任何条件下穷人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永久支柱。有人发问,如果大家都成为生活富裕的人,而穷人再也没有了,那么我们布尔什维克在工作中究竟依靠谁呢?斯大林不得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作出解释:“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这时候他应当想起当年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不过承认这个口号是不可能的,他借用自己的对手季诺维也夫的观点,继续认定这个口号是恢复资本主义的口号。与此对立,斯大林提出“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的口号。但怎么同“发财吧”的口号划清界限呢?斯大林指出两者的不同点为:

第一,能够发财的只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和生活富裕的口号有关的不是个别人或个别集团,而是全体集体农庄庄员。第二,个别人或个别集团发财是为了支配其余的人和剥削他们,而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条件下过富裕生活的口号排除了一些人剥削另一些人的任何可能性。——斯大林不能允许个别人、个别集团先富起来!斯大林强调说:

^① 见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下部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3—734页。

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力求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①

应当承认,斯大林的说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之所以出现他说的那种误解,那种“愚蠢”行为,其始作俑者恰恰是他斯大林本人,正是他的“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他对农民实施的“非常措施”,他的剥夺“富农”以至消灭全体农民的政策等一系列做法迫使人们得出“穷最好”“最保险”的观念。这当然愚蠢,不过布哈林早在九年以前就警告过,“只有白痴才会说,我们永远应当贫穷”。

错误政策和实践留给人们的影响不是说几句话,做几次报告就能够轻易消除的。斯大林的集体农庄政策走的实际上并不是集体富裕的道路,集体农庄只不过是便于国家取得粮食的组织,而不是使农民发家致富的组织。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反而使农业生产受到沉重的打击,以至到50年代初苏联的粮食产量还没有达到1913年沙俄的水平!

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里,“发财”还是“贫穷”始终是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是决定苏联命运的关键之一。

《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1期

^① 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16—318页。

苏联的土地政策及其农民问题

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在国有土地上建立集体的公有制经济。

然而,在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坚持“土地国有化”方针,而是采用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方针。按照“土地法令”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并没有没收普通农民和普通哥萨克的土地。也就是说,并没有实行国有化,把全部土地变成国家所有。作为法令组成部分的农民委托书写的是:“一切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一切土地转让后都归入全民财产”,“土地应定期重新分配”,“平均使用”。使用方式完全自由,究竟采用按户、按独立农庄、按村社、还是按劳动组合的方式,由各乡村自行决定。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此写道:

农民根据这个法令从社会主义革命总共获得了 15 000 万俄亩以上的新土地,这些土地从前都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皇族和教会手中。

农民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 5 亿左右金卢布的地租。^①

这里所说的农民得到的好处只是统计数字上的好处,事实上农民并没有得到实惠。因为很快实行了沙皇时期(1916 年底)已经实行的“粮食专卖”、“粮食征收制”(продразвёрстка,译作“余粮收集制”不准确,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都实行过这种政策,它们实行的这一政策可以译作“余粮收集制”吗?)。为军事和工业的需要几乎拿走农民所生产的全部粮食,同时禁止粮食和农产品的自由买卖,甚至农民为

^①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32 页。

交换生活必需品而出售农产品,都被视为反社会主义的投机倒把行为,要受到严惩。根据当时的理论,小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是打击消灭的对象。这样,农民就是分得土地又能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呢?

1919年3月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执行的是“中立”中农的政策,从这个政策可以看出,当时曾把中农同富农混为一谈,中农是站在富农一边的。苏维埃政权能做到的是争取中农脱离富农而保持中立。八大开始改变方针,确定团结中农,同中农妥协的政策。但是粮食征收制并没有改变,因此并没有能够改变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

在农村组织集体经济的做法没有收到什么成效。1920年底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集体农庄的问题并非当务之急。我知道,集体农庄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现在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①

如果说国内战争的前一阶段是“红”“白”战争,那么发展到后期,就转变成苏维埃政权同农民的战斗,官方的说法是“剿匪”。被当作匪徒的大多是不满粮食征收制的起义农民。农民起义得到穿军装的农民的支持,最后发生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迫使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得不迅速取消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

1917年10月26日,列宁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政府的行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合乎贫苦农民的需要,难道农民群众还会闹风潮吗?然而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农民的,逼他们不得不举行起义。”^②

现在布尔什维克党自己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同农民的反抗风潮,同土地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不断谈论退却、让步。

相对说来,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农民的黄金时期。第一,列宁对农民属性的估计改变了。不再把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看作是资本主义根源,而是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盟友,决定同农民一起前进,尽管速度要放慢很多。第二,农民有了自主权,可以在分给他的一小块土地上自由耕作,在缴纳了事先规定的农业税之后,剩下的农产品归自己支配,可以上市。第三,列宁提出用做买卖的合作社来引导农民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177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7页。

走向社会主义,而不再对农民采用强制手段,甚至允许土地租佃和雇工,号召农民“发财”。

当然,问题也是有的,一些干部害怕资本主义,头脑里不允许勤劳的农民富起来,老想重新剥夺新富的农民,把他们打成富农,一些地方不断重新分配土地,甚至瓜分财产,剪刀差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等等。

列宁提倡的合作社不是斯大林实施的集体农庄。列宁的合作社是做买卖的合作社,根据自愿的原则首先从供销领域把农民组织起来,它不取消农民的独立地位。这种合作社发展下去可能成为我们在现代社会里看到的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合作组织。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则是从生产领域把农民强制组织起来,农民失去自主的独立地位和财产,变成一无所有的农业“无产者”。

斯大林在打倒党内的“左”、“右”派对手之后,违背列宁的设想,在全国实行全盘集体化,在集体化过程中消灭“富农”。在国内战争的贫农委员会期间,曾经实行剥夺富农,可以说,本来意义上的旧富农已经被消灭。现在消灭的实际上是一些善于利用新经济政策给予的条件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家致富的农民。

消灭富农的做法相当残酷,大量的“富农”和非富农(例如只因为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家里被搜查出粮食,等等)被驱逐流放,肉体消灭,其数量至今没有确切的数字,他们也没有得到平反。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中透露,在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一千万。^①

通常都认为斯大林在集体化过程中消灭了“富农阶级”,实际上,应当说是消灭了全体农民。全体农民都遭受了剥夺——土地、农具、牲口全都被充公,变得一无所有,最主要的是他们失去了独立的地位。30年代实施身份证制度,农民没有身份证,因而不可能随意迁徙、流动,他们的选举权也受到限制,是国家的二等公民。

集体农庄是一个庞大的连环保组织,其最重要的职责是保证国家能够及时足量地取得粮食,所以在30年代的大饥荒中,路有饿殍,而国家出口的粮食却反而逐年增加。集体农庄并不保障庄员的生活,集体的土地首先是为国家耕种的,一小块宅旁园地才是他们养活全家的依靠。集体农庄实行的实际上可以叫作“国家农奴

^① 温·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下部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33—734页。

制”。正是这种毫无效率可言的制度,使得苏联的农业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俄 1913 年的水平,而这期间人口却大大增加了。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经济的软肋,一个在沙皇时期出口粮食的国家,到七八十年代却不得不进口粮食!

赫鲁晓夫上台后农业是他必须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他采取一些措施来着手解决农业问题。一个大规模工程是开垦荒地。他想在不触动集体农庄制度下解决粮食问题,于是在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建立国营农场,开垦荒地。虽然在几年时间里,国内农产品的供应明显好转,然而这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赫鲁晓夫取消了机器拖拉机站,把生产工具归还给生产者,鼓励物质刺激,提倡广种玉米,为牲口提供青储饲料,这一切确实有利于农业生产,然而只要不触动集体农庄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又不断进口粮食,就是证明。

《探索与争鸣》2004 年第 1 期

斯大林模式的来龙去脉

近来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个“假命题”，“斯大林模式”这个提法可疑。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是否存在过一种叫作“斯大林模式”的东西？稍微懂得点苏联历史的人，我想有99%的人是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区别也许只在于有人否定、批判，有人肯定、欣赏，这当然是每一个人的自由，难以强求一致。但是，如果独树一帜，断言根本不存在“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个“假命题”，那恐怕还需要从学术上提出有根有据的论证，才能令人信服。

“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过今人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往往把“斯大林模式”和“苏联模式”混为一谈，把两者等同，这就不够“学术”了，所以还得谈一点启蒙性的历史知识。

实际上，“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是一回事——苏联模式包含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等于苏联模式。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一共有过两种基本模式，也就是说，“苏联模式”包含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它被列宁所否定，斯大林模式是这一模式的延续；另一种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它被斯大林所推翻。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实行的第一个模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军营，把全国的生产和消费统统集中到国家手里，取消商品买卖，取缔市场，大家过着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讲（也无法讲）民主，党内外均实行战斗命令制。这不全是战争环境使然，当时的苏俄领导想通过这种“简捷”的办法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列宁后来检讨说：

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决定，

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

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粗陋的军营式的共产主义。实行这种模式几乎收走了农民的全部粮食,而不仅仅是余粮。这种做法引发农民的严重不满和坚决反抗,以至于在国内战争后期农民暴动蜂起,出现所谓“小国内战争”。由于当时实际上抓不了生产,无论工业生产还是农业生产都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工人也因长期缺衣少食而不满,一些工业城市罢工频发,最后酿成喀琅施塔得兵变,使苏维埃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所以列宁说,苏维埃政权遭遇到成立以来最危险的政治经济危机。

为拯救苏维埃政权,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党放弃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实行以粮食税为开端的新经济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其特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引入市场机制,恢复并运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等一向被看作“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社会主义观的重大突破。于是允许贸易自由,允许私人经商,实行引进外资的租让制,在农村允许租佃土地、使用雇工,鼓励农民发家致富。最后,列宁甚至把农民做买卖的合作社直接等同于社会主义。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布哈林所说的: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辟了各种经济力量、各种经济成分互相促进,互相繁荣的可能性。

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党内一直存在一股强大的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力量,他们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城市培育了“耐普曼”(做买卖的商人),在农村复活了“富农”(善于经营的富裕农民),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是搞资本主义。有人为此痛哭流涕,有人因此退党。他们主张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要求限制以至消灭耐普曼和“富农”,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用计划原则取代市场机制。列宁去世后主政的恰恰是这样一些“左派”,包括季诺维也夫、斯大林以及托洛茨基,等等。斯大林是隐蔽的“左派”,出于争权的需要,他同季诺维也夫结盟去打倒托洛茨基,后来又同布哈林结盟去打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达到目

的之后，他倒过来打击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维护者布哈林，以“右倾”的罪名把布哈林等人赶下台，并最后处死他们。斯大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于是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

斯大林恢复了被列宁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他干了三件大事：第一，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不仅消灭了“富农”，而且消灭了全体小生产者——农民，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农具、牲口，剥夺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独立自主权，其第一个苦果就是1932—1933年的饿死几百万人的大饥荒。第二，取消市场机制，实行指令性计划，实行超高速度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这种做法使苏联成为军事强国，但是也造成居民日用消费品的严重短缺，农轻重严重失衡。第三，发明并贯彻“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加强专政，在国内实施大规模镇压，从列宁的战友到各级干部，到工人农民，到知识分子，千百万人成了冤鬼——到底有多少镇压的牺牲者，至今也没有完全查清楚。结果在30年代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军事动员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斯大林模式。

这样，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三段式：军事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用辩证法来说，这是否定之否定——新经济政策模式否定了军事共产主义，而斯大林模式又否定了新经济政策，回归军事共产主义，当然，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斯大林有自己的很多新东西。

邓小平对苏联的体制有客观的评述，他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①邓小平这里评价了苏联的两个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比较好的列宁的思路，这就是新经济政策；另一个是僵化了的模式，这就是斯大林模式。

区别苏联模式和斯大林模式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改革对苏联的做法既有否定批判的一面，也有肯定继承的东西。我们否定了“斯大林模式”，同时也继承苏联某些好的东西，并予以发展。例如我们继承了新经济政策中运用市场机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做法，并且最后发展成作为一个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没有把洗澡水同小孩一起泼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中国同苏联模式的历史联系是客观存在。邓小平多次说明中国体制同苏联的关系。1986年9月29日,在同波兰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①

《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2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斯大林的“三条鲸鱼”捡不得

有人总结的苏共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苏共领导从赫鲁晓夫起不讲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丢掉了斯大林这把“刀子”。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整个苏联时期，专政与民主，阶级斗争与和谐社会，到底何者多？何者少？只要稍微考察一下苏联历史，答案是清楚的：专政多，民主少，“阶级斗争”多，社会和谐少。十月革命后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这36年期间，除不到10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直在加强强制和专政。

俄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微不足道，无产阶级要执政，一靠专政，二靠代表其利益的政党中的少数领袖人物代为执政，领导国家。在苏联早期，工人和农民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执政地位，苏联1924年宪法明确规定，工人每25000人选一名苏维埃代表，而农民则要125000人。农民没有身份证，没有迁徙的自由。当然，这应当是暂时的现象，随着执政主体的逐步扩大，由少数变成多数，就应当逐步淡化专政，以至最终取消专政。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十月革命后苏俄实施军事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下的粮食征收制实际上是对农民的掠夺。由城市工人组成的征粮队全副武装到农村征粮，所经之处农民手中的粮食被征收殆尽。这种政策虽然是当时的军事需要，但长期下去，农民无法生存，所以到军事共产主义的后期，农民暴动蜂起，以至发生兵变，俄共不得不停止军事共产主义，放弃粮食征收制，而改行粮食税，实施新经济政策。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说明，要维持政权，靠暴力强制是不能长久的。

新经济政策下，农村政策开始放松，农民交纳粮食税之后可以自由处理余粮，

可以自由上市,因此也有可能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正是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布尔什维克党走上运用商品货币机制的道路,并且采取准许雇工和租佃的政策,农村出现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由于农业的发展,城市有了较为充足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轻工业得到发展,工人的生活也有了重大的改善。20年代整个社会比较稳定。

但是,党的一些领导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害怕农民富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关系,因而不断在农村掀起阶级斗争,要求重新剥夺“富农”,取缔城市的“耐普曼”。新经济政策下的好日子过了不到10年,在农村实行了“非常措施”,再次对农民施加暴力。紧接着实行强迫集体化、重工业化和大清洗。这三项措施构成斯大林模式的“三条鲸鱼”,都立足于强制、暴力。工业化需要资金,就把集体农庄变成征收出口粮食的连环保组织,需要劳动力,就大规模使用“犯人”劳动,甚至把犯有小错的工人变成提供无偿劳动的“劳改犯”,形成所谓集中营经济;对所谓资产阶级专家不放心,就制造诸如沙赫特案件这样整工程技术人员的“反革命暗害案”;为清除各种反对势力(真正的、臆造的、过去的、潜在的),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杀害列宁的老近卫军、大批党政军干部以及无辜平民。正是在1936年通过“全世界最民主的宪法”之后,大清洗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仅1937年到1938年上半年,就镇压了100多万人!其结果是苏联农业到50年代初还没有达到沙皇1913年的水平,工业化变成牺牲农业轻工业的片面的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而大清洗搞得人人自危,甚至高层领导人如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都缺乏安全感。斯大林这把“刀子”,所体现的是强制、镇压、清洗,是无数人的生命代价。这样的“刀子”,不抛弃不行。

斯大林逝世后,不管谁上台,只要顺应民心和世界潮流,就必须改变政策,进行改革。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谁当政都一样。苏联出现“非斯大林化”,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是历史的要求,决不是某一个人存心和斯大林过不去。50年代苏联发展轻工业、农业(把拖拉机卖给农民,开垦荒地,种植玉米),开始解决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工农业发展问题,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

斯大林之后苏共提出的口号是有明显的针对性的,不能脱离苏联的历史实际和当时的环境去解读。“全民国家”、“全民党”,是要展示这个国家、这个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已经不再是镇压和压制某一阶层、压制人民的组织。“人道的、民主的

社会主义”，是要向人民保证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而不是反人道的、残暴的、反民主的、专制的社会。当然，这只是一种安抚人心的许诺，没有得到多少实施。例如在 60 年代初，赫鲁晓夫就命令用推土机推倒在莫斯科举办的现代派画展。

纵观苏联存在的 74 年，应当说，它缺的不是强制和暴力，缺的是民主与社会的和谐。总结教训是为了指导现实。今天在总结苏联的教训的时候，如果还认为苏共丧权的原因是放弃阶级斗争，因而我们应当继续强调阶级斗争，重新捡起斯大林这把刀子，那么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就会丧失。

《社会科学报》2007 年 3 月 22 日

性格与政治

——读姜长斌和左凤荣著《读懂斯大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读懂领袖丛书”。丛书主编邢贲思撰写的总序解释了出这样一套丛书的意图：它不是对一些历史背景、名词概念、文章内容等进行诠释，而是要使读者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他的生活、斗争、个性特点、复杂经历乃至缺点失误同他的理论观点、著作结合起来，以期真正读懂这位领袖。

由姜长斌和左凤荣合著的《读懂斯大林》是这套丛书中的一本。

关于斯大林的书我国出了不少。《读懂斯大林》是其中写得颇有特色的一本。了解一个人，我们通常都说，要听其言，观其行。这自然不错。《读懂斯大林》一书谈了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介绍了斯大林走上权力巅峰之路，特别是详细列举和分析了斯大林的“独创理论”，如“一国社会主义”和“一国共产主义”理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贡税论”、“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等等，剖析了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及他所采取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手段，评价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功过得失。作者用相当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具体的事例，系统地展示了斯大林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其他方面的言和行。这对了解和读懂斯大林这个对 20 世纪的历史发挥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要了解一个人仅仅依据他的著作，仅仅对他的著作进行剖析是不够的。何况就是我们看到的著作也是不全的。斯大林的著作集，中文版叫作《斯大林全集》，实际上并不全。第一，这里并没有收入斯大林的全部著作，它出到 13 卷，由于斯大林逝世和批判“个人崇拜”，以后各卷就没有再出下去。这不是高明的做法。不管对此人的评价如何，作为历史资料，把他的著作出齐是必要的。东西放在那

里,这才有可能任人评说。我在俄国访问时在书摊上曾经看到一本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是作为“世纪备忘录”(或译作“世纪纪念碑”)出版的,这是一个不坏的创意。其次,收入的著作不全,现在公布的档案显示,斯大林的许多文章和书信并没有收入全集,即使收入全集的也未必是全文,有的文献是后来根据需要重新加工修理过的,同原貌相去甚远。试举两个例子。

1925年斯大林同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展开激烈的斗争。“新反对派”抓住斯大林当时的盟友布哈林“发财吧”的口号不放大做文章。那时候斯大林非常需要布哈林的支持,所以斯大林在会上指责新反对派说:你们对布哈林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他们要布哈林同志的血。季诺维也夫同志在结束语中把布哈林问题提得很尖锐,他要的正是这东西。你们要布哈林的血?你们要明白,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这段话在全集中已经找不到,因为斯大林本人最后不仅要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血,也要了布哈林的血!

“列宁遗嘱”是20年代党内争论中不断触及的问题,但“遗嘱”内容那时始终没有全文公布。不过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中央联席全会上的报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第一节“几个小问题”中几乎公布了所谓遗嘱(1922年12月24日给代表大会的信和1923年1月4日的补充)的全部内容:涉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一段,涉及斯大林本人的一段,还有1月4日补充中列宁批评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调开的内容。当时《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报告,但收进全集时上述内容被全部删去。因为在这以后“列宁遗嘱”是被当作反革命文件受到追查的。

从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说,《斯大林全集》并不全。这倒不怪别人,俄文版的准确名称是《斯大林文集》或《斯大林著作集》,是中文版把它译作“全集”的。然而,即使是全的,仅靠文章讲话还不足以描绘出立体的、活生生的斯大林来。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平面的斯大林,是其言行的结合。人们还会再问一句,是什么促使他如此这般言行的?

这恐怕就要关注我们至今较少涉及的此人出身成长的环境,这种环境给予的影响,打下的烙印,这种环境对人物性格、心理状态的塑造。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性格,是会影响人的行为举止的,甚至会通过这个具体的人,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发生一定的影响。

《读懂斯大林》一书有一个特点，它不仅系统地揭示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还进一步揭示斯大林的性格，性格的形成及其对他的行为举止和理论思维的影响。

斯大林父母的祖辈都是农奴，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他们才得到迁居的自由，搬进哥里城。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在梯弗里斯的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做工。此人贪杯，真应验了俄国的一句俗语：“醉得像个鞋匠。”在俄国，酒往往是同暴力，特别是家庭暴力联系在一起的。维萨里昂也不例外，喝醉了酒，就回家打老婆孩子。而斯大林为了保护母亲，竟然对父亲拔刀相向。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是这样描述这个家庭的：

“在一个一家之主嗜酒成癖的、半文盲的贫穷家庭里，打架、相骂原本是常事，妈妈打儿子，丈夫又揍她。可是儿子爱娘，处处维护她，有一天还将一把刀子扔过去。老子于是大喊大叫去赶儿子，邻居把儿藏了起来。”有人回忆说，父亲的暴力“从他(斯大林)的内心驱走了对上帝和人的爱，使他充满对自己的父亲的憎恨”，“无缘无故地痛打使孩子变得和父亲一样残酷无情”。^①

后来这种家庭暴力也被移用于党内。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布尔什维克同取消派的斗争是策略分歧引发的，应当通过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来解决，然而，斯大林给列宁的信中却说：

真见鬼，竟没有人揍他们！难道就让他们逍遥自在下去吗？！请让我们高兴一下吧，通知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会成立一个机构，在那里可以抽他们的嘴巴，狠狠地抽，不停地抽。

在他掌权以后，把对犯人施加肉刑的做法合法化，果然用抽嘴巴，甚至肉体消灭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的和杜撰的分歧。在斯大林时期，大量冤假错案就是用“拷问，拷问，再拷问”制造出来的。

斯大林的小名叫“索索”。父亲要他子承父业，也当鞋匠。虔诚的教徒的母亲则希望儿子去当神父。索索被送进哥里教会小学读书，然而有一天父亲竟然把儿子从学校强行带走。为此，家里又大吵了一通。索索最后返回这所教会学校，后来又上了梯弗里斯的教会中学。学校里过的是兵营一样的生活。学校当局鼓励学生打小报告，违规的学生要受到体罚，甚至关进小黑屋。修道士千方百计地窥探学生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页。

的思想和行为,搜查他们的行李,偷听他们的谈话,稍有疑点就向院长告发。由于忍受不了这种教育和环境,索索终于弃学离校(不是因为参加革命运动被学校开除)。如果说他从教会学校学到什么的话,就是用宗教的文体写作,其典型作品就是列宁逝世后他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宣誓”。顺便说一下,这篇“加冕誓词”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被《真理报》刊载在很不起眼的位置。它不是代表全党的宣誓,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电影《宣誓》把它抬高为“代表全党”所作的“伟大宣誓”。斯大林遵守了自己的誓言没有?没有。他用消灭党的老近卫军来破坏党的统一,他用强迫集体化来破坏工农联盟,他用无端杀害大批红军指战员来削弱红军的战斗力,他亲手解散了共产国际……

在斯大林的一生中唯一带给他温情的恐怕只有一个人,这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卡桃)。但卡桃不幸于1909年死于伤寒。这给斯大林留下十分沉重的心灵创伤。他对朋友说:“这个妖娆的精灵曾叫我那铁石心肠为之融化,她一死,我对人们最后一点点温情也随她而去了……”此后不久,他开始使用化名“斯大林”——钢铁之意。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不得而知。但斯大林成了“铁石心肠”确是真的!

1918年斯大林同比他年轻22岁的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娜佳)结婚。和斯大林的前妻那种百依百顺的虔诚教徒不同,娜佳出身革命家庭,有自己的思想和信念,无论对社会暴力,还是对家庭的暴力都不能逆来顺受。斯大林的秘书巴扎诺夫回忆说:她是一个善良、规矩、品行端正的女人……我认识娜佳时我的印象是:她生活很空虚……由于斯大林在家里是个十足的暴君,她的家庭生活的确很艰难。斯大林在工作中不得不有所克制,但在家里却不拘礼节。娜佳不止一次地叹息着对我说:“已经两天了,他不说一句话。别人同他说话,他也不搭理。简直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斯大林经常骂娜佳“笨蛋”、“白痴”。他们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纠纷,不仅仅起因于斯大林对家庭、子女和妻子的不关心,还涉及对政治的不同态度。1929年以后,集体化在全国迅猛开展,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给许多人带来痛苦。乌克兰的严重饥荒使许多人家破人亡。这些事使当时在莫斯科工学院就读、了解外部世界的娜佳深感不安。她以为斯大林不了解真相,便经常把听到的情况告诉他,劝他仁慈一些。而斯大林经常不耐烦地打断她,指责她听信托洛茨基分子的谣言。结果那些与娜佳接近的同学受到监视和清查。这显然导致两人

的关系恶化,争吵更加激烈,斯大林指责妻子干扰他的治国方略,娜佳则为斯大林对人民的痛苦无动于衷而伤心失望。两人分居两室。1932年11月8日娜佳暴亡。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但至少可以相信,斯大林的粗暴在娜佳的死亡中发挥了作用。据说,娜佳留下了一封遗书,据看过遗书的人说,这是一封政治信件,充满控诉和谴责。斯大林的女儿说:父亲在读完这封信后会想,妈妈只是表面上和他在一起,实际上却站在当年的反对派的行列里,母亲的死使他“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他失去对人、对朋友的信任”。

果不其然。娜佳逝世后,除了斯大林的岳父母阿利卢耶夫夫妇外,斯大林一家的亲属一个个地在大镇压中丧生或关进集中营。阿利卢耶夫夫妇有两女儿、两儿子。1937年女婿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首先被捕,随后被枪毙。1948年女儿安娜(雷登斯的妻子)被捕,判处10年徒刑。儿子巴维尔1938年因心脏病发作死在办公室。1948年巴维尔的遗孀被控毒死丈夫,是外国间谍,被判处10年徒刑。1938年,儿子亚历山大及其妻子被捕。同年,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的哥哥,他青年时代的革命战友斯瓦尼泽及其妻子被捕,斯瓦尼泽于1942年被枪毙。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上了前线,不久被俘,并在俘虏营中牺牲。斯大林竟然怀疑此事与他的犹太人儿媳有关,下令逮捕了儿媳。女儿斯维特兰娜同记者卡列普尔谈恋爱,这个犹太人引起斯大林的不满,就以“英国间谍”的罪名把他逮捕判刑,如此等等。这是一张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单,这些都是同斯大林关系极其密切知根知底的人,怎么能够相信他们是外国间谍、人民公敌?!有人也许会说,斯大林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六亲不认的。但六亲不认也得有点根据才行。用贝利亚之流的暗害、挑拨是说不通的。

对亲人是如此,对那些为革命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布尔什维克,特别是列宁的战友,斯大林同样一点儿也不手软。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个人,除斯大林本人以外,其余5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托洛茨基都死于非命。

如果斯大林的亲戚、列宁的战友的“罪名”能够成立的话,那就是说,斯大林和列宁都一直生活和工作在间谍叛徒之中,为反革命分子所包围!这是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在建党问题上有分歧,这本来是建党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是斯大林却认为:“此人不是完全发了疯,便是心怀仇恨和敌意。我想这两个原因

都是有的。”^①这种逻辑判断,这样随便怀疑人家的动机,是斯大林的一贯思维方式。他判断敌友的标准是“非此即彼”,“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敌人”。正如《读懂》作者所指出的,斯大林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一是采取“板块式”的切割分析,二是用“对立面的斗争”取代“对立面的统一”,并使“斗争哲学”简单化和绝对化。

后来,那些不卖“余粮”给国家的农民,那些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就统统成了富农、投机倒把分子,受到剥夺和镇压。对斯大林来说,这是有他的一贯理论的。1921年在工会问题争论的时候,斯大林发表了一个理论:“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用强迫的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成了他后来强迫集体化的根据。自然,那些在政策方针上同他有过分歧的党内同志,也统统成了敌人,成了外国派遣的间谍、人民公敌!

我们知道,斯大林在反对他的政敌时的一个杀手锏就是某某人“反列宁”,从对方的历史和动机去制敌于死命。每次党内斗争中,斯大林都千方百计地从历史档案中找出此人同列宁的大大小的分歧,然后以“反列宁”、“反列宁主义”的罪名置之于死地。其实,在斯大林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同列宁发生过分歧,只是斯大林在掌权之后,巧妙地掩盖了这些分歧,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压下对这些分歧的揭发而已。例如,1909年他提出“需要俄国的倍倍尔,需要工人出身的有经验的坚定的领袖”,反对“从国外进行‘领导’”,言外之意,是要知识分子出身的列宁等国外的领导人让位。1917年斯大林回到彼得格勒后,在《真理报》上执行过一段时间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的方针。1918年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他支持过托洛茨基的“中间路线”即“不战不和”的路线。在成立苏联期间,斯大林主张让各独立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即所谓“自治化”方案。这个充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方案受到列宁的尖锐批评。列宁提出,不是加入俄罗斯联邦,而是再建一层新楼——苏联,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各民族共和国平等地加入苏联。关于历史上斯大林同列宁的分歧还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不过斯大林是比较聪明的,通常一旦发现列宁有不同的看法,就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了,他不像布哈林那样往往会为自己的主张战斗到最后一分钟!不过,事情也有例外,这就是当他觉察到列宁已经对他不再构成威胁的时候,他就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例如在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47—48页。

成立苏联问题上,尽管他表面上放弃了“自治化”方案,但是仍然让坚决反对自治化方案的格鲁吉亚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苏联,对格鲁吉亚来说,执行的依然是“自治化”方案——斯大林是不会轻易放过反对过自己的人的。1922年12月21日,在得到医生的允许下克鲁普斯卡娅记录了一封列宁口授的给托洛茨基的短信,信中列宁表示,在坚持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已经取得胜利,要托洛茨基“继续进攻”,把问题提到党的代表大会上去。这封信对支持削弱对外贸易垄断的斯大林是极其不利的。他在得知列宁口授一事迁怒于克鲁普斯卡娅,在电话中把她痛骂了一顿。他敢于这样做,显然是估计到列宁不行了,已对他无可奈何了。列宁知道此事后,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问他是收回他的话,赔礼道歉呢,还是宁愿断绝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列宁革命生涯中留给世人的最后三封书信之一!只是由于列宁病情发作,从此退出政治舞台,斯大林才得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以“列宁的忠实学生”的面貌出现!

斯大林在察里津战线使用铁腕整顿秩序,他向列宁保证:“请放心,我们的手绝不发抖。”结果,错杀了不少人。列宁在俄共八大上批评道:“斯大林在察里津枪毙人,我就认为是个错误,我认为他们枪毙错了。”后来,斯大林大做文章,说托洛茨基在 frontline 滥杀无辜,而对自己的错误则讳莫如深。

1923年是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驾马车的蜜月时期。他们联合起来为反对共同的对手托洛茨基而斗争。野心勃勃的季诺维也夫想借助斯大林的力量登上领袖的宝座。然而不到一年,就发现自己的如意算盘落空了。1923年7月30日季诺维也夫给加米涅夫的信中说:“如果党注定要经历一段斯大林的专制统治时期(也许是非常短暂的时期),那就任其自然吧。但我至少不想把这一切不像话的行为掩盖起来。所有的纲领中都谈到‘三驾马车’,认为我在其中起着不是无重要的作用。其实根本没有三驾马车,而只有斯大林的独裁。”

《读懂》在分析斯大林的暴力倾向时把它同俄国的传统联系起来进行了考察。作者指出,崇尚暴力与集权,是俄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内容。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就是依靠逐年的武力征战扩张形成的。从伊凡雷帝开始,维系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的主要手段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不断使用暴力铲除一切反对派,二是把高压手段置于一切手段之上。在沙皇制度的高压下,俄国的革命者只能以暴抗暴,出现主张密谋和恐怖手段的涅恰耶夫组织。

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高度集中的、有严格纪律的、从事秘密活动的职业革命家组织,这个组织对于从事地下工作、争取政权的斗争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对于和平的建设工作就不完全适应了。因此 1921 年党的十大在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决定从“战斗命令制”转向“工人民主制”。工人民主制的工作方法是:废除干部任命制,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工作制度和监督制。在党的决议通过以前可以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但决议一经通过,就必须遵守,等等。^①

可惜这个转变没有能够付诸实施。原因是一批党的领导人留恋简便易行的战斗命令制,三年的国内战争使他们非常适应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他们在和平年代仍然热衷于行政措施。其次,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政治体制没有及时作相应的改革,国内没有能够运用民主机制来管理国家,等到列宁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改变政治体制的时候,为时已晚,由于身患重病,列宁已经无法贯彻自己的主张了。而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禁止派别活动的条款,被斯大林用来作为压制和打击不同意见、打击实在的和虚构的反对派的“尚方宝剑”。“战斗命令制”直接转化成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制”。这种制度一旦同斯大林的个人性格结合,就给苏联社会带来无穷的后患。

在理论上,斯大林历来崇尚暴力。时至 1925 年,斯大林在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时还在强调它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如果说在革命初期由于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尚未制定出来,革命需要强调不受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制,那么到 1925 年,苏维埃政权的第二个宪法也已经通过,国家的主要职能已经是领导和平的文化经济建设的时候还这么说,那就是无法无天了。事实表明,斯大林对付农民、对待党内的反对派的许多举措都是不受无产阶级法律限制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到后来斯大林的话就成了法律。1929 年 12 月 27 日斯大林提出把限制富农的政策改为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是未经中央事先讨论通过的。联共中央只好于 1930 年 1 月通过“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的措施”的决定予以追认。

战后斯大林又制造了一批新的冤假错案,处决了他曾经认定的接班人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莫洛托夫是铁杆斯大林主义者,他同丘耶夫的 140 次谈话

^① 见《苏共决议汇编》第 2 分册,第 49—63 页。

几乎从头到尾都是为斯大林和他自己辩护的。然而他在谈到斯大林晚年的镇压高潮时也不得不解释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迫害狂。也不可能没有。这是所有在那个位置上坐久了的人的必然命运。”“斯大林担子太重，他累了，在最后几年里他在勉强支撑着，他老了，而主要是，他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几乎没有看过病，他害怕就医。这也有自己的理由，有人可能趁机下毒手，斯大林的敌人够多的了。”^①莫洛托夫说的是斯大林患有“迫害狂”和病态的怀疑症。他已经是对谁（实际上包括莫洛托夫在内）也不信任的孤家寡人了。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有迫害狂的话，那决不仅仅是晚年的事。

斯大林内心深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报复心理，他记得每一个反对过他的人并伺机报复。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中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谈话：

在臭名远扬的莫斯科审讯前十多年，有一个夏天晚上，他在一个避暑住所的阳台上，一边喝着酒，一边向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承认，他生活中最大的愉快是锐利地盯着敌人，精心策划一切，无情地进行报复，然后睡觉。^②

后来的事实说明，斯大林确实对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实施了这种“无情的报复”。当然，还有不少实际上从来没有反对过他的人。

苏联军史专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解释这种现象时认为，斯大林最喜欢的是个人权力。“为了无限的权力斯大林才采取骇人听闻的镇压手段”。他把暴力当作万能的手段是经过一个演变的过程的：“起初是同真正的敌人作斗争，而这样的敌人显然是存在的；然后是消灭个人的对手；再往后则是暴力的可怕惯性力在发生作用；最后，暴力开始被视为忠于领袖和保持正统的标志。”^③

一谈到性格心理的作用，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许多人都指责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结为个人性格所致。其实，赫鲁晓夫报告的缺点不是谈论斯大林的性格，而在于没有把他的性格特征同体制问题结合起来考察。

列宁在谈到斯大林性格粗暴问题时正是把性格同他的地位联系起来考察的。

① 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64、567页。

② 《斯大林评传》下册，第492页。

③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他在给党代表大会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座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或译作“忠顺”。——引注）、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

这里，列宁把一个人性格中的粗暴和任性，或者耐心、谦恭、礼貌、关心人等品质同他所担任的职务联系起来考察。在同志交往中性格粗暴、任性的人并不少见，但如果仅仅是个人关系，这种性格虽然不能说好，但不至于酿成大问题，无伤大局。但如果是领导人，甚至是总书记，那么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就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恶果。列宁的这一观点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们往往把性格上的问题看作小事、小节，不予理会。列宁好像预见到人们会忽视他的警告，因此接着写下去：

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①

历史证明了列宁预言的正确性，斯大林的性格问题，确实是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小事”。

一个人的性格、品性的作用，是同个人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归根结底，这也是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谈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性格及其宠妃的癖性对法国的命运发生一种悲惨的影响时指出，如果具有这宠爱女人癖性的不是国王本人，而是王室中某一个厨师或马夫，这种癖性就不会发生什么历史作用。可见，问题并不在于这种癖性，而是在于具有这种癖性的人所占的社会地位。“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够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表现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因当时的社会结构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340页。

关系所容许那个时候、地方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①

对斯大林来说,也是这样。如果那时俄共及其中央听从了列宁的忠告,撤销了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那么斯大林的粗暴性格就不会对苏联的今后命运发挥如此恶劣的影响。如果后来的联共建立了健全的党内民主和监督机制,那就至少有可能遏制斯大林性格的消极作用。如果后来形成的体制不是把愈来愈多的大权(包括自己的生死权)交给斯大林,那就不会出现如此之多的人头落地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这个人物,是联共党制造出来的。而一旦制造出来,他就像魔法师召唤出来魔鬼一样,连魔法师本人也对他无能为力了。联共党把愈来愈多的大权交给斯大林,对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但不及时予以制止,反而用一种制度使之合法化。所谓个人崇拜是这种体制的产物,而不是个人崇拜产生这种体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缺陷,正是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把一切归结于个人崇拜。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这种偶然性也包括领导人的个人性格。1871年4月17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②

斯大林的所作作为恰恰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

恩格斯称赞黑格尔关于恶的作用的说法,他指出:

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③

很可惜,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继续证明了黑格尔关于贪欲和权势欲的作用的说法。斯大林的粗暴,他对无限权力的追求,他为保持权力所采取的措施等等,对苏联的历史发展起了恶劣的作用,一时确实成了苏联“历史发展的杠杆”,并且为苏联的最后解体埋下伏笔。

《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4期

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7页。

苏联的“告密文化”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

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的密探，最著名的一个名叫罗曼·马林诺夫斯基。此人1906年混入工人运动，曾任工人委员会委员、五金工会理事会书记，1910年被招募为沙皇保安局密探。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为国家杜马代表。他的告密活动给布尔什维克党造成严重损失。布哈林曾经觉察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行为，但列宁不相信，反而指责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政治上不坚定。十月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回到俄国，奸细身份败露，被判处枪决。这是向敌人告密的典型例子，这种人卖身投靠，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投敌叛变。

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的方式解决党内的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20世纪20年代，党内斗争逐渐激化。列宁生前，党内出现分歧还可以通过争论这种正常的方式解决。列宁患病和退出政坛之后，党内斗争开始走上不正常的道路。得到列宁支持的托洛茨基和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

1923年秋，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引发销售危机，国内出现工潮。党内对解决经济问题以至党内民主问题等发生不同意见。

1923年9月俄共召开中央全会,内务人民委员兼格伯乌首脑捷尔任斯基在会上做报告。他提请全会参加者注意,党内生活的停滞、党内存在非法派别集团、任命制取代选举制等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瓦解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这些事实证明党内状况不良。为监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格伯乌早就安排其党员以及了解情况的非党人士充当线人,监视并密报他们的活动。鉴于工潮和党内存在派别活动,他建议责成所有共产党员向格伯乌报告党内的非法派别集团。

十月革命后不久,即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其全名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很快获得了非常权力,即逮捕和不经法庭审判直接处决的生杀大权。这种情况一致延至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初期。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正常的经济活动的恢复,契卡的工作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列宁决定改组契卡,削减其权力。1922年初契卡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格伯乌),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其任务是镇压公开的反革命暴乱,从事反间谍工作,保卫铁路和水路交通线,保卫国家边界等。它有搜查逮捕权,但已无处决权,案件必须移交法院审理判刑。这是把苏维埃国家纳入法制轨道的一项重要措施。

但是这一次,捷尔任斯基却要求把对敌斗争的方法用于党内斗争,要求在党内建立告密制度,这引发托洛茨基的强烈抗议,他坚决反对安全机关介入党内生活。不久,布哈林在10月1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也反对这种做法,他说:“这只会带来害处。这会被理解为变本加厉的警察制度。我们必须急速转向党内民主。”^①

在1925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围绕告密问题展开了小小的争论,有人公开支持告密,有人对告密行为提出了异议。

联共(布)十四大召开之前,党内出现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执行的方针政策。十四大上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同“新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党的十大曾经通过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所以斯大林紧紧抓住派别活动做文章,指责“新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对“新反对派”的许多指控的主要依据的是党员列昂诺夫给中央的告密信,他在信中报告了自己同好友列宁格勒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扎卢茨基以及其他共产党员的谈话内容。

针对这种告密行为,列宁格勒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И.巴卡耶夫在发言中指

^①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10. с.168.

出,党内不允许告密行为,他说:“我对企图在我们党内扎根的那种不健康的道德作风不能泰然处之。我指的是告密行为”,这种告密行为会导致党员互不信任,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中央委员尼古拉耶娃反对把契卡的工作方法用于党内,她说:

什么是契卡人员?契卡人员是反对敌人的武器……是反对阶级敌人的。告密党内同志,告密那些同志式交换意见的某些同志,这只会瓦解我们的党……党内的这种制度将带来损害,它将扼杀真正的不满,扼杀每一个会思考的共产党员都会出现的一系列不解的问题。……不应当用这种制度去斗争,而应当依靠正确的党内民主制度去斗争。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

我没有建议在我们党内设契卡。我们有中央监委,我们有中央委员会,但我认为,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而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他在报告的结束语中承认不允许“告密”,但认为应当“报告”,他说:“总的说来党员向党提出关于某一组织中存在不良现象是否可以用‘告密’的说法?我认为,这不是告密,这是报告,是每一个党员的责任。”^①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1927年底出现粮食和工业品严重短缺,商店排长队,工人举行集会和群众大

^① XIV съезд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1926. с.570, 600, 601, 612, 613.引自 Роговин В. Была л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Терра. 1992. с.237.见 Голанд Ю. Политик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Знамя”, март 1990. SLON—PARTY_RU.

会要求改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也出现粮食收购危机,有一亿多普特粮食收不上来,斯大林采取了“非常措施”,动用刑法对待有粮不交的农民。“非常措施”是一种掠夺农民的手段,使农民同苏维埃政权的关系恶化。围绕是否把“非常措施”常态化,党内再次出现严重分歧。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为一方,以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为另一方,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

《真理报》是控制舆论的重要工具,1928年9月30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表面上批判托洛茨基派,实际上是同斯大林争论。

这引起斯大林的警惕,他也紧紧盯住《真理报》不放。恰好《真理报》编辑部的一名叫B.C.波波夫-杜博夫斯基的人给莫洛托夫写了封告密信,称布哈林学派的B.H.阿斯特罗夫、A.H.斯列普可夫、E.B.策特林及布哈林的其他拥护者从事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活动。这封告密信就成了撤换编委会和编辑部中布哈林拥护者的根据。在新任命的副主编Г.克鲁敏的支持下,一批新的编辑人员使得仍任主编的布哈林不再能决定报纸的方针了。这是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利用告密取得成功的一个例证。

主张告密的人,后来往往死于他人的告密

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年底,斯大林举行五十大寿的庆典,庆祝自己击败了所有对手,获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庆祝斯大林体制的诞生。这是斯大林真正执掌政权的开始,此前几年虽然是斯大林在主导,但他一直遇到“左”“右”反对派的夹击,还不能自行其是。

进入30年代,斯大林大权在握,开始清洗先前的政敌或者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这就开始了“大清洗”,从党外到党内,从中央到基层,在国内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国内出现所谓“耳语者”。耳语者有两个含义,一是有话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说的人,他们只能在绝对可信的人们之间悄悄耳语。一种是指以耳语的形式悄悄打小报告的人,告密者。在告密成风的氛围下人们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就像赫鲁晓夫这样的高官,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那时审讯判刑所需要的证据不是物证,而是口供。告密的材料可以作为判罪的法律根据。这样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先下手为强,用密告他人来保自家的安全。斯大林大清洗的两

千万人中,因被人告密而遭罪丧生者不在少数。有一种现象也属于告密范畴。这就是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犯人”捏造事实,揭发他人,然后据此给他人定罪。例如拉狄克在被捕前曾向布哈林求救,布哈林帮他说过好话。拉狄克最后还是被捕了,在刑讯逼供下他反过来咬布哈林,他提供的材料成为给布哈林定罪的证据之一。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治下屡见不鲜。在20年代主张告密的人,在30年代往往也死于他人的告密!

俄国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告密的受害者。苏德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战绩出色,荣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年索尔仁尼琴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批评了斯大林和极权制度,被朋友告密,这就犯下了滔天大罪,被从前线押回后方,以“进行反苏宣传罪”被判处8年劳改,亲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生活。

他在《古拉格群岛》中讲了一个小伙子的故事。此人原为安全部门的人员,喜欢画画,连政治学习用的笔记本的封面也画满画。一次他画了一头猪,旁边有人问,会画斯大林不?会。马上又画了一个斯大林。后来有人告发,笔记本被送上去检查。这自然犯了滔天大罪,他因此而获刑。

顺便说一下,赫鲁晓夫时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大学生中间经常流传关于赫鲁晓夫的政治笑话,例如赫鲁晓夫提出肉奶面包生产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养猪是措施之一,政治笑话就拿他的姓开玩笑,把它变成猪的哼哼声:“赫鲁……赫鲁……”这时讲政治笑话已经没有什么风险了,此后民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就越来越多!

斯大林也缺乏安全感

斯大林生前制造的最后一个案件是医生谋杀案。此案的起因就是一个女医生的告密。1948年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病故,女医生莉迪亚·季马舒克三次写信密告医生用不当的治疗导致日丹诺夫的死亡。头两次密告没有被受理,第三次引起斯大林的兴趣,于是借此制造了所谓医生谋杀案,9名医生被捕。此案大有扩大之势,很可能酿成新的镇压高潮,只是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3月初去世,遂得以中止。据称告密者是安全部门的密探或者线人,她因密告有功于1953年1月20日获得列宁奖章,但好景不长,当年4月4日又被剥夺。在这里告密已经不是个人的

道德问题,已演变成严重的政治问题,成为政治镇压的一种可以利用的手段。不过那时好像并没有把告密当回事,季马舒克虽然被剥夺了列宁奖章,但对其工作并没有什么影响,1954年还获得了“劳动红旗勋章”!

在苏联告密制度几乎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索尔仁尼琴写道:如果缺乏经验又没有经过充分思考,很难判断告密活动在我国渗透到何种程度,把我们包围到什么程度。……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住宅里,在我们的院子里,在我们的修表店里,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编辑部里,在我们的车间里,在我们的设计室里,甚至在我们的民警局里,谁是坐探?是很难判断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注意判断为好。他感叹道:“坐探是赶不走,辞不退的。你赶走,他们又会招募新人!”

告密的内容,一种是确有其事,但大多是私下的言谈、私人通信的内容——在那时期谁敢公开反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第二种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图借此整倒被告密对象,或者邀功请赏。第三种是在当局需要的情况下借助各种手段去炮制出所需的告密内容,以实施镇压。

告密行为往往经过意识形态的包装,所以是冠冕堂皇的,告密者既能心安理得,还能得到好处。索尔仁尼琴写道:

我国的空气本身就促使人们去当“密工”。国家高于个人、告密者不是告密,而是对被告密者的帮助,如此等等不都是这种因素吗?招募工作和意识形态像花边一样交织着:机关希望的和被招募者应该希望的只是一件事:把我国顺利底推向社会主义。^①

告密制度是专制统治下的产物,无论在社会还是党内,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社会,更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政权不是靠人民基于信任给予的支持,而是靠告密来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统治,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并且当权者本身也不会有安全感,要不然斯大林为什么在垂暮之年还要制造一个医生谋杀案呢!

《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

^① 亚·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中册,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页。

“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光盘

关于《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光盘的情况,我在2005年发表的《论斯大林镇压问题研究中的某些概念和方法》^①一文中曾经介绍过,也许因为是一篇学术论文,看到的人不多,网上也检索不到。不过此光盘还是值得注意的,原苏联地区的各国人士为恢复历史真相,为彰显正义,做了大量的工作,搜寻遭镇压人员的名单,为遇难者的亲友提供线索,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光盘也为苏联历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翔实的重要资料。

2004年3月俄罗斯出版了名为《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的光盘,由“国际‘纪念’协会”、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政治镇压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萨哈罗夫博物馆和社会中心、地区社会组织“公开的俄国”联合制作。^②光盘为非卖品,主要用途是为亲朋提供检索受害者的下落和有关资料,有需要者可以免费索取。

光盘一套两张,第一张是镇压受害者名录,共开列了1345796受害者的名单,光盘上用醒目的字体印着这个惊人的数字。第二张是有关镇压历史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斯大林等人批准的处决名单,各地建立的镇压受害者纪念碑,古拉格群岛(集中营)的历史和概况,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结构、领导人和文件,强迫移民,斯大林以后的镇压,平反工作和有关文件,等等。

光盘编制者认为,尽管原苏联地区各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纪念镇压受害

① 《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② Жертв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еррора в СССР. Третье издание компакт-диска. Издание подготовил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Мемориал, Комиссия по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репрессий 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 РФ, и т. д.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Звенья», Москва, 2004.

者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涉及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被非法判刑者的平反,与镇压及其规模和原因有关的文件的公布,查明被处死者的埋葬地,纪念馆和纪念碑的建立等。迄今为止还没有写出一本政治镇压史。

没有得到解决的还有公布恐怖受害者的名单问题。在光盘首发式上,“纪念”协会理事会主席 A.罗津斯基指出,在收集到的人名中还有多达 10 倍以上的人没有收入此光盘。这就是说镇压人数当在 1 340 万以上。

光盘把镇压受害者分为三大类:

1. 第一类是根据政治指控被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克格勃)逮捕,被司法机关和准司法机关(实际上是违法的机构如特别会议、“三人小组”、“二人小组”,等等)判处死刑、监禁在集中营和监狱或流放地的不同刑期的人。

据初步估计,1921—1985 年这一类的人在 500 万到 550 万之间。在纪念册和数据库中最常见到的是 1930—1953 年间受害者的资料。这不仅是由于这一时期实施了最大规模的镇压行动(仅仅 1937—1938 年就逮捕了 170 万以上的人),还因为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又恢复的平反进程首先触及的是斯大林恐怖的受害者。资料库中数量较少的是早期的(1929 年以前)和稍后时期(1954 年以后)的镇压受害者,对他们案件的重新审理数量要少得多。

这里有许多人是由斯大林及其亲信直接批准镇压的。在俄联邦总统档案库里保存有 383 份(含 44 500 人名)经政治局委员审核的名单。其中斯大林签字“同意”的有 357 份,有莫洛托夫签字的 372 份,卡岗诺维奇签字的 188 份,伏罗希洛夫 185 份,日丹诺夫 176 份,米高扬 8 份,后来被枪毙的柯秀尔 5 份。

2. 因政治原因被大规模镇压的第二类人是在“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中被从居留地行政流放的农民。

据不同估计,1930—1933 年被迫离开祖居农村的人为 300 万到 450 万。其中一小部分人被捕和枪决或者关进集中营。180 万人成为欧洲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荒无人烟地区的“特殊移民区村民”。其他人被剥夺财产,遣送到本区的边远地带,此外相当一部分“富农”为躲避镇压而逃亡大城市和工业建设工地。斯大林农业政策的后果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大饥荒,导致 600 万或者 700 万人员的死亡(大约数),然而,无论是逃避集体化的人还是饿死的人都没有被正式

算作镇压的受害者,没有列入纪念册。被作为富农剥夺的“特殊移民区村民”人数在纪念册中要多一些,他们有时被登记在出发地,有时登记在到达地。

3. 大规模镇压的第三类受害者是被从传统居住地整个驱逐到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各民族。

规模最大的行政驱逐是在战时,即1941—1945年。有些民族被迁移是预防性的,他们被看作是潜在的敌方帮凶(朝鲜族、德意志族、希腊族、匈牙利族、意大利族、罗马尼亚族),另一些民族被指责为在占领区同德国人合作(克里木的鞑靼族、卡尔梅克族、高加索各民族)。被遣送和动员进“劳动军”的达250万人。直到今天几乎没有涉及驱逐民族集团的纪念册。

光盘说明书指出,除上述三类人以外,还有成千上万的因社会出身“不好”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打死的人,被遣送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波罗的海沿岸、西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波兰的居民,在前线被督战队枪毙的人,在甄别营强迫劳动的被遣返者,等等。

编制者认为,除了上述没有争议的政治恐怖受害者外,还有数百万因各种微小的“刑事”罪行和纪律性的过失而被判刑的人。历来不把他们算作政治镇压的受害者,虽然由警察实施的许多镇压运动具有明显的政治背景。不少人因违反身份证制度、流浪、自行离开工作地(变换工作地)或者离开集体农庄;学生因违反纪律自行离开厂校和铁路学校;因从军事工业“逃跑”;因逃避去生产部门、建设工地、农业部门干活的动员的等受到审判。这里惩罚通常不太重,有的被判刑者甚至没有被剥夺自由。很难计算出遭受这些“轻”刑的人数:仅1941—1956年被判刑者不下于3620万人,其中1100万人是由于“旷工”!显然,所有这些惩罚措施的主要目的不是惩罚具体的罪行,而是在集中营和特别移民区之外实施强迫劳动,获取无偿劳动力去建设各种大型工程。

镇压的庞大规模使得编制纪念册的工作极其困难而缓慢。由于“政治镇压”概念本身界限不明确又增加了困难。之所以缓慢,还因为查明镇压受害者命运所必需的文献资料缺失(个人案卷、规范的证明文书、镇压机关的决定、统计登记资料,等等)。编制者准备以后根据收集到的新的资料对光盘的内容作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

光盘提出了一些过去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迫害和镇压的领域。例如迫迁少数

民族的做法虽然在赫鲁晓夫时期做了纠正,但是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当作一种镇压行为来研究,然而俄国至今存在的某些民族冲突的根源之一正是当年对少数民族的无端镇压!

俄罗斯联邦政治镇压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十月革命节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向总统提出成立统计政治镇压牺牲人数的各部门联合委员会,最终哪怕得出一个大体数字,准确数字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哪怕是一个大体的数字,他们有多少人?是谁?在什么地方?有哪些类人?不仅有被枪毙的,还有饿死的,要知道……有1000万人是饿死的,死于有组织的饥荒。一次是死于粮食征收制,而另一次是在乌克兰,在我们的南方城市死于有组织的饥荒。与此同时,还出口粮食,卖粮食。^①

一年后,2001年11月,雅柯夫列夫在同记者谈话时说,斯大林去世后为400万以上的政治镇压受害者恢复名誉。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他认为在镇压过程中,“政治镇压受害者约3200万,其中1300万是在国内战争时期”。此外,还需要单独研究像贝利亚、亚戈达和叶若夫这类政治家的案件,他们是按照捏造的间谍罪名被判刑和枪毙的,然而他们应当以杀人罪审判。为此他认为应当增加军事检察院和其他机关的人数以研究全部镇压受害者的案件。雅柯夫列夫说,他会见了普京总统,国家元首支持建立跨部门委员会的建议。参加委员会的将有内务部、联邦安全委员会、对外情报局、国防部、检察院、最高法院以及档案机构的代表。^②

2004年3月莫斯科发行载有受害者名字的《苏联政治恐怖受害者》的光盘版纪念册,可以说是几个组织多年联合工作的一个综合成果。

虽然如雅柯夫列夫所言,镇压受害者的准确数字永远不会知道,但采取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有可能使调查出来的数字比较接近历史的实际。

徐向梅主编:《俄罗斯问题研究(2013)》,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

① www.nns.ru. Интервью недели. 2000.11.4.(网上资料“一周访谈”,2000年11月4日)

② www.liga.kiev.ua Украинская баннерная сеть № 42(465) 2.11.2001.

斯大林对《斯大林传略》所作的修改

《斯大林传略》共出过两版：第一版是为庆祝斯大林 60 岁生日于 1939 年出版的，后又多次重版，无改动。据统计，此书印数超过 400 万册。第二版是庆祝斯大林 70 寿辰于 1947 年出版的，是补充修订版，也多次重印，总印数在 1 300 万册以上。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秘密报告中曾引用传略二版中斯大林本人所作的修改，揭露斯大林“自吹自擂”。

1990 年第 9 期《苏共中央通报》发表斯大林对他的《斯大林传略》第二版样本所作的修改和补充，并给这批材料加上标题《斯大林自己论自己——对本人传记所作的修订》，同时发表编者按，作简短的评论。

一、“编者按”摘译

在苏共中央档案库中，保存有斯大林为此书第二版样本所作的亲笔修改。样本由该书的第一版剪贴而成。上而有编写组手写的修改和打印的补充，像通常一样，修改是用蓝铅笔书写的。

第一次提到斯大林修改自己的传记一事是赫鲁晓夫 1956 年 2 月 25 日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说：“个人崇拜之所以达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竭力鼓励和支持抬高他个人的做法，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这种自我吹嘘和缺乏起码的谦虚精神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 1948 年问世的他的《传略》。”（《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3 期，第 157 页）

我们同意赫鲁晓夫的这一公正评价,同时还要指出,按照领袖的设想,此书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样,应在党和社会的思想政治生活中起特殊的作用。它也起了这种作用。此书之所以印行数百万,是因为这是各级学校的学生和大学生,各系统和党校、团校的学员以及许许多多的干部培训和进修班的学员们必读的教材。

换句话说,《斯大林传略》是一种供社会用的特殊的“教义手册”。对他的研读形成了关于社会历史和社会制度及其准则、道德和办事原则的一整套概念。此外,它还是1938年出版的《简明教程》的重要补充,提供了关于战前时期,伟大卫国战争的进程和结果,以及战后头几年的情况和评价。

这一切说明斯大林为什么那么注意此书的编写和修订。

读者看到斯大林的修改和补充后,无疑会注意到他是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安排对自己的个性和活动的评价的,他的崇拜者甚至可以找到证明领袖谦虚的东西——他删去了卑躬屈膝的编写者加上的许多赞美之词(诸如“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天才的”等)。然而,斯大林所加的另一一些补充却怎么也不能证明他的谦虚。

请注意斯大林修改的某些特点。

他修正经他本人审定的1939年出的第一版。现在,1947年,在某些地方“恢复”历史真相已不可怕,如把茨哈卡雅和贾帕里泽、菲奥列托夫和阿齐斯别科夫等人^①同自己并列,把自己被捕和逃跑的次数说准确。^②

但较为重要的是意思上的修改,不知为什么斯大林觉得需要强调下列情况:他毕业于东正教神学校,删去托洛茨基“叛徒”的帽子,在谈到1917年4月代表会议时把季诺维也夫排除在“反列宁主义分子”之外,他放弃了他是《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的作者的說法,删去了下述语句:“在列宁生病的日子里,斯大林在人民委员会代理他的工作”,删去1919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他红旗勋章的决定全文。

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补充。如本书第一版说,“布哈林托洛茨基匪帮中的恶棍……策划了反对列宁的阴谋”,斯大林对此补充说:“打算逮捕列宁”。众所周知,

① 这些人是在19世纪末入党,和斯大林一起在高加索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家。——译者注

② 二版中斯大林把被捕次数由8次改为7次,流放由7次改为6次,逃跑由6次改为5次。——译者注

此类论断毫无根据。

有一处修改也发人深思。第一版说：“波罗的海三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接纳入苏联。”斯大林把“被接纳入”改为“回归”。

有关伟大卫国战争的原因和进程的修改具有巨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在这方面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对开战的评价。本书编写者在第11章是这样写的：“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帝国主义德国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起进攻。”斯大林作了原则性的补充：“突然进攻。”这一思想被牢牢地灌输进社会意识中去。以至于今天还有许多人赞同这种说法。

直到现在才公布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无论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来说，还是对军事领导来说，进攻都不是突然的。它对国内千百万对战争毫无准备的人们来说才是突然的。

总之，看到公布的文件后读者会有所思考的。

二、斯大林所作的删节

据统计，斯大林在样书上有十多处删去在斯大林“领导下”或“直接”领导下的字句。

在谈到1936年新宪法的地方，斯大林删去下述评价：

“斯大林同志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是对马列主义宝库的极其珍贵的贡献；它可以同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天才作品并列。”

在谈到斯大林在联共十八大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即令资本主义包围局面仍然存在，我国还是能够建成共产主义”这一结论时，斯大林删去以下评价：

斯大林的这一结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发现。就其意义而言，相当于列宁关于一国能够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发现”。

第11章谈到斯大林担起了领导苏联武装力量的重任时，在领袖和导师前删去“天才的理论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苏维埃国家高明的舵手和最伟大的统帅”等语。

在谈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原因时，斯大林删去以下语句：

“苏联人民之所以取得对德、日帝国主义者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是因为他们是在列宁的旗帜下，在斯大林的指引下生活、工作和战斗的”。

在全书的结尾斯大林删去第一版的4段话：

社会主义之所以在苏联得到了胜利并且正在取得新的胜利，是因为我们的全部工作和斗争是由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领导的。

我们国家和全世界劳动人民发自内心深处的一致愿望是：

祝我们亲爱的伟大的斯大林长命百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万岁！

三、斯大林添加的语句

谈到列宁逝世时，斯大林在下列语句中添加了“列宁的杰出学生”一语：

“列宁的旗帜，党的旗帜（删：‘和共产国际的旗帜’）。便由列宁的杰出学生……斯大林把它高高举起……”（画线处为斯大林添加的。以下同）

传略末尾说，“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改为：

“斯大林是名副其实的列宁事业的继续者，或者如我们党内常说的那样，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在第七章末尾，斯大林亲笔改写了两段话：

“在反对缺乏信心者和投降主义者，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反对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之流的斗争中，形成了列宁去世后的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其成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古比雪夫（此人是后加的。——译者注）、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卡岗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基洛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高扬、安德列也夫、什维尔尼克、日丹诺夫、基里亚托夫等人，这个核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把党团结在列宁遗训周围，引导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人、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是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完美地执行党和人民领袖的任务，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完全支持，但他在自己的活动中不允许有丝毫的自满自骄和自夸。他在同德国作家路德维希谈话时，指出天才的列宁在改造我们祖国的事业中的伟大作用，而关于自己却简单地（原为“谦虚地”。——译注）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

在卫国战争那一章中谈到斯大林的军事学说的部分，斯大林作了如下修改和

补充：

“斯大林同志(原为“大元帅”。——译注)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制定了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的原理(原作“学说”)关于积极防御与反攻进攻法则,至于现代战争条件下各兵种和作战技术配合动作,至于现代战争中大量坦克与飞机的作用,至于最强大的兵种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斯大林的天才都能找到充分顾及局势特点的正确解决办法。

斯大林的军事艺术既表现在防御上,也表现在进攻上。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苏联军队的积极防御总是同准备反攻相配合的,进攻总是同坚强的防御相配合的,斯大林同志巧妙地规定并运用了新的机动战术,即在几个地段同时突破敌军阵线,使敌人不能集中后备力量实行集中打击;在几个地段上相继突破敌军阵线,使敌人失去调动军队的时间和力量;突破敌军侧翼,绕到敌军后方,包围并消灭敌方大兵团。斯大林同志凭靠他的天才洞察力始终都能识破敌人的计划并击破之。斯大林领导了苏联军队,显示了作战艺术的卓越(原为“不朽的”)典范。”

《苏联历史问题》1991年第1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诞生记

斯大林重视意识形态,不过这意识形态是为他本人树碑立传的意识形态,是制造对他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是为树个人而不惜篡改历史的意识形态。为做到这一切,必须有一本按照他本人的意图、指示编写的史书来统一联共党史,统一苏联历史,甚至统一世界历史。1938年出笼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就是这样一本书。

为编写这样一部历史教科书,斯大林花了20来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为编写这部书做好人事组织、理论修正、历史篡改的先期工作,最后才水到渠成地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编写出《简明教程》。

打倒党内的理论家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党内并不以理论家著称,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理论著作。那时的党内理论家有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

列宁自不必说,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有著作问世。

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前就著有批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著作,对国家问题、帝国主义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十月革命后他是党内少数能够同第二国际领袖如考茨基论战的理论家,列宁逝世后,他写作了大量有关列宁和列宁思想的著作,如《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列宁的政治遗嘱》等。布哈林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对经济学、哲学、文学艺术以至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1937—1938年他被关在“自己的”监狱里还撰写了三本书:《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小说《时代》。如果布哈林的《辩证法概论》得以发表,斯大林的《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难以站住脚。

托洛茨基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杂志《新时代》发表文章,敢同列宁展开争论,十月革命后,也是他敢对第二国际的大理论家考茨基等展开批判,写作了如《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帝国主义与革命之间(以格鲁吉亚为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东方与西方》等。列宁逝世后他最早发表回忆录性质的文章,纪念列宁,阐发列宁思想。他首先对斯大林的“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发起挑战,进行驳斥,他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使用的列宁引文大大超过斯大林所引用的。20年代开始出版多卷本的《托洛茨基文集》,这是除列宁外党内第一人。托洛茨基在文学艺术方面也颇有修养,他的《文学与革命》甚至影响到中国的左翼普罗文艺。被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很快就写出一部相当翔实的《俄国革命史》,当然在这部史书里是没有斯大林的什么位置的。

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前有一段时间曾经同列宁在一起,两人合出过一本《反潮流》文集,这在党内是绝无仅有的。1917年七月事变后,是他和列宁一起在芬兰湾避难。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领导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6年出版《俄国共产党(布)历史》,这是最早的很有权威的党史著作。他还写作并出版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比较起来,季诺维也夫的这一著作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所没有谈到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的哲学思想。季诺维也夫对列宁主义所下的定义也比斯大林的要符合实际一些:“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确实是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闹革命的,农民问题是列宁所面对并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从1923年起,开始出版18卷的《季诺维也夫文集》,是当时第三位能够出文集的人。

每遇到重大的国际国内和党内问题,往往都委托他们三人中的某一人来起草决议草案,撰写文章进行解释、宣传或反驳。

这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人物,在他们下面还有一批专家,例如文学艺术领域的卢那察尔斯基,历史学领域的波克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哲学领域的德波林,经济学领域的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等等。

可以这么说,有这些专家学者在,在这些领域就没有斯大林的地位。看看十三卷《斯大林全集》(应当是《斯大林文集》),就可以看出,他没有什么有分量的理论著

作可以与那些大专家比肩的。他的唯一称得上专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还是在布哈林的帮助下完成的,由于他不懂外语,许多外语资料是布哈林帮他搜集和翻译的。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当时只被当作一般的通俗小册子。1929年斯大林申请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因缺乏有分量的理论著作而没有通过。这一年布哈林在政治上失意,却毫无悬念地当选为科学院院士!

在党内斗争和争论中斯大林必须借助外力。同托洛茨基争论时,借助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同“托季联盟”争论时则借助布哈林,在同布哈林争论时斯大林在理论领域已经找不到可以同布哈林对抗的人物,只好干脆撇开理论问题而在“右倾”上做文章。通过这几场争论,斯大林击败了他的主要对手,在党内赢得唯我独尊的地位,这是1929年的事。这一年年底斯大林50大寿成为他赢得党内统治地位的标志,《真理报》连续几天发表文章连篇累牍为斯大林祝寿,盛况空前。人们记得,1920年人们庆祝列宁50大寿时,列宁避席拒听那些歌功颂德的贺词。

反右倾击败布哈林只是政治上的胜利,为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斯大林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

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

斯大林登上意识形态舞台,开始发号施令了。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演说《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判“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和小农经济“稳固”论,等等,指名和不指名地批判布哈林、恰亚诺夫、格罗曼等人。斯大林很放心,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敢出头同他争论了。

1930年斯大林做了一个关于哲学领域开展大批判的内部谈话。他参加了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会议并作了发言,要求对整个社会科学开刀,他说:“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德波林集团所写的一切——摧毁。斯腾、卡列夫可以撵走……我觉得德波林是无可救药的人,但是应当把他留在编辑部,以便有打击对象。”

有人问:“是否应当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斯大林回答说:“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这样做。”“学院在哲学领域应当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何处?”他回答说:“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

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普列汉诺夫应当揭露,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①“不要忘记梁赞诺夫。总的讲,马恩研究院是脱离我们的。”^②这样,在“全方位打击中”,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到德波林就都成为“打击”的对象。斯大林不敢碰的只剩下两人——马克思和列宁了。

30年代的“打击”大批判是全方位的,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以至一系列的自然科学,如生物学,等等。

斯大林对历史学抓得很紧。

20年代苏联学术研究相对要自由一些,出了不少党史著作,除了季诺维也夫写的党史外,早在1920年就出版了布勃诺夫的《俄国共产党发展的基本阶段》,1926年出版了涅夫斯基著作的《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和波波夫著的《俄国共产党简史》。1928—1930年出版了由雅罗斯拉夫斯基主编的四卷本《联共(布)历史》,这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党史著作。党史作者还有巴图林、贝斯特里安斯基等等,没有人垄断党史的写作。布勃诺夫还给30年代初出版的第一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写了“联共(布)”条文。当然,这时候出版的党史著作不会突出斯大林,如实写的话,斯大林的名声盖不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

20年代以及30年代初出版的党史著作严重影响斯大林绝对权威的树立,斯大林要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必须改写党史。

1931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发表斯大林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攻击联共(布)党史中的“托洛茨基主义私贩”,其中也涉及雅罗斯拉夫斯基,斯大林断定,他也没有能摆脱“许多原则性的和历史性的错误”。此文引发对历史学家的新的镇压浪潮,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解除工作和开除出党,一些人被驱逐出莫斯科,流放外省。

30年代初出现了编写得到联共中央批准的官方党史教科书的想法。1932年1月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编写“联共(布)历史”》的决定,成立了编委会,其成

① Октябрь. 1988. № 12. с.69.

②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1989. № 13. с.85.

员有斯大林、卡岗诺维奇、波斯蒂舍夫以及莫洛托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阿多拉茨基等。教科书的编写者为历史学家克诺林、波波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和贝斯特林斯基,还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和斯克雷普尼克。托夫斯图哈任出版秘书。开始了工作,但进展很慢,到1934年底连个大致轮廓也没有确定。此外还计划出版多卷本的大型党史教科书。

1934年底基洛夫遇刺,形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使得认真编写多卷本联共(布)党史教科书成为不可能的事。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两卷本的《联共(布)历史》,其第一版于1933年、第二版于1935年出版。1936年底政治书籍出版社开始准备出第三版,然而1937年2月出版社仅出版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教科书的第一卷就停了下来。与此同时,各种各样伪造事实和歌功颂德的党史文章和著作大量出现,最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贝利亚的关于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充满伪造的著作,1936年出版的法国共产党员作家巴比斯撰写的大力吹捧斯大林的政治传记。

批判的武器变换为武器的批判。1935—1938年全国举行了好几次秘密的和“公开的”审判,原先的各种反对派成员几乎被杀绝,他们的名字在书报中一律禁止正面提及,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拉狄克、叶努基泽、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拉柯夫斯基、梁赞诺夫、克利斯廷斯基等,并且随着镇压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被禁止正面提及的人员名单也在不断增加。书报检查,特别是对政治书籍的检查加剧,从图书馆下架和销毁数百万册图书,仅个别图书馆如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在特藏库还藏有此类图书。

大批历史学家也惨遭镇压,被捕和被肉体消灭的有:波斯蒂舍夫、皮亚特尼茨基、斯捷茨基、克诺林、波波夫、布勃诺夫、奥拉希拉什维利,等等。斯克雷普尼克被迫自杀,只有托夫斯图哈于1935年病逝逃过一劫。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还有谁能够承担撰写新的联共(布)党史教科书的任务,新教科书能写些什么?

“共产主义圣经”的诞生

同列宁并肩战斗、亲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炮火的老革命家被消灭了,熟悉历史的党史学家没有了,仅存的几位老革命、老史家也都被噤声了,舞台已经“净化”,斯大林可以亲自上场改写党史,制作新的党史教科书了。

需要指出的是,改写党史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要求,也是他周围的亲信们的需要,这些人在十月革命以及列宁时期的历史中都不是一流人物,现在地位提升,迫切需要改写历史,提高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伪造学派》中写道:

伪造者改写历史决不是个人的阴谋或者小集团的倾轧之事。这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深刻的政治过程……凌驾于革命阶级之上的官僚随着自己独立地位的巩固,不能不要求用一种意识形态去为他们的特殊地位辩解,防止来自下头的的不满。这就是对还非常新鲜的革命历史进行大规模改写、改头换面甚至伪造的原因。^①

1937年5月1日,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关于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给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们的信》。1937年5月6日此信略加修改在《真理报》转载。

斯大林在信中宣布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都“不能令人满意”。这些教科书所叙述的联共历史脱离国家的历史,只限于简单地描写各种流派斗争的事件和事实,没有作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明。这些教科书的结构和事件分期都有不正确的地方,结果它们变成了对往事的肤浅的和莫名其妙的叙述。接着斯大林对编写新的联共党史教科书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为:要讲述布尔什维克同各种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流派斗争的历史,这是保卫列宁主义的斗争,否则布尔什维克党就会像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蜕化。斯大林指出:“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打架的人。”接着斯大林提出自己的联共(布)历史分期提纲,“作为基础”。

斯大林的分期提纲共12条,即12个时期。提纲本身就开始篡改历史。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1898年成立的。提纲把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时间。把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会议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形成为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实际上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形成为独立的政党,此后直到1917年仍然同孟什维

^①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柏林1932年俄文版,第7—8页。

克派共存于同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内,直到1917年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才成为独立的政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大林之所以把布拉格代表会议抬得那么高,是因为在这次会后他被缺席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并进入人数较少的中央俄罗斯局。提纲把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仅仅限于1917年3月,此后的时期是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和进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实际上,3月以后是二月民主革命继续发展的时期,当然也是布尔什维克党竭力推翻民主革命政权的时期。提纲把1926年至1929年定为布尔什维克党“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时期”,这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简明教程》中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被说成是“工业化的代表大会”,然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工业化仅仅被一般地提及,工业化中的各种问题如资金来源、发展速度、工农业关系等都没有涉及。

斯大林关于教科书的新分期和新架构的建议立即得到政治局的赞同,编写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斯大林需要有人来撰写基本的历史事实。由于大批党史作者遭到镇压,斯大林找了两个人参加新版党史的撰写。一个是雅罗斯拉夫斯基,1878年生,老党史研究者,有多种党史著作问世,这时已经服服帖帖听命于斯大林。另一个是38岁的党的工作者波斯别洛夫,联共中央下属党的监察委员会下的不起眼的报刊小组领导人,没有学术著作。这是听话的青老结合。根据政治局的决定,整个工作要在四个月内完成,换句话说,教科书要在1937年10月底完成。可见这不是一个要求认真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而仅仅是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改写历史的工作。斯大林那时忙于清洗镇压的事务,因此把监督和领导编写新教科书的任务交给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不过,尽管日丹诺夫身处高位,拥有大权,但无权解决党史中的任何问题,能作主的只有斯大林一人。

第一份打印的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直到1938年2月底才完成。斯大林看后不满意。两位作者中波斯别洛夫年轻缺乏经验,胆小怕事,尽量避免作理论概括,尤其是没有列宁斯大林直接引文可用的地方。雅罗斯拉夫斯基整日提心吊胆,他的办法是在教科书中详细叙述斯大林革命前的传记以及莫洛托夫及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传记。斯大林把这些东西统统删去。1938年3月4日同波斯别洛夫进行了详细的谈话,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参加。但没有邀请雅罗斯拉夫斯基参与。斯大林解

释了自己大量删除、修改和补充的情况,回答了问题并提出了建议。

教科书的第二个打印本于1938年7月底8月初完成,吸收了斯大林在3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斯大林在第一个样本上所作修改和意见。斯大林对新本仍然不完全满意。8月斯大林几乎用了14天时间来修改《简明教程》的新版本。这些日子他一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潜心工作,没有接见任何人。斯大林修改完一章就立即送交政治局委员以及波斯别洛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阅读。斯大林几乎每天都收到这些读者的回复。回复照例都很简短:“我没有意见。”(赫鲁晓夫)“作品很出色。”(伏罗希洛夫)“令人惊异的好。”(加里宁)“同意。”(莫洛托夫)“读了。”(米高扬)“非常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加里宁)“非常满意地拜读了。”(赫鲁晓夫)“没有修改意见。”(叶若夫)“没有修改意见。”(日丹诺夫)“非常满意地全都拜读了。”(安德列也夫)“热烈赞同。”(莫洛托夫)等等。他们表示最不满意的是书中对斯大林在联共(布)取得胜利和成就中的杰出作用表现得不够鲜明强烈。

9月8日晚7点在斯大林办公室召集项目的全体人员开会——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波斯别洛夫,以及《真理报》的编委罗文斯基。约在晚上11点钟作出了最终决定:9月9日在《真理报》刊载《简明教程》第1章。此后11天这些人深夜不断地聚会以决定第二天发表的东西。斯大林的某些修改已经不是教科书的样本上,而是在《真理报》的清样上了。

《简明教程》于1938年10月以图书的形式出版,印数为600万。在3—4周期间全部售完,为此政治局两次决定追加印数,每次200万册。根据政治局的决定,1939年《简明教程》要翻译成所有加盟共和国及许多自治共和国的语言。1938年9月27日政治局决定把此书译成中文、法语、英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瑞典语、芬兰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日语、马来语、印度语、保加利亚语、南斯拉夫语出版。这一切都非常紧急。译成“所有语言”的最后期限规定为1938年11月15日,即总共只有一个半月时间。为使读者买得起,政治局决定俄文本的价格为3卢布。

斯大林催促尽快组织学习:“此事我们耽误了整整一年时间。”国内各界1938年9月就已开始根据《真理报》的文本学习新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了。

《简明教程》的作者署名是“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中央审定”。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曾经指责斯大林剽窃。他说:“《简明教程》是集体

写作的,而1948年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中斯大林亲手写下如下语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同志写作,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批准的。”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说:“你们看到,集体创作的成果令人吃惊地变成了斯大林个人的著作。”^①

此书的基本历史素材自然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波斯别洛夫提供和撰写的,但全书的主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都属于斯大林,这是确实无疑的。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依据后来公布的档案资料、书中的文字风格以及政治局委员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及波斯别洛夫对斯大林发来的文本的反应断定:“斯大林亲自操作了联共(布)历史教科书的本文,他不仅修改了,而且亲自撰写了《简明教程》的许多篇章。不仅全书的框架,而且每一章、每一节的标题都是斯大林拟定的。涉及理论的章节都是他写的。那时候也只有斯大林能够对党和苏俄历史上的所有活动家作出官方的评价。只有他能对从日俄战争、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直到集体化、工业化以及通过新宪法等历史事件的意义作出正式的评价。也只有他能对俄国各政党以及党内各流派、反对派、小集团的性质作出评价。”斯大林不是不想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这样一来书中对斯大林的大量狂热的吹捧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就弄出一个“特设委员会”来。

1938年1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相关的党的宣传工作的安排》。此决定在所有党的报刊上刊载,还出版了单行本。该决定的文本由日丹诺夫和波斯别洛夫领导的相当庞大的一个委员会起草。从决定的风格和性质可以看出,斯大林本人起草或者口授了这一文件的许多部分。决定指出:

党史教程是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科学历史。……必须使党在党的历史方面有统一的指南,这一指南作为联共(布)中央审定的、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正式解释,可以杜绝任意解释的现象。联共(布)中央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将结束从前一些党史教科书中胡乱阐述党史以及对于党的理论和党史中的重要问题的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任意解释的现象。^②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3期,第158页。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4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501—502页。

据统计,1938—1953年间《简明教程》印了301次,共4280万册,译成67种语言。^①印数最多的自然是俄文版。

从1938年9月起所有以前出版的联共(布)历史的图书和教科书都从图书馆下架了。在许多年间只有《简明教程》是唯一的党史教材,书中每一句话都被看作终极真理。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9月28日

^① H.马斯洛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百科全书//人民的严峻喜剧》,莫斯科1989年版,第334页。

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

2004年8月《参考消息》曾报道俄《论坛报》的文章,称苏联英雄、卫国战争参加者、作家卡尔波夫用了数十年时间亲自调查,试图为卫国战争史填补空白。其中之一是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斯大林曾建议德国停战,共同打击英美。据卡尔波夫的说法,这样的谈判确实举行过,是在1942年2月20—27日。但苏方无法接受德方要求,谈判中断。^①

“媾和”的说法时有所闻,这并非空穴来风,据现在看到的资料,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采取过三次同希特勒媾和的尝试。

第一次是在德国发动进攻后不久

苏联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在1989年出版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中提到此事。沃尔科戈诺夫在书中引用了一份档案资料:

1957年7月2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作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苏联元帅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

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1941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

^① 新华网2004年8月25日。

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①

70年代后期，沃尔科戈诺夫同莫斯卡连科就这一问题有过一次谈话。

1976或是1977年，沃尔科戈诺夫参加以基·谢·莫斯卡连科元帅为首的视察组，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他都向元帅汇报对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检查情况。有一次在谈话中他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他的问题：

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回忆录）里没有提到您大约二十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实？

沃尔科戈诺夫问的就是1941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托杰诺夫（Стаменов）的事。

莫斯卡连科回想贝利亚的供词说，在这次同保加利亚大使见面时，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语。谈话的始终是莫洛托夫。他请大使同柏林联系一下。据贝利亚说，莫洛托夫把自己关于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议称为“可能缔结的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既然列宁当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们今天也打算这样做。倒是大使拒绝为此事充当中间人，他说，“哪怕你们退到乌拉尔，你们反正也会取胜。”

莫斯卡连科若有所思地说，“很难绝对肯定事情确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在6月底至7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处于绝望状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对他未必有什么好处，再说，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我们谈话时也肯定了这个事实……”

沃尔科戈诺夫那时候没有看到其他材料，所以在《胜利与悲剧》中就此写道：“我援引了口头的和保存在档案中的书面证词。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

^① 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701323目录，第38卷宗，第53页。

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①

不久，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得到朱可夫元帅谈话的证实。1991年历史学家Л.А.基尔什内尔编的一本文件集《战争前夕和初期。文献资料》中，收有历史学博士Н.Г.巴甫连柯中将同朱可夫元帅的谈话。巴甫连柯写道：

为推卸红军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失败的责任，斯大林需要“替罪羊”。这些替罪羊也找到了。主要战线相当部分的指挥员被无端指责胆小叛变并革出教门和枪毙（现在全都平反了）。斯大林指责别人，自己却走到叛变的边缘，1941年10月7日德国人攻至莫斯科城下，据朱可夫见证，斯大林陷入惊慌失措，命令贝利亚通过自己的渠道试探同德国签订新的布列斯特和约，单独媾和。为此可以割让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可以接受任何条件。我问朱可夫，接下去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贝利亚派代表与当时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斯托杰诺夫（Стојенов）接触。据斯托杰诺夫说，希特勒拒绝媾和，他指望莫斯科很快陷落。”幸好背着人民的可耻的单独媾和没有成功。^②

第二次是在1942年2月

斯大林准备同德国媾和一事，作家、“苏联英雄”卡尔波夫有另一种说法。卡尔波夫在1999年写作《大元帅》（中译名《斯大林大元帅》）一书时看到一些文件，证明斯大林在1942年春曾采取措施谋求同德国媾和。《大元帅》一书是替斯大林说话的，相信不会无中生有。

据卡尔波夫的说法，1942年2月斯大林下令情报部门设法与德国统帅部取得联系，以他斯大林的名义提出和谈建议。此事斯大林没有同他的统帅们商量过，甚至没有同政治局委员们商量过，所以，他们中谁也没有在口头回忆或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一设想。

早在1938年苏德两国情报部门就签订了合作的协定，因此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进行谈判。苏方情报人员和德国“同事”接上了头，1942年2月20日双方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内的姆岑斯克会晤。

^① 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177页。

^② 《战争前夕和初期。文献资料》，列宁格勒1991年版，第40、371页。转译自网上资料 SEMA.RU>ХРОНОС>БИОГРАФИИ>ЖА>。

斯大林亲自起草并签署了《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该建议一式两份，一份留在斯大林那里，另一份给了进行谈判的人。这份文件看来并没打算交给德国人，这只是个大纲，列出了苏联代表作为依据的问题。但是看来双方此前曾进行过会谈，因为斯大林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对双方已经涉及的问题所作的反应。建议的内容如下：

1. 从1942年5月5日6时起，战场全线停止军事行动。宣布休战到1942年8月1日18时止。

2. 从1942年8月1日到1942年12月22日，德国军队应该撤至图1标出的地区。建议按照图1标出的延伸线确定德国和苏联的边界。

3. 在双方部队变更驻地后，苏联武装力量准备在1943年底之前和德国武装力量一起对英国和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4. 苏联愿意研究宣布两国和平、指责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各国犹太人挑起战火、在1943~1944年间实施进攻性联合战斗行动、重新安排世界空间(图2)的条件。注：德军如果拒绝履行上述第1、2条的要求，将被歼灭，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将从政治地图上消失。

要提醒德国统帅部应承担的责任。

苏联最高统帅(约·斯大林)

1942年2月1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签名证明这些“建议”是他起草的，这些不是打印在国家机关或党机关公文用纸上的，而是打印在一张普通纸上的“斯大林式”的简短语句，既没有指明官方文书中不可缺少的执行人，也没有注明共复制几份，表明这只是个大纲。

但是德军的代表、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并不像个处境窘迫的穷亲戚(这是斯大林在苏军总攻后的看法)，而是信心十足，甚至表现出德国人特有的高傲。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给斯大林呈上了如下报告。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第1/2428号

1942年2月27日

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

1942年2月20—27日在姆岑斯克与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党卫队帝国长官

私人参谋总部部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谈判的过程中,德国统帅部认为无法满足我方的要求。

他们向我方建议,以1942年底前现有战线为边界,停止战斗行动。

苏联政府应该立即消灭犹太人。为此,首先应该把所有犹太人迁移到远北地区,加以隔离,然后完全予以消灭。同时,当局要负责外围的治安工作和劳改营范围内严格的警卫制度。消灭(销毁)和利用犹太居民尸体的问题由犹太人自己负责。

德国统帅部不排除同我们建立反英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沃尔夫同柏林商量后声明,如果苏联领导人接受德方的要求,德国统帅部为了表示这些变化,愿意把国旗上卐字标志的颜色从黑色改为红色。

在讨论图2时出现了以下的立场分歧:

1. 拉丁美洲。应该属于德国。
2. 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态度复杂。德国统帅部认为,中国应该被日本帝国占领,成为其保护国。
3. 阿拉伯世界应该成为德国在北非的保护国。

因此,应指出会谈出现了全面的观点和立场分歧。德国统帅部代表沃尔夫完全否认德国武装力量在战争中将被歼灭和打败的可能性。他认为,同俄国的战争还会持续几年,会以德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他们认为,主要根据是,俄国两三年后,由于在战争中耗尽了人力和物力,不得不回到和平谈判上来,但是谈判条件将会更苛刻。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梅尔库洛夫^①

第三次是在1942年下半年

提供这一说法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别列什科夫在“二战”期间担任斯大林的专职英语翻译,有机会听到斯大林及其助手的秘密谈话,掌握了当时的最高机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保密工作的要求,他对掌握的机密一直保持沉默。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大学讲授“二战”史。1997年出版《斯

^① 弗·卡尔波夫:《斯大林大元帅》,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399页。

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曾经幻想与希特勒单独秘密媾和，他派苏联副外长与希特勒的特使秘密会晤，企图割地求和。但不久战局的变化使斯大林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

1942年9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委员杰卡诺佐夫突然消失，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在莫斯科。

多年之后，别列什科夫的同事伊利亚·切尔诺舍夫（曾同别列什科夫一道在杰卡诺佐夫秘书处工作，后来任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参赞、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苏联驻巴西大使）告诉别列什科夫，1942年中杰卡诺佐夫执行了什么样的使命。

名义上，那只是副外交人民委员秘密访问瑞典，了解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工作情况。但是，甚至苏驻瑞典大使也不知道，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跟希特勒的什努列特使举行秘密会晤。

别列什科夫说，他记得，1942年间，斯大林以各种理由多次提到过1918年与德国人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强调列宁不顾托洛茨基和其他同事的反对，签订了被列宁本人叫做“可耻的和约”。斯大林总是在说，列宁一贯正确。拒绝和平意味着丧失一切，而接受和约则可以使布尔什维克保存最主要的东西——权力，即使被割去一大块俄国领土。由于担心局面可能会更糟，斯大林显然没有排除与德国在苏方作出某些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和解的可能。按照切尔诺舍夫的话，当时会谈的内容，是将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移交给德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给罗马尼亚，以及德军经苏联领土过境到中东波斯湾的石油产地等等。

希特勒的密使在约定的地点等待着苏联代表。显然，协议是通过某个中立国，譬如瑞典，经过特殊渠道达成的。德国特使什努列答应立即向希特勒汇报斯德哥尔摩会谈的内容。但柏林一直沉默。不久，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鲍卢斯元帅的希特勒第七军大败。此后，德军一直向后撤退，虽然往往经过激战。斯大林的这个1942方案彻底失去了意义。^①

^① 瓦列金·别列什科夫：《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5—317页。

二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初步评析。

1.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来自四个不同的见证人的有关三次媾和的资料。一个是莫斯卡连科元帅转述的贝利亚的供词。第二个是卫国战争初期任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的回忆。第三个是苏联英雄、作家卡尔波夫,他依据的是档案资料,不过未标档案出处(他的《斯大林大元帅》一书所有引证资料均无出处)。第四个是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什科夫,他是从同事、一位外交官那里听说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又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到1942年,曾经采取行动打算同德国“媾和”。

这种尝试进行过三次,一次是在德国入侵后不久,应是在1941年10月前后,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际,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三人通过保加利亚驻苏大使进行的。沃尔科戈诺夫和巴甫连柯两份资料上大使的名字不同,一作斯塔梅诺夫(Стаменов),一作斯托杰诺夫(Стоиенов),看来是发音和拼写上的问题,但可以判断是同一个人。进行谈判的尝试被这位有远见的大使拒绝了。第二次是在1942年2月由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同在姆岑斯克与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党卫队帝国长官私人参谋总部部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进行,这就是说,进行了正式接触,但被德方拒绝了。第三次是1942年下半年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同德国特使什努列在瑞典进行的,苏方提出媾和建议后,未见下文。

苏联提出的条件或者说让步是相当大的,按照贝利亚的说法是: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朱可夫的说法是“可以割让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可以接受任何条件”。此外,还有同德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反英美的统一战线,对英美采取军事行动。切尔诺舍夫的说法是,将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移交给德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给罗马尼亚,德军经苏联领土过境到中东波斯湾的石油产地等。三种说法中,卡尔波夫的说法有档案支持,但没有标出档案来源。不过可以说一下,卡尔波夫的《斯大林大元帅》是一本为斯大林辩护和歌功颂德的书,因此他在这里披露这段史实不会是出于给斯大林抹黑的动机,应是可信的。莫斯卡连科依据的是贝利亚的供词,缺乏直接的证据,三个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并

且这种秘密议论也不可能留下文字材料。不过莫斯卡连科说得有道理,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对他未必有什么好处”,他同时还强调,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他们谈话时肯定了这个事实。看来此事向保加利亚大使核实过。

2. 从当时的形势看,斯大林是有可能采取这一行动的。

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进攻缺乏应有的准备。首先,苏联不相信德国会发动进攻。其次,当时斯大林的战略是打进攻战,拒敌于国门之外,在边境线没有构筑有效的防御工事。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接见军校毕业生时说:“我们应当以进攻的方式从事我国的防御,应当从防御转向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军事政策。……红军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进攻的军队。”^①据此,朱可夫于1941年5月15日提出对集结在苏联边境的德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击的建议。因此在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措手不及,没有应战能力,不要说进攻了,连防御也防不住,很短时间里失地千里。

那时的军事形势是:到1941年7月初,德军就占领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大部分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部分地区。10月13日,德军攻占卡卢加。10月15日,德军第四坦克集群司令霍普纳的坦克集群突破莫斯科防线。10月16日,总参谋长传达了斯大林要求所有后勤机关迅速撤退到古比雪夫(俄罗斯伏尔加河中游城市)的命令。大本营要转移到阿尔扎马斯。总参谋部命令为斯大林撤退准备专车。叫作“莫斯科恐慌”的大混乱开始了。

对战争初期的损失,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大多集中在西部地区,在德军的突然进攻下,苏联的工业实力很快就损失一半左右,例如钢的年产量为1800万吨,几天之内就失去一半左右。战争初期红军本身的损失严重,加上大量高中级军官此前被清洗,红军的战斗力削减得非常厉害,难以应战。按照卡尔波夫的说法,那时的形势非常像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时的情景,德军已经打到莫斯科附近,红军损失巨大,没有预备队,只能用新的役龄青年组建新部队,但是没有武器给他们,因为一部分国防工厂在被占领区,大部分工厂在撤退中,只有内地的企业在生产数量不多的坦克、飞机、火炮和步兵武器,而这样的工厂

^① 转引自《斯大林大元帅》,第263页。

也为数很少。要重建撤退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新地方的工厂并组织生产尚需时日。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喘息时间。朱可夫后来在同西蒙诺夫的谈话中说：我们后撤了上千公里。军队当时是不稳定的，不仅仅是退却，而且是逃跑，是张皇失措。战争初期我们不仅上面打得不好，下边打得也不好。^①

有一种说法，在德军进攻面前斯大林一度灰心丧气，好多天不露面。最早发表告人民广播演说的不是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而是副手莫洛托夫。斯大林到7月3日才出面发表广播讲话。斯大林那时曾打电话问朱可夫：“您确信我们能够保住莫斯科吗？我这么问您时，心里很痛苦。作为共产党员，请您实话实说。”^②斯大林的翻译无意中还听到斯大林同莫洛托夫议论，表示可以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③

这种心态同求和的尝试是一致的。

3. 苏联和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着良好的关系。外国武装干涉失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封锁，为突破封锁，1922年4月苏俄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后苏联同德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苏联为德国提供原料，而德国为苏联提供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德国作为战败国是被禁止进行武器的生产和试验的，苏联给德国提供了武器试验场。特别是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之后，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不但苏联国内停止反法西斯的宣传，而且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即各国共产党也被禁止从事反法西斯的宣传和斗争。对两国签订的协定，苏联是放心的。“如果我们不去挑斗，不采取某种错误的措施，那么希特勒就不敢撕毁条约和向我们进攻。”^④

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人会进攻苏联，尽管他收到不少德国人即将进攻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对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说，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十分突然。这是因为斯大林本来认为，希特勒不会进攻。据别列什科夫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掌握了德国人正在准备入侵的准确情报，甚至知道确切的日期——6月22日凌晨。大使馆把所有这些情报都送到了莫斯科。而且，情报不仅仅来自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而且也来自驻德国武官图比科夫和海军武官沃伦措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① 见《斯大林大元帅》，第303—304页。

② 《斯大林大元帅》，第371页。

③ 见《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313—314页。

④ 《斯大林大元帅》，第304—305页。

可靠的情报来源,并且所有的资料都是吻合的。最后,6月21日夜,“主人”的桌子上,还有一份报告。这是投诚的德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布格河和第聂伯河,在最后一刻警告苏军指挥部,再过几小时马上就要开始入侵了。但对这些情报斯大林一个也不相信。^①

正因为这样,德国发动进攻之后,苏方的反应首先是德国“背信弃义”。斯大林7月3日的广播讲话中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②其实对德国这样的法西斯国家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如果对德国有基本估计,就不会为它的“背信弃义”而痛心疾首,从道义上去谴责。

斯大林的翻译解释说:“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考虑到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特殊态度。他们一直未曾谋面。但是,斯大林曾经期待这样的会见,他对纳粹独裁者有一种独特的向往之情。从希特勒方面来看,他也曾高度评价斯大林。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控制大众意识的手段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③1934年当希特勒消灭了自己的战友、冲锋队负责人恩内斯特·罗姆以及冲锋队其他将领时,斯大林给这场血腥屠杀以高度评价。米高扬多次对别列什科夫说过,在罗姆被杀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德国的事情?希特勒太棒了!就应该这样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④

4. 不错,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上确实有过同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先例,斯大林可以不用担心犯“投降主义”的指责。列宁可以这样做,列宁的学生斯大林为什么不可以呢?斯大林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苏联的领土割让给德国,换取“喘息时机”。

不过列宁当年的布列斯特和约同斯大林要签订的“和约”有根本的不同。1918年春列宁不得不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和约,因为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从沙皇和临时政府那里接受过来的军队由于长年战争已经疲惫不堪,毫无斗志,丧失战斗力,国内物资特别是粮食严重缺乏,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退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空间换时间,为苏维埃政权赢得喘息时机,以求东山再起,否则苏维埃政权

① 《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6页。

② 《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0页。

③ 《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7页。

④ 《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第10页。

就有覆灭的危险。而在1941年,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20多年,斯大林直接执掌政权也有十来年了,苏联号称完成了工业化,是个工业强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同1918年的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时候同德国“媾和”是不能同布列斯特和约相提并论的。倒是保加利亚的那位大使看得清楚,即使退到乌拉尔苏联也必然胜利。1918年签订和约的目的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和德奥同盟结盟去反对协约国。而斯大林不仅打算同德国媾和,而且还许诺同德国结盟,建立反英美的联合战线,向英美宣战。两者的性质全然不同。并且有迹象表明,在谈判中中国(“中华文明”)很可能成为交易的一个筹码。

同法西斯德国联盟,共同进攻西方国家?这种“曲线救国”、“曲线反法西斯”路线可行吗?连卡尔波夫在评价斯大林这一行动时也说: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同意勾结法西斯分子反对盟国,这种无原则的态度当然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个想法本身只是一种战术步骤,为的是赢得时间。现在要拯救国家不被侵略。两年之间,世事变化无穷,会有机会跟盟国作出解释的,不会进行针对盟国的战斗行动^①。这种辩解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媾和”或者“投降”成功,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并肩作战,那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苏联难免要站在耻辱的被审判席上。

值得庆幸的是“媾和”或者“投降”没有成为事实。

《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6期^②

① 《斯大林大元帅》,第395—399页。

② 最近读到俄过尼古拉·津科维奇的《权力与争斗》(邝友昌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其中第8章“布列斯特和约-2”详细谈到贝利亚招供的当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他通过保加利亚大使意图同德国媾和的经过。第139—154页。

斯大林的最后时日

——斯大林医生的最新回忆

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去世。关于他的死因迄今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中毒身亡,有的说是当年苏共领导“集体无作为”导致死亡,还有说在孔策沃别墅抢救和死亡的不是斯大林本人,而是他的替身……种种说法,令人莫衷一是。

2011年4月21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发表了斯大林的医生亚历山大·米雅斯尼科夫的回忆录的片段,披露了医疗专家在孔策沃别墅抢救斯大林的全过程,斯大林最后死亡的详细情况。

亚历山大·米雅斯尼科夫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内科医生。卫国战争时期他是苏联海军总主治医师,后来是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委员。他的回忆录手稿完成于1965年,此后不久去世,手稿被安全机关没收,事过半个多世纪,直到不久前才从档案库取出归还米雅斯尼科夫的孙子。手稿将以《我为斯大林治病》的书名出版。

1953年3月2日深夜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特工来到米雅斯尼科夫医生家,请他去“生病的主人”那儿。那时特工的深夜拜访通常都不是好事,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所以米雅斯尼科夫向妻子告别,这时车子已经等在下面。

到达别墅后,米雅斯尼科夫看到几位医生已经先期到达,其中有卫生部长鲁科姆斯基教授。部长介绍说,3月2日夜斯大林脑溢血发作,失去知觉,失语,右手和右腿瘫痪。

据警卫说,昨天从晚上到深夜斯大林还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工作。卫队的值班军官3点钟还通过锁孔看见他坐在办公桌旁。办公室的灯一直亮着,像通常一样。斯大林睡在另一个房间,办公室有沙发,他常在沙发上休息。早上7点钟,警卫

再次通过锁孔观看,看到斯大林躺在桌子和沙发之间。他已失去知觉。他们把病人抬上沙发,他就在这里一直躺到最后时刻。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叫来医生伊凡诺夫-涅兹纳莫夫,不久卫生部长鲁科姆斯基也赶到了——他们一早就在这里了。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到来打断了医生的会诊,他俩总是一道来来去去。贝利亚对医生说,党和人民遭受了不幸,但相信我们会尽医学之所能的,他说:“请大家记住,党和政府绝对相信你们,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的一切措施,从我们方面只会完全赞同和提供帮助,不会有别的。”说这些话显然是因为刚破获“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多名教授——“医生凶手”还关在监狱等待死刑。

米雅斯尼科夫对病人进行了检查。据他说,斯大林沉沉地躺着,他显得矮小、微胖,格鲁吉亚人的普普通通的脸变得歪曲了,右肢像条鞭子平放着。他沉重地喘气,时而轻些,时而重些;血压为210/110。心律失常;白血球增多至17000;发高烧,尿液中有一些蛋白和红血球;对心脏的听诊和敲诊未发现异常;肺的两侧和正面未发现病态。诊断是明确的:“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引发大脑左半球出血。”

参加会诊的医生们决定一直守在斯大林身边,所以米雅斯尼科夫给家里打了电话。医生们睡在隔壁的房间,轮流守候在病人身旁。经常有某位政治局委员来看病人,最常来的是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米高扬。

3月3日,医生们回答马林科夫的问题说,死亡无法避免。“马林科夫暗示,他等的就是这个结论,但他随即表示,希望医疗措施如不能保持生命,至少要设法尽量延长时间。我们理解,这是需要时间来组织新的政权,同时也为舆论做好准备。”——米雅斯尼科夫说。

3月4日2点,医生们起草了斯大林病情的第一份公告。

各医学机构——卫生部学术委员会、科学院主席团以及一些研究所都召开会议,讨论帮助治疗斯大林的办法,并把建议送交会诊组。不过这些建议并无用处。

据医生说,这一整天斯大林沉重地喘气,偶尔发出呻吟声。“只有一瞬间他用若有所思的眼神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但眼神没有表示出什么来,又昏睡过去。夜里他多次濒临死亡。”

3月4日,参加会诊的一位医生突然想起,他们是否忽略了心肌梗塞问题。于是从医院来了一位年轻的女医生,做了心电图,她肯定说:“是的,心肌梗塞。”这使医生们惊慌不安,因为到现在为止,诊断书上都没有提到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失去

知觉的斯大林当然不会诉说心区疼痛,但白血球增多和发烧都可能表示心肌梗塞。会诊小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担心受到故意不做心肌梗塞的心电图的指责(此前的“医生谋杀案”就是这样说的)。最后还是米雅斯尼科夫首先提出一种说法:“心电图的变化对诊断心肌梗塞是不够的……我在海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同行在检查颅骨内伤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曲线。中风也会出现这种曲线。”神经病学家表示赞同:曲线可能是脑的,无论如何,基本诊断是脑出血,这是很清楚的。会诊大夫决定不承认心肌梗塞,而把一切归结为中风。为防万一,在诊断书上补写上:“由于出血流向大脑基础神经节造成的血管舒缩遭到破坏,出血的病灶可能在心肌。”

这时代表中央值班的是布尔加宁。米雅斯尼科夫发现,他怀疑地看着他们,也许还有点敌意。他肩上的元帅的星星闪闪发光,脸部浮肿,前额有一绺头发,胡子有点像某位沙皇,或者像日俄战争期间的将军。他站在沙发旁边问道:“米雅斯尼科夫教授。他吐的血是从哪儿来的?”米回答说:“也许是由于高血压和中风造成的胃壁毛细血管出血的结果。”

3月5日全天医生们有的打针,有的写日志,有的写病情公报,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们聚集在二楼,政治局委员们去看垂死的领袖,他们按官阶依次俯身从门口看望,不敢走近垂死的“主人”。矮胖的赫鲁晓夫也扶着门观看,大家严格遵守等级次序:前面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然后是伏罗希洛夫,接着是卡冈诺维奇,再后是布尔加宁、米高扬。莫洛托夫不舒服,流感引起的肺炎,但也来过两三次,做短暂停留。关于肠胃出血的说明写进了日志,也写进了病案总结。病人还在喘气,但一小时一小时地接近死亡。

3月5日晚上9点50分死亡终于来临。

当医生们确定脉搏摸不着了,呼吸停止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儿子瓦西里和警卫们悄悄进入了空荡荡的大厅,大家一动不动地静静地待了30分钟,甚至更久。

本文一开始就说过,关于斯大林的死因众说纷纭,米斯尼科夫的回忆提供了另一种版本,但真相究竟如何,尚难作出定论,希望有更多的确凿可信的资料问世,彻底解开这个谜团。

2011年5月稿

全文载《同舟共进》2013年第12期

木犁与原子武器,何人所言?

有一句流行颇广的话,长期以来被一些人当作对斯大林的权威盖棺论定:“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木犁的俄国,而留下的是装备有原子反应堆的俄国。”

据说这来自 1959 年 12 月 21 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纪念斯大林诞辰 80 周年会上的演说。

苏联文献中现在看到的最早引用此语的是尼娜·安德列耶娃。她在《我不能放弃原则》(1988 年 3 月 13 日《苏维埃俄罗斯》)一文中写道:

我们不妨举丘吉尔为例,他在 1919 年以自己组织 14 国武装干涉反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做出的贡献而自豪,而 40 年后又不得不以这样的语句来描绘斯大林——自己的最大政治对手之一:“他是一位给予我们这一残酷时期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在这一时期中他度过了自己整整的一生。斯大林是一个具有非常的精力和博学多才的人,他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管在工作中还是在交谈中,他总是一个尖锐的、强硬的和毫不留情的人,即使我这样一个经过英国议会培养的人也不能与之抗衡……在他的著作中有一股巨人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各个时代和民族领导者之中是无与伦比的……他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当他走进雅尔塔会议大厅时,我们所有的人就像得到口令似地全部起立。而且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都挺直身体垂手而立。斯大林具有处变不惊的、逻辑的和理性的高深智慧。斯大林是善于在困难时刻从最最束手无策的境况中找到出路的一位再好不过的巨匠……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之手消灭自己的敌人的人,甚至能使我们这些被其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帝国主义者作战。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

木犁的俄国，而留下的却是装备有原子武器的俄国。”

安德列耶娃没有标明出处。

几年后，丘耶夫同莫洛托夫谈话中，也记载了这段话：

“我朗读了英国首相 1959 年 12 月 21 日斯大林 80 诞辰之际在英国下院发表的一段简短的演说——译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伟大的独裁者，他接手的是木犁的俄国，留下的是拥有原子武器的俄国”。“这可是当时所谓的‘头号敌人’丘吉尔说的话。”^①

同莫洛托夫的谈话中这段话有明确的出处，说是丘吉尔 1959 年 12 月 21 日在英国下院的演说。

不过有资料称，1959 年 12 月 21 日英国议会根本没有开会，并且从 1959 年 12 月 17 日到 1960 年 1 月 26 日英国议会就没有举行过会议。所以，可以认定，丘吉尔在英国下院发表纪念斯大林诞辰 80 周年的演说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英国历史学家、原丘吉尔中心主任理查德·兰格沃尔德也驳斥过似乎丘吉尔曾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赞扬斯大林的神话。

关于木犁与原子弹的说法并非丘吉尔的原创（如果他确实说过此类的话），据我最近看到的资料，原创者是《托洛茨基三部曲》的作者伊萨克·多伊彻。

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发表后不久，亚·雅柯夫列夫的助手就写了一篇文章（《真理报》1988 年 4 月 5 日），指出：“她所引的对斯大林的颂词并非出自丘吉尔。不是这么回事，这是著名的英国托洛茨基分子伊·多伊彻说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引起注意。

斯大林逝世的第二天，1953 年 3 月 6 日，多伊彻在《曼彻斯特卫报》发表悼文，其中写道：

“斯大林的历史成就就在于，他接手的是木犁耕种的俄国，而留下的是原子反应堆装备的俄国。”

这个说法也写入了他的著作《斯大林之后的俄国》，更为重要的是，还写入了《不列颠大百科全书》中多伊彻撰写的“斯大林”条。其中写道：

这种怪异的崇拜之下是斯大林不容置疑的成就：他是计划经济的创始人，

^① 《同莫洛托夫的 140 次谈话》俄文版，第 72—73 页，新华出版社中文版，第 86—87 页。

他接手的是木犁耕种的俄国，留下的是原子反应堆装备的俄国，他是“胜利之父”。但他的成就伴随着专制和他的残酷独裁；他统治的家长制特征——或许适合文盲及落后的人的智力——在他自己缔造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俄国成为一个时代错误。^①

多伊彻撰写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2版中写道：

但是也得承认这样的事实：“斯大林在发现俄国的时候，它还在用木犁耕种，而当他离开它时，它已经装备了许多原子反应堆了。”对这句话，作者还特意加注说明：“这句话引自我对斯大林的悼文，发表于1953年3月6日《曼彻斯特卫报》。”^②

上引关于“木犁”的说法文字有所不同，这显然是转译造成的。

需要介绍一下伊萨克·多伊彻。这是波兰犹太人。18岁入华沙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加入波兰共产党，任党报的编辑。30年代初公开反对斯大林领导共产国际的政策，反对把社会民主党看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当作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敌人，认为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德共反希特勒斗争的失败。与此相反，他主张建立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被波共开除，波共官方的说法是“夸大纳粹的危险”，他本人称自己是第一个因反对斯大林主义被开除的共产党人。他是波兰著名的托洛茨基分子，但1938年却因不赞同托洛茨基建立第四国际，与托派官方拉开距离。1939年，德国占领波兰之前不久移居伦敦，担任《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作为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员，一度加入托洛茨基的“革命工人联盟”。战后同托洛茨基主义政治脱离关系，但仍然是托洛茨基的拥趸，主要从事学术活动，研究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1949年出了一部《斯大林政治传记》，由于此书，他被公认为俄国革命史和苏联问题的专家。接着，他于1954年、1959年和1963年出版了著名的托洛茨基传记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书中大量利用了当时没有公开的托洛茨基收藏的档案。据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时随身携带了约30箱的档案和书籍，这批档案1980年才解密，但多伊彻得到托洛茨基夫人的允许，得以利用这些档案。

① 《不列颠大百科全书》第21卷，1964年版，第303页。

② 多伊彻：《斯大林政治传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2页。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木犁的说法确系多伊彻的原创,发明权不属于丘吉尔。由于这是托派或者亲托派的多伊彻的话,所以“左派”安德列耶娃即使知道是多伊彻的原创,也不会直接标明,她需要丘吉尔这样的大人物赞扬斯大林的话来肯定斯大林,这从她接着就引另一位大人物戴高乐的有关言论也可以看出来,如果用了托洛茨基分子的话,那不仅缺乏公信力,而且也太有损“左派”的名声了!莫洛托夫倒是指出了译自《不列颠百科全书》,但没有指出具体卷次、条目,不知从何而来。由于此语一直被看作是对斯大林的赞颂,所以被一些喜欢斯大林的人多番引用,以致以讹传讹,流传至今。至于丘吉尔到底说过这类话没有,既然1959年12月21日英国议会没有开过纪念斯大林八十诞辰的会,那就需要到别处去找了,但愿有人有朝一日能够找到。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2月23日

“澄清”还是“搅混”

——有关斯大林的几个历史事实

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为姜长斌著《历史的孤独——早期斯大林新探》所写的书评中说过,关于斯大林的争论在本世纪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也就是说在21世纪还会争论下去。2003年是斯大林逝世50周年,俄国报刊出现不少有关斯大林的文章,既有为斯大林说好话的,也有继续否定斯大林的。这一事实说明斯大林仍然是个争议人物,对他的评价远没有盖棺论定。今年3月《参考消息》用《俄罗斯人对斯大林评价仍两极化》的标题转发了法新社的两条有关斯大林的消息。法新社报道说,眼下俄国掀起了有关斯大林是非功过的热烈讨论。当被问及听到斯大林的名字首先会想到什么词时,42%的人说,他们得到的是消极的印象:饥荒、恐怖、镇压和内务部劳改局。然而,仍有32%的人对这位苏联独裁者抱有积极看法:对纳粹德国的胜利、秩序、低价、工业化、帝国和骄傲。^①标题和所介绍的内容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最近读到吴恩远的学术综述《俄罗斯重评斯大林》^②,其中说:“近年来,俄罗斯学者和民众中涌现一股重新评价斯大林的思潮”,并且据说“为他恢复名誉完全成为有组织的行动”。

20世纪最后十年,由于苏联解体、苏共瓦解,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已经“不时兴”了,俄国出现了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缺失。为弥补意识形态的真空,叶利钦曾经试图创造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来维系整个国家,然而直到他下台,也没有看到俄国

^① 《参考消息》2003年3月2日。

^② 《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出现什么有组织的“国家意识形态”，各政党各派别都信奉各自的意识形态。同样，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重评斯大林的“有组织的行动”，那么是谁来组织的呢？当今的俄国谁会有力量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又有谁会服从这种“组织”呢？“自由的”俄国报刊什么都刊登，真理、实话、谣言、谎话什么东西都有——“言论自由”嘛！在“言论自由”的俄国，什么言论都会有，都可以在媒体上出现，你想要什么，喜欢什么，去找，准能够找到。要想证明什么“思潮”，什么“有组织”的运动，报刊上是不会缺少材料的。比如说，如果要证明目前“反斯大林思潮严重”，在俄国的报刊上就可以随手找到证明。今年3月我在网上就偶然读到《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斯大林于昨天去世》。^①报纸记者采访了一些作家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

记者提问：按照您的看法，1953年3月5日以后俄国的生活是否有了变化？此事对我国文学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B.沃伊诺维奇(作家)：

回答是显而易见的：起了积极作用。独裁者有个不良习惯——活得很长，但他们还是要死的。斯大林之死对国内生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几百万人从集中营中解放出来，千百万人摆脱了恐惧。可惜的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迄今没有摆脱奴隶的心态。当然他的死亡对新文学的产生起了巨大的作用，这在斯大林生前是无法产生的。我作为作家，是其中之一。

B.叶罗菲叶夫(作家和电视主持人)：

形势根本改变了。1953年3月以前，我们生活在不断枪毙人的古拉格群岛，每个人随时都会被消灭。从1953年3月起落入的是制度严格的集中营——区别是巨大的，已经不是那种恐惧了，不管怎么样总算得到了自由。说实在的，1953年3月帝国死亡了，以后是垂死挣扎……

只有那些喜欢生活在枪毙和鞭笞的环境之下、相信关于共产主义的幼稚概念的人，才会把斯大林的死亡看作是悲剧。而他的死亡是国家的机遇，这个国家已被他搞得濒临死亡。我们把暴君逝世50周年当作某种事件来纪念，这是一种耻辱。我觉得，他这样作践自己的人民，已经走上绝路。我走遍了全世界，没有看到过这种几乎被自己的统治者所消灭的人民，其中被消灭的有最优秀的人才，——而这个

^① <http://www.g.ru/fakty/2003-03-06>.

人民还继续爱戴和神化这个统治者。我们是个傻瓜国家还是怎么的？

……可惜，俄国的非共产主义化至今没有完成。大家都在等待鞭笞。

A. 普罗哈诺夫(作家,《明日报》主编):

斯大林逝世以后,确确实实地从此后的那几个小时起,苏联文明的航船急剧地改变了航线。开始改变航向:起初是改半度,然后是一度,最后是全方位。由斯大林实现并记载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上的选定的苏维埃文明,都被抛到大西洋去了。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回到了正常的人类发展的道路。

B. 索罗金(作家):

在生活中,斯大林的逝世表明,斯大林的宇宙毁灭了,在此体制所产生的百万小斯大林的心中毁灭了。在很多方面,60年代人感到委屈的是斯大林以自己的逝去夺走了他们的这个宇宙。总的说来,依我看,斯大林时代在文学上的反应还会长期继续下去。原因很多。为什么,这是清楚的。

T. 托尔斯托娅(作家):

是肯定的。这是幸事,我要庆祝这个事件,为斯大林不再存在,我要为俄国、为斯大林干杯。老不死的凶狠的瘦老头消失了,这是多大的好事!据某些史料说,他不是死于3月5日,而是3月1日——乌拉,春天来了,它带来了幸福!

我不想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有人反对,有人肯定,大千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

议论是各种各样的,有的是情绪化感想式的,有的是信口开河的,有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有的是对现实不满引起的怀旧情绪,有的是大国地位衰落想重温斯大林的强国梦,有的恢复了历史真实面貌,有的在制造新的神话……这就需要我们的历史学家做出认真的分析,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

涉及的问题太多,如果要一一解释,恐怕需要写一本专著。吴文第二节在“关于斯大林的某些历史事实的澄清”的标题下列举了一些所谓澄清的事实。本文仅举几个涉及斯大林的历史事实作为例子来看看到底是“澄清”还是搅浑。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吴文引用一种说法: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夕领导党的武装起义中心——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是十月革命的具体操作的领导者”。

这是一个早就清楚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时候，斯大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叫《十月政变》，刊载在1918年11月6日的《真理报》上。文章写道：“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驻军很快地转到苏维埃方面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巧妙地安排工作，党主要和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和波德沃伊斯基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①这段话把谁是“具体操作的领导者”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这显然不是斯大林的谦虚，而是历史的真实——这是十月革命一周年写的，人们不会那么健忘。当然，斯大林后来后悔了，所以在文章收入《斯大林全集》的时候把有关段落删除了。不仅如此，中央编译局收藏的这一天的《真理报》干脆剪掉了这篇文章。

20年代出版的《列宁全集》第一版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也给我们提供了佐证，其中写道：“在彼得堡苏维埃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以后，[托洛茨基]当选苏维埃的主席，作为主席组织和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义。”^②

那么斯大林在起义过程中做了些什么，起过什么作用呢？1917年12月24日上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形势，安排当天各中央委员的任务，实际上是一个部署起义的会议。有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等11人与会，但没有斯大林。这天早上克伦斯基下令封闭《工人之路报》，所以中央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印刷厂和报纸问题，做出决定：“立即派卫队去印刷厂并设法及时出版当天的报纸。”^③据《斯大林传略》材料看，斯大林这一天应当在《工人之路报》即《真理报》编辑部，抵抗临时政府查封报纸的行动，保证《工人之路报》的出版。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斯大林在24日的活动。不管《工人之路报》多么重要，毕竟仅仅是起义中的一个环节，掌握和控制起义工作全局的第一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二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曾经成立一个“军事革命总部”。关于此事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是这样写的：“中央委员会单独开会并通过下述决定：中央委员

① 见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10—311页；《斯大林伪造学》，柏林1932年俄文版，第2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俄文第1版，第482页。

③ 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СДРП/б/. Москва. 1958, с.119—121.

会组织军事革命总部,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洛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组成。此总部加入革命苏维埃委员会。”^①“革命苏维埃委员会”应是指“彼得堡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决议没有指定总部由谁领导,如果按照名单排序,则为首的应当是斯维尔德洛夫,无论如何不会是后来常说的斯大林。这个总部做了些什么工作,谁也不知道。因为关于它的活动后来没有任何记载,在24日上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也没有提及这一总部。

在1967年出版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文献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起义期间的斯大林。他第一次在军事革命委员会出现是在10月31日,这时起义已取得胜利。起义期间他的名字在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在军事行动文献中都没有提到过。^②《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的作者沃尔科戈尔诺夫写道:我所查阅过的有关十月革命的这些历史性的日日夜夜的档案资料中,没有一份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以斯大林当时所处的地位,以编辑部领导人的地位,决不可能是“十月革命的具体操作的领导者”。过去人们关于十月革命只知道两个领袖——列宁和斯大林,现在再重复这种“神话”已经无法让人相信了!

斯大林是进军华沙的“唯一的”反对者?

1920年4月波兰军队向苏俄进攻,占领了基辅。5月红军开始反攻。7月底进入波兰领土,逼近波兰首都华沙。这次进军华沙不仅仅是一次反攻的军事行动,而且是世界革命战略的直接产物。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包括列宁在内,希望通过进军华沙,打开一个把革命推进到西欧的缺口和通道,这是输出革命的一次尝试。但是由于对波兰人民的情绪估计错误,红军各部队配合不协调,进军行动以失败告终。

吴文中有一种说法:“斯大林是唯一一个反对红军进军波兰的人。”

这种说法的根据大概出自斯大林本人。1920年9月23日斯大林在俄共第九

① 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СДРП/6/.Москва. 1958, с.104.

② 见 Историки спорят. М., 1988. с.9.

③ 沃尔科戈尔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次代表会议上有一个关于个人问题的说明。其中提到,托洛茨基说他用玫瑰色描绘进攻华沙前的前方形势,此话不符合实际情况。斯大林说:“恰好相反,我几乎是唯一在报刊上嘲笑‘向华沙进军’命令的中央委员。要证明我这声明的确实性,只要读一读我在《真理报》上的几篇文章就够了。”^①

“几乎是唯一”的,并非就是“唯一”的。看来斯大林曾反对进军华沙是事实,但不是唯一的反对者,当时表示反对的还有一些人,如对波兰比较了解的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捷尔任斯基,而在高级领导人中还有托洛茨基。

多伊彻的《武装的先知》中介绍过当时领导人对进军华沙的不同态度。多伊彻写道:拉狄克、马尔赫列夫斯基、捷尔任斯基曾警告政治局,红军的入侵会因波兰的爱国情绪急剧高涨而被挫败。托洛茨基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一警告所起的作用。托洛茨基认为,如果不预先提出媾和建议就命令红军向华沙挺进,就会破坏俄国革命与波兰人民的友好关系,就是做对皮尔苏茨基有利的事。然而,列宁受乐观主义的鼓舞,相信红军的挺进会成为在波兰爆发革命的信号,他的意见支配了政治局。就连本来清醒地不考虑进军华沙这一意见的斯大林也改变了立场;因而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托洛茨基一人了。^②

托洛茨基本人在《我的生平》中也提到此事,他写道:“当我在莫斯科做例行逗留期间,我发现中央有一股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强烈情绪。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波兰人已经求和了。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胜利的顶点,要是不顾自己的力量,继续进攻,就可能丢掉业已取得的胜利,走向失败。”^③

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闻》谈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进军华沙的态度:柯巴(斯大林)渴望回到莫斯科,反对“某些同志不满足于保卫我们的共和国……这些人傲慢地宣称,只有‘苏维埃华沙红旗飘’,他们才罢手”。托洛茨基也反对战争,他知道,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可是列宁坚定不移。^④

斯大林本人的最后态度如何?在1920年9月召开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有一个简短的发言,表示完全赞同进军华沙的方针。他说:“我认为基本

① Девя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КП(б). Протоколы. М.1972. с.82.

② 伊·多伊彻:《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509页。

③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赵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

④ 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

问题是在今年8月中旬我国所处的局势下进攻的不可避免性问题。”他指出当时存在三个事实，一是寇松的照会，要求我们接受英国的调停，停止向前推进。其次，英国和德国革命运动高涨。最后，我们的军队在西南和西方战线向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接受寇松的建议，就会给波兰和整个国际资产阶级提供喘息的机会。毫无疑问，中央应当做的首先是检查我们的战线状况。中央发出询问，并于8月中旬收到电报，说我们将在8月16日拿下华沙。此报告来自权威的负责人，等于增加了一个砝码，使中央的观点倒向继续进攻性战争。斯大林说：

我必须声明，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如果采取另一种政策，那它就不是革命的中央。……我认为，在这种局势下中央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而如果说其结果是我们打败了，那只是因为战略上没有看准形势，在某种程度上使中央陷入窘境。^①

斯大林的发言是在对波战争失败之后不久，其所言应当是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看法的。

至于列宁的态度，那么他从来没有隐瞒对波战争中自己和俄共中央决策中的错误，他多次公开谈论决策时对波兰人民的情绪估计不足。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制革业职工代表大会上说：“当我们逼近华沙城下时，我军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乘胜前进了；可是，波兰军队在华沙城中爱国主义热诚的鼓舞下，感到自己是在本国作战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进攻的可能。结果是……在决定性的关头我们的力量不够了。”^②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说，“我们在进攻时推进得太快了，几乎打进华沙，这无疑犯了错误。……犯这个错误是由于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的优势。”^③列宁从没有因为维护什么个人威望而隐瞒事实真相。今天再说什么“斯大林为了维护列宁的声望，从此不再提起这件事”，不免让人觉得好笑！

据一些史书的记载，红军作战行动存在协调配合不好的问题。其中就有斯大林应负的责任。斯大林是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8月2日政治局决定，把西南方面军的克里木地段划分为独立的南方面军。总司令要求把第十

① Девят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КП(б). Протоколы. М. 1972. с.60—62.

② 《列宁全集》第39卷，第31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第7页。

二集团军和布琼尼的骑兵第一集团军转交西方面军,由图哈切夫斯基指挥。斯大林拒绝在转交的指示上签署。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直到8月20日才从利沃夫方面撤出骑兵第一集团军,但它已经来不及给西方面军援助了。斯大林有自己的计划,他打算趁图哈切夫斯基进军华沙之际,夺取利沃夫,随后再从利沃夫袭击华沙,然后急行军,穿过奥地利,直捣德国,支援革命。^①这一点,斯大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只字未提。

这是批判布哈林吗?

吴文援引一种说法:“斯大林坚决反对大俄罗斯主义,同时他也有勇气公开反对‘仇俄、憎俄’思想。如在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中,1923年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不顾当时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布哈林是其同盟者,公开反对布哈林的‘仇俄’思想。在1945年庆祝卫国战争胜利的祝酒词中,斯大林发表了对俄罗斯民族热烈赞扬的讲话。”

说布哈林有过“左倾”、“右倾”,多少有点根据,但说布哈林“仇俄、憎俄”则是无稽之谈。斯大林在党的十二大上的言论是批布哈林吗?不妨看看历史事实。

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围绕民族问题在俄共党内有过尖锐的斗争,争论的主角是列宁对斯大林。此前,在处理格鲁吉亚问题和成立苏联的原则问题上,斯大林所暴露出来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受到列宁的多次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两点:1.“自治化方案”——斯大林主张各独立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自治共和国。列宁认为此方案有违民族平等原则,表现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2.以粗暴的压制手段(甚至动手打人)对待在加入俄联邦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人。列宁为此要求处分奥尔忠尼启则,要“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我不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坚决反对过大俄罗斯主义。

作为俄罗斯族人,列宁对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对待少数民族上的不公平、不平等的做法深有感触。他写道:“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觉察。”因

^① 见《胜利与悲剧》第107页;《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85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99页。

此列宁主张,国际主义(族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可以看出,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列宁反复强调要矫枉过正,宁可过些,而不要不足、不到位。这是列宁在1922年年底值苏联成立之际抱病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①这封信是为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1923年3月5日列宁把此信以及有关民族问题的其他资料送交托洛茨基,委托他在大会上为格鲁吉亚人辩护。列宁本人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但通过秘书把信送到了大会。

俄共十二大讨论了民族问题,托洛茨基没有完全负起捍卫列宁观点的责任,倒是布哈林在会上起来捍卫列宁的立场,坚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他说:“列宁主义在我们民族问题上的实质首先在于同我们现存的基本的沙文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如果俄罗斯人采取不正确的路线,那么其他民族例如格鲁吉亚也会跟着采取民族主义路线。他发挥列宁的观点说,在这里甚至不能以民族平等的观点作为出发点,相反地,“我们作为前大国民族应当制止民族主义的要求并在对民族潮流做更大的让步的意义上使自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只有在这种制止政策下,只有在我们有意使自己处于比其他民族更低的地位这种政策下,只有付出这种代价,我们才能换取过去被压迫民族的真正信任”。他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当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不是说不存在地方民族主义,而是应当打击主要的敌人,否则“就是执行一种不正确的政策”。他解释说:“为什么列宁同志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花这么大的劲提出警告?为什么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信中只字未提倾向分子的错误,反而用长达4俄尺的文字去反对那种反倾向分子的政策?他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不知道存在地方沙文主义吗?或者是因为举不出十个有分立倾向的县吗?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列宁同志是天才的战略家。他知道应当打击主要的敌人,而不是折衷地把各种色调调和在一起。”他最后宣布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不把同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放在首位,如果我们不动员我党的所有基本力量去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9—355页。

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不打击它,那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列宁同志在这里,他会把俄罗斯沙文主义者痛骂一顿,使他们十年不忘。”^①针对斯大林所说的只有本民族的人才可以反对本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说法,作为俄罗斯族人的布哈林声明:“我们亲爱的朋友柯巴不那么尖锐地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他以格鲁吉亚人的身份反对格鲁吉亚沙文主义,这我理解。……请允许我来反对俄罗斯沙文主义。”^②

斯大林在《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的结论》中针对布哈林的说法说:“有人对我们说,不能委屈少数民族。这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这一点,不当委屈少数民族。但是如果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说必须使大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对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那就是胡说八道了。在列宁同志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只是文字上的一种表现方法,布哈林竟把它变成了完整的口号。”^③

比较一下列宁和布哈林的说法,布哈林的所有说法几乎是逐字逐句照搬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上的话。如果说布哈林是在宣传“仇俄、憎俄”思想,那怎么概括列宁的观点呢?很清楚,斯大林这里批驳的不是布哈林,而是列宁。正是列宁用了半年的时间,尽了他病中的所有力量去反对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既使斯大林感到严重的不安,也使斯大林感到愤怒,他需要发泄的对象,布哈林正是个合适的目标!

列宁曾经强调指出:“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④正是斯大林这个俄罗斯化了的格鲁吉亚人根本没有听进列宁的忠告,哪怕减少一点“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所以在卫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斯大林无视苏联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流血牺牲才换来伟大胜利这一事实,单为俄罗斯人祝贺,称赞俄罗斯人是“加入苏联的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⑤。与此同时,借口有人背叛,而惩罚整个民族,用暴力把苏联国内的某些民族整个迁移到边远地

① 《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公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3 年俄文版,第 464—467 页。

② 同上,第 467 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 5 卷,第 214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51 页。

⑤ 《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428 页。

区！这种言论，这种做法，哪里还有列宁主义的东西！

至于吴文说“斯大林主张建设联邦制的国家，列宁主张建立联盟形式的国家”，简直不知所云。“联邦制”与“联盟形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同“联邦制”相对的是“集中制”或者“单一制”，而不是联盟。革命前列宁是反对“联邦制”的，后来鉴于俄国的现实情况，改变主意，主张实行“联盟”制或者“联邦制”。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不是联盟制同联邦制的分歧，而是斯大林主张各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自治共和国，而列宁反对这种做法，主张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等共和国上面“再建一层新楼”即苏维埃共和国联盟，俄、乌等国都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这个联盟。所以准确的表述应当是，斯大林反对联邦制或者联盟制，而主张建立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这正是列宁当年所反对的。

列宁是主张民族自决权的。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设想让乌克兰人尝试各种制度，“比如说他们在若干年内既实际试一试同俄罗斯联邦合并，又实际试一下与它分离而成一个独立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又试一下同它结成各种形式的亲密联盟，如此等等，即使出现这样的前景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也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恐慌”。^①称赞斯大林的人也许忘记了1936年通过的“斯大林宪法”，这部宪法继续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当有人建议从宪法中删去这一条时，斯大林反驳说：“如果把关于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这一条从宪法上删去，那就违反了这个联盟的自愿性质。我们可以同意这个做法吗？我认为不可以而且不应当同意这样做。”^②在这一点上把列宁同斯大林对立起来，肯定斯大林，否定列宁，把苏联的解体归罪于列宁主张的联盟制难道不荒唐吗？

有人非常欣赏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学”。什么是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学”？对此本文不可能作详细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苏联继承的大体上就是沙俄的地缘政治，虽然在十月革命后让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出去，因而版图有所收缩，但正是在斯大林任上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又扩大了国家的版图。这里仅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看看斯大林的地缘政治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牺牲波兰民族的利益，同希特勒德国共同瓜分波兰，这就是凭借军事力量割取芬兰土地，这就是并吞独立的波罗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1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12页。

的海三国,这就是让中国最终失去外蒙古!二战以后苏联获得了从欧洲到亚洲的约7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①苏联在打败日本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斯大林在告人民书中宣称这个胜利是自1904年俄日战争失败以来,俄国为洗刷历史的污点苦苦等待40年才盼来的胜利时②,他洗刷的不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的领土上同日本打仗、侵略中国的污点,而是在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非正义战争中失败的“污点”!在超级大国地位沦落的今天,俄国某些政党和人士怀念昔日的“辉煌”,打出“强国主义”的旗号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对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货色中国人是不应当为之喝彩的。

一段令人不解的译文

吴文写道:

著名牧师德米特里·杜普科说道:“斯大林就是我们的上帝。他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他保卫了俄罗斯,并向全世界证实了它的价值。甚至我们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也把他称为上帝似的领袖。当他逝世时全俄东正教都为他祈祷。”

一个东正教牧师怎么会把斯大林叫作“我们的上帝”,尽管斯大林上过神学校。如果这样,这位牧师本来的上帝到哪里去了?这段话的俄文是:

Богоданным вождем “ называл Сталина известный священник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деятель о. Дмитрий Дудко. У него есть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ые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Сталине. В 1995 году он писал: ”Да, Сталин нам дан Богом, он создал такую державу, которую сколько не разваливают, а не могут до конца развалить... Да, Сталин сохранил Россию, показал, что она значит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Наши Патриархи, особенно Сергей и Алексей, называли Сталина богоданным вождем... Сталин с внешней стороны атеист, н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 верующий человек... Не случайно в Русской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и ему пропели, когда он умер, даже вечную память.

①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9页。

② 见《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37—438页。

这段话的大意应当是：

著名的神甫和社会活动家德米特里·杜普科把斯大林叫作“上帝赐给的领袖”。关于斯大林他有很有意思的想法。1995年他写道：“是的，斯大林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他建立了这样一个强国，尽管它正在瓦解，但不会彻底解体……是的，斯大林保存了俄国，展示了它对全世界的意义……我们的大牧首，特别是谢尔盖和阿列克谢，把斯大林叫作上帝赐给的领袖……斯大林表面上是无神论者，实际上是信教的……不是偶然的，当他逝世时俄国的东正教教堂甚至为他唱永生曲。”

按照俄文原意，斯大林不是“上帝”，而是上帝赐给的领袖！他建立的国家不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崩溃的国家”，而是“正在瓦解，但不会彻底解体”的国家。

不知道其他引文是否需要核对原文，至少这段话如果不看俄文是无法理解的。

社会现象是复杂多样的，对同一个问题，同一个人物出现截然不同的评价并不奇怪。一种看法或者论断要在复杂多样的社会里找到例证也并不难。问题还是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哪些是合乎实际，符合历史事实的，哪些是虚妄的，臆造的，这是一个历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职业道德的起码要求。

《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2期

斯大林“热”及其误读

近年来有人说俄国出现“有组织的重评斯大林”，其实这是对近年俄国出现的斯大林“热”的误读。我和一些同行问过俄国的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多位学者：在他们国家是否出现“重评斯大林”的热潮？回答都是否定的。

不过，俄国确实出现了某种斯大林“热”。究其原因，有下列几点：

首先是同连续出现的纪念日有关：2003年是斯大林逝世50周年，2004年是斯大林诞辰125周年，为此俄国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谈论斯大林的功过。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二战的胜利自然离不开主角之一的苏联和斯大林大元帅。

其次，还有社会心理原因。苏联解体后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社会秩序混乱，社会福利减少，生活艰难，贪污腐败盛行，引起各阶层的不满。这就引发对故去大国地位的怀念，对低水平平然而普遍的社会福利的怀念，对以前相对廉洁的社会的怀念。此外还有对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怀念，由于苏联的解体，许多家庭变成了“一家多国”，亲戚来往成了国际交往，平添了许多困难。这一切都引发了人们对斯大林时代的记忆。而人们的记忆往往是记住好的，忘记坏的。人们的习俗也往往是对逝者多说好话，少说坏话。在国力衰落，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人们一直希望有一个像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来重振河山。

这些现象在民意调查中得到一定的反应，因此我们看到有不少被调查者说斯大林的好话。例如去年尤里·列瓦达分析中心在斯大林诞辰125周年前夕公布的材料表明，29%的人认为，不管他有多少过错和罪行，最重要的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21%的受调查者认为斯大林是一位“英明领袖”，使苏联走向强大和繁荣。有16%的人认为，“我们的人民少不了斯大林这样的领袖，迟早将出现

一位斯大林式的人物,建立起秩序”。只有31%的俄国人认为斯大林残酷,是没有人性的暴君,是造成数百万人丧命的罪人。

不过民意调查反映的只是民众的一时情绪和看法,是即兴发表的意见,而不是科学的研究结论。正因为如此,其提供的数字并不稳定,是不断变动的。可姑妄听之,但代替不了科学研究的结论,否则一个人物的评价就可以看民调或者由选票来决定。例如有民调说斯大林甚至是比列宁还伟大的人物,能相信吗?

当前的俄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各种意见、看法都可以自由表达。有反斯大林的报刊,也有为斯大林辩护的报刊,甚至有专门的“拥护斯大林”的网站,反斯大林的文章和为斯大林辩护的文章都可以看到。有人反对,有人赞扬,这本来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把肯定斯大林的言论收集在一起,说俄国出现“有组织的重评斯大林”的现象,就未免牵强。试问,在“言论自由的”俄国,目前谁有力量和本领去组织“重评”斯大林?有学者指出,当局同右翼和左派都保持同样的距离,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他们不感兴趣,他们是非常实用主义的。

对各种言论应当持分析的态度。例如《参考消息》(2004年12月24日)刊登的一篇题为《政权党领袖呼吁重新看待斯大林》的文章报道,俄国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认为,对斯大林的态度应该改变,因为“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做了大量工作,是雅尔塔、德黑兰等地举行的会谈的领导人,因为这些会谈才有了第二战场的开辟”。不难看出,他这里涉及的仅仅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而不包括斯大林的全部,格雷兹洛夫说得很清楚:“在国内政策方面他所采取的那些过激行为并不光彩。”至少这里看不出是全面重评!

《参考消息》对这篇文章的报道是不全的,还有误译。报道说:“要求重新评价斯大林历史作用的呼声在俄国政治家和百姓中引起了震动。”这句话准确的翻译应当是:“政治家和俄国公民要求这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作用确实使专家感到震惊。”是使专家感到震惊!接着是几位专家的评论。独立议员弗·雷日科夫评论说:“这完全是发疯。”他说,“社会的多数人有权持错误的观点,但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的”。“抓住”斯大林时代的稻草,只能更快地沉到水底。高等经济学院学术领导人叶·亚辛持同样的立场:“斯大林的形象越来越远地走进历史了。人们记住好事,忘掉坏事。这是人类心理的特性。人们只是评价当今周围所做的东西,而较为宽容地对待过去的事。对人民来说,斯大林首先是战争的胜利。”“至于把几百万人

‘投入’泽劳弗高地^①(关于非战争时期的其他牺牲者,我就不讲了),这说明在我们这里人的生命是不怎么值钱的”。

前两年俄国出版了轰动一时的卡尔波夫的《斯大林大元帅》一书。此书今年有了中译本。中新社报道说,这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客观地记述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著作”。实际上,这本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作家的政论性的著作,许多论断缺乏根据。举一个例子,作者把十月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直至20年代的一段时间写成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苏联的政局,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斯大林的斗争。这样解释历史能叫全面客观吗?

前些时候在我国电视台看到一个有关卫国战争的纪录片,解说员说,普京已经下令把伏尔加格勒城恢复旧名“斯大林格勒”,还就此发了一通议论。实际情况是,红场旁边离无名烈士墓不远有一个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塔,塔上列有英雄城市的名字,过去写的是伏尔加格勒,为历史真实,恢复为“斯大林格勒”。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举措,并不涉及重新评价斯大林。为纪念亚尔达会议,有人建议搞一个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雕像,有人就认为要重塑斯大林的金身,为他恢复名誉了。实际上,这不过是纪念二战的一个举措罢了。

当然,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是历史学家的一个长期课题,需要历史学家以及有关专家根据历史事实,依据可靠的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的客观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较为符合历史的结论。俄国、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学者都在做这件事,出了不少著作,但离得到大家认同的结论还早。例如莫斯科历史学家茹科夫在一本专著中提出一个论断,说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曾经想搞“自由化”,使共产党同政府和经济管理分开,实行普遍平等秘密的差额选举制,等等,还说那时存在一个所谓“线球”(клубок)阴谋。对此学者反应谨慎。一方面否定“自由化”的可能性,同时认为对“阴谋”的说法,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需要依据事实研究。

归根结底,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只有历史才能作出最后的裁决。

《学习时报》2005年12月5日

^① 泽劳弗高地是柏林战役中争夺激烈的据点,苏军伤亡达361367人,是历次战役中牺牲人数最多的。

一本谬误百出的“奇书”

——《大元帅斯大林》略谈

最近,读了俄国作家卡尔波夫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大失所望。这本书并非像有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对斯大林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实际上是一本继续制造斯大林神话的“奇书”,书中谬误百出,并且问题还不仅仅涉及斯大林,它甚至涉及整个苏联历史,如果书中的种种论断和说法能够成立的话,一部苏联历史恐怕就不得不改写了。这里仅列几点。

1. 是列宁提拔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个职务的吗?

作者认为,是列宁提拔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这个职务的。他这样说的目的自然是要证明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是“列宁的继承人”。这是恢复《斯大林传略》和《斯大林全集》注释中所编写的神话。俄共十一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是加米涅夫主持的,各种资料说明,不是季诺维也夫就是加米涅夫在会上提名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的。而当时的总书记也不是党和国家的第一把手,不具备后来的重要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在1923年1月4日的信中明确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至于列宁要同斯大林断绝关系,那就不用提了。

2. 列宁患病,是托洛茨基主宰政治局吗?

书中说:“由于列宁患病,托洛茨基主宰政治局。”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列宁卧病期间和去世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政治局的是“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事实上,托洛茨基始终没有能够“主宰”政治局。不过

列宁在患病期间,对托洛茨基确实非常倚重,在维护外贸垄断、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等问题上,列宁多次请托洛茨基出面维护他(列宁)的立场。

3. 战胜“犹太复国主义”是斯大林的“另一伟大功绩”?

在这部书中,作者认为斯大林有两大功绩:一是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一是击败了犹太复国主义。关于第一大功绩即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这是公认的,但是对于后一大“功绩”,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作者在书中为俄国革命编写了这样一个“新说法”: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资助和派遣犹太人托洛茨基回到俄国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托洛茨基不负众望,不仅打入布尔什维克党,而且在苏维埃政权中爬到第二把手的位置,把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变成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多亏斯大林看穿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拯救了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内斗争乃是一场斯大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

我们见过歌颂斯大林伟大功绩的N种说法,但是作者把所谓斯大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同反法西斯战争相提并论,歌颂斯大林“战胜犹太复国主义”的伟大功绩,并且认为其意义等同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这还是第一次。斯大林确实同各种反对派进行了无情的残酷的斗争,但是像作者在书中所描绘的这种斗争,恐怕斯大林本人也不会认可,至少在《斯大林全集》中是找不到这种说法的。

4. 存在所谓“列宁时代确立的传统”吗?

作者写道:“根据列宁时代确立的传统,政治局会议都是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加米涅夫主持。”这个说法同样不符合事实。列宁生前政治局会议是由列宁主持的,但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是他的不言而喻的在党内的领袖地位。那时如果列宁缺席,则由加米涅夫主持政治局会议,加米涅夫当时的职务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从来没有担任过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逝世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可夫,但没有资料说明他主持过政治局会议。可见并不存在这种所谓“传统”。

5. 斯大林是列宁葬礼告别仪式上的第一人？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作者写道：由于托洛茨基没有回来参加葬礼，“斯大林就成了与党的领袖告别仪式上的第一人。虽然在此之前托洛茨基比斯大林更有声望。”“1月26日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史称‘誓言’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成了独特的党的纲领性文献和斯大林毕生的个人誓言”。卡尔波夫关于斯大林“宣誓”的评价是后来炒作的结果。查1924年1月27日的《真理报》，上面刊发了关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追悼会的消息，依次报道了会上各人的讲话：加里宁（会议主席）、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蔡特金的讲话摘要，最后是加米涅夫的讲话全文，斯大林的讲话只用几句话一带而过，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直到1月30日，才把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各人讲话全文公布。每个人的讲话都只代表自己，斯大林的讲话也不例外。可以看出，这时候斯大林还不是“告别仪式上的第一人”。斯大林的誓言共6条，至少最后一条所说的“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斯大林并没有做到，他亲手解散了共产国际！

另外，书中其他地名、史实方面的错误还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新编”俄国革命史、苏共党史，在当今的俄国一度成了“畅销书”，而在我国也被说成是“迄今为止比较全面客观地描写斯大林的作品”。

读书无禁区，像《大元帅斯大林》这样的书是可以翻译出版的，奇文共欣赏，相信读者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但是舆论的引导应当有分寸，应当是科学的，合乎实际的，不要去误导读者。不要一看到说了斯大林的一些好话，就认定是好书，因为苏联的历史，除了斯大林毕竟还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

《北京日报》2006年7月3日

托洛茨基、斯大林及其他

——有关苏联史的几条知识

《同舟共进》2015年第2期刊载了两篇涉及苏联历史的文章，一篇谈斯大林的妻子之死，一篇谈托洛茨基之死，内容都不错，但涉及苏联史的几个地方有误，需澄清一下，不为批评，只为普及一下苏史知识。

十月革命中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装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说“他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有点过头了。举行十月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者是列宁，隐蔽在地下的列宁从1917年的9月起就不断催促党中央发动武装起义。列宁的倡议，在党内遇到严重的阻力，尤其是两名重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顽强反对举行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原属区联派，1917年7月与布尔什维克派合并，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缺席当选中央委员。七月事变后不久托洛茨基被捕，粉碎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后获释出狱，并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党控制了苏维埃，他在苏维埃下设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着手具体组织武装起义事宜，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军事革命委员会是十月武装起义的具体组织和指挥机构，在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因为如此，宣布推翻临时政府的《告俄国公民书》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公布的，其中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①所谓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1页。

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实际上并不存在,是斯大林在 1924 年伪造的。列宁是 10 月 24 日晚上到达领导起义的指挥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的,而起义工作在 24 日早上已经开始,早上召开中央会议做出起义的具体部署,分派各中央委员到各关键部位领导起义工作。这时候原先反对起义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转过来参加起义工作,24 日早上召开的中央会议就是加米涅夫主持的。斯大林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据说是在《真理报》编辑部。斯大林在纪念十月起义胜利一周年的《十月革命》文章中高度评价了托洛茨基的作用:

起义的全部实际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

这篇文章载于 1918 年 11 月 6 日的《真理报》,后来此文收入《斯大林全集》第 4 卷时上述评价被删去,中央编译局所藏的《真理报》刊载的此文也被剪去,所以复印的这天《真理报》就开了天窗。这完全像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真理部的所作所为。文字可以删去,但实际事实是抹杀不了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列宁的决策就不会有十月武装起义,而没有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具体实施,也不会有十月武装起义的胜利!

顺便说一下,斯大林这篇文章的篇名为“Октябрьский переворот”,《斯大林全集》中文版译作《十月革命》,如果直译,应是《十月政变》。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对十月革命一般都用 переворот,而少用“革命”的说法。现在俄国的一些史书,也把十月革命叫做 переворот,而不用“革命”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就都成了“十月政变”。

托洛茨基和新经济政策

1921 年 3 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废除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开端。所以说托洛茨基“是 1924 年新经济政策的最早提出者,使千百万人免于饿死,从经济上挽救了濒临崩溃的苏维埃”并不符合事实。第一,新经济政策并非 1924 年开始的,第二,托洛茨基也不是 1924 年新经济政策最早提出者。不过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不着边际。1920 年 2 月,托洛茨基到西伯利亚考察后,

给中央提出一个近似后来的新经济政策的建议：

1.用按一定比例的扣除(一种累进所得实物税)取代没收余粮,以利于增加播种面积或者更好地耕作。2.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缴纳的粮食量之间要有更为恰当的关系,不仅按乡和村,并且还应当按农户计算。

这就是说,用赋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同时用工业品去换取农产品。托洛茨基写道：

“无论如何,目前按照粮食定额平均征收的政策、征购时的连环保制度和工业品的平均分配政策,显然造成了农业生产下降、工业无产阶级涣散,有使国家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

不得不佩服托洛茨基的远见卓识,后来实施新经济政策的主要论据和基本措施就是托洛茨基所说这几条。整个国内战争,托洛茨基主要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比较接地气,对地方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并不奇怪。不过当时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多数还没有认识到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托洛茨基的建议以 11 票对 4 票被否决。一年以后,在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党才匆匆通过决定,废除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制度,从此开始了新经济政策。

如果说得更全面一些,那么最早提出废除粮食征收制的还不是托洛茨基,而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这就说远了,就此打住吧。

斯大林的职务

说斯大林“由民族人民委员升任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是不确切的。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内的职务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党内的职务是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1922年4月又当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由于担任了总书记,为使他集中精力处理党务,就免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职务,但仍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至1923年。当时的总书记职务并非后来党的第一把手,只是书记处的头,而书记处的任务是落实和监督检查政治局的决定的执行以及处理其他日常党务工作。所以担任总书记谈不上“升任”,根据后来总书记为第一把手的情况判断斯大林为“升任”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不过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结果是,他一人在党内同时担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

三个重要职务,这是空前绝后的,就如列宁所说的“掌握了无限权力”!这也使他后来在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斗争中能够取得节节胜利!

列宁生前,党内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头。列宁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是政治局委员,其地位与其他政治局委员相同。政治局会议由他主持,在他因病或其他原因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则由加米涅夫主持政治局会议。有人说,按照惯例,政治局会议由人民委员会主席担任,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惯例。列宁去世后,李可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政治局会议在一段时间内仍由加米涅夫主持。

彼得堡改名的历史

文章提到彼得堡,作者加注说:1917年3月改称彼得格勒。这里把改名的时间弄错了,改名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建城后起的名称,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这个词中的“堡”(бург)来自德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德开战,德国成为敌对方,所以1914年8月18日决定把市名改为彼得格勒(Петроград),град是俄语“城”的意思,这一改彼得格勒就是纯粹俄罗斯的名称了。1924年列宁逝世,为纪念列宁,1924年1月26日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前夕,1991年9月26日恢复旧名称,叫圣彼得堡,从而完成了该市名称变迁的一个轮回。

苏联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名称

苏联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经常被弄混。如说“1922年,列宁重新审查了联共(布)中央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事件”,“斯大林……升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这里所说的“联共(布)”和“苏共”都不准确。1922年既不叫“联共(布)”,也不叫“苏共”,而是叫“俄共(布)”。

苏联共产党1898年成立的时候取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两大派:多数派称布尔什维克,少数派称孟什维克。两派分分合合,共处于统一的党内,直到1917年。事情并非像《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那样,在1912年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成为独立的政党了。

1917年7—8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在党的名称“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面加写“布尔什维克”，以区别于孟什维克的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党才成为独立的政党。孟什维克党依旧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不过列宁早在1917年的《四月提纲》中就提出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的建议，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称号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并且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世界各地都背叛了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应再叫‘社会民主党’，而应改称共产党”^①。1918年3月召开的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后面继续在括号内加写“布尔什维克”字样，即“俄国共产党(布)”。

1922年底苏联成立。与苏维埃联盟相应，1925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俄国共产党改名为“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

1952年10月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苏联共产党”。这个名称一直用到1991年苏共解散为止。

苏共名称的变化一般人不清楚，容易弄混。最简单的办法是从它成立到解散都称之为“苏联共产党”，这不会错，也行得通。当然专业论文和著作还是应当按不同时期的名称称之。

《同舟共进》2015年第5期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6页。

托洛茨基生平思想略论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至少有两个人是迄今没有得到盖棺论定的，他们作为对立的矛盾体，生时不共戴天，死后也未得到公认的论定。这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

托洛茨基其人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在 20 年代初，他曾被当作俄国革命的领袖介绍给中国，那时候，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并提的。托洛茨基有关文学艺术的论述对我国进步的文艺界有过很大的影响，鲁迅案头就有他的《文学与革命》。后来由于在联共党内斗争中托洛茨基失败并被驱逐出境，在苏联 30 年代的“大清洗”浪潮中举行了三次大公审，每次都同托洛茨基挂上了钩，托洛茨基的名字就直接等同于反革命了。中国有一批留学莫斯科的学生，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这些人成了中国的托派分子。本来这是革命方针路线方法的分歧，但那时康生给他们加上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津贴的罪名，中国的托派成了日本的特务。这样一来，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托派就统统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旦发生分歧和争论，最简便的办法之一就是指责对方为“托派”。赫鲁晓夫当年就想给中国戴这顶帽子。一个政治人物，政治流派变成了一个政治术语或一顶“政治帽子”的时候，人们对其真正内涵倒不关心了，反正信手拈来，随手抛出，就可以“克敌致胜”了。托洛茨基到底何许人？他的真正观点是什么？如果他有错误的话，他的真正错误又何在？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很少有人能说得清了。苏联是托洛茨基的故乡，那里对托洛茨基批得最厉害，在二三十年代苏联出现的任何问题、任何错误都可以甚至必须同托洛茨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他们的学者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著作，如果要批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

主义,只能根据党的文件规定的调子和文件中所介绍或引证的托洛茨基的言论开展批判。当然这些经过精心剪裁、挑选的东西是很难展示托洛茨基的本来思想的。从20年代起,苏联批托洛茨基的专著多如牛毛,然而有多少经得起岁月考验,站得住脚,就难说了。正因为如此,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后期和苏联解体之后,苏俄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著作和论述托洛茨基的著作,这也是“填补历史空白”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在解放前出版过不少托洛茨基的著作。在20年代他的著作是当作革命读物在我国传播的,如《俄国革命记实》(即《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多数党与世界和平》(即《战争与国际》)、《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1928年北京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等。进入30年代则主要是由托派人士翻译出版。仅《托洛茨基自传》就出过译自不同文字的三四种不同的版本,托洛茨基的三卷本《俄国革命史》有翻译质量不错的王凡西和郑超麟的译本(春燕出版社1941—1948年版)。

解放后,“为研究苏联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人民大学在1958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言论选集》,作为“党内参考”。收集的主要是发表在《真理报》上文章。这是解放后最早出版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言论集。进入60年代由于中苏争论,苏方有意给中国戴“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逼得中国领导人去了解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当时翻译出版了一批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俄国局势真相》、《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不断革命论》、《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斯大林评传》,等等。这些书能看到的人不多,但能出版这么一批托洛茨基的原著,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还出版了两卷本的《托洛茨基言论》,虽然也是内部发行,但范围大多了。前言和按语基本上是沿袭过去的调子,许多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但毕竟为广大研究人员提供了能反映托洛茨基基本观点的材料,至少是受到斯大林批判的那些观点的原始材料。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全译本,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泓、田娟玉译,郑异凡校的《我的生平》。应该说,这是一种好现象。要研究历史,就得拥有相应的资料,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1990年我曾参加在德国召开的一个托洛茨基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会上西方的一学者声言,苏联和中国的学者连托洛茨基的著作都看不到,还谈得上什么研究。当时的苏联,确实除少数像沃尔科戈诺夫那样的学者能进入机密档案库外,多数人还看不到

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档案。好在我倒是可以在会上介绍在中国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以及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藏的各种文字的托洛茨基著作的情况。

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托洛茨基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还处于起步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一些零星的评论文章见诸报刊,对托洛茨基的某些功过提出新的看法。1986年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托洛茨基的传记著作,提供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明显的原因,书中传多评少,对托洛茨基的重新评价只起了一个头。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过重大作用的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是不能仅仅用“反革命托派头子”、“托洛茨基主义创始人”、“列宁主义的死敌”、“外国帝国主义的走狗”甚至“间谍”这样的帽子来概括的。托洛茨基是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不管是好是坏,都必须根据实际材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出较为客观的较为接近实际的评价。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我们要认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更不能不去研究这个列宁的战友、斯大林的死对头的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和他所主张的方针政策,以及他当年对苏联社会的分析。

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

托洛茨基,原姓勃朗施坦,全名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1879年生于南俄草原的一个犹太富农家庭。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工人运动。按照苏共的习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前,参加革命组织的年份即算作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因此在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出版物上,托洛茨基入党的年份是1896年,即他组织南俄工人同盟的时候。只是后来为了表明托洛茨基不是正宗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才把他的入党时间改写为1917年,即从他“区联派”一起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时算起。

在同盟活动了两年,1898年被捕入狱,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四年。1902年秋从西伯利亚逃脱,其假护照署名“托洛茨基”,结果弄假成真,以后反而以此名著称。在伦敦第一次见到列宁。用笔名“笔尖”为《火星报》撰稿。列宁对这个年轻人评价甚高,不久即推荐他为《火星报》第七名编委。1903年3月2日列宁给普列汉诺夫写信,建议增补托洛茨基为编辑部“享有一切平等权利的成员”,说他正干劲十足地为《火星报》工作和作报告,并且取得了很大成绩。对于时事述评专栏来说,托洛茨

基不但十分有用,而且“简直是不可缺少的”。“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一个有信念、有干劲的人,这个人是有发展前途的。”^①这个建议由于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没有通过,但托洛茨基开始列席编辑部的会议,没有表决权。同年7—8月,托洛茨基以西伯利亚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布鲁塞尔和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起初他是列宁派的主力成员,有人甚至把他叫做“列宁的棍子”。不久会议在组织问题上出现不同的意见,托洛茨基属少数派,即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在会上的发言有两点值得注意。1.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秘密工作者‘夺取政权’,而是构成民族多数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只有社会主义者获得多数时,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才会到来”。这不是什么独创的新观点,而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2.他在反对列宁的党章条文时提出一个论据:仅仅靠规章制度不足以防止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由更为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的相对发展水平、由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及其他的复杂原因所引起的”。^②这个提法本身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俄国小组习气十分严重、组织涣散的情况下,托洛茨基没有看到一个严整的组织的重要性,没有看到在当时沙皇制度的残酷镇压下,一个有铁的纪律的严密的组织对无产阶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意义。

托洛茨基在孟什维克阵营里的时间并不长,1904年9月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派。从此他游离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

“不断革命论”的提出

1905年革命爆发之后,托洛茨基于2月回到俄国,参加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这一年出版了由帕尔乌斯作序的小册子《1月9日以前》,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概念。在革命的烈火中诞生了俄国特有的组织形式——苏维埃,彼得堡的苏维埃在1905年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2月彼得堡苏维埃主席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被捕,托洛茨基接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很快也被捕了。在狱中写作《总结与展望》,出文集《我们的革命》,论证他的不断革命论。1906年9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第333—334页。

②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史研究室编:《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页。

月被判处长期流放,1907年2月在流放途中逃脱。4月以梯弗利斯代表的身份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起定居维也纳,次年创办俄文报纸《真理报》。这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真理报》的前身。从1912年决定把这份报纸收编为党报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办得不错,是受到欢迎的。

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大体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总结革命的教训,分析俄国革命的动力,阶级力量对比,革命的可能发展前景,阐发他的不断革命论。二是在当时党内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对立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做两派的和解工作,这就是托洛茨基“调和主义”的来源。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调和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二月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争论得最激烈的就是这个组织问题。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数量最多的也是这个问题。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两项工作,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本人认为,他关于俄国革命的动力、前景等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得到了历史的证实。但他所进行的调和工作,则是错误的。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召开第六次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基本上是布尔什维克一派的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把取消派开除出党。需要注意的是,开除的是孟什维克取消派,而不是孟什维克,这就是说,这以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还有托洛茨基,仍然共处于一个党之内。由于在这次之后斯大林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所以苏联的党史著作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地位大大抬高,甚至说是布尔什维克形成独立政党的开始。实际上,这以后无论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至于作为区别在后面加上“(布)”的字样,那是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托洛茨基应《基辅思想报》之约任该报在巴尔干的战地记者。这段战地记者生涯使托洛茨基受益无穷,十月革命后他组织红军,领兵作战,这段时间观察战争的经历给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14年,20世纪人类第一个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待战争,托洛茨基持国际主义立场,这使他同布尔什维克有了共同语言。他是1915年在齐美瓦尔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是会议总宣言的起草者。大战期间,托洛茨基同其他俄国流亡的革命者一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从维也纳移居苏黎世、巴黎,最后被法国驱逐出境,1916年11月经西班牙赴纽约。在纽约

他在俄国侨民中间进行革命宣传工作,参加了《新世界报》的工作,使该报转向国际主义立场。托洛茨基认为,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同列宁回国前所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是吻合的。后到的布哈林曾与他同事于该报,两人的关系很不错,有共同语言——都主张在俄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十月武装起义的组织者

1917年获悉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之后,托洛茨基立即动身回国。但回国的道路并不平坦,4月初被英国当局逮捕,直到4月底才获释返俄,到彼得格勒已经是5月了。由于1905年的声望,立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他加入了在大战期间就存在的国际派组织“区联派”,主张区联派同布尔什维克统一。在7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党与区联派的统一。这是两派合并,而不是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严格讲,托洛茨基不是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而是通过两派合并成为其成员的。由于在7月事变后托洛茨基被临时政府逮捕,所以他没能参加党的六大,是缺席当选党的中央委员的。9月初获释出狱,立即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是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的重要标志。

从二月革命以来党内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首先,列宁主张立即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受到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他们认为俄国民主革命尚未完成,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立即提上日程。其次,列宁主张对临时政府持不信任、不支持的立场,而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在《真理报》上宣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的主张。到了9月,列宁认为俄国的政治危机已经成熟,应当立即准备武装起义。这不仅受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反对,而且在中央委员会里也得不到支持,对列宁建议不予理睬,逼得列宁以退出中央委员会相威胁。然而,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列宁却得到托洛茨基的支持。托洛茨基本来就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去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因此,对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可以说是一拍即合,给予了大力支持。托洛茨基领导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个革命战斗司令部,在组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工作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年后斯大林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中承认,“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

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坚定地说,无产阶级很快转到苏维埃方面来与军事革命委员会善于做日常工作是分不开的,这些方面党首先并主要应该归功于托洛茨基”^①。1917年10月25日宣告临时政府被推翻的苏维埃政权的第一个文告《告俄国公民书》就是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文告宣布:“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②由此不难看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在十月革命中的份量。

至于说当时存在一个“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这是一个不合逻辑的机构。众所周知,在武装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是坚决反对起义的,在10月10日和16日的两次中央会议上都投票反对起义,后来加米涅夫还在《新生活报》上发表短文,反对起义。但奇怪的是,这样两个人竟然是“从政治上领导起义的政治局”委员!他们究竟是从政治上领导,还是从政治上反对起义呢?显然,任何一个革命组织都不可能作出如此不合逻辑的决定,何况不把起义问题当儿戏的布尔什维克党。

据斯大林秘书托夫斯图哈在30年代揭露,原来这个政治局是1924年在反托洛茨基斗争的高潮中斯大林在会议记录上添加进去的,也就是说,是斯大林在1924年“组建”的!在十月革命中并不存在什么“政治局”。

“不战不和”真相

十月革命胜利后,托洛茨基出任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员。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苏维埃政权如何实现“和平”的承诺。在协约国拒绝和平建议的情况下,列宁决定同德国单独谈判,谋求和平。12月托洛茨基接替越飞任苏俄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的基本思想是利用谈判进行革命宣传,拖住德国以待其国内革命的发展。对这个方针起初列宁是支持的。列宁在俄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

“我要谈一谈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应该把他的活动的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当

^① 《真理报》1918年11月6—9日,转引自罗·亚·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页。

他开始在布列斯特进行谈判,并且出色地利用了这次谈判来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做法。……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拖延谈判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宣布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又不签订和约,那就不正确了。”^①

按照列宁的看法,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是在德国人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不应该宣布“不战不和”,而应当签署屈辱的和约。当时托洛茨基的想法是,一个革命政权,不能不作最后的抵抗就签署屈辱的和约,要让全世界看到,苏维埃政权是在敌人的刺刀的逼迫下签署和约的,这就会激起西方无产阶级起来造他们本国政府的反。他估计,只要德国军队向苏维埃国家发起进攻,德国无产阶级就会采取行动去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然而,他的估计并没有得到证实。拒不签署的结果是苏维埃政权不得不签署更加苛刻的条约。

一直流行一种说法,托洛茨基的行为“违背了列宁的指示”。实际上这里谈不上“指示”,因为列宁的主和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央处于少数,如果按照中央的精神来衡量,托洛茨基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列宁说:“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就让步。”^②列宁这里说的是“约定”,而不是决定或者指示。其次,历来都把托洛茨基算作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罪魁祸首。其实,坚持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托洛茨基在紧要关头的态度有所不同。1918年2月23日在德军再次提出最后通牒之后,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在表决列宁的提案“是否立即接受德国的建议”时,提案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得到通过。这是列宁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央得到通过。在这里投弃权票的是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当时与会者共19人,有表决权的是15人。如果托洛茨基派投反对票,列宁的主张就会以7对8票被否决。所以托洛茨基派的弃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托洛茨基本人解释说,他之所以弃权,是因为必须找到摆脱既成局面的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不妨碍形成接受统一路线的多数。实际上,有一段时间,不仅左派共产主义者接受不战不和的路线,连斯大林也支持过这条路线。他在1918年1月19日的中央会议上说:“我们摆脱困境的出路是中间观点——托洛茨基的立场。”在2月23日的

^{①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页。

会议上又说：“可以不签订(和约)，但开始和谈。”^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列宁的主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少数。

在分歧中各派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这就是世界革命，都指望世界革命，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来支持俄国。问题是对世界革命，德国革命爆发的时间的估计。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的估计是几天之内革命就会爆发，而列宁认为不是几天，而是几个月。这是一百步和五十步的差别。对世界革命速度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方针政策也就不同，带来的后果就更加不同了。这里根本不存在出卖革命，充当德国帝国主义的帮凶的问题。无论是主和的列宁，主战的布哈林，还是主张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他们都是世界革命论者！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志，是志同道合者。所以尽管争论极其激烈，但党并没有分裂，争论过去之后，大家依然同舟共济地一同闹革命。

赢得国内战争的统帅

和约签订后，1918年3月，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9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托继续任主席。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度过的。当时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托洛茨基专列”，这就是他的办公室。他组建了一支最后战胜外国干涉军和国内白军的红军，在战争过程中他大胆倡议使用旧军事专家，反对散漫的游击作风，保证了红军的胜利。可以说，在三年战争中，哪个战场有问题，他就出现在哪里。高尔基在《列宁》一书中曾这样记述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的，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和他的关系有人在胡说。谎话太多了，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他拍了一下桌子说：‘请您给我指出另一位能够在一年里组织一个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取得军事专家尊敬的人来，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人！’”^②

建立一支正规红军，使用旧俄军事专家，是托洛茨基的在国内战争中的功绩之一。我们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可以看到在党的八大前后有一个以伏罗希洛夫为代表的“军事反对派”。《简明教程》对各种反对派向来是毫不留情的，但对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记录》，莫斯科1958年版，第178、212页。

^② 高尔基：《列宁》，转引自罗·亚·麦德韦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军事反对派”却写得颇为含情。书中充分肯定了他们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然后才轻描淡写地说:“这个派别维护军队中的游击主义残余,反对建立正规红军,反对利用军事专家,反对铁的纪律。”然而,他们反对的这些东西恰恰是托洛茨基所创造所坚持的,是保证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胜利的必不可少的东西。《简明教程》说,“列宁和斯大林坚决地反对了‘军事反对派’”。然而,军事反对派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国内战争期间在军事反对派等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埋下了以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长期不和的种子。

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了及时解决迫切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了一个四人小组,其成员是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由于托洛茨基经常在前线,所以在莫斯科处理迫切问题和日常事务的就是三人了。这是政治局的前身。1919年12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正式决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托洛茨基是政治局委员。

被否定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与工会问题争论

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有两件事值得注意。

其一是1919年冬托洛茨基到乌拉尔指导经济工作,其成果是1920年2月向中央提出的《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提纲。托洛茨基指出,粮食征收制(又译“余粮收集制”)等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因此他建议:1.用按产量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粮食征收制(一种累进实物所得税)。2.严格确定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交纳的粮食量的相互关系。用工业品换取农民的粮食和原料。不难看出,这就是后来实行的以粮食税为标志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但是,当时的多数领导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建议在政治局会议上被否决了。要再等一年的时间加上喀琅施塔得暴动的逼迫,中央的多数才能认识到改行粮食税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其二是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乌拉尔考察之后,1920年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负责恢复交通运输工作。当时机车损坏,燃料缺乏,劳动纪律涣散,全国的铁路运输处于瘫痪状态。托洛茨基接手交通工作之后,采取军事手段,很快取得了成效。这使他看到军事手段在恢复工业中可以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他于11月向中央全会提出《工会及其今后任务》的提纲初稿。由此引发了一场工会问题争论。

工会问题的提出,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出现的工会工作的困惑。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工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广大工人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与此同时,工会也是掩护工人政党从事革命工作的合法机构。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工会似乎已经失去领导工人进行政治经济斗争的任务,维护工人利益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就出现一个新问题:工会的任务是什么?这是个新课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工会曾直接领导经济,因此在十月革命以后就出现工会领导经济建设的提法。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得最明确:党领导政治,工会领导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文化。俄共八大通过的党纲中说:“工会应当做到把作为统一经济整体的全部国民经济的全部管理切实地集中在自己的手中。”^①后来成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会同它一起领导经济工作。再后来,由于各种经济机关陆续建立,国民经济工作逐渐由这些经济机关实施领导,这样工会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去干什么了。正式的提法是工会同经济机关的“结合”。所以有“工会国家化”的口号,党的十大决议也没有否定这个口号,否定的只是“迅速使工会国家化”,“人为地加快工会国家化的速度”。决议指出:“现在工会也已经在执行着某些完全属于国家机关的职能(规定工资等级,分配工作服,等等)。在苏维埃国家里,工会的这些国家性质的职能还会逐渐扩大。”^②

在工会问题上列宁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指责是他关于“整刷”(直译是“抖搂”)工会的提法。托洛茨基认为,工会出现了危机,解决危机的办法是从上而下地对工会进行“整刷”,把不合格的工会干部“抖搂”掉。他的矛头是针对当时被他看作是工会“保守派”的托姆斯基等人的。这自然引起列宁的不安,他担心由此引起党和工会的分裂。

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会到底应当起什么作用呢?列宁的提法是: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托洛茨基的提法是工会应当突出“生产观点”即抓经济工作。在两者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布哈林出来打圆场,搞“缓冲”和“折中”,说“一方面,它们(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并且越来越是——经济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从俄共的文献看,确实两种职能、两种提法

① 《苏共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542页。

② 《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版,第77页。

都是存在的。工会的国家化被看作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当时的工会还有一种功能在整个争论过程中被忽视了,至少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保护工人的利益。梁赞诺夫曾提出,工会应当仍然作为联合工人以保护或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组织。当然,不是用罢工的方法。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提法,认为这是“苏维埃工联主义”。列宁认为托洛茨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当时的苏维埃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因此“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①。但是,列宁的这一提法完全淹没在形形色色的纲领之中,没有引起任何一派的注意。我们看到,随着苏维埃国家官僚化的发展,随着个人独裁的加剧,列宁所指出的工会的这一保护任务越来越具有重大的意义。还有一点是当时还感觉不到的,这就是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国内出现多种经济成分,私人资本主义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这样,保护在私人企业工作的工人的利益,就成了具有同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样的意义。这一点是在夺得政权时所没有想到的。可惜的是,列宁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论点在苏联的实践中,在工会理论著作中都没有引起重视。关于1921年工会问题的争论,人们看到的仅仅是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是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热闹异常的工会问题争论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回答苏俄工会的任务问题。

工会问题的争论在党内引发了大量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纲领。最后,连列宁本人也加入了“十人纲领”派。这种派别林立,就某一问题展开广泛争论的现象,严重妨碍了日常工作,妨碍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工作,而派别的存在直接威胁到党的统一。有鉴于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一切派别和派别活动。决议中的第7条规定,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条当时没有公布,这是考虑到这是一项临时措施,希望备而不用。然而这一条规定后来却成了斯大林打击异己的一根大棒,大量中央委员以至政治局委员,稍有不同意见,就在“派别活动”的罪名下被开除出党。其实,十大还通过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行“工人民主制”,要求废除任命制,实行各级干部的选举制,定期报告工作制,等等。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对党的决定采取了为我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372—373页。

所用的态度,关于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国内战争末期,农民纷纷举行起义反对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特别是粮食征收制。俄共十大召开期间,发生了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水兵们的行动表达了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的不满,年轻的苏维埃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暴动虽然用武力镇压了下去,但问题没有就此解决。于是一年前被否决的托洛茨基的建议,又旧事重提。俄共十大决定中止军事共产主义,放弃粮食征收制,改行粮食税。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是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更换。一般的概念,托洛茨基是新经济政策的反对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托洛茨基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曾经被看作是代表党的观点的文件。1922年11月14日列宁在《致北美俄国侨民》中写道:“凡对我们的新经济政策这个唯一正确的政策的问题还不够清楚的人,我都请他们读一读托洛茨基同志和我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①11月25日列宁给托洛茨基去信说:“读了您论述新经济政策的提纲,我认为总的来说写得很好,某些提法恰到好处,但有少数几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我建议暂时先在报上发表,以后一定要再印成单行本出版,要是再加上一些说明,那对于向国外公众介绍我国的新经济政策将是特别合适的。”^②列宁的这两段评语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列宁的最后战友

从1921年底起,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不得不断断续续地去休养。1922年3—4月召开了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斯大林当选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应当说,到这时候为止斯大林是得到列宁信任的。然而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列宁不能经常视事,斯大林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和错误。在成立联盟国家问题上,斯大林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是谓“自治化”方案。为贯彻这一方案,斯大林对某些持异议的共和国领导人实行高压政策。“自治化”方案受到列宁的批评,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所有共和国,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一律加入新建的联盟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2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34页。

建议,但心中并不服气,把气撒在反对“自治化”最激烈的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身上,把格鲁吉亚等国降为自治共和国,要它们通过外高加索联邦加入新的共和国联盟,从而激化了同格鲁吉亚党政领导的矛盾。其次是弱化对外贸易垄断。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等一部分中央委员主张削弱对外贸易的垄断。而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能削弱外贸垄断。由于在十月中央全会上,已作出不利于外贸垄断的决定,列宁要求在下次全会之前暂缓执行决定,由下次全会重新研究这一问题。第三,是官僚主义泛滥,列宁认为曾由斯大林领导的担负反对官僚主义的工农检察院工作不力,有负使命。

在以上三个问题上,列宁都处于少数地位。为维护自己的立场,列宁多次求助于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委托托洛茨基在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自己发言。1922年12月15日列宁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两人意见一致。”^①同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说:“他已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②列宁的主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2月21日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口授一封给托洛茨基的便条,要他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继续进攻”,为此克鲁普斯卡娅在电话中受到斯大林的辱骂。关于格鲁吉亚问题,列宁在1923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写信,要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人辩护,说“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放心了”。^③列宁在最后时日同托洛茨基的一致是有据可查的事实。相反地,列宁同斯大林的分歧则在逐步扩大,终于导致列宁建议中央设法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并最后给斯大林写信,提出“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的问题。^④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据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列宁曾建议托洛茨基,两人组成反官僚主义的“联盟”。

在历史上托洛茨基确实同列宁有过分歧,但从二月革命以来两人的合作和一致大大超过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成了列宁所能委托的唯一辩护人。由此可见,把托洛茨基说成一贯反对列宁,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0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33—33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页。

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利用列宁的托付去谋求自身的好处。在民族问题上托洛茨基行动不力,没有坚决站出来维护列宁的立场,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妥协让步的态度。他反对列宁所建议的处分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负有责任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反对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在俄共十二大上,在民族问题上他对列宁立场的维护还赶不上布哈林。如果从争权的角度看,托洛茨基显然坐失了利用列宁委托的良机。列宁从1923年3月中旬起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执行列宁委托不力,使斯大林有时间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来控制局面。

1923年4月托洛茨基在为俄共十二大准备的关于工业的提纲中专门谈到计划工作的任务和方法。他指出,由于基本生产资料属国家所有,因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干预必然具有计划的性质”。“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不能先验地通过理论途径或官僚主义途径来确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囊括相互关联的一切部门和整个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只有在国有化的基础上长期进行准备性的经济试验、不断对各经济部门的工作努力加以实际协调以及正确统计成绩之后才有可能制定出这样的计划。”他认为,“计划原则在我国不局限于个别的托拉斯或辛迪加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工业。不仅如此,国家计划应包括工业与农业、金融业、运输业、内贸及外贸的相互关系”。他同时警告,由于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应向各个企业提供在市场上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自由,不要试图用行政意图去取代这一自由”。^①得到俄共十二大批准的这个报告提纲为计划经济作了论证。

争取党内民主的一场争论

1923年秋俄共围绕“新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新方针”的争论是以托洛茨基的系列文章《新方针》得名的。这场争论存在明显的个人权力争夺成分,但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论,那么可以说它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苏俄从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市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放得比较开,取得了比较好的效益。然而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却几乎没有什么

^①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5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00—501页。

进展。本来,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决议,要在全党实行“工人民主制”,取消在军事共产主义下实行的“战斗命令制”。俄共十大还通过了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禁止派别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够防止派别活动,但也可以以此为借口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扼杀党内民主。问题就在于在实践上很难区别不同意见与派别活动的界限。尽管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规定要实行选举制,取消任命制,然而在实践上任命制有增无减。这种状况引起党内一部分人的忧虑。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政治局的多数派改变政策,反对官僚主义,实行党内民主。这是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争取党内民主而展开的争论。

争论是1923年9月中央全会引发的。全会主要是讨论解决面临的迫切经济问题,但在会议末期突然提出了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决定派伏洛希罗夫、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参加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和选派的人员都不很恰当。伏洛希罗夫在国内战争期间是军事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之一;奥尔忠尼启则是因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列宁要给予处分又没有受到处分的人物,派这样的人去革命军事委员会,不仅是对托洛茨基的一种挑战,也是对列宁批评的一种否定。其次就时机而言,也显然欠妥。在列宁卧病不能视事的情况下,暂时维持现状,保持党内稳定,是比较符合整体利益的。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措施,显然打破了平衡。托洛茨基对此反应强烈,不等会议结束即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这是1923年秋冬党内争论的直接导火线。

10月8日托洛茨基写了一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指责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用任命制取代选举制,抗议安全机关插手党内事务,同时指出国内经济形势极端恶化,对经济没有任何领导,混乱来自上头。他特别指责中央全会决定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关于革命军事委员会人员更迭的真正理由同正式宣布的毫不相干。

接着,46名党的著名活动家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认为党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党内关系方面领导不当,要求“改变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签名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不少人对声明的内容和措辞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声明上没有托洛茨基的签字。

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反击,党内形势趋于紧张。经

过第一轮交手之后,也许都感觉到需要达成某种妥协,11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季诺维也夫受中央委托而写的文章《党的新任务》,呼吁活跃党内生活,“切实实行党内的工人民主——加强党内一般在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自由讨论”。季诺维也夫此文的某些提法同托洛茨基和46人声明中的说法差别不大。《真理报》在发表季诺维也夫文章时加了编者按,宣布就文章提出的问题展开全党争论。

争论进行了一个月左右,12月5日政治局和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①决议是一致通过的。同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一样,决议中也有不少提法非常接近于托洛茨基等人的说法,有人甚至认为,决议出自托洛茨基的手笔,至少可以认为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决议谈到了发生新经济政策下的蜕化危险,强调贯彻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全体党员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一切重要问题的自由,有对这些问题展开争论的自由,同时由下而上的各级领导人员和集体领导机构都应由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倾听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视为派别活动的表现,不要因此把忠诚的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派别活动的道路。”决议还要求“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集体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认为只有采用这样的工作方法,才能保证偶然的意见分歧不致形成派别集团。这些说法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也切中时弊。

季诺维也夫的文章和《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被看作实行“新方针”的开始。

12月8日托洛茨基给党的会议写了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他高度评价《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认为“它标志着党在自己的历史道路上着手作重大的转变”。接着他抨击了党的机关和官僚主义,谈了新老两代人的关系和派别活动等问题,指出“只有发展、加强和巩固工人民主这一方针”,才能消除派别活动的危险。接着又在《真理报》上连续发表以《新方针》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包括《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成》、《关于党内新老两代的问题》、《党的社会成分》,这些文章,再加上以后撰写的几篇文章,于1924年1月结集成一个小册子,以《新方针》为书名出版。

“新方针”的争论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党内生活问题,一个是经济政策

^① 其基本内容见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55—362页。

问题。

关于党内生活,主要是党内民主或工人民主问题,是这次争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细心对照一下,除去个别激烈的、过火的用词不论,那么双方的论点和主张表面上差别并不大,有些基本提法颇为相近。

托洛茨基一方认为,党内生活中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民主,没有自由讨论的风气。党章规定的党的各级组织的选举制没有得到执行,上级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结果“党的机关”取代了党本身。早在1904年托洛茨基就说过,“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①托洛茨基在10月8日的信中写道:目前的制度“比军事共产主义最严酷的地方的制度离工人民主制还要远”。“在国内战争的严酷时刻,在党内,甚至在报刊上,曾就吸收专家、游击作风和正规军、纪律等等展开争论,而现在甚至根本不想就党所真正关心的问题公开交换意见。”46人声明也说,“党内建立的这种制度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它破坏党的独立自主;用一种特选的官僚机构来代替党,这种机构平时还能运转自如,但是在危机时刻就不可避免地失灵,而面临现在正迫近的严重事变时,就有根本失败的危险”,他们把这叫作“一派专政的制度”。

季诺维也夫承认,党内缺乏民主,重大问题未经广大党员讨论就事先决定。他要求发挥全体党员和基层支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政治、经济问题在党内展开自由讨论。斯大林在《关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党内存在“战争时期的残余和习惯,要求让党员讨论他们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对党的机关提出的一切建议进行自由批评”,还谈到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切党组织和负责人必须真正由选举产生”。

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重申俄共十大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它重申“工人民主制就是全体党员都有公开讨论党的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自由。对这些问题进行争论的自由,以及自下而上地选举领导人和委员会”。决议要求保持生机勃勃的思想生活,能经常以批评的态度研究自己的过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和对重大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许把中央批准书记的权力变成对书记的实际上的任命。决议强调,“只有采取这种工作方法,才有切实保证防止把一时的意见分歧变成具有上述一切后果的派别集团。为防止这种情况,需要党的

^① 《托洛茨基言论》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0、80—81页。

领导机构听取广大群众的呼声,不要把任何批评都看成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也不要因此把那些忠诚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

可以看出,对党内生活的缺点,对实行工人民主制的必要性,对克服缺点的基本措施等问题,争论双方的分歧并不明显。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在理论上,不如说是在具体执行的行动上。

同民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当时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对此双方并无分歧。分歧在于对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分析上。斯大林认为官僚主义是战时的残余,主要在地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路线是正确的,但地方上在实践中用官僚主义的态度歪曲了这一路线。”党的工作中的缺点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和党的工作人员施加压力的结果。这就是说党本身是不会有官僚主义的。

托洛茨基作了另一种分析。他认为,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省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不是从县里经过省向中央发展的,恰恰相反,是从中央经过省向县里发展的。他决不是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正是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内来的结果。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或工作作风,而是一种社会现象,即一定的管理人和事的制度。党的书记把全部事务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甚至集中到书记一人手里。而为了统管一切,书记就得为自己建立起官僚部门,并以这个同苏维埃机构相接近的附属机构,把自己同生机勃勃的党隔离开来,这就使党内的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使党的领导被他的执行机关(党委会、执行局、书记处等)所取代,结果机关取代了党。所以托洛茨基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不是过去的古董,而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错误所产生的新现象。

在谈到官僚化的后果时托洛茨基提出了引起争论的老一代人蜕化的问题。他写道:“官僚化的长期发展会造成这样一些危险:脱离群众,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管理、挑选和调动的问题上,缩小眼界,削弱革命嗅觉,也就是说,或多或少使老一代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向机会主义蜕化。”

争论还涉及派别和小集团问题。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同意禁止派别,但主张有组织小集团的自由,托洛茨基否认这种指责,声明他并不主张小集团的自由。但他认为,派别集团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它压制批评,使不满情绪越来越大。它总是喜欢给提出批评或警告的人或集体带上一顶派别活动的帽

子。物极必反,机械的集中制必然由派别活动来补充,而后者是一种可怕的政治危险。他的说法是同12月5日的决议一致的。“需要党的领导机构听取广大党员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活动的表现,也不要因此把那些诚诚恳恳和守纪律的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认为,派别集团光靠禁止是不行的,关键是要消除产生派别集团的根源——官僚主义和不民主的制度,使广大党员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可以对党内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

斯大林对派别集团产生的原因作了另一种解释,他否定集团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中央官僚主义制度的说法,而把它归结为阶级的原因:(1)苏联存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2)新经济政策下容许资本主义存在,资本主义思想已渗入党内,(3)党内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三种成分。“这就是某些分子离开党而组织集团的原因。”^①

实际上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派别集团的存在虽然可能同一定的阶级利益有联系,但更多的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或具体政策上的认识和方案上的差异造成的,只有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才能比较正确地处理党内的意见分歧。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的说法比较符合实际,他说:“党对同一个任务往往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决。至于那一条途径更好、更短、更经济,是会发生意见分歧的。这类意见分歧可能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而涉及广大党员,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里有两种阶级倾向在进行斗争。”

这时候托洛茨基并没有组织派别集团。到1923年底,还没有直接指责托洛茨基组织反对派集团的说法。直到1924年初才逐渐给托洛茨基等人上纲上线。1924年1月全会把托洛茨基、拉狄克、皮达可夫等正式算作“反对派”,说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

“新方针”争论中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经济政策问题。当时新经济政策开始不久,好多重大的经济问题党的领导还不知道如何处理,一些涉及新经济政策的理论问题还刚刚开始研究和探讨,所以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争论最多只是提出问题罢了。可以看得出来的是,托洛茨基等把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估计得过于严重,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严重威胁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远比不上在党内民主和官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主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0—21页。

张那么有说服力,那么切合苏联的实际。

关于“新方针”的争论在苏共党史的著作中都说是一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对托洛茨基派别集团的斗争。就发展的结果而论,也确实如此。当时党内的多数派一开始就把党内一部分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所发表的批评意见说成是“派别活动的信号”,继而发展到组织各种声讨会,最后给反对派戴上“背离列宁主义”、“小资产阶级倾向”之类的帽子。俄共第十三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派“不仅企图修正列宁主义,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客观上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和政策的进攻。

在列宁病倒不能视事的情况下,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显然是违背列宁的意愿的。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担心的正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间的冲突带来的党的分裂的危险。列宁不希望他们两人之间闹摩擦和冲突,而希望两人能合作共事,因此主张用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用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来增加中央的稳定性,防止党的分裂。然而,列宁的这些嘱咐未能防止这类悲剧的出现,竟然在列宁最后时日掀起了冲突的第一个高潮。

争论是围绕民主问题展开的,是要争取党内民主,大家都说需要民主,然而却以不民主的办法结束,这就是列宁以后的党内生活的可悲局面。正因为缺乏正常的民主制度,到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可以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废除新经济政策,实行消灭富农的政策。而到了30年代,斯大林一人竟可以决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生死命运。

列宁对这场争论持什么态度?那时列宁在哥尔克养病,已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但从秋天起病情有所好转。1923年11月7日至12月,列宁不断浏览报纸,请克鲁普斯卡娅给他读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关于党的建设的争论的基本文件。1924年1月中旬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1月17—18日列宁浏览报纸,看《真理报》上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报道,让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19—20日她给列宁读报纸上的代表会议决议。她后来写道:“星期六(1月19日)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激动不安起来,我告诉他,决议是一致通过的。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是在读决议中度过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得非常仔细,有时还提问题。”^①列宁对会议的关注,

^① 《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7—738页。

特别是它的“激动不安”，是值得注意的，可惜的是对这种敏感的问题，在当时的处境下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明明白白写清楚。也许可以说，列宁病情的急剧恶化以及最后死亡，是同党内斗争的形势有直接关系的。

列宁逝世之后，1924年1月29日，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托洛茨基说：“弗·伊·（列宁）在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找我们时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他去世为止始终没有变。”^①他们的第一次会见是在1902年的秋天，在伦敦的列宁热情地接待了第一次逃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很大的希望。克鲁普斯卡娅当然是清楚地知道这以后两人间的一致和分歧的，她在列宁尸骨未寒之际，向托洛茨基转达这个信息，显然不是心血来潮的冲动，这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关系的简短总结！

党内争论中的托洛茨基

1924年9月托洛茨基为他的《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1917年》写了一篇序言，名为《十月的教训》。文章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指名道姓地指出“三驾马车”的成员——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在1917年犯有错误。这是直接向“三驾马车”发出的挑战。

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从十月革命史的角度看问题，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在十月革命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位置。它第一次尖锐地提出十月革命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对临时政府的态度问题，对待武装起义的态度问题。《十月的教训》提纲挈领地表述了托洛茨基对革命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他以一贯严谨的作风，有根有据地摆事实，谈理论。对他所作的评论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他所列举的事实并没有伪造歪曲。此文以及他后来写就的《俄国革命史》迄今为止仍然是研究俄国和苏联历史的重要著作。

对三驾马车的直接攻击自然无法被容忍，《十月的教训》加上回忆列宁的《论列宁》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当时叫“书面争论”。表面上争论的是历史问题，实际上是现实问题，是权力问题。这一次季诺维也夫出手了，他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扮演了温和的折衷角色，反对“割除”的流血政策。结果以削去托洛茨基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5页。

的军权,解除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了结。托洛茨基改任租让委员会主席、电器技术管理局局长等职务。

在1925年这一年,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参加这一派的甚至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这是一个内部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的派别,只有两点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一个是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另一个就是反对斯大林的领导地位。托洛茨基暂时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1926年初托洛茨基才下决心同季诺维也夫建立联盟,这就是有名的“托季联盟”。这是一个相当勉强的联盟,他们从过去相互攻击,势不两立,到联合起来,主要的也还是两点——理论上季诺维也夫不同意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他的《列宁主义》一书坚持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实践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同斯大林的合作,已经看清斯大林的面目,深知不能与此人共事。加米涅夫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斯大林不能成为团结全党的核心。这样,托洛茨基同他们就有了共同语言,结成了为时已晚的联盟——“托季联盟”。这时候斯大林已经羽翼丰满,在组织上严密地控制了党,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则由于长期互相攻击,互揭老底而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下要打倒斯大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

在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给后人留下的最大遗产是对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揭露和批判,还有就是他的战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布哈林就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展开的论战。而就具体政策而言,则“托季联盟”所提出的主张都显得过左和极端。它们要求高速度工业化,要求打击以至消灭农村的富农阶级和城市的耐普曼。他们把布哈林看作“右派”,而把斯大林看作“中派”。因而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把斯大林看作是可以争取的盟友。这样他们的批判方向就完全错了。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的一致——争论归争论,实际上他们之间存在内在一致的东西。1929年在联共4月全会上布哈林曾列举了对他的六项指责:1.对工业化估计不足;2.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3.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阶级,而指靠富农;4.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5.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6.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斯大林手下的卡冈诺维奇中计回答说,“对你来说这张清单是正确的”。布哈林当即指出,这几项指责逐字

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布)十五大的政纲。这就是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人对布哈林的指责是相同的。从后来斯大林同布哈林的分歧以及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批判可以看出,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尽管有不共戴天之势,但从根本上说有許多相同或类似之处,以致后来有人说,斯大林比托洛茨基还托洛茨基。

同季诺维也夫的结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他们联合得太晚了。如果在列宁逝世后他们立即联合起来,执行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上提出的建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那么苏联和苏共的命运也许会大大改观。而自纪念列宁吸收了25万新党员以来,党的成分大大改变,各级机关已安插上大量斯大林的人,整个组织系统完全掌握在总书记手中。这个党已开始听命于斯大林一人。托洛茨基所说的“党的机关”取代党本身已经成为事实。

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撤销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7年1月被撤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1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到阿拉木图。那时候还没有对反对派开杀戒,在20年代对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持不同政见者,大多采取驱逐出境的办法。这使托洛茨基得以保全性命,甚至随身携带大量文件档案出境。

再次流亡

1929年1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长期流亡生活。他先后流亡土耳其(1929—1933),法国(1933—1935),挪威(1935—1936)等地,最后定居墨西哥(1937—1940)。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从事著述工作。从1929年至1940年托洛茨基留给后世大量的著作,其中有批判共产国际策略方针的《列宁以后的共产国际》,系统阐述其不断革命理论、批驳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革命》,记叙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历史的《俄国革命史》,解剖苏联社会和联共党的《被背叛的革命》,揭露斯大林伪造历史的《斯大林伪造学派》,制定第四国际策略方针的《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宣言以及因遇害而未完成的《斯大林——对其人及其影响的评价》,等等,此外,还编辑出版了《反对派通报》。其次,进行组织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是组织留在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然后逐渐扩大到国外的托派,最后成立第四国际。

在这两项工作中比较有价值的是他的著作,包括他的历史著作和现实问题的

著作。托洛茨基本人是俄国许多历史事件的参加者和目击者,又拥有大量在苏联严格保密的档案资料,这就使他的历史著作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而他关于苏联现实问题的著作,由于他是过来人,熟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思想,对苏联的现实有亲身感受,因此他的分析苏联问题的著作具有西方学者无法比拟的深度。他在1936年写就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对苏联社会及其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至今对研究苏联解体问题仍然有参考价值。他的未完成的《斯大林》一书尽管笔下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但仍然不失为一本材料相当丰富、内容基本可信的斯大林传记。托洛茨基的这些著作加上他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是研究托洛茨基思想和苏联问题的重要资料,不能简单地以“反苏”“反共”来概括,并且应当说,托洛茨基从来不反共,他的共产主义信念至死也没有放弃,当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有自己的理解。

他对共产国际的否定有他的道理。列宁逝世之后共产国际推行错误的理论和政策,把共产国际变成联共(布)的一个支部,变成单纯的保卫苏联的工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瞎指挥,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凡此等等,越演越烈。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某些批评是对的,符合实际的。但是他本人所坚持的共产国际早期的“世界革命”方针,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这一方针还在列宁生前已经证明是失败的。第四国际把各国的极左分子组织在一起,脱离时代,脱离群众,脱离各国的具体实际,鼓吹世界革命,他们的主张得不到实施,他们的组织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始终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组织。可以说,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极不成功的。

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驱逐出国的。显然斯大林不久就后悔了,把这样一个死对头放到国外去自由行动,是对斯大林的极大威胁。所以托洛茨基在国外多次遇刺,他所携带的档案遇盗,就不足为怪了。托洛茨基一家的命运是悲惨的。儿子列夫·谢多夫是他流亡国外的主要助手,1938年在巴黎的一家医院可疑地死去。女儿齐娜在柏林自杀身亡,而留在苏联从事科技工作的儿子谢尔盖则被斯大林逮捕,最后死在集中营。

托洛茨基本人最终也没有能摆脱斯大林的魔掌。1940年5月23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寓所遭到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的袭击,托洛茨基一家幸免于难。但是没过多久,克格勃的特工,一个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混进托洛茨基的宅

院,用冰斧击中托洛茨基的头部,托受致命伤,抢救无效,于8月21日去世。他虽然逃过了斯大林30年代大审判的子弹,但最后仍不免丧生在斯大林杀手的冰斧之下。他多活了几年,但其最终结局同留在国内的他的战友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他没有在“无产阶级法庭”上遭受那种屈辱,用不着“悔过”,用不着把自己鬼化,至死保持了人的尊严,一个革命者的尊严。

功过是非

托洛茨基的著名研究者伊萨克·多伊彻对托洛茨基的一生有如下一段评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与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在1917年前的某个时候死去,他就会跻身于别林斯基、赫尔岑及巴枯宁这样一些俄国思想家与革命家之列,成为堪与他们匹敌的马克思主义者晚辈。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中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以《共产党宣言》以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倡导者,最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他也在身后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他这段话有一些判断是对的,但不尽然。托洛茨基之所以出名,主要是他的两段经历,一是参加并领导了俄国的十月武装起义,创建了红军并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这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的功绩使他赢得了同列宁齐名的崇高地位。如果没有这一段历史,即在1917年死去,那么人们在历史上知道的恐怕只是一个战地记者或者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还有就是在1905年曾担任了几天彼得堡苏维埃主席。那时作为党派人物,他是不足道的,他游离于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之间,始终没有能够组成一个多少有影响的党派——从本世纪初到1917年,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直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小团体。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上,有不少人显然处于他之上。普列汉诺夫、列宁自不用说,像孟什维克阵营中的马尔托夫,在理论修养方面也不在他之下。他的名声甚至未必能超过在1905年革命期间和他一起创造“不断革命论”的帕尔乌斯。

可以说,如果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也就不会有后人所知道的托洛茨基。

使托洛茨基出名的第二段历史是他同斯大林的斗争。在列宁逝世前后,是他第一个举起反斯大林的旗子,自此以后,他同斯大林就成为不共戴天的死对头。斯大林把他的主张概括成“托洛茨基主义”,还加上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定语。这就使托洛茨基从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立足之地,把他永远革出了教门。多伊彻说得对,如果托洛茨基像列宁那样,在20年代初去世,那么他在苏联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领袖,赢得国内战争的英雄,使世界资产阶级胆战心惊的红军统帅。但是他那时没有战死,没有病逝,这就注定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悲剧角色——以少数人去反对羽毛逐渐丰满的斯大林以及他的党机关,最后被他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权流放到当时的不毛之地阿拉木图,尔后又被驱逐出国,成为有国难回,有家难归的流亡者。他的一系列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及其体制的著作,是最早出现的分析和剖析苏联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其达到的深度是同时代作家难以企及的。

使托洛茨基在理论思想领域出名的则是他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后来他在《1905年》一书中总结他的不断革命论时写道:

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他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

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①

简而言之,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把革命限制在民主革命的范围之内,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就必然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孤立无援的俄国无产阶级只有在国外,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

1917年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二月革命后列宁立即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并在八个月之后领导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无产阶级革命去顺便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也确实把拯救俄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西方革命上。至于对农民作用的估计,那么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同列宁基本上是一致的。列宁认为,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广大农民群众,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则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贫雇农阶级。他在《两种策略》中写道: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②

不久列宁又说:

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③

在列宁生前,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当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看待的,并没有被看作异端邪说。

1924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关于这一争论,需要指出的是,第一,在1924年以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并不存在分歧,分歧是从斯大林修

①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4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1—142页。

改自己先前的观点引起的。在此之前,斯大林本人也是认为苏联单独一国,凭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其次,斯大林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引用和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恩格斯的谈到“共同胜利”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的手稿直到1913年才公开发表,因此不可能像斯大林所说的,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影响下,在第二国际存在一个共同胜利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斯大林对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中的论断的引证也是牵强附会的。列宁那里所说的仅仅是一国可以首先开始革命,夺取政权,而没有涉及“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为论证自己的新说法,斯大林甚至不惜篡改和删除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语句。^①

1929年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一书中把“不断革命”论发挥成三点:1.从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断的。2.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是不断的。国内战争和对外战争同和平改革相互交替,经济、技术、科学、家庭和日常生活等方面不断革命。3.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始,但不能在这个基础上结束。民族革命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不过这三条中只有第一条是已有的观点,其余两条已不是原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内涵了,它们并没有得到实践的证实。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其说是“不断革命”的过程,倒不如像布哈林所说的,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长入”的过程。

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革命上。他的不断革命论就是立足于世界革命,首先是西方革命上的。他用“世界革命”来对抗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然而十月革命后不久,客观形势就显示出,世界革命的期望是不现实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整个世界还缺乏必要的前提,作为社会经济形态的革命,需要旧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真正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只要这种社会经济形态还有生命力,还能通过自我调节继续发展,它就不会灭亡。在20世纪,资本主义就是处于这种状态。这就不能不使托洛茨基的希望和

^① 参见郑异凡:《“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若干问题》、《恩格斯“同时胜利论”质疑》,载郑异凡:《史海探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318页。

一切有关预言落空。在这方面列宁要比托洛茨基现实一点,他也是世界革命论者,但当他发现西方革命无望的时候,立即把希望转向东方,把国内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去。东方最后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了列宁所期望的革命。事情很清楚,如果抽去了世界革命这一根台柱,那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就无法站立起来。

不过,托洛茨基看到了时代的发展,各国和各地域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世界性的经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向国际分工发展的各国之间存在有机的相互依赖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单独一国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得出结论,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不仅需要欧洲几个最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且在此之前还必须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利用它们的先进科学技术。他在《〈不断革命〉美国版序言》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经济并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一种由国际分工和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专横地统治着民族市场的世界市场所形成的强有力而独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已发展得超过了民族界限。(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事实的表现之一。在生产技术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代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如果要在民族范围内孤立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那么,不管暂时取得多少成就,都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不顾构成世界统一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在地理、文化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试图在一个民族范围内实行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经济各部门的均衡,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①

他指出苏联经济存在的一个巨大矛盾,即苏联工业的集中性质和苏联经济孤立处境之间的矛盾;苏联工业的集中性为空前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苏联经济的孤立处境则排除了正常利用世界经济潜力的可能性。托洛茨基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说:

世界范围的分工超出于单独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上,而且用命令的方式指出它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没有把俄国排除于人类其他部分之外,反而

^① 《不断革命》,伦敦1962年版,第22—23页。

使俄国同他们更密切地联系起来。^①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定用以取代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设想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在 20 年代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是计划经济的倡导者、鼓吹者,经常把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缺乏计划所致。他的主张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然而他没有看到,在苏俄那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之中,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计划经济可言的。而从 30 年代开始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又充满了领导人的唯意志论,一切计划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制定的计划往往朝令夕改,数字指标任意规定和随意改变。人们在计划经济后面看到的不是严密科学的计划,而是领袖的个人意志。正因为如此,这种经济不可能调动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可能有合理的资源配置,造成了经济中的极大浪费,建设事业的严重混乱。事实证明,计划并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小生产占多数的国家里在经济上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即使经济发展了,也难以制定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万能的计划。把计划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志,是一个理论和认识的误区。在过渡时期或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都需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借助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当然,在宏观调节上一定程度的计划和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但像托洛茨基那样把整个希望都寄托在计划经济上,显然是不现实的。

工业化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物质条件来说,工业化应该是已经完成了,旧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下工业化以后飞速发展的生产力。工业化的任务是在东方落后国家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下的补课任务。在革命之前未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社会主义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必须补课,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托洛茨基是苏联工业化的提出者,主张高速度发展工业,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但是,苏联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给我们提供的教训是欲速则不达。苏联 30 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工业化采取了不顾苏联的国情,盲目的高速度的工业化,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取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在某程度上是实现了国

^① 《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见《俄国革命史》伦敦 1936 年版,第 1240—1241 页。

家的工业化,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并且其成果仅仅是国家的重工业化、军事工业化,而不是全面工业化,农业仍然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受到严重的抑制。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失衡。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尽管托洛茨基可以说,这是一面变形的镜子,也许由他来实施情况会好一些,但未必有大的改观。

至于农业集体化,这同列宁当年所说的合作社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集体化。这实际上也是大体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但是,看看斯大林集体化的后果就可以大致估计出等待着托洛茨基的集体化的是什么东西了。问题在于,在落后的苏联,在20年代几乎不存在富农阶级,因为通过国内战争时期贫苦农民委员会所实施的剥夺,革命前的富农已经不再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存在的所谓富农,多半是些善于经营的、基本上通过劳动发家致富的中农,甚至贫农。在他们的经营活动中也存在程度不等的剥削,但在量上远远没有达到革命前的富农程度。这些人的生产经营对当时城乡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20年代末,没有任何理由去消灭他们。列宁提倡的合作社同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农庄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形式,是本来意义上的集体经济,在这里农民是合作社的主人,他们的地位是独立的。而从苏联的实践看,集体农庄仅仅是一种为保证政府得到它所需要的粮食的连环保组织,农民在这里除了双手以外基本上一无所有。农民,现在叫农庄庄员,不再拥有生产资料和土地,没有耕种土地的自主权,甚至失去了人身的自由——他们没有身份证,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不能随意到城市去打工。政府也不保障他们的温饱,对许多集体农庄政府只管收粮,庄员只能靠一小块宅旁园地养活一家。至于集体化过程中大批反对集体化的农民被当作富农流放,农民大量杀猪宰羊,造成农村牲口的大量减少,那就不必说了。其直接结果是连续两年的饥荒,其远期后果是苏联的农业长期落后,直至50年代初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可以说,集体化消灭的不是“富农”,而是全体农民。从斯大林的集体化实践,也不难看到托洛茨基主张的集体化的后果。自然,也许会有所不同,例如少一些强制和暴力,但总的情况或者方向,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集体农庄这个形式本身就存在问题,不是一种能够解决农业问题的组织。

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基本肯定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措施。

可以说,托洛茨基所坚持的东西,大体上没有违背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可惜的是托洛茨基这种教条式的坚持,脱离了俄国的现实。他对布哈林的批判是一种倒退。因为到20年代,布哈林已经摆脱了左的极端主义,开始正视俄国的落后的现实。他坚持列宁的合作社思想,反对集体化方针,反对对农民使用强制和暴力,反对对农民实行剥夺政策,主张让农民发展自己的经济,甚至号召他们“发财”。他主张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保持农轻重的一定比例,反对不顾国情的高速度的片面发展重工业。托洛茨基完全看错了人,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布哈林。斯大林后来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其始作俑者乃托洛茨基!布哈林帮助斯大林打倒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则给斯大林提供了反对布哈林的现成思想武器!

30年代托洛茨基在国外所写的论文和专著,对苏联现实的剖析,对斯大林的批判和揭露,是对“苏联学”的重大贡献,也许可以说他是西方后来盛行的“苏联学”的开创者。他毕竟是从这个国家出去的,他对这个国家有深入的了解,他懂得马克思主义,知道列宁的想法,清楚这个政权的长处和缺点,因此,从他的笔头出来的东西,不像西方作家所写的那样往往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

1936年托洛茨基写了《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剖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他对苏联社会所作的分析,仍然能给人以某种启迪。这是托洛茨基留给我们的值得批判地吸收的遗产。要探讨苏联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崩溃的原因,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书中对苏联的前途提出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工人推翻官僚的统治。这种结局后来并没有出现(只有波兰出现了这种结局,但推翻以后并没有继续社会主义道路!),且按下不表。第二种结局是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托洛茨基对第二种进程有这样一段描述:

如果资产阶级政党推翻了苏维埃统治阶层,它就会在目前的官僚、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经理、党的书记以及整个享受特权的上层中找到不少现成的奴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对国家机关进行清洗,不过资产阶级复辟所需要清除的人,要比革命政党清除的人少。不过,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会是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首先要创造条件从力量单薄的集体农庄分出殷实的农场,把富裕的集体农庄变成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变成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部门,非国有化将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计划原则在过渡时期会

改变为在国家政权和各“公司”之间采取的妥协措施,这些公司即是从工业部门的苏联官员、其流亡国外的原业主和外国资本家中产生的潜在的所有主。尽管苏维埃官僚为资产阶级复辟作了大量的准备,但在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法上,新制度还必须进行社会变革(переворот),而不是改良(реформа)。^①

这段话无须解释,人们在苏联解体时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幅图景。这里仅举一个数字。现今的俄国流行一个名词“在册权贵”(номенкратура),指的是苏联时期列入上级任命的各级(尤其是高级)干部花名册的党政官员,是一般名词“官僚”的具体化。有一项资料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有75%以上的政治精英和61%的商业精英来自“在册权贵”。来自这个群体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府中占74.3%。^②这些数字说明了苏联的某些党政干部在剧变中以及剧变后的作用。看看这些数字,看看剧变的过程和剧变后的变化过程,不能不佩服托洛茨基的预见,或者用多伊彻的话说“先知”。

通观托洛茨基的一生,他无疑是个革命家。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斯大林刀下之鬼,都由官方正式恢复了名誉(只有像叶若夫那样的刽子手除外),但托洛茨基并没有获得苏联当局的正式平反,理由是他没有被正式判刑。即使如此,斯大林当年给托洛茨基加上的几个最大的罪名,如“托洛茨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法西斯的间谍”、“帝国主义的走狗”,也没有一个是能够成立的。如果有“托洛茨基主义”的话,那么,这个托洛茨基主义同社会民主主义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而自从法西斯德国失败以来,德国的档案已被公开,历史学家并没有从这成堆的档案中找到任何可以证明托洛茨基投靠德国的文件。

托洛茨基是悲剧性的人物。他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舍生忘死,但胜利后不久就有家归不得,继续他在革命前的流亡生活。先前他是被沙皇反动政府赶出去的,后来又被无产阶级政府驱逐出境。他在国外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反对和揭露斯大林的工作,但他还是承认,苏维埃政权是工人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尚未完全丧失。当苏联面临法西斯德国进攻的危险时,他号召保卫这个工人国家。他坚持工业化和计划经济,主张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他的这些主张,在提出之初曾受

^①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1页。

^② 《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被冠之以“超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罪名,然而在他被驱逐出国之后,斯大林马上放手搞起全盘集体化,彻底剥夺农民,实行高速工业化,其所采取的措施,所定的速度,是托洛茨基本人当年也不敢设想的。

纵观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观点,有几条是他始终坚持的,这就是世界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因此,尽管他对斯大林的批判指责甚多,但除了世界革命,斯大林的许多主张同托洛茨基的差别并不大,有的也就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另一种发展的选择,但托洛茨基所坚持的只是上述几点,至于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并没有得到他的支持。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显然落后于同时代的布哈林,在理论方面他把布哈林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显然不是偶然的。他同布哈林的争论才真正是两种社会主义建设方法的争论。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曾经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①。恩格斯的这一重要论点既适用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也适用于托洛茨基的理论观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同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社会经济关系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的社会现实还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提供充分的根据。问题还仅仅在暴露之中,要从某些迹象中得出人们在半个多世纪才得出的结论,托洛茨基显然还缺乏这种“先知”的本领。不能苛求于古人,托洛茨基毕竟是历史的人,而不是先知。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2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724页。

托洛茨基和文化

有一种说法,说托洛茨基是很残暴的人,在对待传统文化上,比斯大林还激进,完全不要传统文化,不要资产阶级文化,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列宁对待传统文化还是要继承的,而托洛茨基所持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一切文化从无产阶级开始。

在苏联托洛茨基是被斯大林妖魔化的一号人物,凡苏联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同托洛茨基这个魔鬼挂钩。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案,被冠名的首先就是已经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1936年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1937年的“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连审判布哈林的案件也要同托洛茨基挂钩,名之曰“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左一右,但是还是要把托洛茨基扯上。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就更不用说了。此类宣传多了,人们在谈起托洛茨基的时候,联想起来的就都是坏事。

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实际上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党内少有的几个熟悉文学艺术的内行,另外几人是: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还有被当作无产阶级文化派教父的亚·亚·波格丹诺夫(在20世纪初,是赫赫有名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早在流亡国外期间,托洛茨基就接触到大量西方文学艺术,写了不少文艺评论。十月革命后,出于兴趣爱好,在主管军事的情况下,仍然关注文艺界的情况。1923年出版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是最早问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论述文学艺术的专著,影响了20年代的苏联文坛,也影响了中国早期的左翼文学,当年鲁迅的案头就有托洛茨基的这本书。托洛茨基熟悉西方文学,阅读西方作家的作品是他的一个爱好。在同斯大林争论期间,

他参加政治局会议往往带上一本法国小说阅读,既表示抗议,也显示一种爱好。

否定“无产阶级文化”的可能性

说托洛茨基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纯属误解,他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坚决反对者,甚至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出现的可能性。他对世界革命胜利的可能性比较乐观,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看作一个短暂时期,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很快就会消亡,无产阶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无产阶级消失,也就不会再有阶级的文化,而只有社会主义文化,所以不存在无产阶级文化。

一种新文化围绕统治阶级而形成,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需要很长的时间,并常在该阶级政治上临近衰落的时代时才达到完美。

无产阶级将自己的专政设想为一个短暂的过渡时代……社会革命的时代在世界范围中将持续几年和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是几十年,然而不是几个世纪,更不是几千年。……社会革命的年代将是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代,在斗争中,破坏所占的地位要超过建设……换句话说,在专政的时代,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谈不上具有巨大历史规模的建设;再则,与过去无法比拟的文化建设,将在专政的铁钳已失去必要时开始,那时它就已不具有阶级性了。应当由此作出一个总的结论:无产阶级文化不仅现在没有,而且将来也不会有;其实,并没有理由惋惜这一点,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正是为了永远结束阶级的文化,并为人类的文化铺平道路。^①

托洛茨基在这里说了一句大白话——在专政的铁钳下是谈不上新文化的创造的!

当时无产阶级文化派把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叫得震天价响,以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为己任。托洛茨基就此评论说: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艺术”等等,在我们这里大概在十分之三的场合下是不加批判地指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和艺术,在十分之二的场合指的是无产阶级的个别团体掌握无产阶级以前的文化的个别要素的事实,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2—173页。

最后,在十分之五的场合下,谈论的概念和文字是如此混乱,以致完全不知所云。^①

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割断与过去的联系,不要继承文化遗产,企图通过人为的实验室,关起门来创造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托洛茨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不吸收和同化旧文化的成分,它(无产阶级)就无法着手建设新风格的文化”^②。“无产阶级能够创造一种新的,亦即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学,但不是在我们目前贫穷、匮乏和缺乏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实验室的途径来创造,而要通过广阔的社会经济和学文化运动的途径来创造。艺术需要丰裕和富足”^③。

他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以及左翼作家们说:“你们以为,在花盆中撒下一粒豆子,你们就能够培植出一株无产阶级文学的大树来。我们不会走这条路。一粒豆子是长不出任何大树来的。”^④

托洛茨基不仅主张继承文化遗产,而且也主张谨慎对待外国的科学成就,对西方新出现的一些学说,并没有简单地当作资产阶级学说予以否定。他说:

较之于政治路线,艺术的侧翼设防较少,这也是事实。在科学方面的情况难道不也是如此吗?纯无产阶级科学的幻想家们对于相对论该说些什么呢?相对论与唯物论相容吗?这一问题解决了吗?何时、何地、由何人解决的?我们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工作完全是遵循唯物论的,即使是一个门外汉也清楚这一点。但对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又该说些什么呢?它如同拉狄克同志认为的那样(我也赞同他的意见)是与唯物论相容的,还是与唯物论敌对的呢?对于原子构造等等的新学说,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⑤

比较一下后来苏联大肆批判相对论、摩尔根学说等做法,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当年提出的问题颇有深度,他那时已经感觉出隐存的在科学上否定西方的一切的苗头。

1924年5月俄共中央召开文学讨论会,托洛茨基在会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存在,基于众所周知的理由,我将支持,但在对波格丹诺夫的无产阶级文化的

① 郑异凡编:《托洛茨基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②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11页。

③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页。

④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557页。

⑤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05页。

抽象概念这个问题上,我是完全反对您(普列特涅夫)和您的保护人布哈林的,我是完全赞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①

他支持作为普及文化知识的组织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但反对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做法。

布哈林不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但支持他们的某些主张。

列宁对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说过:

“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②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共产主义。”

列宁的说法就等于取消了无产阶级文化,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无产阶级的,因而也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存在之余地。托洛茨基的说法是同列宁的这一论断相近的。

托洛茨基主张的文艺政策

在人们的印象中,托洛茨基是一个“残暴”的人。不过在俄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一个人的残暴能够超过斯大林!就托洛茨基而言,别的不说,至少在文化政策上他恰恰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

十月革命后在文化界有一股左的激进情绪,总想打倒一切,认定不站在我们一边的就是反对我们的,就是敌人,于是除无产阶级外,其他都是敌人。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这是一种严重混淆敌我的思潮。正是针对这种打倒一切的思潮,托洛茨基提出一个新概念——“同路人”,按照他的说法,属于同路人的作家,“他们都接受革命,每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来接受”,“他们没有从整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感到陌生。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的,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同路人的艺术创作是一种新的苏维埃民粹主义。^③被列入同路人的主要是那些被认为的农民作家、小资产阶级作家。“同路人”的提出,使他们得以避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5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34页。

③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42页。

免打击,而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盟友,团结对象。这个方针得到俄共的肯定。

托洛茨基认为,精神创造要有自由才行,所以在政策上,托洛茨基认为,不能像对待政治那样对待艺术,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艺术创作具有自己的手法、方法和规律。1924年5月9日,他在中央文学讨论会上说:

应该把艺术当作艺术去对待,应该把文学当作文学去对待,也就是说,应该把它当作人类创作一个完全特殊的领域去对待。当然,我们有艺术的阶级标准,但这一阶级标准应当被艺术地折射,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标准运用于创作时,必须使阶级的标准与创作的完全特殊的特点相一致。^①

不能像对待政治那样对待艺术,——这不仅是因为艺术创作像有位同志在这里讽刺性地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和玄学,而是因为艺术创作具有自己的手法和方法,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首先是因为在艺术创作中,潜意识过程具有巨大的作用,这类过程较为缓慢,较为懒惰,较少服从管理和领导,——正因为它们是潜意识的。^②

托洛茨基认为,在文学艺术领域,需要的只是区分革命和反革命,在创作方法上无需强求一律,需给以艺术自决的充分自由。他就此写道:

在过渡时期我们的艺术政策可能、而且应该是这样的:帮助已站到革命立场的各种团体和流派,使它们易于真正把握革命的历史意义,在对它们提出“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一毫不含糊的标准之后,在艺术自决方面给它们以充分的自由。^③

当然,在实践中区分革命还是反革命也会出错,会把并非反革命的作家当作反革命惩处,但这比后来斯大林以意识形态、以领袖个人好恶划线要好多了。

1936年托洛茨基已在国外流亡多年,他看到当时斯大林对言论自由和自由创作的扼杀、对作家艺术家的迫害,他在《被背叛的革命》中继续其在20年代的思路写道:

有一位古代哲学家说过,争论是万物之父。在思想不能自由交锋的地方,也就创造不出新价值。诚然,革命专政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严格地限制自由。

①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550—551页。

②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551页。

③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6页。

正因为这缘故,革命时代从来不是直接有利于文化创造的时代,它只不过是这种创造扫清了道路。无产阶级专政越是不再成其为专政,就越能为人类的天才开辟广阔的天地。社会主义文化只有随着国家的消亡而得到繁荣。这个简单而不可动摇的历史规律就包括着对苏联现行政治制度的死刑判决。苏维埃民主并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政治,更不是要求一种抽象的道德。它已经成为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①

在20年代,有些艺术团体要求共产党赋予领导地位,让它在文化艺术界代替党发号施令。托洛茨基强烈反对这种要求,同时反对党在文艺创作领域发号施令,他指出:

艺术应当靠自己的双脚走出路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艺术的方法。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是领导历史的进程。有些领域,党可以直接地、绝对地进行领导;有些领域,党可以进行监督和协助;有些领域,党只能进行协助;最后,有些领域,党只能给予指导。艺术领域并不是党发号施令的场所。党可以并且应当进行限制、协助和仅仅是间接的领导。党对各种艺术团体可以并且应该给予有条件的信任,只要它们真诚地努力靠近革命并用艺术的形式来描绘革命。在任何场合下,党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站在正与别的文学团体进行争论的或者干脆说进行竞争的某个文学团体的立场上。党所维护的是整个阶级的长远利益。党在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地为新文化从而为新技术创造前提条件,党对待文学同路人的态度,不是把他们当作工人作家的竞争者,而是当作在宏伟建设中的真正的或可能的助手。党了解过渡时期文学团体的暂时性,因此对它们的评价着眼于它们在培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所起的或可能起的作用,而不是着眼于文学家们的阶级身份。

党不能只是因为写作的人是工人而给《打铁场》(又译“锻冶场”)杂志打上纲领性的印记,另一方面,党也不能事先摒弃任何一个文学团体,即使是知识分子的文学团体。^②

1924年起托洛茨基已经失势,逐渐被排挤出领导核心,但是托洛茨基关于同

① 《托洛茨基读本》,第415页。

② 《真理报》1923年9月16日,见《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92,394—395页。

路人、关于不能偏袒某一流派、关于在文艺领域不能发号施令、关于各种流派自由竞争而不能赋予某一文学团体以垄断权等等主张,得到俄共的赞同,被写进1925年由布哈林起草的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之中。^①

托洛茨基和书报检查制度

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是从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实施的军事检查开始的。不过,以后他把政治需要同艺术创作的政策作了区分。从政治上讲,他认为,革命对任何一个有可能瓦解革命阵营,或者会使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内在力量相互敌对的艺术流派不能不加以干预。“我们的标准显然是政治的、指令性的和不容异议的。但正因为如此,这一标准才应当清晰地划定起作用的范围”。在艺术上他主张采取灵活的政策:“在实行警觉的革命的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同时,在艺术领域实行一种与小团体的吹毛求疵迥异的广泛和灵活的政策。”一方面不能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另一方面要确定“干预在哪一点上开始,干预的界限何在”。^②托洛茨基显然担心违背艺术创作特点的外行的干预,因为当时有一些左翼文学团体以无产阶级或者共产党的名义干预其他文学团体和流派的创作活动。托洛茨基认为,这个界限就是“拥护革命还是反对革命”。^③

在1917年的苏维埃政权发布的出版法令中,把取消对出版自由的限制同苏维埃政权的稳定联系起来,宣布一旦政权得到稳定和巩固就取消对出版自由的限制。托洛茨基关于书报检查的必要性是立足于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重点不在意识形态上。他把取消对自由的限制同西方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西方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稳固,因此他声明:“到了无产阶级在西方最强大的国家中稳固地获胜的那一天,革命的书报检查制度就会因没有必要而消失……”^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在文化问题上是比较开明的,是主张按照文艺自身的规律行事的,他不以作家的出身来划分作家的阵营,主张通过作品赢得自己

① 见《苏联文学艺术问题》第3—9页。

②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06—207页。

③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6页。

④ 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9页。

的地位,他既不排斥传统文化,也不排斥西方文化的成就,他所主张的文化政策,今天看来也还有可取之处。当然,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的理由,未必能够成立,事实表明,到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并不是托洛茨基所乐观的几十年的事。但无论如何,他不是“无产阶级文化”支持者,这也是事实。

《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1期

托洛茨基的两个预言

伊萨克·多伊彻三卷本《托洛茨基传》最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发行,说明这样一部学术著作还是有读者的。本书作者多伊彻是国际著名历史学家,同托派有密切关系或者本人曾是托派。他的这三卷本传记可以说是研究托洛茨基的经典著作。第一卷《武装的先知》成书于50年代初,斯大林还在世。第二、三卷《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浪的先知》于60年代初完成。书中大量利用了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随身携带出去的几大箱档案(这批档案直到1980年才解密)和作者对同托洛茨基有关人士的访问材料以及这些人向作者提供的回忆材料。因此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于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今年出了新版,增加了“人名索引”,这就使本书接近了“学术版”,便利了读者的使用。当然如果能够加上“主题索引”,那就更好了。“同国际接轨”是近年来的流行词汇,西方的学术图书一般都附有各种索引,过去我们的译本为图省事通常都不予翻译刊印,是同国际脱轨的。

作者把本书命名为《先知三部曲》,此处“先知”源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失败”。我看到另一种译文是:“武装的倡导者全都获得成功,而赤手空拳的倡导者尽成落花流水。”^①按照词典的解释,“先知”,一指对人类或国家的大事了解得较早的人。二指犹太教或基督教的预言者。作者用的应是前一种意义上的“先知”。

本文想借“先知”这个词说说托洛茨基的两个重要的预见。

^① 《君主论》,阎克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先知之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从1905年起托洛茨基一直主张和坚持一种“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的说法并不新鲜，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提出不断革命，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的主张。托洛茨基的“新东西”在于把它移用于俄国。

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中同帕尔乌斯一起提出来的。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总结与展望》、《无产阶级与俄国革命》、《我们的意见分歧》等论证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他在《1905年》一书中这样总结他的这一理论：

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他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而突破了俄国革命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得不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应当自觉地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序幕。

他的主张简而言之有三个重点：1.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2.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必须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这就必然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从而也同广大农民发生敌对冲突。3.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得到西方先进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的支援，才能保持政权，坚持下去。

1917年以前，列宁的观点与托洛茨基不同，列宁主张革命分两步走，先进行民主革命，以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同时发展民主，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创造自由活动的空间。所以列宁在《两种策

略》中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列宁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

直到二月革命前夕，列宁一直主张俄国的当前任务是民主革命，他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遥不可及的事情。1917年1月9日他在《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中说：“正是由于这次强盗战争，欧洲也会发生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对金融资本权力、反对大银行、反对资本家的人民起义，而这些震动只能以剥夺资产阶级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这次革命的决战。”回国前夕写于1917年3月中旬的《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中，列宁还在强调：“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

不过列宁是现实的政治家，回国后立刻觉察到现时的俄国是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立即改变一贯坚持的方针，提出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方针。这一转变使那些一直追随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大惑不解，他的“四月提纲”起初支持者寥寥。政治家的列宁这时候需要修改理论家的列宁的说法，于是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如今沙皇政府已经被推翻，政权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可以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了。这不是很能说服人的论据，因为政权的转手并不等于发展经济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的任务也已解决，情况恰恰相反，在临时政府存在的八个月期间，俄国的经济是每况愈下。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党派也就此对列宁提出质疑，指出俄国缺乏必要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列宁用置之不理的办法予以回应——那时候不是进行理论争辩的时机，必须抓住这个大好机会把革命进行到底。

这样，从提出“四月提纲”起列宁的实际主张已经与托洛茨基的历来主张完全一致了。托洛茨基后来说，他是经过战斗走向列宁的。这是他的谦虚之词，实际情况至少应当说是两人不谋而合，殊途同归。多伊彻就此写道：

他们两人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其中一个得出这些结论早得多，而另一个却为这些结论作了长时间的艰苦的辩论。……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的出发点，通过不同的过程向前发展走向他们此刻的汇合点。

1917年的俄国革命基本上是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和列宁的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思路发展的。八个月之后由托洛茨基具体组织的十月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上台执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能够完成的民主革命

任务,只好由无产阶级革命顺便去解决了。

其实,对革命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处理,早在1917年以前,列宁同托洛茨基的想法就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显然也是后来两人合作的思想基础,只是过去的史书避开不提而已。

一个是俄国革命同西方革命的关系。托洛茨基早就提出,单靠俄国一国的力量是不能保证革命取得胜利的,俄国革命需要先进的西方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列宁在1917年以前的设想也大体如此,他在《两种策略》中说过:

如果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俄国无产阶级的支援,那么,这个斗争对于孤军作战的俄国无产阶级,几乎是毫无希望的,而且必然要遭到失败。

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估计,托洛茨基的结论同列宁的估计也是大体一致的。1906年4月列宁写道:“在一个小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包括农民在内)在无产者从争取自由走向争取社会主义的时候,必然会掉过头来反对无产者”,要防止复辟,俄国必须有非俄国的后备军,必须有外来的帮助。这就是西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列宁是这样设想不同革命的不同阶级力量的配置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广大农民群众,而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则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贫雇农阶级。

1918年底苏维埃政权组织贫苦农民委员会在农村开展的斗争,就是一场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富农)和小资产阶级(中农)的斗争,被叫作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粮食征收制不仅征收了农民的余粮,而且把农民养家糊口的粮食统统收走,因而引发了广大农民的反抗,农民暴动蜂起。这种场景一如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早期预见。

先知之二:从“集中制”到“个人独裁”

1902年,托洛茨基在伦敦首次会见列宁。列宁对这个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小伙子的才情非常欣赏,曾提议他担任《火星报》的第七名编委,因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反面而作罢。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起初托洛茨基全力捍卫列宁的观点,被叫作“列宁的棍子”。大会后期,在组织问题上发生分裂,托洛茨基转向少数派(孟什维克)。但为时不久,1904年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派分手,从此游离于两派之间,因竭力促使两派统一,受到主张同孟什维克决裂的列宁的严厉批判。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针对手工业作风、小组习气严重,

列宁提出在党内实行“集中制”的主张。“集中制”遭到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的强烈反对,托洛茨基也是激烈的反对者之一。1904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陈述自己的观点。

托洛茨基反对把党的纪律与工厂的纪律完全等同起来,说这是“荒谬的”,“我们的党的体制不能是兵营体制,正如党不能以工厂为模型一样”。“在当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组织上的集中制是伴随一个派别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而来的。”然而“只有当纪律允许人们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人们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才接受纪律的)而斗争的时候,纪律才有重要意义”。当一个派别面对着自己的权利要被剥夺的前景时,也就是说,为施加思想影响而斗争的可能性要被剥夺的时候,对于这一派来说,他的生存问题就从一个权利问题变成一个权力问题。要么按照纪律而默默自行解散,要么无视纪律为生存而斗争,毫无疑问任何派别都会选择第二条道路。后来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斗争,选择的的就是这第二条道路。

多伊彻引用的托洛茨基一段话来说明高度的集中制必然导致的后果:这就是“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这是一句相当具有“先知”水平的预言。

1905年,在多方的指责和反对下,列宁把集中制改名为“民主集中制”,以示他的集中制不会成为“官僚集中制”,但其落脚点仍然是“集中制”。直到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鉴于此前实行的“集中制”或者“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战斗命令制”,上级任命制取代了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大会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中决定改行以选举制为核心的“工人民主制”。这是实践提出的对集中制的修正。由于大会还通过一个禁止派别活动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转移了关注点,“工人民主制”并没有得到实施。

集中制的弊端是明显的,不过由于个人的品质,也由于那时布尔什维克党所处的环境,列宁在执政的五年里并没有成为俄国的独裁者,他的某些主张也会在党内被否决。1921年3月17日,列宁在给越飞的信中否定“中央——就是我(列宁)”的说法,说在组织问题和人事问题上他列宁“有无数次处于少数”,“原中央(1919—1920年)在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上击败了我”。

所以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的预言“对于未来而言……是一面准确的镜子,不

过镜子里照出的俄国罗伯斯庇尔与其说是列宁，倒不如说是他的继承者”。多伊彻说这是“托洛茨基具有第六感官，即历史的直觉”。实际上，应当说这是托洛茨基的历史理论修养使他能够先知地感觉到历史逻辑的发展结果。

有这种修养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普列汉诺夫、卢森堡当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警告。

1904年7月，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把列宁的集中制比作布朗基的密谋主义的集中制，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下列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

也是在1904年，普列汉诺夫在《集权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一文中针对“集中制”指出，在缺少来自普通党员的必要监督的情况下，赋予党的领导核心过大的权力，会导致下列情况：

中央委员会到处“痛斥”所有它不满意的成员，到处安插亲信，而在所有委员会中充分安插了这些亲信以后，就能不费力气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这个代表大会，这个由亲信们所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异口同声地向领导人高呼“乌拉！”赞成他的所有成功的或不成功的行动，并为他的所有计划和倡议鼓掌。那时我们党内的确不会有多数派和少数派，因为那时我们正在实现波斯王国的理想。

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三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都看到“集中制”的弊病以及它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幸而言中，30年代的苏联完全印证了他们的预见！

顺便讲一个译名问题。《托洛茨基传》这次再版把“军事共产主义”一词改为“战时共产主义”，译者说，初版误听了“一位权威人士”的意见，用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译法。

20世纪90年代，我应邀客串这部书的终审，在阅读清样的过程中对书中某些

译文和名词顺便提出修改意见。这不是终审的职责,仅仅是顺便而为之。原稿中的“战时共产主义”我建议改作“军事共产主义”。理由是这个制度并非仅仅出现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而是在内战之前就开始,并且在30年代实际上继续执行了这一政策,所以这一政策并非完全出于战时的需要。马克思早就批判过“军营共产主义”,1917年前后,布尔什维克原领袖之一亚·亚·波格丹诺夫也曾警告过布尔什维克不要搞“军事共产主义”。粮食征收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布尔什维克政权宣布实施粮食征收制是在内战爆发之前,而不是在内战爆发之后。列宁后来总结军事共产主义的时候承认,“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应当译作粮食征收制。——引注)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这已不是战争的逼迫,而明显是指导思想的问题了。这种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军营共产主义”,如果译作“战时共产主义”,把它限制在“战时”,就缩小了它的范围。并且俄文“военный”一词的本意是“军事的、战争的”,译作“战时”附加了时间概念,一般说来也没有错,但在这个场合,以不赋予时间概念为妥。本人实际上是以第一读者的身份提出的改译建议的,没有强制性,更同“权威”不相干。我在《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3期《不仅仅是翻译问题——关于苏联史中的两个译名》一文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6月9日

托洛茨基著作在中国

十月革命前,托洛茨基流亡欧洲,主要从事文字和口头宣传工作,俄国1905年革命中曾短期担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2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应《基辅思想报》约请,当过军事记者。十月革命后担任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领导工作,但仍然笔耕不辍,在国内战争和党内斗争中留下大量的著作。1929年被驱逐出境,流亡国外,更是集中精力从事写作。他的一生留下大量的著作,其主要著作在中国解放前和解放后陆续被翻译成中文,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成为禁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解禁,终于被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著作收入人民出版社的“人民文库”。

十月革命后从20年代起开始给领导人出文集。在苏联出全集(文集)的第一是列宁,第二是托洛茨基,第三是季诺维也夫,当时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文献、革命文献出版的。

《托洛茨基文集》从1923年开始出版,1927年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解除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最后被开除出党,于是其《文集》的出版也就被中止,1927年出的第21卷为《过渡时期的文化》,可能就是最后一卷。这就是说,托洛茨基的《文集》至少有21卷,不过国内能看到的《托洛茨基文集》只有13卷。

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托洛茨基与列宁齐名,他的著作也被及时介绍到中国,例如1921年出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记实》,周铨翻译。此书俄文原名为《从十月革命到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出版,中文版出得相当及时。托洛茨基是十月武装起义的总指挥,接着又组建红军,直接参加了在布列斯特同德方的和谈,作为一系列事件的亲历者,此书应是最早系统介绍十月革命经过的著作。1918年托洛

茨基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19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詮翻译的此书，书名为《多数党与世界和平》。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显然有助于国人了解俄国的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

十月革命后，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写了《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指责布尔什维克违背自己早先的诺言搞恐怖主义。列宁为此写了《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叛徒》(1919年9月)^①一文予以批驳。不过这种短评性质的文章显然是不够的，于是由托洛茨基执笔写作了《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1920)一书进行系统的反驳。当时在俄共党内有能力同考茨基这类国际大理论家展开论战的除了列宁，只有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人了，所以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文章和决议一般都由他们起草和写作。此书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出版，中国也没有落后，192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罗慕敢翻译的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一书。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写作出版了小册子《论列宁》(1924)。1933年南京国际译报社出版了韩起翻译的《列宁传》，1939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戚铭远翻译的《列宁》。40多年后，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王家华和张海滨翻译的此书《论列宁(供传记作者参考的材料)》。

托洛茨基的兴趣广泛，尤其爱好文学艺术。他的文字很好，在20世纪初就享有“小册子之王”的称号。一位苏联同学对我说过，她父亲亲自听过托洛茨基的讲演，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在当时的领导人中间最有文化修养的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两人。他关心文学创作，1924、1925年俄共中央开过几次文艺工作会议，他都出席并对文艺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正是他提出“同路人”的概念，反对当时文艺界左派排斥和打倒无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作家的极端主张，主张团结非无产阶级作家的“同路人”，这个主张写进了1925年俄共中央关于文学的决议之中。1923年托洛茨基出版了《文学与革命》一书，其中收入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后撰写的有关文学艺术的论文。不久北京未名社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1928)，此书在我国左翼作家中颇有影响，鲁迅的案头就有这本书。199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刘文飞、王景生和季耶翻译、张捷校订的《文学与革命》，这是全本，篇幅增加了好多。我觉得，研究中国左翼文学或者说普罗文学历史的人需要读读托洛茨基的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174—185页。

这本著作。

到这时为止,托洛茨基的著作是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这时候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并且是重要领导人,还没有被贴上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者叛徒间谍的标签。长期以来我们判断真伪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往往不是其真实的内容,而是人为贴上的标签!

估计 20 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不止这一些,但由于长期反托派、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估计有些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已经湮灭了,现在已经查不清楚,找不到了。

托洛茨基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也引起国人的兴趣,在二三十年代之交我国相继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苏俄之前途》,梁鉴舜译,上海新宇宙书店 1930 年版;《英国帝国主义的前途》,张太白译,上海春潮书店 1929 年版;《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 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上海群育书店 1930 年版。

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中国出现托派,这以后翻译出版托洛茨基著作的任务就主要落到中国托派的头上了。中国的托派有一个特点,这就是俄文比较好,正因为俄文好,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能够直接听懂讲授的内容,能够课外阅读俄文书籍,这使他们能够直接了解到托洛茨基的主张,知道在中国大革命中托洛茨基的策略要比斯大林正确,因而信奉托洛茨基的主张,成为中国的托派。托洛茨基在联共党内遭到失败,被驱逐出境。中国的托派则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另组托党。这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党派,既不为中共所接受,又受到国民党的镇压,这批书生能够做的工作,主要就是翻译托洛茨基以及国际托派的著作,这样既可以宣传托洛茨基的主张,又能够解决他们的经费问题。因此从 30 年代起,托派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居留的第一站是土耳其,住在名叫普林吉坡的小岛上。早在流放阿拉木图的时候,他已经着手写作自传,到普林吉坡后继续此书的写作,并且很快完成了。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的译序中这样评价这本著作:“《我的生平》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的一部回忆录。就列宁的同时代领导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本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他所记述的是 20 世纪最初 30 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涉及当时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以及党内斗争等

重大事件。关于这段历史的知识,过去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供的,其中有大量不实甚至伪造的东西。托洛茨基的回忆录以当事人的身份,依据他所掌握的历史资料,从另一个视角给我们描绘了这段历史的过程,这是弥足珍贵的。”此书完成后,多家外国出版商同他签约,以多种外语出版。中国的译界和托派也不落后,很快就出现了此书的多种中译本。1930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石越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同年春秋书店出版了成绍宗翻译的《我的生活》。193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刘镜园翻译的《托罗茨基自传》,1941年刘镜园翻译的自传以《我的生活》的书名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同年春燕出版社出版了由何伟翻译的《托罗茨基自传》,这是根据1933年作者的删节本译出的,虽是删节本,但重要的内容都有了。这些译本有的译自英文,有的译自法文,有的译自俄文,译文质量参差不齐,质量较好的是刘镜园即刘仁静的译本和何伟即郑超麟的译本,两位译者精通俄文,还能参照其他国家文字,这就保证了译文的质量。不过那时所使用的语言,现在读起来已不大适应了。我深知此书的重要性,一直请编译局图书馆寻找此书的俄文原版,大概在80年代初终于找到。此书被华东师大的朋友借去并组织翻译,后来他们约我做最后的校订。我在1989年炎热的夏天把全书校订了一番,但当时出版社不敢承接这种有风险的图书,书稿在京沪两地转了好几个来回,直到2007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书。解放后华东师大出版社1980年出过两卷本的由英文转译的《我的生平》,是华东师大政教系国际共运史教研室翻译的。1996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由石翁等翻译的《托洛茨基自传》,这是从俄文翻译的译本,只是其译者前言中有一些不应有的错误。

关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一些亲历者写有专著或者回忆录,例如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历史学家米留可夫著有《回忆录(1859—1917)》和《转折中的俄国》。临时政府总理、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著有《历史转折中的俄国》。孟什维克苏汉诺夫著有多卷本的《革命札记》,几乎逐日记载了1917年发生的各种事件。布尔什维克阵营中,只有托洛茨基撰写了大部头的三卷本《俄国革命史》。

托洛茨基是1917年5月回到俄国彼得格勒的,属区联派,由于其不断革命的观点与列宁当时的主张契合,很快就同布尔什维克党合并了。七月事变后列宁转入地下,托洛茨基入狱。粉碎科尔尼洛夫将军叛乱后托洛茨基出狱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苏维埃转向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在苏维埃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具

体组织实施了十月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新政权的第一份公告就是宣布政权转归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军事革命委员会。^①

1924年托洛茨基发表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十月的教训》，概述了布尔什维克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程，指名道姓地揭示了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错误，引发后三人的猛烈反击。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托洛茨基后来撰写俄国革命史的一个纲要。1946年春燕出版社出版了由唐盛翻译的《十月教训》，作为该出版社“新旗丛书之一”。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完成《我的生平》后，立即从事俄国革命史的撰写工作。托洛茨基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最直接的参与者，可以说是十月革命的缔造者之一，这样的作者撰写革命史，自然具有非常的价值，所以书一问世立即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中国的托派王凡西和郑超麟也在艰难的条件下翻译了这部著作，由春燕出版社于1941年6月出版，并在1948年6月再版。中文版把此书分为三卷，第一卷是俄国二月革命史，根据俄文版，参照英译本译出，第二、三卷是十月革命史，第二卷根据英译本译出，第三卷根据法文版译出，曾经用英、法文互校，最后又用俄文核对过，可见译者是非常认真对待本书的翻译的。我翻看过，译文不错，只是现代读者读起来对当时的译名、译语会有点不习惯。这个版本弥足珍贵的是有托洛茨基撰写的《中文版自序》，其中写道：

“让我表示坚定的希望，希望这部书确实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我这部书无论有何缺点，但有一件事我敢自信的，即是：书中事实底记载完全是出于‘良心’，这话是说都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的；总之，其中没有一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缘故而篡改过或歪曲过，更没有为了个人声望缘故而出篡改过或者歪曲过。”

托洛茨基接着批判了不久前出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底不幸就在于：世界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的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史也陷于此命运

^① 见《列宁全集》第33卷。

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污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

托洛茨基写此自序是在1940年7月初,没有最后完稿即于8月被苏联特工刺杀。同《斯大林评传》一样,此序言也浸染了托洛茨基本人的鲜血。

目前网上有此书的电子版,用的是郑超麟和王凡西当年的译本,对文字和译语做了一些修改,以适应现代读者阅读。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丁笃本翻译的译本。

郑超麟等翻译的《俄国革命史》虽然出得很及时,但知者甚少。除姚海的《俄国革命》(《苏联史》第1卷),中国人撰写的与俄国十月革命史有关的论著未见有人利用过托洛茨基的这部著作,这是令人遗憾的。不管是否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作为俄国革命的领袖、亲历者的著作,研究俄国革命是不能撇开它的。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还完成了《不断革命》一书。托洛茨基从1905年起有大量的著作阐述、发挥这一理论,但一直没有时间做完整系统的论述,到土耳其后终于有时间从事写作,完成此书的写作,1930年在德国出了俄文版。中国的托派彭述之翻译了此书,于1934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郑超麟的译本,但我没见过。1966年三联书店组织翻译了此书,书名为《“不断革命”论》,内容扩大为三部分:1.蔡汉敖从俄文翻译的《总结与展望》。2.柴金如从英文翻译的《不断革命》。3.边忆菊(即编译局)从《俄国革命史》中选译的《关于“不断革命”的一些历史材料》。

托洛茨基身在国外,但还是非常关注苏联国内外发生的一切的。1933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由刘镜园编译的文集《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文章大多取自柏林出版的俄报和纽约出版的《战士》周刊,其中收入《十月革命之历史的意义》、《苏联经济中的危机》、《特米多的危险》、《国际形势之钥在德国》、《我看俄德将有战争》等八篇文章。

1934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陈清晨等翻译的《苏俄第一次第二次五年计划论战》,内收托洛茨基的《苏联经济之危机(第一个五年计划总评与第二个五年计划之路线)》等。

1937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由许庸翻译的小册子《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这是译自《反对派公报》的文章。

托洛茨基研究苏联的最重要也是最有价值的著作当推写于 1936 年的《被背叛的革命》。此书出版后不久,1939 年春燕出版社即出版了由何伟翻译的《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书名取自《被背叛的革命》的副题。《出版者序》这样评价此书的:

他(托洛茨基)拿了马克思主义这把冷酷无情的刀,像医生似的,平心静气地检验与解剖着整个苏联的机体。凡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甚至家庭等方面,他都毫不含糊地指点出它的强处或弱点,不掺杂丝毫感情,不混合半点意气,他让你看到苏联的真面目;但决不是它的假面具。

当然,完全不带感情是不可能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基本概括了本书的主要内容。我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读本》的导读中说:

这本书“对当时的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剖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的理解和阐述,他对苏联社会所作的分析,仍然能给人以某种启迪。这是托洛茨基留给我们的值得批判地吸收的遗产。要探讨苏联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崩溃的原因,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此书 1963 年由柴金如翻译三联书店以《被背叛了的革命》为书名出版,由于当时找不到俄文原著,是从英文转译的。鉴于此书的重要性,我在编《托洛茨基读本》时把选入此书的四章从俄文直接译出。

中国大革命期间,托洛茨基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论述中国的革命运动,提出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不同的策略。被驱逐出境后托洛茨基继续关注中国革命问题,论著不少。国内出版过杨笑湛编译的《中国革命问题》(第一、二集),后来春燕出版社出了由凡西校译的《中国革命问题》,书前有校译者写于 1947 年 4 月 27 日的长篇序言,由此可以推断此书于 1947 年或 1948 年问世。所收文章分四个时期:联合反对派时期,阿拉木图流放时期,寄居普林吉波时期和寄居挪威及墨西哥时期。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述大体上都有了。此书后面所附的图书广告刊载了“新书预告”,其中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过渡纲领》、《最后的论文和书信》以及《俄国革命史》(再版)。前三本书我没有见过,不知最后是否问世。不过从《俄国革命史》出版可以大致断定,另三本书问世的可能性较大,只是由于中国托派的后来遭遇,这些书没有能够保存下来或者没有被发现。

托洛茨基是联共(布)党内左翼反对派领袖,写有许多文章阐述左派的观点。1930 年上海育群书店出版了他的《保卫苏联和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

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这里说的“极左派”即托洛茨基反对派。同年，国际研究会出版了乐三翻译的《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此两书应是同一本书。

托洛茨基是第四国际的创始人，他的一些有关第四国际的文章都被及时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国际的纲领《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过渡纲领)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上海先锋出版社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名于1939年出版，译者李新如。1940年第四国际召开紧急大会，发表《第四国际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宣言被译成中文以《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书名出版(具体出版社及时间不明)。1939年托洛茨基著《他们的道德和我们的道德》在巴黎、墨西哥出版，其中译文收入李书勋翻译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道德与辩证法》(1939)。

1938年亚图书馆出版了李书勋翻译的列宁、托洛茨基著《恩格斯评传》。书名起得大了，实际上只收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列宁的《弗里特里希·恩格斯》，另一篇是托洛茨基的《由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里所见到的恩格斯》。有意思的是译者序里把托洛茨基同列宁的关系比作恩格斯同马克思的关系：

至于历史地位呢，托氏之对于列宁，也正和恩格斯之对于马克思一样，“演奏着第二把提琴”。还有在能力之多样性以及才智之灵活性方面，这两人实在有其极度相似之点。

1938年托洛茨基的儿子突然病逝，托洛茨基认为是被谋害的，写了悼念文章《列夫·西道夫——儿子、朋友和战士》。上海亚东图书馆迅速出版了由李书勋翻译的小册子《悼里昂·西道夫——儿子、朋友、战士》，其中还收入西道夫的《论斯达汉诺夫运动》和阿述·平古斯的《托洛茨基近况》。

上面就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托洛茨基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情况，多数是见到书的(编译局在60年代曾经花很大的人力寻找托洛茨基的著作)，部分是在图书广告中看到的，如最早期出版的著作。解放前图书的发行量本来就不多，流传不广，解放后托洛茨基的著作成为禁书，托派的藏书被查抄没收，因此很难找全，估计还有一些中译本没有被发现。

顺便说一下，托派不仅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还译有其他作者的著作，例如郑超麟翻译了法国作家纪德的《从苏联归来》。20世纪90年代我曾多次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很想见一下郑超麟先生，曾托华东师大的朋友联系，但没有结果。

后来从 1999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的《从苏联归来》得知,郑超麟先生费很大的周折寻找他在 30 年代翻译的此书。其实我手头就有亚东图书馆 1937 年出版的林伊文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和 1938 年出版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两书,如果能够在 90 年代见到郑超麟先生,那么先生肯定能够在生前见到重印的纪德此书!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出版了一批“灰皮书”,托洛茨基著作是其中的重头戏,虽然翻译出版了,但发行量非常少。下面开列的是“灰皮书”中的托洛茨基著作:

《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上下册),林基洲、郑异凡编译,但未署名,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无出版年月。

《俄国局势真相》,刘琪译,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被背叛了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三联书店 1963 年版。

《十月的教训》,载《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 1964 年版。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吴继淦、李潞译,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苏联的发展问题》,列兵(郑异凡)等译,三联书店 1965 年版。

《“不断革命”论》,柴金如等译,三联书店 1966 年版。

《托洛茨基言论》(上下册),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三联书店 1979 年版。这是最后一本“灰皮书”。

80 年代以来,托洛茨基的著作不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而是作为普通图书出版发行,其中有:

《论列宁》,王家华、张海滨译,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托洛茨基回忆录》,王景生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文学与革命》,刘文飞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我的生平》,赵泓、田娟玉译,郑异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托洛茨基读本》,郑异凡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

《托洛茨基文选》,郑异凡编,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俄国革命史》,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

“文革”中“灰皮书”流传到社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启蒙”读物。“文革”结束

后,托洛茨基的著作逐步解禁,出版社出的托洛茨基著作从“内部发行”变成公开发行。2008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郑异凡编的《托洛茨基读本》,内载编者写的长篇《导言》。托洛茨基著作一直是由人民出版社及其副牌三联书店作为“灰皮书”出版的,21世纪初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人民文库”,从历年出版的两万多种作品中“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郑异凡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被收入《人民文库》,于2010年问世。托洛茨基的著作不再是“黑书”或者“灰皮书”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和主张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的流派终于被放在应有的位子上,供人研究了。对托洛茨基这样一个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有着相当影响的人物,应当根据其本人的著作和行为进行客观的认真的研究,而不能一骂了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解放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有一些译者是明显的托派,但也有一些译者的身份不明,不过不管是否属于托派,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从人类文化的积累、流传和延续来看,是有功于历史的。

2015年清明于北京

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

——读《炼狱》^①

1952年12月22日,我刚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久,夜里淞庄宿舍的灯光突然大亮。第二天听说,抓了一批托派。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托派”为何物,后来学习“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才知道,这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是一帮杀人凶手。至于中国的托派,人们只知道党史上有一个“托陈取消派”,是领取日本津贴的汉奸特务。在国际共运史、苏共党史、中共党史,只要戴上托派的帽子,就等于反革命,必死无疑。后来看的书多了,知道托洛茨基并非被妖魔化的那样,是十月革命的功臣,红军的缔造者,至死不渝的革命家。然而,关于中国的托派,仍然不甚了了。直至读到吴基民的《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才稍微详细一点地知道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还有一批鲜为人知的另类革命家——托派。

《炼狱》以简短的篇幅,介绍了中国托派的奋斗与苦难。它告诉读者中国托派的产生和历史演变,逐个介绍了托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作者不仅查阅了各种书面资料,而且亲自访问了一批劫后余生的托派人物,记录了他们的经历和所受的难以想象的苦难。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的托派没有辉煌的业绩,更没有尝到过胜利的喜悦,他们的奋斗不为别的,只为自己的信念,只为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托派中有不少人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领导人,甚至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中共创始人,这些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为什么又脱离了共产党,成为异端呢?

^① 吴基民:《炼狱——中国托派的苦难与奋斗》,[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8年版。

实际上,中国的托派是大革命失败的产物。中国的大革命是轰动世界的大事件,是孤立的苏联的希望所在。那些日子,苏联的《真理报》每天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国大革命的进展,把苏联的命运同中国大革命的命运紧紧地联接在一起。遗憾的是,大革命期间中共的行动是由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遥控的,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肯定是要失败的。

从列宁逝世前后开始,俄共(后来的联共)开始了激烈的党内斗争,起初争论只涉及党内民主,经济政策,历史问题等等,后来随着中国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党内的争论发展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的争论,出现两派,一个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派,一个是已经开始在联共党内失势的托洛茨基派。中共遵循的是斯大林的方针,然而在此方针的指挥下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寻找失败的原因和摆脱困境的出路。有一批被送到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这里亲眼看到了联共内部的分歧和斗争,知道他们党内对中国大革命还有另一种主张——托洛茨基的主张,这种主张往往与他们的苦苦思索不谋而合。于是在这些学生中出现了支持托洛茨基观点的所谓托派。他们毕业后被遣送回国,也就把托派的主张带到中国。

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托洛茨基不断批判斯大林的方针,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独立性,退出国民党,不要轻信蒋介石、汪精卫,要有自己的武装,等等。所谓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路线,被迫执行的陈独秀只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独秀一旦了解到托洛茨基的主张,立即加入到托派组织中去了,一些在中共担任高级职务的领导人也纷纷转到托派的立场。这时候托洛茨基在联共的党内已经失势,他的支持者大多被开除出党,有的遭到逮捕,有的遭到流放,他们的吸引人之处不是权力,不是卢布,不是枪支,而是主张和思想。

本来所有这一切都是总结历史教训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党遭到挫折和失败后都应当做的事,必须做的事,并不涉及什么派别问题。不幸的是,这是在苏联指挥下的革命,因此对革命的总结本身也不能摆脱联共自身内部的派别斗争。这样,总结经验教训就成了派别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中国出现了有组织的托洛茨基派。这个派别一诞生就注定要遭受苦难、磨难,打入万劫不复的炼狱的。第一,他们面对的是国民党政府一个接一个的“剿共”高潮。国民党哪能分辨出什么是正统

的共产党,什么是托洛茨基派!它只知道,他们的目标都是要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是搞共产革命的。因此在他们的牢房里关押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托派党员。不过应当说,国民党没有看错,两者确实都是它的敌人。第二,他们要面对的是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当然,那时候共产党还没有执政,不可能动用专政的武器,但是凡是共产党的根据地,对托派或疑似托派是绝对不客气的。在日本人的占领区,情况同样如此。在夹缝中求生存,进行奋斗的托派的境遇可以想象。并且,他们一旦脱离共产党,也就意味着断了自己生存的经济基础,再也得不到苏联卢布的支持了。他们多数只能依靠卖文为生,并靠此提供所需的经费。陈独秀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困难的了,但是还得拿出自己的稿费去支持托派的活动。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这些人坚持斗争,为的不是金钱富贵,而是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相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相信自己奋斗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他们是一群向风车挑战,同风车斗争的堂吉诃德。

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上,他们找到了比斯大林正确的主张,然而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无论斯大林的主张,还是托洛茨基的主张都不切合中国的实际,都不能引导中国走向胜利。不过那时候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还在探索之中,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各种认识和想法是很自然的。

帮派会社的传统是对外部敌人可以宽恕,甚至可以结盟,但对内部的“叛徒”必须严惩,必须清除,置之死地而后快。苏联对托派就是如此。托洛茨基失败了,先是流放边远的阿拉木图,然后是驱逐出境,再后是多次暗杀,终于丧生在苏联特工的冰斧之下。罗织罪名是实施这些措施的舆论准备,斯大林一口咬定托派是“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间谍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有了这些吓人的帽子,就可以格杀勿论了。上世纪30年代托派在苏联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在国外活动的托派已经被断绝了同国内的联系,然而斯大林需要制造一个永存的假想敌,把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同托派联系在一起,30年代苏联的三大公开审判案都同托洛茨基挂钩,连被指责为右派的布哈林案也变成“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把曾经水火不相容的两派捏在一起。王明、康生用的也是这种伎俩,他们硬说中国的托派接受日本津贴、充当日本间谍。王明公然宣称:“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日本间谍。”在王明占据领导地位的时期,托派这顶帽子是他排除异己

的一个法宝,不仅真托派受到打击,而且一些与王明有分歧反对过他的人也打成托派,例如在中山大学反对过他的俞秀松、董亦湘,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

世界托派组织从成立时起,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内部派别众多。中国托派是世界托派组织的一个缩影,从建党之时起一直存在四派,无法真正统一起来。本来人数就不多,又分成四派,其战斗力可想而知。陈独秀 1938 年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如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这是对托派的非常清醒的评价。

中国托派的功绩与其说是革命斗争,不如说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历来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般只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组现象,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得到传播的一开始只有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学习,那时还没有斯大林的事。托派中有不少精通外语的人才,在不能从事其他活动的情况下,就坐下来埋头翻译,不仅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也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精通多种外语的杜畏之曾担任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时的翻译,他加入托派仅一年,1933 年脱离了托派,专事教书和翻译,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等几十本书。解放后他先后被关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和北京的秦城监狱从事翻译工作,大概还“为反修斗争”服务过。刘仁静是中共一大的代表,建党的元老,是中国托派中唯一去土耳其朝拜过托洛茨基的人,他在 1937 年退出了托派,以后一直在国民党机关中工作。1950 年发表公开声明,承认错误,此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就是他翻译的。郑超麟去世时讣告中给他的一个正式头衔是“翻译家”,他翻译过曾经作为中共党校教材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托洛茨基的名著《俄国革命史》。1975 年出狱后,还组织翻译了伊萨克的《托洛茨基三部曲》(中译名为《先知三部曲》)。托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忘记的。顺便说一下,托派反斯大林,但不反列宁,不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这很像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梅德韦杰夫兄弟。

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担心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而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不但宣布“一边倒”,而且采取行动证明给斯大林看。1952 年 12 月 22 日“大肃托”,一夜之间逮捕了一千多名

托派分子,这大概是送给斯大林的一份生日礼物。这些被捕的托派被分别判处3年、5年、10年、15年、20年以至无期徒刑。还有黄鉴铜、郑超麟、尹宽和喻硕遗四人以“罪恶太大,实在无法量刑”而被挂了起来,一直被关押在监狱,成了实际上的无期徒刑!1972年,毛泽东指示释放所有在押的托派,但那时全国正处于混乱之中,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并没有得到落实。1975年中共中央提议释放全部在押的国民党罪犯,这些反国民党的托派才搭上车,一起获得释放。获得释放并没有完全摆脱困境,除像郑超麟这样的少数人进入政协或文史馆外,多数人在政治上、生活上仍然困难重重。

中国的托派,如作者说的,是一些了不起的人,选择了一种信仰,一生无悔!他们奋斗过,牺牲过,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炼狱》作者吴基民访问了存活的一些托派成员如王国龙、周仁生、周履锵等,记录了托派的历史,诚如余秋雨教授对他说的:关于托派,如果你不写,别人不一定会写;而现在不写,也许以后永远也不会有人写了……而这些事,这些人恰恰是应该有人去关心去研究的。

这正是《炼狱》一书的意义所在。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10月30日

在监狱里著书立说

这是布哈林的三本狱中遗著：理论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和《辩证法概论》、自传体小说《时代》，手稿于1937年2月到1938年3月在狱中写就，在铁柜子里封存了半个多世纪，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见天日。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在革命遭遇危难之际的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敢于“反”列宁，即同列宁争论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在国家问题上、在革命的阶段问题上，他同列宁有过分歧，革命胜利后，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在工会问题上也同列宁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然而争论归争论，一旦通过争论达成共识（错误也并不总是在布哈林一方），他们又齐心协力地投身于革命的共同事业之中。在十月革命的风云激荡年代，布哈林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核心之一。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几年，布哈林是理论宣传工作的掌门人，主持过共产国际的工作。他没有担任政府部门的工作，其身份是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他写出了得到列宁好评的《共产主义ABC》和总体上得到列宁肯定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善于总结吸取教训，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为新经济政策宣传、论证和发展的重担，不惜为此同斯大林闹翻，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后招致杀身之祸。这是一个为信念而奋斗终生的人，甚至在向斯大林求情的时候，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大事业”，还想利用自己的“余生”去劳改营再干25年，在那里建大学、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或者建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办集中营杂志、报纸等，“为进行一项拓荒者的奠基性的文化工作”，“战斗到最后一息”。布哈林不明白，斯大林不会允许他哪怕多活25天，斯大林的“大事业”需要布哈林的血去贡献祭坛！布哈林不

理解,这是因为 1925 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曾经信誓旦旦地向“新反对派”声明:“你们要布哈林的血?要知道,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布哈林有理由相信这个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出的庄严承诺!然而,自 1928 年同斯大林发生分歧之后,对他的迫害有增无减。1937 年 2 月底,布哈林在参加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的时候,被直接投入监狱,一直关押到 1938 年 3 月,经公审后被枪毙。

布哈林早就想写一本关于文化问题的专著《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但苦于没有时间,只写了其中的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发表在 1922 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在被捕前,他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法西斯主义和文化。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回忆说,布哈林被捕后,她根据布哈林所开的书目,往卢比扬卡监狱送去 1936 年在柏林购买的德文书籍,供布哈林在狱中写作《法西斯主义下文化的蜕化》一书。《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第二卷。布哈林在被捕后于 1937 年 3 月 26 日动笔,在 4 月 7 日以后完成。德国已经根据手稿的打字稿译成德文出版,书名为:布哈林:《狱中著作之一。社会主义及其文化》。

1937 年 6 月布哈林在起诉书上签了字,签字后布哈林获得纸张和书籍,开始写作《辩证法概论》。此书完成于 1937 年 11 月 7—8 日。

接着,1937 年 11 月 12 日,布哈林开始写作自传体小说《时代》。1938 年 1 月 15 日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转交的手稿中有小说的头七章。他以为以后不可能继续写下去了,所以在第七章末尾写了“完”字。实际上,在这以后他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继续写作。

布哈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 20 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他对理论问题极感兴趣,在世纪之初他对当时出现的经验批判主义就有着“某种异端的偏爱”,一个 20 来岁的毛头小伙子“读遍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他利用流亡国外的机会,深入钻研政治经济学。他爱好艺术,他同列宁的第一次见面,列宁是把它当作“年轻的画家”接待的。30 年代有一位苏联画家甚至劝他抛弃“该死的政治”,去当专业画家!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政论、文艺评论、诗歌、小说等,还有由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文献。以短短的 50 年生命,在紧张繁忙的斗争和工作中,能给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留下如此之多的文字遗产，这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不多见的。

布哈林拥有严谨的理论思维，也具备丰富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写像《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样深奥的理论著作，也能写像《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这样的既有理论深度，又浅显易懂的通俗著作，还能写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时代》这样的生动描绘世纪之交的俄国外省和莫斯科风情的文学作品。也许他还记住列宁在“遗嘱”中对他不懂辩证法的批评，他在狱中所写的哲学著作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著作弄丢了，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成的，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那些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这个被列宁誉为“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的布哈林，最后竟被关进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在监狱里利用这个“闲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给我们留下这三部弥足珍贵的著作。要知道，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布哈林得到的不是“创作假”，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创作，而是写供词，进行对质。这三本书如果让一个熟练的翻译家来翻译，一年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

什么是天才？这就是天才！什么是悲剧？这就是悲剧！——按照鲁迅的说法，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苏联社会存在的这种不仅布哈林一人遭遇的悲剧，布哈林在这些著作中没有作专门的评述，他显然并不想在狱中同斯大林争论。但是在《时代》中我们看到布哈林对沙皇镇压的猛烈抨击。

在小说《时代》里有伊万·安东内奇（实际上是布哈林的父亲）同斯拉维扬斯卡娅（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一段对话，谈到了沙皇当局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她发出这样的慷慨：“一个民族的头脑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

不妨读一读下面的对话：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应当走哪一条路。只知道最一般的否定的道理：该反对这个野蛮的专制制度……我常常觉得，社会上甚至对罗曼诺夫君主制度的反文化性质都估计不足……这是老实话……所有优秀的头脑，民族的精华不是统统被绞杀了吗！只要稍稍显出一点才华，露出一点头脑，就被拿去砍了头……这些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要是仔细计算一下呢？普希金是流放、

禁止、猝死。莱蒙托夫是流放，被谢林^①认为是最聪明的人才之一的恰达也夫^②几乎按沙皇的旨意被关进疯人院。波列扎耶夫^③在兵营里受尽了折磨。您还记得那篇《被囚禁的易洛魁人之歌》吗？”

“记得。“我要死了。我交出这具没有人保护的尸体，证明刽子手的可耻！……””

“对……一个伟大的天才……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皮萨列夫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上枪决的刑场，后来又被关进死屋。屠格涅夫，连屠格涅夫也被监禁过。赫尔岑先是关监狱，后来流亡国外。雷列耶夫^④被绞死。拉季舍夫^⑤被流放之后，又服毒自杀……还有被处死的基巴利契奇，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科学家啊！……再说托尔斯泰，他被搜查……而他是世界级的天才人物！还有不久前发生在高尔基身上的事件，多么让人气愤……进监狱是不消说的了……他不是一次蹲过监狱。”

“您说的是科学院的事吗？”

“是呀……院士们是好样的！连契诃夫这个谦谦君子也火冒三丈了！您读过他给院长那个善于阿谀逢迎的自由派贵人的信吗？”

“读过……”

“嗯……您看，俄罗斯的天才人物不断被德国男爵出身的宪兵头子们，本肯多夫^⑥之流、杜贝尔特^⑦之流，还有列文达利之流，这些罗曼诺夫家族的杂种们所消灭……您倒说说看，一个民族的头脑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民众，农夫，工人就更不消说了……不，锅炉会爆炸的……而且很快就要爆炸了……”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 彼得·雅可夫列维奇恰达也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

③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列扎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1826年因为写了讽刺诗而被充军。

④ 孔德拉季·费奥多罗维奇雷列耶夫(1793—1826)，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会员。

⑤ 亚历山大·尼古拉那维奇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作家、革命思想传播者。

⑥ 1826年起任宪兵司令。

⑦ 1835年起任独立宪兵队参谋长兼管第三厅。

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站起身来，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着。伊万·安东内奇沉默不语。

“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您把这一切都看得很认真吗？”

“我还不是—具僵尸。但我是袖手旁观的，伊万·安东内奇……啊，我的托夏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他能够活下去，而且参加了革命的话，我毫不怀疑他会参加革命……也许到那时他会弥补我的罪过，我的小市民习气……可是同时我自己又感到害怕——这样做的命运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即使能取得胜利，活下来的人也寥寥无几……”

这不就是布哈林所面对的现实写照吗？

布哈林在最后的时日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时代》里的一段描写，也许能够给读者一些暗示：

有一天，科里亚^①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忽然碰上了一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这是《少年》中的一段，描写未来的人们失去对上帝和永生的信仰，丢掉了这一条令人宽慰的千年古训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孤苦伶仃的人们立刻会更紧密地互相挨得紧紧的，”读着读着，科里亚的心抽紧了。“他们会手拉着手，明白如今只有他们彼此相依为命了。那伟大的永生的思想已经消失了，必须找到替代它的东西，于是从前对那永生的神强烈而伟大的爱就转移到大自然，转移到世界，转移到人，转移到每一棵野草身上。他们越是逐渐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有限，也就越情不自禁地爱上土地和生命，这是一种特殊的爱，而不是早先的那种爱。他们会在大自然中察觉和发现早先不曾料到的现象和奥秘，因为他们会用新的目光，用情人看心上人的目光来观察大自然。他们会觉醒过来，急切地互相亲吻，急切地相爱，因为意识到来日不多，意识到这就是他们还能够做的事情。他们都为别人而工作，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别人，并且因为能够付出而感到幸福。每个孩子都会知道并感觉到，世上的每个人都像是他的父母，每个人看见落日时，都会想：‘即使明天是我的末日也不要紧，虽然我死了，可是他们还全部活着，他们死后

① 科里亚是小说《时代》里的主角，即布哈林自身。

还有他们的子女。’他们都活着，彼此仍然相爱，而且为别人而担忧这个想法会取代在冥界相见的想法。啊，他们会急切地相爱而消除自己心中强烈的哀愁。他们会为自己而自豪，变得勇敢大胆，但是会因为别人而变得畏怯；每个人都会为别人的生命与幸福而提心吊胆。他们相互都是温情脉脉，不会像现在那样因此而感到羞惭，他们彼此会像孩子一般的亲热。他们相见时，会用深邃的、沉思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目光里含着钟爱和愁绪……”

科里亚目不转睛地读完了这段话。他兴奋极了……他找到了！而且是没有上帝。说得多好啊！多么鲜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拨动了科里亚心中最脆弱的那根弦，于是弦声响了，他听到了非尘世的绝妙音乐，这音乐总有一天会降落人间……可是它会怎样落下呢？……于是又开始了痛苦和疑惑……要知道那时的人们将不再是今天的人们，那时会是……科里亚眼前立即出现了阿拉克切耶夫^①、萨尔台奇哈^②之流的人物、刽子手、凶狠的沙皇、毫无怜悯心的压迫者……部队，还需要把地球打扫干净……“不知道忧伤和愤怒的人，不会爱自己的祖国。”

丢掉对“上帝”的信仰，抛弃对永生的追求，认清生命反正是短暂和有限的，泰然面对死亡，寄希望于明天——“即使明天是我的末日也不要紧，虽然我死了，可是他们还全部活着，他们死后还有他们的子女”。这恐怕也就是布哈林临刑前的心态！

关于布哈林的著作，我国从80年代初起陆续出版了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1981），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套布哈林多卷本文集，在80年代初是空前的，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恐怕还可以说是绝后的——世界范围的布哈林热已经过去，布哈林故乡也已对他失去兴趣。

我们编译《布哈林文选》的时候自然不知道在斯大林的秘密档案库里还保存着布哈林处在“生与死之间”的一年时间里写下的三本著作。1992年我去莫斯科访

① 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俄国伯爵、将军、亚历山大一世时专横残暴的宠臣。

② 达·尼·萨尔台奇哈(1730—1808)，莫斯科省波尔多斯克县女地主，折磨死100多名农奴。

问,曾专门去“俄国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查阅布哈林档案,但在“布哈林卷宗”里几乎一无所有。唯一一份有分量的文件还是拉林娜—布哈林娜凭记忆写下赠送的布哈林的《致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信》的打字稿。

苏联时期的档案资料几经浩劫:斯大林镇压高潮期间,曾大量销毁手稿文件;后来,1941年在希特勒进攻莫斯科期间,内务部也销毁了大量文件;据说斯大林逝世时在混乱中曾大量销毁档案资料,1991年“8·19”事件期间还销毁了一批档案文件。但幸好斯大林时期还是保留了不少文件,原因之一是这些文件上盖有图章:“永远保存”在内务部和斯大林档案库。布哈林的三本遗著即属此类。

1937年2月27日布哈林被捕,在狱中渡过12个月,在卢比扬卡监狱写了这三本书和一扎抒情诗。手稿立即被当作“绝密”文件送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斯大林,藏之于斯大林的绝密档案库,也许斯大林是其唯一的一名读者。遗稿得见天日,是布哈林的亲属和美国的布哈林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多方努力的结果。

众所周知,斯蒂芬·科恩是布哈林政治传记《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作者,从1975年起同布哈林一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续写布哈林传的时候,他发现布哈林有可能在狱中写下什么东西,但直到同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私下谈话时才得知存在四份手稿的事实。于是他开始以布哈林的亲属——妻子拉林娜和儿子尤里的名义搜寻手稿。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请求表示同情,但无能为力,因为他卷入了党内争取对“党的档案”的控制权的斗争。不久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失去总统职务,也失去对克里姆林宫总统档案的控制权。1992年拉林娜已年近80岁。她委托斯蒂芬·科恩为其代理人,以自己是布哈林所有文字材料的合法继承人,因此有权查阅一切与其案件有关的档案的名义,授权科恩查阅所有与布哈林有关的档案。原内务部档案库迅速给予肯定的回应,但科恩仍然无法进入藏有布哈林以及其他重要人物档案的总统档案库。1992年在公开审讯苏共的时候,科恩找到叶利钦的一个亲密助手,他被拉林娜想要知道自己丈夫悲惨命运的要求所打动。经他的联系,数周后四份手稿的复印件送达布哈林亲人手里。小说《时代》于1994年由俄进步出版社出版。其余手稿,包括哲学和文化的著作随后以俄文和德文出版。据布哈林女儿古尔维奇说,诗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工编辑,暂时不能发表。另外一些重要文件迷失或被销毁,其中就有布哈林论述文化的第一卷手稿,这是在被捕前夕完成,在搜查住宅时被没收的。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特别嘱咐把它找出来,说

“如果丢失了,那太可惜了”。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千千万万革命战士流血奋斗的历史。我们看到有不少仁人志士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而有的革命战士在敌人的牢房里,还给后人留下不朽的诗篇,发人深省的著作。最著名的在中国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在德国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在意大利有格兰西的《狱中札记》。他们在战场上拼搏之后,利用狱中的“余暇”,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给后人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敌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在“自己的”监狱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时间里争分夺秒地写下三本巨著,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甚至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此类悲剧的重演。

《读书》2006年第6期

纪德的悲哀

——再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

1936年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应邀访问苏联。这是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的前夕，一部新宪法正在准备之中，苏联国内似乎要实行较多的民主了。国内的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开始摆脱饥荒的阴影。然而，与此同时，国内正在加大镇压的规模和力度，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纪德一行5人，有两人俄语很好，还有一人刚刚在莫斯科工作了6个月，基本上不存在语言的障碍。回法国后纪德出版了他的《从苏联归来》。由于出版了这本书，纪德本人从“苏联之友”被打成了“反苏分子”，受到猛力的攻击。《真理报》骂他是“说谎者”，是“法国的旧作家与俄国轻滑的白党的杂色混合物”，是“骗子”，等等。

那么纪德在《从苏联归来》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简而言之，他根据自己亲身所见所闻所思，讲了点真话而已。通过在苏联的旅行，纪德看到，“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那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他说，他的精神却是“对于我所愿意永远称赞的人，我总要更加严厉些”。他把苏联看作是祖国，向导，榜样，看作是梦想、希望之所在，正由于爱得深，他对在苏联所看到的消极面、阴暗面就更加无法容忍，如骨哽喉，一吐为快。

纪德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上上下下在制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苏联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的无所不在的斯大林的肖像。在格鲁吉亚他的像挂在无疑是从前挂神像的位置上。到了斯大林的故乡哥里，他想给斯大林发一个电报，表示感谢，于是他在邮局

拟了电报稿,其中写有“向你致敬”云云。但翻译告诉他,在“你”字后需要加上“劳动者领袖”,或者“人民导师”之类的敬语,否则就不给翻译,不给发电报!这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和程序。他在苏联的演说,也常遇到此类修改。作家评论说:这在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划下了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不仅如此,他看到,在苏联已经把斯大林当作神,看成永不犯错误的人。

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从精神,乃是附和主义。凡是不肯宣布满意的人,都要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者’”。那年月,托洛茨基的名字就等于“反革命”,凡有不满者,给他一顶“托洛茨基分子”的帽子就够了。在纪德看来,苏联正在败坏革命事业。他不禁问道:“列宁有灵,他今日还肯回到这个地球上来么?”纪德访问的时候,正是斯大林的大清洗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那些过去的反对派,甚至历史上曾经和斯大林有过不同意见的人,几乎都在劫难逃。但是这种做法能够消灭不同意见吗?

纪德写道:在一个国家之中消灭反对党派,或简单不让其发言,不让产生,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要激起恐怖主义的。如果国内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这对统治者自然很便利。但没有对抗力量,“精神”怎能不偏向一方发展呢?

纪德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此下去,不久之后,在斯大林周围将只会剩下那些不会反对他的人。“这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痂舔痔者流。”我们今天看到,在消灭了列宁时代的近卫军之后,在斯大林周围确实就是一些唯唯诺诺的由他一手提拔上来的人。这些人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只不过把自己的异议留在肚子里而已。

在“大清洗”的恐怖中,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告密成了自我保护的手段,当局也用互相告密的办法去打倒想要打倒的人。作家写道,要陷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就去找他们过去的好友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先败坏这两个人的名誉,然后再枪毙他们。如果拒绝作这种卑鄙的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朋友都不免于难。结果人们什么都不敢相信,大家都互相监视着,再也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人了。这种状态,完全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对大吹大擂的莫斯科审判案提出质疑,对被告供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说:“所有这些亲供的真实价值,在我看来,是最成问题的。”

纪德看到,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开始变味,渐渐地成了“官僚分子对于无

产阶级之专政”。在一个把专政矛头对准自己人,对准革命的元勋——列宁的老近卫军,对准广大劳动者的国家里,这种专政确实很难再名之为“无产阶级专政”。

在苏联衡量一切的标准是“路线”。“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到排除的。”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允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他的感觉是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以外,只是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而是要知道,某种行为、理论是否符合神圣的路线。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一概不许。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苏联执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由于精心隔绝同外界一切联系,苏联公民对于外国事物异常无知,或只知道足以鼓励他们的事情。向他们灌输的是“其他一切国家都不如苏联”。老百姓对外国的概念是巴黎没有地铁,那里的工人都是非常不幸的,在苏联以外尽是黑夜,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所有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挣扎。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对这种做法纪德是理解的,他说,在新制度尚未成立而事情往后不会进行得更好的时候,护持着这样一种幸福,对于苏联居民的幸福乃是有重大关系的。然而,长期这样下去行不行呢?

斯达汉诺夫运动在中国也是非常出名的,读50年代出版的苏联书籍,经常可以看到对这位苏联劳动英雄的赞颂。然而纪德对这一现象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所有工人都在做工,本无所用其斯达汉诺夫运动。在苏联之所以需要这个运动,就因为那里的工人或工作“松懈”(他没有说“懒惰!”),所以当人们告诉他斯达汉诺夫用5个钟头做了8天工作时,他不禁问道:“这话不含有当初他用8天来做5个钟头工作的意思么?”纪德是知道法国工人是怎么工作的。一个法国矿工在参观苏联的一个矿山时为了表示友谊,请求代替苏联矿工做一班工作,结果无须怎样奋斗,他们所做的已经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成绩了。而据我们所知,斯达汉诺夫在开始工作之前,大家为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就是说,这种“高产”记录并不是可以天天保持的。

30年代的苏联显然离天堂还很远,人们实际上也没有要求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立即给苏联人民建造出一个天堂来。纪德所看到的苏联仍然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他看到,“苏联没有阶级了,但有穷人。有很多的穷人。”另一方面,苏联正在

形成“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也许在那个时候，这个判断显得为时过早，但产生新阶级或阶层的某些迹象恐怕是存在的。

尽管苏联存在种种弊端，然而纪德仍然认为，这并不能归罪于“原初理想”，而应“归咎于后来的背离”。他对“大同事业”仍然寄予希望：“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事业之真理。”

纪德是带着满腔热情去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希望他能向西方介绍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毕竟纪德是“苏联之友”。然而纪德却不是那种能够轻易上当受骗的人，从一个作家的良知出发，他对在苏联所看到的一切，好的和坏的，都秉笔直书，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纪德的书掀起了轩然大波，对他的指责纷至沓来。有人甚至认为，他的书“不过是一件好买卖罢了”。对于这种指责，纪德回答说：“为什么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拿你们所说的什么‘好买卖’去同苏联献给我的罕有的利益，丰富的金钱以及所有一切荣誉的事情，相较比一下呢？”确实，苏联在接待这些“苏联之友”时是不惜本钱的。他说，如果我写一本赞美苏联和斯大林的书，我将得到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这显然是可以做一笔大买卖的。当然，大笔投资是希望得到回报的。实际上，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以及接着写的《答客难》，是对苏联慷慨接待的最好回报，他指出了苏联的弊病，希望能得到救治。正因为如此，他在给“苏联之友协会”副书记的信中说：

苏联状况无论如何不如人意，如何糟糕，我一定会默而不言的，只须我至少能确信那边是向着更好的情况走去。正因为我不幸深信苏联是在梯子上一级一级下来，而非如我们所期望的一级一级上去，它一个个抛弃了大革命辛辛苦苦得来的利益（我承认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或至少有似是而非的理由抛弃这些的），正因为我害怕看见它拖带法国共产党走向那不可挽救的错误去，——所以我认为我有不得而言之责任。

他指出：“照苏联现在这样进行下去，则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受我们指责的东西，不久就要恢复起来了。不久，十月革命就要从头做起了。现在正是呼喊：‘停住！’的时候了，正是警告的时候了。”这就是贯穿全书的红线——纪德凭作家的良知和洞察力写下所见所闻，看不出有丝毫的恶意。他只是发出一个警告。“虫恰正躲在果子的内心深处。但当我告诉你们：这个苹果生虫时候，你们却责备我没有看清

楚，——或者不爱苹果。”这就是纪德的悲哀之所在。

不幸的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人们看到这个苹果确实被蛀空了——苏联终于垮了。我国的读者在看过尘封半个世纪之久的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之后，不妨去看看纪德的这本《从苏联归来》。由郑超麟先生翻译的此书的中译本也尘封了半个多世纪，不过不是出于作者或译者的本意！

2001年2月15日稿

《驯服的艺术》中文版前言^①

本书作者尤里·叶拉金是幸运的,由于他所从事的职业——小提琴手,在苏联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能够躲在艺术的象牙塔内观察并记录下所见所闻,给人们留下那一时代的生动场景。

叶拉金何许人?其实在俄国知道他的人也不多。

尤里·波里索维奇·叶拉金(Ю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Елагин, 1910—1987),在当时的苏联属家庭出身不良者之列,属“社会危险”阶层,祖父是纺织厂厂主,父亲是优秀的工程师。1928年苏联制造出一个“沙赫特案件”,由此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受到无端迫害。叶拉金的父亲也未能幸免,被流放西伯利亚劳改。19岁的叶拉金本人也被捕入狱,在布蒂尔监狱关押了几个月,后因找不到罪证获释,但被剥夺了公民权。母亲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是钢琴家,丈夫被流放后,她也被遣送西伯利亚,住在离丈夫不远的村庄,目的是能够看到丈夫并尽可能给予帮助。叶拉金从9岁开始学拉小提琴,他的音乐启蒙教育是母亲给的。一个被剥夺公民权的人,要找一个固定的职业是非常难的。他只能在一些音乐团体打工,起初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乐队,1931年在瓦赫坦戈夫剧院的乐队拉小提琴,由于他在音乐方面的天分,赏识他的剧院领导设法把他正式调入乐队,并帮他摘去“被剥夺公民权”的帽子。这样他就有权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取得正式的学历。他边学习,边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工作,过着莫斯科精英阶层的优越生活。1935年父亲在西伯利亚去世,剧院领导又帮他母亲迁入莫斯科居住,而按规定,她作为劳改犯的家属是不

^① [美]尤里·叶拉金:《驯服的艺术》,田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能在莫斯科居留的。音乐学院毕业后,1940年叶拉金被分配到克拉斯诺达尔的一所音乐学校教授小提琴,并在音乐厅兼职。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不知是来不及撤退,还是有意留下,最后进了德国的遣送营。遣送营是德国为从占领区裹挟到德国去的人而设的。1945—1947年间叶拉金就滞留在遣送营,然后辗转到了美国,继续其音乐事业,经常在休斯敦交响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手,得到侨居美国的俄作曲家、指挥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美国指挥家斯托科夫斯基的好评。1965年停止音乐活动,专事写作。据现在所知,他一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苏联大导演梅耶荷德的,书名叫《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1874—1940)——黑色的天才》,另一本就是本书《驯服的艺术》,此书于1951年在美国以俄文出版,成为畅销书,2002年在俄国出版。叶拉金于1987年8月21日在华盛顿去世。

《驯服的艺术》记叙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这大约30年的苏联社会,尤其是1930年到1940年间有关文化界的见闻,这十年间的人和事大多是作者本人耳闻目睹的。在这30年的时间里苏联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既有列宁领导的相对平稳的时期,又有斯大林上台执政后刮起的多次政治旋风。

苏联20年代实行新经济政策,从总体上说,那时的文化领域还是相对宽松的,出现了各种主义并存、各种流派争鸣、各种团体竞争的局面。无产阶级文化派、未来派、意象派、印象派、象征主义(阿克梅派)、先锋派等都有存在及活动的权利。当时存在着各种文艺团体,其中有十月革命前即已存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有从中分化出来的“锻冶场”(1920年底成立),有以“同路人”为主体的“谢拉皮翁兄弟”(1921),有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莫普”,1923),左翼艺术阵线(“列夫”,1922),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1925),等等。在文化领域,“左”的激进倾向盛行,不过,艺术上的“左”的含义与政治上的“左”有所不同,“左翼”是艺术知识分子中最初一批为革命创作的人,他们探寻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其中有些人以其艺术作品丰富了苏维埃文艺。但也有“左”的极端表现——对文化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排斥非无产阶级作家“同路人”。20年代的苏联文坛流派纷呈,复杂多样,出现了一批享誉世界的理论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艺术家。

出现这样生动活泼的局面,和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的文化修养、生活经历有相当的关系。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人文化修养较高,长期流亡西方国家,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因此能够容忍各种文艺思潮。他们当时最为关心的只

有一点,就是各种文艺团体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不能含糊,至于艺术创作的形式和主张则听由各人各派自由选择,不予干涉。他们不授予任何文艺团体以领导权。1925年俄共中央通过由布哈林起草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其中强调,党不能偏袒文学形式的某一派,不能支持某一文学派别,在文学艺术问题上,应当由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争,无产阶级文学应当通过作品的竞争赢得领导权,要根除外行的行政干预。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虽然许多文艺团体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但除了争论,均无权采用行政手段去压制另外一些文艺团体。在20世纪20年代很少看到以领导人个人的好恶和口味来决定某一作品命运的情况。卢那察尔斯基喜欢现代主义作品,而列宁不喜欢未来派、立体派的作品,但他们并不干预艺术家的创作。

20年代末风云突变。斯大林在绵延不断的党内斗争中大获全胜,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反对派,独掌了党政大权。从这时起,斯大林需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于是在这一领域开展了一场大批判大清洗运动。

1929年是斯大林宣布的“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年底,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批判“平衡”论、社会主义建设“自流论”、小农经济“稳固论”等,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像布哈林、恰亚诺夫这样的专家。

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接见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认为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重要的任务是开展全面的批判”,他开出的批判名单中有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德波林等。提出要“挖出和摊开哲学和自然科学积攒的粪便”,“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把理论上的斗争同政治倾向联系起来。“主要的问题就是打击。应当全方位打击,打击没有打击过的地方。黑格尔是德波林分子的圣像。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他总是傲视列宁。连恩格斯也不全是正确的。他关于爱尔福特纲领的意见中有的地方存在长入社会主义的东西。布哈林曾企图利用这一点。如果在自己著作的什么地方触及恩格斯,那也不是坏事。”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学领域批判布哈林、恰亚诺夫、巴扎诺夫、鲁宾、格罗曼、泰奥多罗维奇等;哲学领域批判德波林、斯滕等人;历史学领域批判波克罗夫斯基、斯卢茨基、斯切克洛夫、卢金……甚至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

斯大林的讲话是全线出击的动员令。

1930年4月,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了一次题为“反对文学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论坛,“山隘派”的一些作家因散布“自由主义思想”而遭到猛烈批判。

与此同时,斯大林决定取缔各种文学艺术团体。1932年4月23日联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解散各种作家团体,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

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为唯一的创作方法和指导原则。大会组委会主席И.М.格龙斯基同斯大林有过一次重要的谈话,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由来:

我向斯大林提出建议,希望能把文学艺术创作方法叫做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最好叫作共产主义现实主义……我们一共强调了两个重点:第一,突出苏联文学中的无产阶级特性;第二,指明文学创作活动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斯大林回答说:“您正确地指出了苏联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正确地说出了我们斗争的目标……把工人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说成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些都是正确的,可是我们目前并没有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任务,如果您现在就坚决指明这一最终目标,有点操之过急了吧……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叫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您看怎么样呢?这个定义的好处有三:第一,名称简单(一共才有两个词构成);第二,易于理解;第三,指明了文学发展的继承性。”

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诞生了。领袖定下了创作方法的名称,剩下的就是让理论家们去阐发这种方法的内涵,让艺术家们揣摩这种方法并写出符合要求的作品。

这次作家大会标志着苏联的文学艺术组织上、思想上和艺术上从多中心向单一中心的转变。此后五彩缤纷的文坛不见了,生动活泼的争论场面不见了,出现的作品是对领袖言论的诠释,对领袖个人的吹捧和颂扬。领袖的爱好、口味成了审美和评判作品的唯一标准。最高主宰斯大林自不必说,连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都成了判断艺术好坏的最高裁判官。裁定艺术好坏的机构则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真理报》的一篇社论或者文章可以致作品或作家于非命。

1936年开展了对“形式主义”的声讨和批判。遭批判的所谓“形式主义”并没

有确定的美学含义,而是可以安放在任何一部领袖所不喜欢的作品和作家头上的帽子,其典型定义是:“艺术中的形式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是敌视苏联人民的。党一刻不停地对任何即使是形式主义的最细微的表现保持警惕并进行斗争。”因此,被扣上“形式主义”帽子的人,不管是作家、诗人,还是画家、音乐家,不仅会遭到各种批判、惩罚,甚至会从此在地球上消失。

斯大林使用的不仅仅是“批判的武器”,而且是“武器的批判”。到30年代末,各界的“异己分子”不仅受到批判,而且被消灭殆尽。例如长期担任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总书记的阿维尔巴赫于1937年被捕,最后跳楼自杀。创作了《骑兵军》,被誉为“20世纪最有才华的俄国小说家,也是苏联第一流散文家”的巴别尔于1939年被捕,被控三大罪:“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1940年初被枪决。著名作家皮利尼亚克在1926年发表小说《永不暗淡的月亮的故事》,被认为影射伏龙芝之死,当时即受到指责,1938年被枪决。著名戏剧导演梅耶荷德,人称“戏剧界十月革命”的领袖,于1939年被捕,从此在人间消失。导致其杀身之祸的也许仅仅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他把一部戏剧献给了托洛茨基。像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音乐家算是幸运的例外,1936年他两次被《真理报》点名批判,他本人都收拾好行囊准备“进去了”,但得以幸免,不过他在这一年完成的《第四交响乐》的公演却推迟了25年,他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德谟克利斯剑。名单可以继续开下去,但实在太长了,打住吧。

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赫鲁晓夫后来说,就是他们这些政治局委员,早上出去上班也不知道晚上能否平安回家。赫鲁晓夫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列宁参加的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选出的政治局有七名委员: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托洛茨基,其中季、加、李被枪毙,托姆斯基被迫自杀,托洛茨基遭暗杀,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候补委员布哈林、加里宁、莫洛托夫,三人中布哈林被枪毙,加、莫两人倒是保住了性命,但他们的妻子被斯大林逮捕,成为人质。权贵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文艺工作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终于树立,苏联终于形成斯大林主义的大一统的天下。1938年斯大林亲自参与撰写并最后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标志着文化思想管理体制的最终完成。

在卫国战争期间,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上,为了让更多

的人投入这场民族自卫战争中,曾经一度放松意识形态的控制,甚至求助于东正教会。由于广大军民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

然而,战争的胜利也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难题。国门打开了,大量军官士兵打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冲破了壁垒,了解了外部世界,他们不再像法国作家纪德所描写的那样听说巴黎有地铁竟然惊讶万分了。通过在同一战壕的作战和交流,他们也了解了国内各地的情况。百万红军的复员又把他们所了解的信息传播到国内各个角落。这是国际国内的一场“大串联”。战争结束后,正当人们需要休养生息,过一下轻松生活的时候,“日丹诺夫主义”大行其道,苏联掀起新一轮的大批判的浪潮,锋芒所及横扫了整个文坛。

在40年代下半叶,联共中央接连就文学艺术通过一系列的决议,开展新一轮的大批判运动。1946年8月14日联共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接着于8月26日通过《关于剧场上演剧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9月4日通过《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定,两年后,1948年2月10日又通过《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定。这样,文学、戏剧、电影、音乐、报刊、图书各界就都在劫难逃了。参与制定这些决定并对决定作出详尽解释的是日丹诺夫。

首当其冲的是列宁格勒的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实际上他们仅仅是靶子而已,当局在反对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低级庸俗的口号下,实际上是要制止那些“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的作品”的传播。

1946年9月4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作出决议,落实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精神,不仅继续批判列宁格勒的两家杂志,进而批评莫斯科的《旗》和《星火》杂志,点了更多的作家的名字,批评“对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阿谀”,指责“艺术”出版社出版现代英美剧作家的低劣庸俗的独幕剧集,“以敌视苏联社会的世界观来毒害我国的人民的意识”。决议提出,“必须在作家中间有系统地宣传党在国内生活和国际生活基本问题上的政策,把党和政府的决定广泛地通知作家”。主席团决定解除吉洪诺夫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把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家协会,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还开除左琴科的公职,迫使他到一家皮鞋生产合作社去干活谋生。

1948年关于歌剧的决定点名批判了普罗柯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等著名音乐家们的“反人民的形式主义倾向”,说“这种音乐强烈地散发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

阶级音乐的气息,而这种气息是反映着资产阶级文化的衰亡、音乐艺术的全部否定、音乐艺术的绝路的”。“在一部分苏联作曲家中间,还没有根绝那些为现代衰颓的西欧和美国音乐的影响所培养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余。”

在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还开展了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运动的目的是否定一切非苏联的、非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继续隔绝苏联同西方文化的联系。

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出版后,又在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展开批判。

40 年代下半期到 50 年代初的大批判运动使文艺界和科学界的许多活动家遭到镇压,轻者被解除职务,重者被投入监狱或者流放。而其社会结果自然是在偌大的苏联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文化,一种主义。

斯大林逝世之后有过短暂的赫鲁晓夫“解冻”时期,一批遭镇压或流放的作家艺术家得到平反,一批被禁的作品得以问世。但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又实行了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者”这一特殊现象。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苏联有一批颇受欢迎的著作、电影问世,其中不少是解禁作品。

《驯服的艺术》所描绘的就是苏联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这一阶段的文化现象。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对当时文艺界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有生动的描绘,提供了有关苏联文化界的珍贵材料,其中写到的某些事例已被广泛引用。当然,回忆录本身还不是完整的历史,到底有多少是历史的准确再现,只能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了。不过,无论如何,相信本书对读者了解苏联那一段的独特文化现象还是会有所助益的。

2008 年 11 月 25 日于北京蓬莱公寓

布哈林及其著作变色记

一、布哈林由“党的最大的理论家”变成“人民公敌”

对中国第一代革命家来说,布哈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的著作,特别是他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 ABC》(新青年社 1926 年出版)是当年革命青年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启蒙读本。邓小平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薄一波说,“中国老一辈革命者当年能得到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相当不容易。20 年代初,基本上没有什么马列著作可读。只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同志翻译的,后来经成仿吾同志修改过),大革命时又译出布哈林写的《共产主义 ABC》。一般党员就靠这两本书来进行活动。以后,有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以及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伍修权写道,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员用的教材是《共产主义 ABC》。布哈林的其他著作,如《农民问题》(新青年社出版);《共产党底计划》(即《共产主义者纲领》,由汉口长江书店出版,是康民尼斯特丛书之一);《资本主义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全会上的报告);1924 年为纪念列宁而作的报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新青年社),等等,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热门读物。布哈林的一些理论著作也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如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过渡时期经济学》、《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等著作,纷纷由不同出版社以不同的书名出版问世,有的还一版再版。

1928—1929 年联共(布)内部布哈林同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瞿秋白曾及时客观地向中共中央报告联共党内的分歧和斗争,如今在《瞿秋白文集》中可以读到这些报告。布哈林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受到联共的处分。但是当时联共中央的内部斗争对中国的出版界影响并不大,布哈林的著作照出不误,特别是他的一些理论著作和经济学著作。这适应了大革命失败之后,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需要。

1938年3月苏联举行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公开审讯,中国各报以“大叛国案”为题作了广泛的报道。同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中国很快见到由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中译本,从此布哈林就以“人民公敌”、“匪帮”的面目出现,在以后的长达40年的岁月中,中国再没有公开出版过布哈林的著作。从解放区到解放后的全国,干部学习,高校授课,报刊论文以至一些专著中,按照《简明教程》的口径,布哈林都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富农代理人”、“外国间谍”、“人民公敌”的面目出现。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时公布了列宁“遗嘱”,人们这才知道布哈林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赫鲁晓夫坚持为斯大林的反右倾斗争辩护,不给布哈林平反。所以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布哈林仍然是一个反面人物。中国的高校仍然讲授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马列主义基础”课。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译的两卷本《苏联托洛茨基布哈林反革命派的言论选集》,作为“党内参考,编号发行”。这可以说是“灰皮书”的前身。

二、做了两次的《布哈林言论》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争论公开化,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为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批修文章,不指名地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1960年下半年,为适应反修斗争的需要,中央派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来中央编译局兼任局长,调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王惠德来编译局担任副局长。编译局把原有的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室改组为国际共运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直接从事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我就一直在国际室工作。

这时候苏联有给布哈林平反的意思。1962年12月,苏共中央委员、苏共马列研究院院长彼得·波斯彼洛夫在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回答提问时说:“当然,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李可夫都不是间谍或恐怖分子。”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很后悔当时没有给布哈林等人平反,说他曾经打算为布哈林等人平反,但受到国外共产党人的压力未果,据说其中就有法共施加的压力。

大概就是在此背景下,中央编译局领导布置调查布哈林情况以及苏联准备为之平反的资料。这项工作保密的。我那时从事托洛茨基资料的编译工作,因此没有介入此项工作。最后出什么样的成果,也没有看到。

1964年《红旗》杂志增刊第2号发表郑言实的长篇文章《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布哈林主义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78年再版)。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布哈林既是为国际上的“反修”,也是为了国内的“防修”。现在看来,这种纯粹以斯大林的语录为依据,断章取义地引用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言论为靶子的单方面批判的文章是毫无说服力的。不过由此可以看到,布哈林问题也是当时中苏争论中的一个问题,是为斯大林辩护的重要内容。

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编译老修的言论集,国际室俄文组的一部分同志承担了“布哈林言论”的编译工作。1964年11月此书编成,送交人民出版社,他们已经打印出清样,可惜在“文革”中,出版社保存的原稿和清样全部丢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识别真假马列主义。1974年12月毛泽东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当时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文革”后期又提出重新编译“布哈林言论”的任务。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不同,托洛茨基从1929年起再次流亡国外,他的大部分著作在西方比较容易找到,而布哈林一直留在国内,他的早期著作还可以在国外找到,但大部分著作在他遭镇压之后就都被焚毁或封存在苏联国内少数图书馆的特藏库(如位于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图书馆),中国此类图书很少见。不过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收藏有全套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这是苏共马列研究院送给我们的。因此在编译过程中我们采用笨办法,逐日逐期翻阅《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我们先开

出要寻找的苏联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名单,如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皮达可夫、拉狄克等,然后各人负责一个时段,逐日查找,发现他们的文章,就记下文章的篇名和主要内容,特别是认为有问题的内容,供下一步选材用。《真理报》的开本比较大,我们查阅的又是合订本,无法趴在桌子上阅读,所以请机关的木匠师傅专门制作一种可以升降的架子以便于翻阅。有的文章没有署作者的全名,而仅仅是几个字母,如 H.Б.,这就需要设法辨识。布哈林言论中的许多文章就是这样挑选出来的。编译局收藏的原版《真理报》上还经常有被剪去的文章(所以在我国影印的《真理报》上可以发现不少“天窗”),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文章,有时连斯大林的文章也被剪去,如他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写的文章 *Октябрьский переворот* (《真理报》1918年11月6日,中译本为《十月革命》),由于高度评价托洛茨基在组织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而被剪掉。英国作家奥威尔写的小说《1984年》中描绘了“真理部”修改历史的做法,看来并非虚构。由于找不到俄文本,“言论”中的有些著作不得不从德文和英文转译,如《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由周亮勋从德文译出,《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由杨彦君译自英文。这些从西文转译的文章直到80年代初我们编译三卷本《布哈林文选》的时候才找到俄文本,从原文直接译出。

选取的文章都是受到列宁和斯大林批评过的,在每一篇的“编者按”中都会引用列宁和斯大林批评该文的言论。这是必须的,可以说是该书的“通行证”。

《布哈林言论》编选完成后需要写“前言”,有几个草稿都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找我来写。我手头的《布哈林言论》一书在“前言”末尾手写了一个日期:“1975年5月”,这应是前言完稿的日期。

与编选原则以及“编者按”一致,“前言”的基本写法也是以列宁、斯大林批判布哈林的言论为衡量标准,而不管布哈林的真实思想和所作的论证,更不管时代背景。这种写法是强词夺理的,是“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的写法。实际上如果仔细推敲,那么不仅斯大林对布哈林的批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是列宁对布哈林的某些指责也不是完全准确无误的,例如列宁在国家问题上指责布哈林“半无政府主义”至少是一场误会,布哈林提出“炸毁”资产阶级国家并非无政府主义,而是直接引用了恩格斯的“炸毁”说法,而列宁似乎还没有注意到恩格斯“炸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提法。前言的许多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不过如上所述,它起了“通行证”的作

用,没有这样的“通行证”,“言论”是不可能问世的。只有一点值得一提,这就是没有再给布哈林戴“外国间谍”之类的帽子,那时候已经有充分根据可以认定布哈林并非什么外国间谍,他没有里通外国。

《布哈林言论》1976年3月由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出版。署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编译组。没有具体标明编译人员的名字,事隔30多年现在已经难以恢复编译者的完整名单了。

三、对布哈林的研究和布哈林著作的“脱灰”

由于编译布哈林言论和写前言,我较为系统地研读了布哈林的著作,对布哈林的观点已经觉得有些地方是有道理的,比斯大林的更有说服力。不过那时候,只能放在心里,是不能公开讲的。

就布哈林问题发表看法和写文章是“文革”结束以后的事了。“四人帮”倒台后,在清算四人帮的谬论中我觉得有三个问题需要正本清源。一个是“四人帮”鼓吹的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第二个是文化问题,还有一个是阶级斗争问题。前一个问题我写了一篇《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发表在1978年7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当天电台的新闻联播曾经转播该文的摘要),证明列宁从来就没有批判过所谓“唯生产力论”。《人民日报》负责理论版的汪子嵩先生告诉我,胡耀邦同志很关心这篇文章。“四人帮”否定人类文化,汪子嵩先生约我写一篇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文章,我和宋鸿训合写了一篇题为《列宁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批判》,发表在1977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写作过程中看到不少有关资料,随手编译了一本《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论争资料》,得到人民出版社沈昌文先生的帮助,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阶级斗争问题,1978年,我写了一篇《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遭到斯大林批判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辩护,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的趋势不是越来越尖锐,而应当是越来越缓和,直至“熄灭”。过去我们只知道斯大林对布哈林“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批判,并不知道布哈林本人的真正观点是什么,通过编译布哈林言论我看到了布哈林的真实说法,有充分根据说明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趋势的说法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写成后,由于事关重大,我交给局领导传看,在那里几乎压了一年。我找到一位领导问他的看法,他对我说,看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公开

发表要慎重。这等于说不能发,所以这篇文章就压在抽屉里。

1980年5月四川师范学院在成都举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出席会议,带去两个题目,一个是布哈林问题,一个是无产阶级文化派问题,请主办方选择,他们选了布哈林问题,所以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布哈林的若干问题的发言,重点谈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的发言在会上引起震动,公开为布哈林辩护,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苏联都是破天荒的。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不过都是底下的议论,会上没有争论。回到北京后,北京市共运史学会邀请我作了一次内容相同的报告。和我一起参加成都会议的曹特金女士回京后代表《世界历史》杂志约我写一篇关于布哈林的文章。我写了《有关布哈林的若干问题》的论文,寄给编辑部。文章很快就在《世界历史》1981年第一期头版发表。那时候全国处在解放思想的热潮之中,即使如此,杂志编辑部如此及时大胆地刊载我的这篇文章,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这篇文章已经不限于阶级斗争问题了,提纲挈领地涉及布哈林同斯大林争论的所有基本问题,部分还涉及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评。如关于国家问题上的“半无政府主义”,“发财吧”的口号,“阶级斗争熄灭论”,“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等等。我觉得,布哈林不是外国间谍这类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清楚,重要的是他的一些理论观点的是非对错,布哈林提出的许多问题也是我们长期没有弄清楚甚至陷入谬误的问题,正本清源,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成都会议回来后,我建议我们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出一期“布哈林专辑”一则发表在其他刊物上难以刊载的文章,另外提供一些我们掌握的资料。1980年底专辑编成,1981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规定“只限国内发行”,这也是一种防护措施,比“内部发行”要宽一些。标注日期为1980年12月的“出版说明”写道:

关于布哈林的理论观点和“布哈林案件”,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开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

为了配合研究,特出版一期《布哈林专辑》。本专辑收录了有关研究布哈林理论观点的4篇论文,以及有关布哈林生平、案件、评价等资料。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是初步收录了一部分文章和资料,提供参考。

“布哈林专辑”刊发了我的上述《试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原篇名是《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蔡恺民的《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观点初探》也颇有新意。蔡恺民这时候开始研究苏联20年代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展开的论战,这场论战实质上就是维护新经济政策还是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争论,而经济平衡发展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趁此机会记一下两位逝去的同志,以资纪念。一位是在1975年因病去世的杨树莲同志,她参加了第一次布哈林言论的编译工作,还着手翻译1927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中的“布哈林”条,该条目写于1927年,那时布哈林处于鼎盛时期,对布哈林的介绍比较客观真实,且篇幅甚大,内容丰富。可惜杨树莲还没有译完就不幸早逝。为表纪念我替她译完了这篇长文,遗憾的是在“专辑”中被署名为“杨莲”,这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另一位是2012年8月10日去世的我局资深翻译家杨彦君同志。在编“布哈林专辑”的时候有些资料找不到俄文,只能从英文转译,专辑中的几篇英文资料都是他翻译的:《布哈林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布哈林和加米涅夫会谈纪要》、《尼古拉也夫谈布哈林》,此外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企图逮捕和杀害列宁的问题》的辨正文章,给布哈林摘去企图逮捕和杀害列宁的帽子。这是一篇有材料有观点的论文,但没有收入论文栏。

也是在1980年,学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余大章(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曾在中央编译局工作)找我,说人民出版社约他翻译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邀我同他合作。我们各译一半,很快就完成了。我起草了“译者前言”,其中写道:

布哈林曾被列宁叫做“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著有大量的经济学著作,《过渡时期经济学》是其主要著作之一。作者在本书中尝试从理论观点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规律,揭示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以说,布哈林是当时除列宁之外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

1981年5月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解放后我国正式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布哈林的著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书的封面是绿灰色,而不再是灰色了,这是布哈林著作“脱灰”的开端。这一年《读书》杂志第二期发表学部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的评介文章,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思想界和出版界的进一步解放”。

顺便说一下,列宁对这本书有详细的批注,其中的某些批语曾经被斯大林用来批判和否定布哈林。对有列宁批注的著作,苏联的传统做法是只刊载批语所针对的语句,不刊载被批注的著作全文,往往把被批注的著作搞得支离破碎。最近我把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全文和重译的列宁批注放在一起，交重庆出版社出一本^①，这样读者将能在书中看到完整的布哈林和列宁的思想，也顺便纠正了批注的一些错译。

《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出版学界反应良好。这时候国内正在开展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学界有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理，这条标准也应当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检验历史人物言论是非的不是某领袖的指示或言论，而是历史的实践，在研究和编译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的著作和言论中必须用历史的实践来判断其是非。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深感原先编译的《布哈林言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不能适应研究的需要了，于是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了一部三卷本的《布哈林文选》。

这部书的选材已经超出列宁和斯大林所批判的范围，而是着眼于完整反映布哈林思想和理论主张。我们把最主要的文章，即布哈林论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文章先编成两本，交人民出版社，准备以后陆续编下去，但人民出版社把这两册作为《布哈林文选》的“上册”和“中册”，这就断了我们陆续出多册文选的后路，最后只出了一本“下册”，主要收入布哈林十月革命前的有关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的。上、中两册于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一个简单的“出版说明”，说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既无赞词，也无贬词。这两册主要由周邦媛和我主持，我负责选材，她组织翻译。下册由宋鸿训主持编译，稍后于1983年出版。仅就这三册而言，其所收资料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最丰富的布哈林文集。

这是公开出版的《布哈林文选》，封面也“脱灰”变颜色了，人民出版社出的第一版的封面是三分之二棕色加三分之一的浅蓝色，1988年东方出版社再版时用的是偏红的豆沙色，“出版说明”也加长了一些，说他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活动家，较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简历。

我在北京共运史学会做关于布哈林问题的报告的时候，有与会者提供信息，意大利罗马要举行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学部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将出席，建议

^① 布哈林著、列宁批注《过渡时期经济学》，郑异凡、余大章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

我也设法与会。但那时编译局还没有派人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先例,只能作罢。其实那时如能与会,中国学者是有许多话可说的。苏绍智回国后到各单位介绍会议内容,很受欢迎,对国内了解布哈林问题的真相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此基础上马列所在1981年底举办了一个“布哈林研讨班”,有全国各高等院校、研究机关的二十来人参加。我和我局的蔡恺民、宋鸿训、江显藩也参加了研讨班。对多数人来说,布哈林问题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不知如何着手。我们在研讨班介绍了布哈林的生平经历和主要观点,提出新的评价。苏绍智对编译局副局长林基洲说,多亏了郑异凡等人报告,否则这个研讨班真不知道怎样办下去。研讨班对推动全国布哈林问题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由于参加者多数是高等院校的老师,他们回去后在讲课中改变了对布哈林以及联共党史中的某些问题的提法,推动了国际共运史研究的深入。

布哈林问题的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的冤案平反,还为研究斯大林模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说明苏联历史上除了斯大林模式还存在过另一种选择,即布哈林所捍卫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布哈林的理论遗产中也有不少可以借鉴的东西。对布哈林的重新评价是苏联史研究的重要突破点,也是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开端之一。

中国的80年代还是多事之秋,布哈林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84年《世界历史》编辑部组织出版《苏联现代史论文集》,约我写了一篇《论布哈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不料稿子送到人民出版社后,出版社怎么也不收这篇文章。这时有关布哈林的文章在报刊上已经不罕见了,我对此感到非常不解。近日读沈昌文的《最后的晚餐》,看到其中《清理旧物的感想》一文中提到,《读书》的执行副主编史枚先生曾谋求为布哈林恢复名誉,到处找高级干部陈说,要求向中央反映。为此遭到“严厉苛责”,这说明布哈林问题并没有完全解禁!《世界历史》杂志只好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了。当时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世界历史》主编朱庭光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短论《没有必要作茧自缚》。关于这篇文章,我在《世界历史》创刊20周年的座谈会上旧事重提,说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它借布哈林之题发挥,提出必须把学者的学术见解同代表党和国家的对外发言明确分开,在历史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必要作茧自缚。马克思主义必须随时代的推移和实践的积累而发展,历史科学也不例外。要勇于并善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选择新的历史课题,对

多年争论或者不敢问津的老问题提出新的答案。评论触及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影响我国世界史,特别是苏联史研究中的一个几乎是积重难返的问题。这种思维定式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成果的发表。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苏联史研究,特别是布哈林问题的研究是走在苏联学界前面的,我们对许多在苏联还是禁区的问题展开了探讨和研究。这表明,布哈林在中国实际上已经恢复了名誉,而苏联直到1988年才给布哈林正式平反,出现俄文本的《布哈林选集》之类的著作,掀起“布哈林热”。

1988年10月联邦德国贝格曼等几位左派教授发起举办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这一年是布哈林诞生100周年,遇害50周年,又适逢获得正式平反,因此是很有意义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有苏联、东欧、西方的学者,我和殷叙彝应邀与会,提交了由我起草的两篇论文:《重评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布哈林研究在中国》(此文署名殷叙彝和郑异凡)。会场上有一个布哈林著作的小型展览,我们展出了中文版三卷本的《布哈林文选》、我与余大章合译的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还有我的几篇关于布哈林的论文,引起外国同行的很大兴趣,特别是三卷本的文选是迄今为止收入布哈林文章最多最全的一部文集。会后出版了由特·贝尔格曼和格·沙费尔主编的论文集《全党喜欢的人物。社会主义的理论家 and 实践者》。得到德方的赞助,此书由我组织翻译成中文,以《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书名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拿了赞助费,印了100册,把书全给了我们,市面上是见不着的。^①

1988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文章《布哈林研究在中国》(署名夏风),算是给10年的研究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

我一直没有中断对布哈林问题的研究,1997年我的专著《布哈林论稿》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常言道“十年磨一剑”,此书不止磨了10年,从搜集材料到出书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我是相信“慢工出细活”的!后来此书作了一些修订,改名《布哈林论》,于2006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再版。对我来说,布哈林研究才算画了一个句号。

不过布哈林著作的出版工作并未停止,苏联解体后从斯大林档案库里找到三

^① 《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本布哈林狱中所写的手稿：《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和小说《时代》。德国的贝尔格曼教授非常希望此书能够在中国出版，给我们提供了俄文本。此三书分别由郑异凡、孟广钧和赵永穆译成中文，20世纪末交给辽宁教育出版社，该出版社由于机构调整迟迟不能出书，后书稿转入中央编译出版社，仍然长期拖着出不了书，最近转交重庆出版社，但愿不久能够问世。

进入21世纪，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社会主义思想史文选”，让我编选《布哈林文选》和《托洛茨基文选》，交稿后，人民出版社又把它们列入《人民文库》，现在《托洛茨基文选》已经问世，《布哈林文选》也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人物的著作，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重要遗产保存下来，供人们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世纪》2013年第4期